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 鲍威尔文选

〔奥〕奥托·鲍威尔 著 殷叙彝 编

 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ISBN 978-7-01-006989-0



9 787010 069890 >

定价：46.00元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译著

# 鲍威尔文选

[奥] 奥托·鲍威尔 著 殷叙彝 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张 红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鲍威尔文选/殷叙彝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人民文库)

ISBN 978-7-01-006989-0

I. 鲍… II. 殷… III. 鲍威尔, C. L. —选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378 号

## 鲍威尔文选

BAOWEIER WENXUAN

殷叙彝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7.5

字数:39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6989-0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人民文库》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连儒 王善迈 止 庵 田士章 叶秀山  
庄浦明 庄福龄 张立文 张世英 张作耀  
张惠卿 张静如 吴道弘 陶文钊 顾锦屏  
蔡美彪 薛德震

主 任 黄书元

副主任 陈有和 张小平 任 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国根 李春生 乔还田 刘丽华  
张文勇 张振明 张耀铭 陈亚明  
陈鹏鸣 郇中建 喻 阳

## 《人民文库》出版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

“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披沙拣金，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

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首批出版 100 余种，准备用两年时间出齐。此后，我们还将根据读者需求，精选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陆续出版。

由于文库入选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一方面为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我们将原来的繁体字、竖排本改为简体字、横排本；另一方面，为尽可能保留原书风貌，对于有些入选文库作品的版式、编排，姑仍其旧。这样做，也许有“偷懒”之嫌，但却是我们让读者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体味优秀作品恒久价值的一片用心。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公益性出版单位，我们深知人民出版社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多出书、出好书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我们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再创人民出版社的辉煌。

《人民文库》编委会

## 出版说明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活动家和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文本或其片断,这些文本能够“客观地”反映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应该说是他们的思想的要旨之所在。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过程,其实就是一部实践和思想相互作用的人类现代社会史的主流之一。在其中,思想对于实践的认识、理解、总结,以及对其可能的发展路向的预测、从而对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枢机。

所以,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是理解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然”的深层理由,也是理解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的思想根据的基础方法。

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具有震撼力的、伟大的当代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事业在当今正引领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大方向。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事业也就包含着宏大的艰巨性和深刻的复杂性:在蓬勃前进的同时确实也面临着许许多多具体的困难和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记得古人的几句话:“温故而知新”、“前车之辙,后车之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依据这些宝贵的方法论,在以积极的实践态度大力推进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我们还应该以积极的理论态度,放开眼界,扩大胸怀,重温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激活历史上诸多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肯定

会对我们思考当前的迫切问题有所启迪。而从理论研究的高层次来说,盛世治史,在新的历史意识的视域中,重新反思、解读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史的诸多重要文献,实乃推进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之必需,实乃推动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之必需。

当然,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两点,提请读者注意:

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著作文本,都是我们认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我们相信读者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他们作出正确的、从而也是科学的和客观的理解和评价;我们提倡对具体思想根据具体时代条件和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由于我们学术水平有限,所选人物和其文献的文本是否得当,敬请尊敬的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把选编工作做得更好。

2008年4月

## 编者说明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 1881—1938)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起任该党的国会党团秘书,同年参与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斗争》月刊并任编辑,后又任维也纳《工人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俄国前线被俘,1917年7月获释,9月回维也纳。1918年10月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1919年10月退出政府。1920年以后一直为国会议员。1923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立后一直是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局委员。1934年社会民主党被奥地利政府查禁后,为逃避德、奥法西斯政权的迫害流亡到捷克,1938年又逃到巴黎,不久病故。

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理论家如鲁道夫·希法亭、麦克斯·阿德勒等曾分别从哲学、经济学、法学、民族问题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和论述,并作了一些修正,形成了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鲍威尔在《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民族问题理论,并对社会民主党在奥匈帝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政策提出建议。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他主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落后国家则应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他反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又肯定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主张在国际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保卫苏联,并且支持共产国际提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晚年他主张布尔什维主义与改良社会主义应当互相让步和调和,形成“整体社会主义”,因

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奥等国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认为他是“第三条道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本书所选鲍威尔著作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哲学:《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第二,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三,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苏俄的新方针》、给考茨基的几封信等。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到社会主义之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等。大部分著作都是全文收录。《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二书篇幅较大,所以只能选录一些主要章节。还有几篇著作也删去一部分。但是所有选译的部分都是完整的章节,是可以全面反映作者的有关观点的。

《到社会主义之路》、《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和《苏俄的新方针》这三本著作采用三联书店分别于1964年、1978年和1977年出版的单行本。《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的大部分译文是专为本书新译的,一小部分选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译的《鲍威尔言论》(三联书店1978年出版)。其余译文全部选自《鲍威尔言论》。当年参加《鲍威尔言论》编译工作的有殷叙彝、杨威理、李宗禹、李兴耕、周家碧、周懋庸、于沪生、唐春华等。因年代相隔较久,大多数文章的原译者已无法确定,所以不能在篇后一一注明。

原文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都已按照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最新译文校对。

殷叙彝

2005年6月

#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编者说明 .....	1
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摘录)(1907年) .....	1
第一章 民族 .....	1
第一节 民族性格 .....	1
第十节 民族的概念 .....	9
第三章 多民族国家 .....	33
第二十节 工人阶级与民族问题 .....	33
第六章 民族原则的变化 .....	51
第三十节 社会主义和民族原则 .....	51
第七章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 .....	62
第三十一节 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	62
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摘录)(1916年) .....	65
给考茨基的信(1917年) .....	76
给考茨基的信(1918年) .....	79
布尔什维克和我们(1918年) .....	81
到社会主义之路(1919年) .....	94
一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	94
二 大工业企业的公有化 .....	99
三 工业企业的组织工作 .....	102
四 工人委员会 .....	106



五 大地产的公有化	109
六 个体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化	113
七 住宅用地和家务的社会主义化	117
八 银行的公有化	119
九 剥夺剥夺者	122
十 社会主义化的先决条件	125
考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1919年)	129
给考茨基的信(1920年)	138
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年)	141
序言	141
第一章 俄国革命的社会前提	144
1. 农奴制的废除	144
2. 土地公社	150
3. 俄国农业的封建性质	154
4. 工业化和贫困化	158
第二章 俄国革命的社会内容	163
5. 三次革命	163
6. 土地革命	166
7. 农民和共产主义	171
8. 苏维埃宪法的本质	179
9. 工业的国有化	189
10. 俄国革命的历史地位	200
第三章 欧洲革命问题	207
11. 工业国的社会革命	207
12. 工业民主制	223
13. 财产的社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	234
14. 专政和民主	244
15. 德国革命	251
苏俄的新方针(1921年)	256

序言 .....	256
1. 苏维埃共和国的第四年 .....	259
2. 资本主义贸易和苏维埃资产阶级 .....	264
3. 工业和租让 .....	269
4. 专政的历史意义 .....	274
取得政权的斗争(摘录)(1924年) .....	281
尤利·马尔托夫(1924年) .....	295
阶级力量的均势(1924年) .....	300
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马赛代表大会上关于东方问题的 报告(1925年) .....	316
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摘录)(1926年) .....	324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27年) .....	327
给考茨基的信(1931年) .....	331
我们布尔什维克——对多尔富斯的回答(1932年) .....	333
民主制和社会主义(1934年) .....	338
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摘录)(1936年) .....	356
——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	
社会主义的危机 .....	356
革命的和改良的社会主义 .....	356
两次革命 .....	378
社会主义的分裂 .....	391
整体社会主义 .....	410

# 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摘录)

(1907年)

## 第一章 民 族

### 第一节 民族性格

到目前为止,科学几乎把民族问题完全留给抒情诗人、杂文作家以及国民大会中、议会里和啤酒桌旁的演说家去议论。在一个伟大的民族斗争的时代,我们才刚刚开始探讨一个令人满意的民族本质理论。而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种理论。我们大家都受着民族意识、民族浪漫主义的影响,在我们中间,哪怕只要用德语说出这个词儿,就很少有人不会同时引起一种特别的感情上的共鸣。凡是想理解民族意识并加以评论的人,都不能避开民族的本质这个问题。

白哲特<sup>①</sup>说:民族是许多现象中的一种,在还没有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扼要地说明这些现象。<sup>②</sup>然而对此科学不能感到满意,当它要谈论民族时,它不能不提

---

① 瓦特·白哲特(1826—1877)——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编者注

② 白哲特《民族的起源》1874年莱比锡德文版第25页。

民族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并不像粗粗一看那样容易回答。民族是一个由同一血统的人组成的共同体吗？但是意大利人是伊特刺斯坎人、罗马人、克勒特人、日耳曼人、希腊人和萨拉森人的后裔，今天的法兰西人是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的后裔，今天的德意志人是日耳曼人、克勒特人和斯拉夫人的后裔。民族是把人们联合成一个民族的那种语言的共同体吗？然而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丹麦人和挪威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特人说同一语言，却并不因此就是一个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仍旧是一个民族。把民族联合起来的是对共同属性的意识吗？但是难道提罗尔的农民因为从未意识到同东普鲁士人和波美拉尼亚人、同图林根人和爱尔萨斯人之间有共同的属性就不应当算是德意志人吗？而且，当德意志人想到他的德意志国民性时，他所意识到的又是什么呢？是什么使他属于德意志民族，是什么把他和其他德意志人联系在一起呢？在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共同属性之前，必须先存在着共同属性的一个客观特征。

民族问题只能从民族性格这一概念谈起。如果我们把随便哪一个德国人带到外国，例如带到英国人之中，他立即就会感觉到那是一些另外的人，是一些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感觉的人，这些人对同样的外界刺激的反应和通常在他周围的德国人的反应不同。使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身体特征和精神特征的复合体，我们暂时称之为他们的民族性格；此外，所有的民族都具有使我们把他们大家看作人类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每个民族的各个阶级、各种职业、每个人都具有使他们互相有所区别的个人属性、特征。但是普通的德国人同普通的英国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尽管他们作为人类，作为同一个阶级或同一种职业的成员相互间具有许多共同点，而一个英国人同其他英国人不管有多大的个人的或社会的差别，他们之间却肯定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谁要是打算否认这一点，民族对他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在柏林并且能说德语的英国人会因此成为一个德国人吗？

如果有人用各民族的命运、各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各民族的社会

组织这些方面的差异来说明他们的差异,那么这并不是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提出异议。例如考茨基试图说明,俄国人的顽强和韧性是由于俄国人民的多数由农民组成,而农田耕作到处都会造成迟钝的、但是坚韧和顽强的性质,那么这并不是反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sup>①</sup> 因为这样说并没有否认俄罗斯特有的民族性格的存在,不如说是力图说明俄国人的民族特性。

但是许多人总是急于去论述民族性格的起源,弄得自己没有片刻的安宁,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一概念遭到滥用而造成的。

首先有人错误地断定民族性格具有一种持续性,这已经被历史驳倒了。不能否认,塔西佗<sup>②</sup>时代的日耳曼人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区别于同一时代的其他民族例如罗马人的性格特征。同样也不能否认,我们时代的德国人具有某些共同的、和其他民族不同的性格特征,不管这些性格特征是怎样形成的。但是毕竟没有一个行家会因此否认,今天的德国人同他的时代的其他文明民族的共同之处比他同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的共同之处要多得多。

民族性格是可变的。性格的共同性把某一个时代中的一个民族的成员联系起来,但决不把我们时代的民族同它在两千年或三千年前的祖先联系起来。当我们谈论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时,我们所想的是某一个世纪或某一个十年期间的德国人的共同性格特征。

人们常常也错误地忽视,除了民族的性格共同体外,还存在着一系列其他的性格共同体,其中阶级的性格共同体和职业的性格共同体是远为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的某些特征和任何一个别的德国人的完全相同,这就把德国人联合成为一个民族的性格共同体。但是德国工人同他们在其他所有民族中的阶级兄弟具有共同的特征,这就使他们成为这个阶级的国际的性格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德国的排字工人和其他所

---

<sup>①</sup> 《新时代》第23年卷,第2册,第464页。

<sup>②</sup> 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约55—120)——罗马最著名的史学家和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活动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的作者。——编者注

有民族的排字工人无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他们属于一个国际的职业共同体。

阶级的性格共同体是比民族的性格共同体更加密切,还是相反,这个问题或许是多余的。衡量这类共同体的密切程度的任何客观标准是没有的。<sup>①</sup>

一种缺乏批判力的想法认为,可以用民族性格本身来解释一个民族的某种行动方式,例如有人认为,法国人同他们的高卢祖先一样是像恺撒所说的那样不断“致力于变革”的,法国体制的迅速变换就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但是,民族性格的这一概念因此就更加被歪曲了。

恺撒观察了各高卢部族和单个的高卢人的一系列行动;观察他们如何迁移自己的住址,如何改变自己的体制,如何缔结和解除友谊和盟约。这位观察者从这些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观察到的具体行动的每一件中重新看到了他在先前的行动中就已经看到过的某种东西,并且强调了他们的全部行动中共同的东西,于是他说:“他们不断致力于变革。”因此这一判断丝毫不涉及对原因的说明,而是单纯的概括,是强调各种具体的单一行动的共同特征。我们描写民族性格,并不是以此来说明某一个行动的原因,而是仅仅描述民族和民族同胞的大量行动的共同特征是什么。现在,过了19个世纪以后,一个历史学家看到法国的政体形式的迅速变动并由此而回想到恺撒认为高卢人“不断致力于变革”的这一判断。难道他用这个所谓的由高卢人继承下来的法国人的民族性格说明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吗?全然没有。他只是确认,今天法国人的行动也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就是恺撒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观察到的高卢人的行动的共同特征。因此,这决不

---

<sup>①</sup> 德国工人是同德国资产阶级还是同法国工人有更多的共同的性格特征,这个问题似乎同德国工人应当推行阶级政策还是推行民族政策、他应当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国际资本主义还是联合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其他民族这个问题不是一回事。因为对后一个问题作出决定时的考虑和探讨不同的性格共同体的密切程度时的考虑完全不同。

是原因的说明,而是单纯再认识一种在原先就已经观察到的各种不同的单一行动的共同特征。高卢人为何致力于革新,法国人为何迅速改变其政体,当然并未由此得到说明。用民族性格去解释一种行动的尝试所依据的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即毫无道理地把对各种不同行动的共同特征的观察变成一种因果关系。

凡是认为能够用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去解释每个人的行动的人,例如用犹太人的民族性格去“说明”每个犹太人的思想方式和愿望的人,也犯了同样的思想错误。威·桑巴特<sup>①</sup>认为,犹太人突出地表现出抽象思维方面的特殊天赋,即对任何质的规定性的冷漠态度,这种态度既表现在犹太人的宗教里,也表现在犹太学者的脑力劳动中,也表现在对于货币的估价(把它看成摆脱一切质的规定性的价值)上。<sup>②</sup>这样一来,可能就会有人认为可以用这一人们熟悉的犹太人的民族性格去“解释”犹太人科恩或者犹太人迈尔的行动方式了。实际上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桑巴特观察了他从历史上知道的或者他本人熟识的单个的犹太人的无数的单个行动并从他们的行动中抽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如果说我们观察了个别的犹太人并在他身上再次发现抽象思维方面的那种特殊天赋的话,那么我们也不是以此来说明单个的犹太人的行动方式,而只是从这种行动方式中重新认识了桑巴特从前在其他犹太人的行动中已经观察到的那种特征。但是这种一致性是怎样产生的,自然并未由此得到丝毫的说明。

民族是一个相对的性格共同体;它之所以是性格共同体,是因为在某一个时代的广大的民族同胞身上能够观察到一系列一致的特征,并且因为,尽管所有的民族都具有一系列作为人类的共同特征,然而每个民族都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它之所以不是一个绝对的而只是一个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是因为各个民族同胞尽管在整

---

<sup>①</sup> 威纳尔·桑巴特(1863—1941)——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柏林大学教授。——编者注

<sup>②</sup> 威·桑巴特:《十九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1903年柏林德文版第128页。

个民族的共同特征上完全一致,此外确实还有把他们互相区别开来的个人特征(以及地域的、阶级的和职业的特征)。民族具有一种民族性格。但是这种民族性格只是各个人的行动方式的特征的相对共同性,并不是对这些个人的行动方式的说明。民族性格没有作出说明,它却需要得到说明。科学在确认民族性格的差别时并没有解决民族这一问题,而只是刚刚提出了这一问题。那种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是怎样形成的,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全体民族同胞尽管有种种的个人差异,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为什么他们尽管同其他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有着种种相似之处,却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成员,这正是科学必须去理解的。

如果人们打算用一种十分神秘的民族精神、一种“民族灵魂”来解释一个民族的行动,那么他并没有完成对民族同胞的性格的相对共同性的原因作出说明的任务,而是回避了这一任务。民族精神是浪漫主义者的传统的爱好。历史法学派把它引进科学。历史法学派说明,民族精神是造成各个个人的法律信念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或者本身就是法律,或者毕竟具有制定法律的能力。<sup>①</sup>后来人们认为不仅可以把法,而且可以把民族的全部行动、整个命运都理解成民族精神的表现。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一种民族灵魂是民族的基础、民族的实质,是一切变动中的恒久不变的内容,是寓于一切个人差别中的统一;个人只不过是这一精神实质的形态,只不过是它的表现方式。<sup>②</sup>

---

<sup>①</sup> 关于这一观点的错误,特别是关于法的起源问题,参看施坦姆勒《经济和法》1896年莱比锡德文版第315页及以下。

<sup>②</sup> 费希特更加深刻地表述了这一形而上学的民族概念。他说:“在社会中共同继续生活下去并且不断在自然方面和精神方面从自己产生自己的人们的整体就是一个民族。这个整体是统统受由它产生的神性的发展的某种特殊规律支配的。正是这一特殊规律的共同性才使这一群人在永恒的世界中并且从而在有限时间的世界中结合成一个自然的并且自身得到充分实现的整体。(《对德国人民演说集》,莱比锡雷克拉姆德文版第116页。)根据这一看法,每个人只不过是神性的无数表现形式中的一种,但是神性是受种种规律支配的,而只有受到一个规律支配的神性的表现形式才构成民族。民族精神是神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个人是民族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费希特虽然在这以前已



这一民族唯灵论显然也是以一种推理错误为根据的。

我的心理现象,我的想法、感觉、意愿是我的直接经验的对象。从前的理性心理学把它们当成一种恒久不变的现象,一种特殊的对象的活动,也就是灵魂的现象和活动。但是康德的粉碎性批判却证明理性的心理学自认为能对这一对象作出的一切说明都是一种谬论的结果。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想把心理现象理解成是心灵实质的现象的那种理性心理学,而只有一种经验心理学了。这种心理学描述通过经验直接产生的表象、感觉、愿望等心理现象,并且力图从它们彼此之间的交互依存关系来理解它们。

如果对我来说,我自己的心理现象是通过经验直接产生的,那么与此相反,别人的心理现象却是推断出来的。因为我看不到别人的表象、感受、愿望,只看到他行动:说话,走路和站立,斗争和睡眠。但是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知道,身体的运动是有心理现象伴随的,因此我得出结论说,别人的情况也和我一样。别人身体的运动不可避免地会使我看成他们的由表象和感受决定的愿望所产生的行动。

理性心理学家把别人的这些心理现象当成一个特殊对象的产物,正如它把我自己的心理现象当成我的灵魂的行动一样。因此对它说来,一个人的灵魂对象怎样与另一个人的灵魂对象发生关系就成为一个问题。于是人们或者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把人们彼此之间的经验和关系当成灵魂与其他同样性质的、简单的和恒久不变的存在(Wesen)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表现形式,或者从普遍主义的角度(universalistisch)构想一种总的心灵,一种精神的整体(geistige Totalität),它在个别的心灵中只作为现象出现。民族精神、民族的唯灵论(所以主张的)民族心灵也是这个在个别心灵中仅仅作为现象出现的总的心灵的一个产儿(Nach-komme)。

---

经很接近正确的经验性的民族概念(见同上书第 52 页),却终于达到了民族的形而上学。康德以后的教条的唯心主义的特征是,它即使在能够从经验和历史的角度正确理解一个现象的地方,仍不满足于此,而是要使可以科学地作出正确规定的经验现象成为与它不同的形而上学的存在。

但是自从康德发表理性批判以来,我们已经不再知道任何心灵的实质(心理上发生的事本是可以当作它的活动来理解的),而仅仅知道经验的心理现象了,我们是通过这些现象的相互依存关系来理解它们的。因此我们不再把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理解成那些简单的心灵实质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不能理解成在各个心灵中显示的世界精神的一个实质,而我们的心理学的任务仅仅是对通过直接经验而产生的我们自己的表象、感觉和愿望以及通过间接经验而了解的其他人的(由经验给定的)个人的表象、感受和愿望,从它们彼此之间的交互依存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在康德对心灵概念作出批判以后,对于我们来说,“民族精神”只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幽灵而已。

在许多犹太人的行动方式中,某一个特征的一致性引起我的注意。民族唯灵论企图对这种一致性作出解释,它构想出一种统一的和恒久不变的实质,即犹太民族精神,并且这样理解犹太人行为的同一性:每一个单个的犹太人正是这一民族精神的体现。但什么是这一民族精神呢?要就是,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的词,它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尤其是不能说明像某一位科恩先生的行动这样具体的事物;要就是,如果我打算赋予它一个内容,我就必须把全部犹太人的行动的那一共同性附带加进去。但是如果犹太民族精神就是科恩和迈尔和勒维和所有它打算解释其行为的先生(不管他姓什名谁)的抽象的素质,那么它恰恰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既然科恩和迈尔之所以抽象地思维,是因为犹太精神体现在它们身上,而犹太精神之所以是抽象思维的素质,又是因为科恩和迈尔是抽象地思维的。这样一来,用民族精神来作出解释就成了同义反复,成了这样的分析性判断:我们打算解释某种事物,而应当加以解释的事物却已经存在于据称要作出的解释的事物之中了,所谓的原因只是应加解释的结果的一个抽象而已。

民族精神不能说明民族性格共同体,因为它本身只不过是转变成一个形而上学存在(Wesenheit)的、转变成一个幽灵的民族性格。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民族性格本身不是某一个个人的行动方式的解

释,而只不过是对其某一确定时代的民族同胞的行动方式的相对同一性的认识。它不是任何说明,它却需要加以说明。要说明性格的民族共同性,是科学的任务。

## 第十节 民族的概念

我们现在可以从积累的经验材料中作出一般的结论,从而把要探索的民族概念确定下来。在探讨之初,我们起先是把民族理解为相对的性格共同体的。我们现在可以更确切地把这个性格共同体的实质确定下来。

本书一开始,我们就把民族的性格暂时看作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把民族同胞彼此联合起来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身体特征和精神特征的总和。不过,这些不同的特征彼此绝不是等值的。

意志的规定性各不相同,无疑是属于民族性格的。在每一个认识过程中,意志表现为注意力,即在大量经验到的现象中只选择某些现象,只是有意识地感觉这些现象:如果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作同样一次旅行,那么,在回到家里时他们的收获是很不相同的;如果一个德国学者和一个英国学者打算研究同一个课题,那么,两个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将是很不相同的。但是意志更为直接地表现在任何一种决策上: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的行动会是不同的;他们对同一项工作的处理是不同的;如果他们想娱乐一下,他们选择的娱乐方式是不同的;如果他们是同样地富裕,他们选定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不同的,所要满足的需要也是不同的——所有这一切无疑形成民族性格的实质。

同样无疑的是,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表象群**:对正义和非正义的理解不同,对道德和不道德、对体面和不体面、对美和不美的观点不同,宗教不同和科学不同。但是,知识上的这些差别并不仅仅是同意志的差别相并列的,而是要确定意志的差别,向我们说明意志为什么会有差别。因为每个英国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学到的东西不同,所受的文化影响不同,所以英国人和德国人由同样刺激引起的运动是不同的。因此,不同的表象和不同的意志趋向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至于**身体特征**的情况也是相似的。不同的颅骨结构可以使人类学家发生兴趣,但对历史研究者、社会理论家、政论家来说,只要他们还不能把不同的身体类型也与不同的心理特征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差别就是无所谓的。经验表明,身体结构的差别或者直接伴随着在同样情况下作出的决策的差别,或者伴随着认识能力和认识方式的差别,而这一种差别本身又产生决策和意志的差别。如果反犹太主义者不是认为,总有某种心理特征同犹太人的身体类型相联系,那么,甚至他也会觉得犹太人的鼻子是很无所谓的。使我们关心任何一种人类学类型上的身体特征的只是这一情况,即人类学特征的差别伴随着心理特征的差别,归根到底间接或直接地伴随着意志趋向的差别,尽管我们还不能发现身体结构和意志趋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全部身体特征也并不是和意志趋向的差别并列的,而是与之有着功能上的联系,在这种联系后面也许隐藏着一种因果关系。

这样,我们便得出了**比较确切的民族性格的概念**。这就是说,民族性格首先不是指的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身体特征和精神特征的总和,而仅仅是指**意志趋向的差别**、也就是指同样的刺激引起不同的运动、同样的外界情况引起不同的决策这一事实。但是,意志趋向的这种差别是由一个民族所获得的表象的差别或者一个民族在生存斗争中所形成的身体特点的差别决定的。<sup>①</sup>

我们曾经问道,这样的一种性格共同体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对问题的答复是,同样的动因造成了同样的性格。因此我们把民族确定为命

---

<sup>①</sup> 哈吕·格拉弗·克斯莱尔还想更确切地表述民族性格这个概念。他也是把对同样的外界现象采取不同态度的能力与具有不同的表象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的。但是,他认为区别各民族的那一特征仅仅在于对某一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快慢,民族性格在他看来成了特殊的“心灵节拍”(1906年4月7日《未来报》)。毫无疑问,不同的意志敏捷程度是那些特征之一,我们主张用意志趋向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些特征并且把它们理解成狭义的民族性格;众所周知,法国人灵敏,荷兰人迟钝。当然,问题不仅在于某一种外界刺激引起我们的运动是快是慢,而且在于这一运动采取什么方向,具有多大力量。这就是说,克斯莱尔对民族性格概念的表述是过于狭隘了。

运共同体。

但是现在应当比较严格地表述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要知道,共同性不是简单地等于同一性。例如,德国在19世纪经受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像英国一样。从这方面发生作用的、对人们的性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在两个国家是同样的。但是德国人仍未因此而成为英国人。因为命运共同体不是意味着遭受同样的命运,而是意味着在经常交往和不断互相影响中共同经历同样的命运。英国人和德国人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互相的关系又仅仅是松散的。这样,同样的动力可能使他们彼此比以前更加相似,但决不会使他们变成一个民族。不是命运的同一性,而只是共同经历和遭遇一种命运,即命运的共同性造成一个民族。按照康德的说法,共同性意味着“普遍的互相影响”。(经验的第三类推:共同性的原理)只是在普遍的互相影响和经常的互相联系下经历的命运才造成一个民族。

民族不是单纯的命运同一性的产物,而只是产生并存在于命运的共同性即同命运的人们经常的互相影响之中,这一点就使民族同其他一切性格共同体区别开来。举例来说,阶级的性格共同体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共同体。各国无产者具有同样的性格特点。尽管有种种差别,但是同样的阶级地位使德国的和英国的、法国的和俄国的、美国的和澳大利亚的工人具有同样的性格特点,即同样的斗争热情、同样的革命信念、同样的阶级道德、同样的政治志趣。但是,这里的性格共同体不是由命运的共同性造成的,而是由命运的同一性造成的。尽管德国工人和英国工人之间存在着交往关系,但是这些关系毕竟比英国工人和英国资产者由于以下的原因而建立的关系松散得多;他们二者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读着同样的墙头告示、同样的报纸,参加同样的政治活动或体育活动,他们本身偶尔互相对话,或者双方都和同一些人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对话。语言是交往的工具。如果英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之间发生了比英国资产者和英国工人之间更为密切的交往,那么,有着共同语言的就会是德国工人和英国工人,而不是英国工人和英国资产者了。可见,一

个民族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共同的交往,即在间接和直接的互相交往中经常互相影响,这一事实把民族同阶级的性格共同体区别开来了。也许应当说,生活方式和命运的影响决定了不同民族的工人的同一性比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的同一性更多,因此按性格来说,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比同一个国家的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相似之处也得多得多。但是尽管如此,民族的性格共同体仍旧与阶级的性格共同体不同,因为前者来源于命运共同体,后者仅仅来源于命运的同一性。

因此可以下定义说,民族不是从命运同一性产生的而是从**命运共同性产生的性格共同体**。语言对民族的重要意义也就在此。我同我与之交往极为密切的人们创造一种共同的语言;而我同我与之有着共同语言的人们交往极为密切。

我们知道有两种手段,通过它们,人的生存斗争条件作为有效的原因使人们团结成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

一条道路是自然遗传。祖先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把后代彼此联系在一起胚胎原生质的质的规定性:通过自然选择的途径决定哪些特性得到遗传,哪些特性被排除。因此祖先的生存条件决定了血缘后代的遗传特性。在这里,民族可以说是起源共同体:按照人民的说法它们是通过共同的血缘,按照科学家的教导,它们是通过胚胎原生质的共同性而确立起来的。但是这些通过共同的起源而确立起来的民族同胞只有在他们彼此之间保持交往共同性的时候,只有在他们通过通婚而保持他们的血缘共同性时,才能保持为一个民族。民族同胞之间的性的联系一旦停止,立刻就会出现从到那时为止的统一民族中产生新的彼此不同的性格共同体的倾向。要维持作为自然共同体的民族,不仅需要由共同起源产生的血缘共同性,而且需要通过持续的血缘融合来保持这一共同性。

但是个人的性格从来不仅仅是遗传的特性构成的共性,它始终也是由传交给他并且对他产生影响的文化决定的:由他所受的教育,他所服从的法律,他据以规范自己生活的习俗,由传统的对神和世界的看

法,对道德和非道德、美好和丑恶的看法,由对他产生影响的宗教、哲学、科学、艺术、政治,——而尤其是由他在自己的民族同胞间进行生存斗争,维持生计的方式决定的,而这一方式又是决定上述所有的现象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达到第二种重大的决定个人的生存斗争的手段:口头的文化遗产传授。民族从来不仅仅是民族共同体,而始终是文化共同体。在这里,决定个人的也首先是从前世代的命运:儿童要受现存社会的有效影响的支配,他是出生在现存社会的经济生活、法律和其精神文化之中的。但是在这一方面也只有持续的交往共同性才能保持性格的共同性。语言是重要的交往工具:它是教育的工具,一切经济交往和一切精神交往的工具。凡是通过语言有可能达到互相理解的地方,也就是文化能产生影响的领域。只有在语言的共同性达到的范围,这种交往才是密切的。交往共同性和语言彼此互为条件:语言是一切密切交往的条件,正因如此,交往的必要性产生了共同的语言,正如另一方面,随着交往共同性的破裂,语言也逐渐产生差别一样。我当然也可以学一种外语,却并不因此就会成为一个异民族的成员,因此这种外语永远不会像母语那样使我受到文化影响:通过母语传授的文化对我的童年也就是对接收能力最强的年代产生影响,首先形成了我的性格;所有后来的印象,当它们被我接受的时候,都要适应已经存在的个性,在它们被接受的过程本身中都有一个改变的过程。不仅如此,外语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像母语一样以同样完满的方式成为个人的财富,而在太多情况下,它的最细微、最深刻的作用是丧失了:即使对于有教养的德国人,英国和法国的艺术品也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才会与德国的艺术品同样的力量产生影响。不能想象一个民族在缺乏共同语言这一人类交往的最重要工具的情况下还能持久保持为文化共同体。反过来说,语言的共同性还不是民族统一性的保证:丹麦人和挪威人尽管有共同语言,却受不同文化的影响;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信奉希腊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虽然有共同语言,却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但是随着宗教使人们在文化上分离的影响的消失,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

亚人就凭借由相同的语言促成的交往共同性,凭借他们所受到的同样性质的文化影响而形成了一个民族。由此也产生了统一语言对方言所取得的胜利的民族意义:密切交往的必要性产生于统一的语言,而统一语言的存在又使所有掌握这一语言的人经受同样的文化影响。彼此之间的互相影响使他们统一成文化共同体。荷兰人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文化差别与语言共同性之间的关系:荷兰人是从德意志种族的三个部族形成的,却已不再属于德意志民族;与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完全不同的尼德兰国民经济的命运在那里创造了另外一种文化;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德意志人分离,他们切断了与德意志人的交往共同性:使他们自己互相联系的纽带太紧了,使他们与其他德意志种族联系的纽带太松了;于是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文化的工具,不再参与德意志民族通过德意志共同语言达到文化统一的过程。

自然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有可能是重合的:祖先的命运能够成为子孙的命运,这一方面是通过祖先性格的遗传,另一方面是通过由祖先发展的文化的传授。但是自然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不一定重合:自然的子孙与文化的子孙并不总是同一的。因为联合成自然共同体的只是出于同一起源的人们,而文化共同体却把在经常彼此交互影响的情况下接受共同文化影响的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这种文化影响愈是强大,单个的人从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财富所吸收的愈多,单个的人的特性受这一文化财富决定的程度愈大,他就愈能成为民族的一个成员,他从民族性格获得的份额就愈大,尽管他并不是凭借自然共同性而属于这个民族的。因此有意识地选择隶属于一个与我们在其中出生的民族不同的民族,甚至也是可能的。夏米索<sup>①</sup>关于他自己就是这样说的:“通过艺术、科学和宗教,我成了一个德国人。”

那么人类真正是如此分成各民族,以致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民族,没有人同时属于若干民族吗?仅仅由于人们通过起源与两个民族

---

<sup>①</sup> 阿德尔伯特·冯·夏米索(1781—1838)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编者注



发生自然联系并不能改变各民族的严格区分。在两个民族互相接触的边境地区,人们往往彼此混合,因此两个民族的血会以多种多样的混合方式在每一个人血管中流动。尽管如此,这通常不会引起民族的融合。在这里,使各民族尽管存在混血状态仍旧明显地区分开来的正是文化共同体的差别。奥地利的民族斗争为我们提供一个例子。谁认为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的斗争是一种种族斗争,就证明自己历史的无知。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中的农民也许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血统的纯粹性,但是进行民族斗争和成为民族斗争对象的那些阶层——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好几个世纪以来已经由于互相通婚而使血统混合到这样的程度,既无法谈到一个作为自然共同体的德意志民族,也无法谈到一个作为自然共同体的捷克民族了。尽管如此,各民族绝没有因此相互融合。由语言促成的文化差别使它们作为独立的、彼此严格分离的民族继续存在。但是如果一个个人也在两个或若干个民族的文化中获得同等的或几乎同等的份额,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边境地区,或者在若干民族毗邻而居的地区,这样的个人也是为数不少的。他们从儿童时代起就说两个民族的语言,他们受到两个民族的命运、两个民族的文化共同性的几乎同样的影响,因此他们就性格来说是两个民族的成员,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成为不是完全和彻底地属于任何民族的个人。因为受到两个或若干个民族的文化影响的个人,他们的性格是同样强度地受不同的民族文化影响的,他们不是仅仅把两个民族的性格特征联合在一起,而是具有了一种崭新的性格,正如化学的化合物展现出与组成它的每个元素的特性完全不同的情形一样。从文化上说是若干民族的儿女的那些个人之所以大多数不受人喜爱,遭到怀疑,在民族斗争时期甚至被当作叛徒、当作投敌者而受到鄙视,其深刻的原因也在于此:文化要素的混合造成一种新的性格,使文化混血儿在两个民族看来都像是外人,使他被看成与另一个民族的成员一样的异族人。但是如果说对文化混血儿的厌恶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人们毕竟不能因此受到误导。最伟大的人往往是在文化上受到两

个或若干民族影响的人。对于我们科学界的人物,对于我们伟大的艺术家们,经常有若干种民族文化氛围以几乎同样的强度产生影响。在卡尔·马克思这个人身上,四个伟大民族——犹太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历史凝固成个人的特性,而正因如此,他的个人事业能进入我们时代的所有伟大民族的历史,上一个世纪任何文化民族的历史离开他的事业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若干民族文化对同一个人产生的文化影响并不仅仅是作为个人现象,而是也作为群体现象出现的。例如,德意志文化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捷克民族起决定作用的。如果说,捷克人是说捷克语的德意志人,这肯定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而从民族的价值判断方式来说,这句话如果出自德意志人之口,当然不是指责,而是高度的赞扬。不过整个民族大批地接受外来的文化因素却从来不会产生各民族性格完全达到一致的后果,而至多只能减少它们的差别。因为外来因素永远不会以与本来的民族文化相同的力量对个人产生影响:它们决不会不加改动地被吸收,而是本身要在吸收过程中发生变化,也就是要适应已经存在的民族文化。这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民族统觉<sup>①</sup>现象。

人类的生存斗争的条件是产生作用的原因,而这同一个原因通过两种不同的手段使由语言共同性和交往共同性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结合成民族。这两种手段是:一方面,由生存斗争培育的特性遗传给血缘后裔,另一方面,人类的文化遗产流传下来。这一情况造成民族的表现形式(Erscheinungen)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使人很难认识有效的原因的统一性;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民族,在那里自然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是重合的,血缘后裔同时也是接受历史地产生的文化传统的人;我们也看到属于同一文化形态的天然的混血儿;还有那些在民族起源方面是统一的,性格却是由两种或多种民族文化形成的人们;最后还有这样的民族,它们不具备起源的共同性,却仅仅由文化的共同性融合成一个强大

---

① 统觉为心理学名词,指人在获得新感觉时对旧感觉的依赖。——编者注

的统一体(Einheit)。与此相反,如果没有文化共同性把出自同一起源的人们联合起来,他们就不会形成民族:民族同胞彼此之间不产生相互影响的民族是不存在的,而这种影响只有通过共同的语言这一工具,通过同一种文化财富的传统才是可能的。没有文化共同性的纯粹的自然共同体可能作为种族会使人类学家发生兴趣,但不能形成民族。人类生存斗争的条件可能也会以自然共同性为手段,但是必须总是而且无论如何要以文化共同性为手段产生民族。

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共同的文化所起的构建民族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至今已经知道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类型基本上有三种。

在我们的历史描述中第一种类型是以民族共产主义时代的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这个民族的所有民族同胞既是由共同的血缘,又是由祖先遗传的共同文化联系在一起。我们曾一再提到,这种民族统一性已随着向定居生活的过渡而瓦解了:各部族分开居住,生存斗争条件各不相同,互相通婚终止,因此遗传特性也分化了。但是遗传的共同文化也由不同的部族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发展。由此可见,民族本身孕育着瓦解的萌芽。

以社会阶级区别为基础的社会是民族的第二种类型。民族的大众进一步经受我们熟悉的分化过程:由于彼此之间没有两性关系,他们在肉体上日益产生差别;由于没有交往关系,他们把原来共同的语言发展成不同的方言;由于受不同的生存斗争条件支配,他们创造了不同性质的文化,而后者又造成性格上的差别。于是,随着遗传特性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愈来愈丧失原来的共同性,随着原来的共同文化被后来产生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掩盖和瓦解,民族的大众也愈来愈丧失民族的统一性,使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已不再是大众的血缘统一性和文化统一性,而是统治阶级的文化统一性,他们高踞大众之上,靠大众的劳动生活。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是通过两性关系和种种文化交往而互相结合的:中世纪的骑士、近代的受过教育的人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但是用

自己双手的劳动维持民族的广大群众——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却只不过是民族的“佃农”(Hintersassen)。

最后,第三种类型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使所有的民族同胞重新联合成自主的民族统一体。但是在这里使民族团结起来的不再是共同的起源,而是教育、劳动、文化享受的共同性。因此这一民族不再存在瓦解的危险,教育的共同性、对文化享受的参与、在共同体(Gemeinwesen)和社会劳动中的密切联系为民族提供了民族统一性的可靠保证。

由此可见,对我们来说,民族不再是僵化的事物,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发展在本质上是由人们为维持生计和保存(自己的)种(Art)而斗争的条件决定的。民族不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产生的,在这种状态中,人们不制造食物,而只是寻找食物,他们只是通过占有、占领所发现的无主地产而获得生计。民族是在人们通过劳动从自然界夺取他们所需要的物品的阶段才产生的。可见,民族的产生、每一个民族的特殊性格是受人的劳动方式、受他们所使用的劳动手段、受他们所拥有的生产力、受他们在生产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制约的。要把民族的产生、每一个民族的产生理解成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的一个部分——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已使我们具有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能力。

对民族的唯物论来说,民族是一个特殊的物质的实体,它具有创造民族性格共同性的神秘力量。因此,对民族的唯物论来说,人类的历史成为各种恒久的、不变的种族实质、遗传实质互相斗争和互相混合的历史。这一非科学的观察方式在最近几年特别是在戈比诺的影响下也显著地获得再生,但是达尔文主义对它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即使在那些特别重视遗传的种族性格的重要意义的人们中间,这样的观点也已得到传播“仅仅确认种族的差别是不够的,必须也对之作出说明”。<sup>①</sup>但是人们只要认真对待这一思想,就会认为,种族无非是生存斗争条件借以发挥作用的那些手段之一,通过这一手段,人在与自然作斗争时所

---

<sup>①</sup> 沙尔迈尔《民族的遗传和选择》,1903年耶拿德文版,第174页。

使用的生产力形成了民族性格共同体。

民族唯灵论使民族成为神秘的民族精神,民族的历史成为民族精神自我发展的历史,世界历史成为各个由于本身的特性或者彼此友好相处、或者彼此敌对的民族精神之间的斗争的历史。但是,虽然朗勃雷希特还把民族意识的发展看成他所写的民族史的中心点并且认为有可能发现关于民族精神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但他毕竟已经用民族的经济和发展来说明从象征主义时代到刺激反应(Reizsamkeit)时代民族精神的变化、民族心灵的发展;民族心灵的发展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发展的推动力,而是人民的劳动方式的变化的结果。如果说尽管如此他仍不满足于从人的生产力的发展、从人的生产关系按规律的发展来理解民族的成长发展,如果说他除此之外还想为民族精神、民族心灵的发展确定普遍的规律——这些规律只能说明发展的一般性,却不再能说明具体的历史事实,那么这里涉及的已根本不再是规律,而是像辛默尔所说的那样,涉及“为历史所作的准备”,涉及“历史的典型现象的暂时的概括,对大批单个现象的初步定位”。<sup>①</sup>

一方面,达尔文主义战胜了民族唯物论,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用揭示决定民族发展的经济过程代替神秘的民族精神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依赖这两方面的准备工作能够把民族理解成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的永远不会完成的产物,这一过程的最终推动力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人的生产力的变化,人的劳动关系的变化。这一观点使民族成为我们身上的历史性(das Historische in uns)。达尔文主义教会我们解释有机生活的历史在我们的活的身体上镌刻的符号:在伯尔施的动人的漫谈中人们可以查阅到,我们自己的器官是如何表述我们的兽类祖先的历史的。我们也同样学会了解释民族性格。使每一个个人与他的民族的其他个人联合成一个共同体的是他与其他个人共同的个人特性,而他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祖先的历史正是沉淀在这种个人

---

<sup>①</sup> 辛默尔《历史哲学的问题》,1905年莱比锡德文版,第84页及以下。

特性之中,他的性格是凝固的历史。我们中每一个个人的个人特性是在过去的各共同体的生存斗争中发展形成的,这一情况使我们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

但是如果我们把民族性格理解成一段流动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就会理解,为什么历史科学能够驳斥那种认为民族性格是不可改变的、是恒常的意见。一个民族的历史在任何时刻都不是已经完成的。变动不居的命运使民族的性格——它无非是过去的命运的一个沉淀物——经受不断的变化。使同一时代的民族同胞联结起来的是性格的共同性;使不同时代的民族同胞联结起来的不是性格的相似性,而是这一事实:他们是前后相继的,是彼此产生影响的;从前的人的命运决定后来的人的性格,而不是从前世代的性格与后代的性格重合。语言的历史也表明了这一关系。<sup>①</sup> 通过交往共同性联系起来的同时代人具有语言共同性,前后相继的世代却不具有。后代的性格是由从前世代的命运决定的,但他们不是与从前世代同一模样的(Ebenbild)。

但是当我们认为性格共同体是从命运共同体产生时,我们才能完全理解性格共同体的意义。我们在进行研究时是从民族性格的直接的经验表现方式出发的:从民族同胞的性格的同一性,也就是说从那种使通常的德国人与通常的英国人相区别、却与每一个其他通常的德国人相似的特性出发的。但这只是一个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定律:难道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是都知道有那样的德国人,他们并不具备任何通常被认为是德意志民族性格的东西吗?但是如果我们从经验的同一性上升到造成性格共同体的命运共同性,那么我们会达到一个与单纯的性格同一性相对立的、另一个更加深刻的关于性格共同体的概念。

---

<sup>①</sup> 费希特正确地说:“你们总是使若干世纪以后的后代不能理解他们的祖先当时的语言,因为对他们来说过渡已不存在了;但是从一开始起就有一个不停的、不经过飞跃的、当时始终不引人注意的过渡,只有在新的过渡添加进来时它才受到注意并且作为飞跃出现。永远不会出现同代人不再能互相理解的时刻。”《对德国人民的演说》,雷克拉姆德文版,第53页。

个人的性格是几种不同力量的合量(Resultante):我们在其中发现对每一个个人产生作用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影响,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随个人而异的构造性格的力量。只有当这后一批力量的强度不太大时,民族的命运共同体的影响才能造成相似的个人性格;相反,如果有一些与决定个人的民族同胞的性格的那些力量本质上不同的,特别强大的力量对他的性格产生作用,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种个人性格,它虽然也是由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塑造的,却不再与他的民族的其他个人相似。尽管如此,他也是民族的性格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这是因为,尽管他与他的民族同胞如此不相似,但是仍有一个东西把他与他们联系起来,这就是,造成他的那些力量中的一个是与塑造同一民族的所有其他个人的那些力量中的一个相同的;他是他的民族的孩子,因为如果尽管他是同一些个人力量造成,却是由一个其他民族的血源和传统造成的话,他就会是另外一个民族的孩子了。这样,我们就得出另一个更加深刻的关于性格共同体的概念:它对我们来说不再是指同一个民族的个人彼此相似,而是指同一种力量对每一个个人的性格产生作用,不管除它以外也在起作用的其他力量是多么不同。只有在这时,性格共同体的概念才被证明是正确的,而纯粹经验只会使我们认识一种相对的性格相似性。但是这一性格相似性只有在民族同胞的多数人身上才能看到,而性格共同体,亦即是他们统统都是同一个发生作用的力量产物这一事实,对于他们大家都毫无例外地是共同的。这一发生作用的力量,即我们身上的这一历史性(das Historische),就是我们身上的民族性(das Nationale),正是它使我们结合成民族。

但是如果我们把性格中的民族性理解成我们身上的历史性,那么我们就更加深刻地把民族理解成一个社会现象,一个社会化的人的现象。对于个人主义者来说,人是一个原子,而原子对于他来说只是按照结构规律在外表上结合在一起的。但对我们来说,人不是原子,而是社会的产物;鲁滨逊在他的岛上单独进行斗争,但甚至他也只是因为他已经是作为他的祖先的遗产,作为他所受教育的产物,拥有了由社

会发展出来的能力,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力量”,<sup>①</sup>才能够进行这一斗争的。因此对我们来说,民族也并不是以某种方式在表面上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个人,民族是作为每个人的个人特性的一个部分,作为他的民族性存在于他身上的。民族的性格特征只是作为个人的性格特征呈现出来,却是社会地创造出来的:它是遗传的特性和传统的文化遗产的产物,而这些文化遗产是每一个民族同胞的祖先在与其他的社会同胞的经常互相影响中创造出来的;民族性格特征本身是社会产物。使属于一个民族的个人联合起来的是这一事实:他们大家都是同一些产生影响的力量、同一个社会的产物;他们的个人遗传特性表现了共同生活的人们所进行的生存斗争的选择作用;他们的个人性格是由在同一个人类共同体的生存斗争中产生的同一种文化造成的。因此,民族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根据某个外部的结构规律组成的。民族不是个人的总和,每一个个人却是民族的产物;他们大家都是同一个社会的产物,这使他们成为一个共同体。只是作为个人的特征呈现出来的特性是社会产物,而且就民族的所有成员而言都是同一个社会的产物——这就使个人联合成为民族。因此民族不是根据外部的结构规律而存在的,而是——逻辑地说,而不是历史地说——在一切结构规律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的。<sup>②</sup>

但是当然,如果形成共同体的人们现在打算彼此发生关系,互相合作,那么他们需要语言。语言是人们交往的最重要的工具:圣经中说,工人未能继续建立巴比塔,因为上帝把他们的语言搅乱了。并不是所有说同一种语言的人都会形成一个民族,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任何民族都是无法形成的。不过语言无非是一个根据“外部的规定”而存在的“原始的惯例”<sup>③</sup>——如果我们按照鲁道夫·施坦姆勒引进到科学

---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新时代》第21年卷,第1册,第711页。

② 参看麦克斯·阿德勒博士《在为科学而进行的斗争中的因果关系和目的论》(《马克思研究》第1卷)第369页及以下。

③ 施坦姆勒《经济和法》莱比锡1896年德文版,第103页。



中的那种广泛意义来使用这个概念的话。这当然不是说,似乎它是根据结构规律产生的,似乎一位聪明的立法者或者一项社会契约创造了这个概念,但是就其有效性来说,它毕竟只是建立在外部的规定之上的。因为当我们把某一个词与一个概念结合起来时,把关于某一个音素结合的表象与一个事物的表象结合起来时,我们仅仅是根据惯例行事。儿童从母亲的嘴唇学到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规定。施坦姆勒认为可以从在外部规定中发现构建社会现象的特征,这是错误的;民族向我们指明,所有社会现象的基础是共同体,也就是说这是这一事实:个人的特性同时也是联合成共同体的所有其他个人的特性,因为每一个个人的性格是在与所有其他个人的经常互相影响中形成的,每一个人的个人性格是同一些社会力量的产物,但是只有通过外部的规定,这些如此联合成一个共同体的个人才能互相合作,组成一个社会,保持他们的共同性,创造新的共同性。外部规定是通过共同体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社会合作形式。<sup>①</sup>

民族性格的差别是一个只有教条主义才能加以否认的经验事实,这种教条主义只看到它愿意看到的东西,因此看不到大家都看见的东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一再企图否认民族性格。并且声称,民族只是通过语言才有差别。我们在许多以天主教的教义为立足点的理论家那里看到这种意见。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哲学接受了这一意见。它也成为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遗产,他们打算把它当作无产阶级世

---

<sup>①</sup> 我在使用共同体和社会的概念时赋予它们的意义是与滕尼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编者注)在他的杰出著作《共同体和社会》(1887年莱比锡德文版)中所采用的意义不同的。我认为社会的本质在于人们根据一项外部规定而合作;共同体的本质在于,个人就其精神的和肉体的存在而言是他和结合成共同体的其他个人之间的无数的交互影响的产物,因此他的个人性格是共同体性格的表现形式。共同体当然只有在外部的规定——至少像施塔姆勒告诉我们的那样是语言——也就是社会已经给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另一方面,社会又是以共同体,至少是像麦克斯·阿德勒所指明的那种“一般意识”的共同体为前提的。国家归根结底只是社会的形式之一,正如以外部权力为依据的法律只是规定的一个种类一样。随着商品生产而产生并且随着它一同消失的现代国家概念就更加狭隘了。

界主义的依据来使用。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这种无产阶级世界主义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世界的民族斗争的最初的和最原始的表态。这种对民族的“本质缺乏”(Wesenlosigkeit)的臆想的想法,今天在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报刊的语言的习惯用法中仍旧继续存在,它们喜欢用说德“语”和捷克“语”的“同志”,这样的称呼,而不是用德国同志和捷克同志这样的称呼。关于民族差别无非是语言差别的观点是以原子式一个人主义社会观为依据的,这种社会观把社会看成仅仅是外在地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总和,从而也把民族看成仅仅是外在地、也就是通过语言联合起来的人们的总和。谁信奉这一观点,他就重复了施坦姆勒的错误,后者认为能在外部规定、在法律条文和特征惯例中发现构建社会现象的特征。但是对我们来说,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总和,而每一个个人却是社会的产物。因此对我们来说,民族也不是通过共同语言互相发生关系的个别的人的总和,个别的人本身却是民族的产物;他的个人性格无非是在与其他的个人持续发生交互影响之中产生的,正如这些其他的个人的性格是在与他的交互的影响之中产生一样。这一交往决定了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性格,并从而使这些个人结合成一个性格共同体。民族是在各个民族同胞的民族性中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事实中呈现出来的:每一个民族同胞的性格是由所有的民族同胞在共同体中,在经常的交互影响中经历的命运决定的。但是语言无非是这种交互影响的一个手段,当然它随时随地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正如外部规定一般说来是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个人之间的合作的形式一样。人的眼睛毕竟使他日复一日地看到民族性格的差别,谁要是不信任自己的眼睛,毕竟也必须相信那种理论思考,它教会他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从经常的交往共同体中经历的命运的差别中必然不可避免会产生不同的性格共同体。

但是我们对民族的本质的认识不仅会使从个人主义角度对民族生活的否定今后不再可能,而且也会使更加危险得多的对这一概念的滥用不再可能。民族性格无非是指单个的民族同胞的意志方向是通过自

已与所有的民族同胞的命运共同性决定的。民族性格一旦产生,它就会表现为独立的历史力量。民族性格的差别意味着意志方向的差别。由此可见,每一个民族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都将以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方式行动。例如资本主义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那里的发展尽管很相似,但是在具体方面毕竟引发了不同的运动。于是民族性格作为历史的潜能(Potenz)呈现。如果说理论把它理解成历史的产物,那么日常的经验却宁可把它理解成决定历史的创造力。如果说理论教导我们把它理解成人们彼此的关系的表现,那么直接的经验却宁可认为它是决定、规定这些关系的。这是民族性格的拜物教。我们的理论一下子就把这个鬼打跑了。如果我们认识到,每一个民族同胞都是他的民族的一个产物,民族性格无非是那种确定的意志方向,而命运的共同性是在每一个同胞身上使这一意志方向作为他的个人特性产生出来的。那么认为民族性格似乎决定每一个民族同胞的愿望和行为的看法就不再是神秘的了。一旦我们把民族性格理解成民族历史的沉淀物,民族性格也就不再会作为独立的力量出现了。于是我们就会懂得,在民族性格的似乎是独立的历史作用中隐藏着的无非是这一事实:祖先的历史,他们的生存斗争条件,他们所掌握的生产力,他们所接受的生产关系仍旧在决定着他们的自然的和文化的后裔的行为。我们以前知道,自然遗传和文化遗产传统仅仅是从前的世代命运借以决定后代性格的手段,但是现在我们进一步看到,民族性格本身只是一种手段,社会的历史通过这种手段,仍旧对后代的生活,对他们的思想、感觉、愿望、行为产生影响。正是当我们认识了民族性格的真实性质的时候,我们排除了它的虚假的独立性,学会了把它仅仅理解成其他力量借以施加影响的手段。但是民族性格因此也丧失了它的虚假的实质性(substantieller Charakter),也就是说,丧失了它是流动不居的现象中的持续存在的恒久不变的东西这一假象。它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沉淀物,它每时每刻都会随着民族所经历的每一件新事,都会像它的所反映的事情本身那样变化不定。当它被放在世界大事中间的时候,它不再是恒久不变的

存在,而是不断的生成和消逝的东西。

\* \* \*

最后,我们还打算通过与迄今关于民族本质的各种理论<sup>①</sup>的对比来为我们确定民族本质的尝试提供论据。关于形而上学的民族理论——民族唯灵论和民族唯物论——已经谈过了;以后联系其他问题我们还将讨论心理学的民族理论,这一理论不是打算在彼此休戚相关的意识中,就是打算在彼此休戚相关的意志中发现民族的本质。因此在这里还需要做的仅仅是把我们的民族理论与那些人的尝试对比,这些人提出一批通过其汇合应能构建民族的因素。意大利社会学家们列举如下的因素:

- 一、共同的居住地区。
- 二、共同的起源。
- 三、共同的语言。
- 四、共同的风俗和习惯。
- 五、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历史的过去。
- 六、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宗教。<sup>②</sup>

很清楚,这一理论把一批特征编在一起,但它们是决不应并列的,只能按照相互依存的关系去理解。如果我们暂时撇开民族的所谓第一个因素即共同的居住地区不谈,那么在其余的因素中,第五个因素即共同的历史就凸显出来。它是决定其他因素,创造其他因素的。共同历史赋予共同的起源以内容规定性,因为它决定哪些特性得到遗传,哪些特性被排除。共同的历史造成共同的风俗和习惯,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宗教,也就是说,造成——还是按照我们的习惯用语——文化传统的共同性。共同起源和共同的文化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在施加影响时,在从来构建民族性格的工作时所使用的工具。但是第三个因素即共同的

---

<sup>①</sup> Fr. J. 诺伊曼在《人民和民族》(1888年莱比锡德文版)中搜集了一批关于民族的定义。

<sup>②</sup> 诺伊曼《人民和民族》,第54页。

语言又是不能和其他因素并列的:不如说它是一个第二级的手段。因为如果说共同的文化是使共同的历史能对形成民族性格产生影响的手段,那么共同的语言又是共同的文化施加影响时的一个手段,它是一个造成文化共同性并使它得以维持的工具,它作为外在规定又是那些组成一个共同体并且一再从本身产生共同性的个人进行社会合作的形式。<sup>①</sup> 因此我们首先用一种体系来代替仅仅列举民族的因素。这个体系是:共同的历史是有效原因,共同的文化 and 共同的起源是它施加影响的手段,共同的语言又是共同的文化的中介者,既是共同的文化的产品,同时又创造共同的文化。但是我们也了解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迄今给研究民族的理论家造成很大困难的情况,也就是这些因素能够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彼此结合的事实,一回缺少这个因素、一回没有那个因素的情况,现在成为可以理解的了。如果说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文化是同一个产生影响的因素的工具,那么对于民族概念的确定来说,显然关键就不在于两个手段要同时起作用了;因此民族固然可能是以起源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却不一定要以它为基础,而单纯的起源的共同性始终只能形成种族,却永远不会形成民族。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得出文化共同体的不同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的法律肯定是形成性格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性格共同体即使没有它也能存在和产生,只要其他因素的影响十分强大,足以使个人联合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就行。凡是在宗教的差别妨碍文化共同性,而共同的宗教成了共同的文化的基础的地方,宗教信仰的差别能使说同一语言的人民形成两个不同的民族,就像迄今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一样。但是德意志人尽管在宗教方面是分裂的,却仍旧是一个民族,因为信仰的分歧

---

<sup>①</sup> 不过语言不仅是文化财富传承的一个手段,它本身就是一项文化财富。法国人之所以与德国人不同,不仅是因为他的语言把其他文化财富传授给他,而且还是因为这个语言本身是一种传授给他的文化财富,它通过本身的特性决定他的言语、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如果说法国人的雄辩术与德国人的演说术不同,那么语言的差别肯定也起一份作用。

并没有能够阻碍一个普遍的德意志文化共同体的产生和存在。最后，我们也这样理解语言与民族的其他因素的关系：没有语言的共同性，就没有文化的共同性，也就没有民族。<sup>①</sup>但是在其他方面存在的差别——例如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那里的宗教差别，西班牙人和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那里的起源差别和社会、政治情况的差别阻碍语言共同体成为文化共同体的地方，语言共同性还不能创造出任何民族。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回过头来考虑对上面列举的民族“因素”的第一项，即共同的居住地。我们曾一再讲到地域上的分隔怎样会使统一的民族分裂。作为自然共同体的民族会由于地域的分隔而逐渐消失，因为民族的地域上分离的各个部分的不同的生存斗争条件培育不同的特性，而任何血缘混合都不会抵消这一差别。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同样会由于地域上的分隔而消失，因为民族的地域上分离的各个部分是彼此分开进行生存斗争的，它们也使原来统一的文化发生分化，而由于它们之间缺乏交往，原来统一的民族文化分解成一批不同种类的文化，这种分裂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由于原来统一的民族在地域上分离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交往纽带过分松弛，统一的语言就分化成各种不同的语言。由此可见，既然地域的差别使民族分裂，那么居住地的共同性肯定是民族的存在条件之一：但这只是就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条件而说的。尽管地域上分离，保持文化共同性仍旧是可能的甚至保持自然共同性也是可以设想的，因此就此而言，地域上的分离不是民族性格共同体的阻碍。住在美洲的、继续受到德国文化影响的德国人——尽管这甚至只是通过读德文书和看德文报纸而做到的——对自己的子女给予德国式教育，因此不管地域上的分离，他仍旧是一个德国人。土地的共同性只有在它是民族的生存条件这一程度上才是文化共

---

<sup>①</sup> 如果我们谈到一个瑞士民族，那么这不是——当人们仅仅看到瑞士人隶属于一个国家时——以混淆国民和民族为根据，就是——如果人们主张瑞士的德意志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瑞特人之间存在性格共同性——以认为性格共同体就已经是民族这一错误意见为根据的。

同性的条件。但是在书籍印刷、邮政和电报、铁路和汽船的时代,它的重要性比以前差多了。于是人们不是把居住地的共同性看成与民族的其他“因素”并列的因素,而是看成使其他因素产生作用的一个条件,因此人们必然要对常常听说的居住地点的共同性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条件这一规律加以限制。我们认为这一认识的好处是不小的:我们关于民族与最重要的地区机构(Gebietskörperschaft)即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毕竟是以我们对民族和土地的关系的观点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在后面恰恰还必须回到这一问题,那时我们将能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表明我们的回答。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事仅仅是指出,我们的民族理论是怎样能够把旧的理论中直接并列的、构成民族要素的那些因素理解成一个体系的产生作用的力量的,是怎样能够通过这些因素的互相依存、互相合作的关系来理解它们的。

但是我们的理论还需要经受一项任务的考验,而迄今的对民族本质作出规定的尝试都是同样地在这一任务上失败的。这是指划清民族概念与民族内部的更加狭窄的地域共同体和种族共同体之间的界限。当然,命运共同性使德意志人联合成一个性格共同体。但是这个道理难道不也是适用于萨克森人或巴伐利亚人吗?提洛尔人和施蒂里亚人吗?甚至每一个阿尔卑斯山谷的居民吗?祖先的不同的命运,居住地和土地分配的差别,土地的肥沃程度和气候的差别难道不是从同一个种族中造成了一些特性非常明显的性格共同体吗?那些被看成独立民族的性格共同体与那些被我们看成民族内部的较狭窄的集团的性格共同体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

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回忆起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比较狭窄的性格共同体,它们是以起源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的分解产物。自从德意志种族的后裔在地域上互相分离,被耕作束缚在土地上以来,他们没有交往,没有通婚,各自分离地过日子,彼此之间的差别愈来愈大。他们固然是来自同一个自然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但是逐渐形成独立的、彼此明确区分的自然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存在着从每一个这样的比较狭

窄的,出自一个民族的集团形成一个特殊民族的倾向。要把这些比较狭窄的性格共同体的概念与民族概念区分开来是困难的,因为它们本身正处于向民族发展的阶段。

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使民族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的反倾向与这一民族分裂的倾向对抗。但是这一反倾向起初只对统治阶级有效。它使中古时期过骑士生活的人、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受过教育的人结合成一个狭窄的、与一切其他文化共同体界限分明的民族,使他们彼此发生密切的经济、政治、社会的交往,为他们创造共同的统一语言,使他们受到同一种精神文化、同一种文明的影响。这种密切的文化共同体纽带首先使统治阶级结合成一个民族。对于某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德意志人还是荷兰人,是斯洛文尼亚人还是克罗地亚人,谁也不会产生怀疑,民族教育、民族的统一语言使甚至血缘最近的民族也彼此界限分明。相反,某一个村庄的农民是还应算作德意志人还是已经是荷兰人,是还应算作斯洛文尼亚人还是已经是克罗地亚人,是可以相当随意地作出决定的。只有民族同胞的圈子是界限分明的,每一个民族人佃农的圈子却不是。

现代资本主义逐渐也使各民族的下层阶级彼此明确区分开来,因为他们也获得分享本民族的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民族的统一语言的权利。统一的倾向也涉及劳动者大众。但是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促使这一倾向获胜。社会主义社会将使各个民族全体通过民族教育和文明的差别彼此明确地区分开来,正如今天只有各不同民族的受过教育的人才彼此区分开来一样。当然在社会主义民族内部也将有更加狭窄的性格共同体存在,但是在这一民族内部不可能有独立的文化共同体存在,因为甚至每一个地域共同体将都是处在整个民族的文化的影响之下,处在与整个民族的文化交往和意见交换之中。

这样,我们才能对民族作出完全的概念规定。民族是通过命运共同性而结成一个性格共同体的人们的整体。说“通过命运共同性”,是因为这一特征使它与职业的、阶级的、国民的民族际(international)性格



共同体区别开来,这些共同体以相同的命运为基础,却不是以命运共同性为基础的。说“性格共同者(Charaktergenosse)的全体”;是因为这使它与民族内部的那些更加狭窄的性格共同体区别开来,后者从来不会形成一个自我决定的,由自身的命运决定的自然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而是处于与整个民族(Gesamtnation)的密切交往之中,因此也是由它的命运决定的。例如,在民族共产主义时代,民族的界限是分明的:那时形成民族的是所有的由波罗的海沿岸的部族起源而且在精神本质上通过自然遗传和文化传统由这一部族决定的人们的全体。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又是界限分明的:所有的享受民族的教育和民族的文化财富,因而其性格是由决定这些文化财富内容的民族命运塑造的人们将形成民族。在以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Sondereigentum)为基础的社会中,统治阶级——过去是过骑士生活的人,现在是受过教育的人形成民族。在这些人中间,由民族的历史形成的相同的教育,通过统一语言和民族教育造成了相近的性格,他们作为整体形成了民族。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却不形成民族——从一方面说是不再形成,因为古老的起源共同性已不再使他们彼此足够密切地结合起来;从另一方面说是尚未形成,因为处于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共同体还没有把他们完全包括进来。要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民族概念的定义是困难的,迄今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这一困难是历史地决定的。在我们的阶级社会中,老的界限分明的起源共同体已分裂成无数的地区的和种族的群体,而正在形成发展之中的新的教育共同体还没有能使这些小群体联合成一个民族的整体。

就这样,我们对民族本质的探索向我们提示了一幅壮观的图景,起初——在民族共产主义和游牧耕作时代——是作为起源共同体的统一的民族。然后,自从向定居农业和私有财产的发展过渡以来,老的民族分裂成以统治阶级的文化共同体为一方和民族的佃农为另一方——后者被封闭在作为老民族的分解产物的狭窄的地区之中。再后,自从社会生产发展成资本主义形式以来,出现了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劳动

和被剥削阶级仍旧是民族的佃农,但是与老的、以起源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分裂成日益截然分离的地区群体的分立倾向相比,以民族教育为基础的向民族统一发展的倾向逐渐加强了。最后,一旦社会使社会生产摆脱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作为教育、劳动、文化共同体的统一的民族就重新产生。民族的发展反映了生产方式的历史和所有制的历史。正如从民族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产生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个体生产,由此又产生了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生产一样,统一的民族分裂成民族同胞和佃农并且分解成小的地区集团,后者在合作生产发展以后重新互相靠拢,最后融合成未来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财产私有制和个体生产时代的、分化为民族同胞和佃农并且分裂成无数的比较狭窄的地区群体的民族,是过去的共产主义民族的分解产物,也是构建未来的社会主义民族的材料。

由此可见,民族在双重意义上说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从它的物质规定性来说是一个历史现象,因为存活在每一个民族同胞身上的有效民族性格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沉淀物,而社会的历史在各个民族同胞的民族性中得到反映,个人则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民族就它的形式上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历史现象,因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规模不同的各个集团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成一个民族,社会的历史不仅决定民族同胞的哪些具体特征形成民族性格;不如说,历史地起作用的力量产生一个民族共同体时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历史地决定的。

把民族之间的斗争看成事情的推动力的民族历史观力求创立一种民族的力学。在它看来,民族是不能进一步分解的元素,是僵化的物体,它们在空间中互相碰撞,通过压力和推力互相发生作用。但是我们吧民族本身化解成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说,历史不再反映民族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民族本身是历史斗争的反映。因为民族只有通过民族性格,通过个人的民族性才能显现出来;而个人的民族性无非是他的通过社会的历史获得的规定性的一个方面,是他通过劳动方法和劳动关系

的发展而获得的规定性的一个方面。

### 第三章 多民族国家

#### 第二十章 工人阶级与民族问题

工人阶级最原始、最自然的推动力就是他们的革命本能。

年轻的觉醒的无产者的革命情绪还来源于他的民族立场。因此，当整个民族在反对它的压迫者的时候，当我们社会的大人物和权势者都成为民族斗争中的敌人的时候，当推翻现存制度成为民族斗争目标的时候，工人就会采取民族主义立场。所以，工人就站在一切受沙皇制度奴役民族的民族斗争的最前列；所以，在普鲁士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也要保卫受普鲁士阶级国家压迫的波兰民族的利益；所以，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就要为了支持德意志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利益而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奥地利的那些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工人阶级采取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立场：在他们看来，奴役他们的国家是德意志的，保护有产者、把无产者投入监狱的法庭是德意志的，任何一份血腥判决书都是用德语写成的，在任何一次罢工中军官都是用德语指挥军队，对付那些饥饿的、手无寸铁的工人人们的。就像维克托·阿德勒当初所说的那样，德语是古老奥地利的“国家语言、官方语言、进行压迫的语言。”不仅如此！德语还是直接阶级敌人的语言，工厂主和他们的监工、商人和放高利贷者的语言。与此相比，本民族的民族运动是革命的：这个民族是被现行政权排斥的；它对现行宪法是十分不满的；民族政党的报纸被查抄，它的先锋战士被投入监狱；而这个民族的小资产者也在进行反对德意志资产者和官僚的斗争。革命本能唤醒了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工人阶级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民族的仇恨和对本民族的民族权力政策的爱。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工人阶级的民族观念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由爱和恨产生的，是未经反思的，朴素的。这些民族的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问题的最初立场就是一种

朴素的民族主义。

在奥地利的有历史民族那里,除了德意志民族以外,革命的本能也推动他们走向这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波兰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的民族运动曾经是革命的,是与现存国家制度相敌对的。他们对于革命的工人阶级曾经深表同情,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在奥地利以外的那些民族主义已经得到满足的民族那里,以及在奥地利的德意志人那里,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无产者反对的不是其他民族的阶级敌人,而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的、剥削压迫工人的阶级。在这里,民族政策起初并不意味着进行一场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制度的斗争:直到古老的自由主义政党垮台以前,在奥地利的德意志资产者并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建立起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而是建立了一个维护现行宪法的政党,他们依靠这部宪法支撑着自己的特权。德意志民族并没有受到压迫,而且他们的权力还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比例。在这里,民族政策并不是一场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它是被无产者视为剥削者、压迫者,因而被他们十分仇恨的那个阶级的政策,它是资产阶级和官僚们的政策。在这里,工人阶级不能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统治阶级保卫着作为维持民族权力条件的特权。在德国工人看来,民族权力除了是敌对阶级的阶级统治所依靠的一种骗人的借口以外,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吗?

当德国工人阶级开始进行反对有教养的有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时候,他们重新发现了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统治阶级斗争中曾经发挥作用的古老思想。工人们想,与我们相比,我们的敌人能够占有更多的财产,能够知道更多的事情,能够穿上更好的衣服,能够比我们更文雅地谈话,更正确地拼写。但是,难道因此就应该使我们在国家面前拥有的权利比他们更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拥有享受生活乐趣、享受文化的权利?难道我们不是与他们同样好的人吗?这样,在工人中,人道主义思想复活了,关于所有具有人的面貌的人都能够享有平等地位的要求复活了。对于德国工人来说,民族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在他们眼

里,民族差异日渐淡薄。就像他们为了反对自己所经受的剥削和压迫而斗争那样,他们要消灭剥削和压迫本身,他们的斗争锋芒也许会指向一个阶级、一个性别、一个宗教团体,或者还会指向一个民族。他们感觉自己是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战士。如果说,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革命本能导致了一种朴素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在民族主义已得到满足的民族中的工人阶级就会创造出一种朴素的世界主义。

除此以外,在奥地利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还具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气质。只不过它不是起源于工人阶级,而是起源于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寻找一条从资产阶级民主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于在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曾经是民族主义的:1848年的统一的、自由的德国,大德意志共和国曾经是他们的梦想。就像到处发生的那样,奥地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摧毁了古老的民主。就像到处发生的那样,这支民主的优秀力量最终加入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大军:资产阶级民主成为这样一种源泉,他们的流水最终汇入了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洪流。对于我们这些奥地利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恩格尔伯特·佩纳斯托费尔<sup>①</sup>这个人就是我们党这段历史的生动体现。这些人还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憧憬带入党内。正像那些行家仍旧能区分来自这个或那个山脉的这个或那个河源所带来的岩石碎片一样,我们在奥地利的德意志社会主义思想世界中也会很容易地发现这样一些情绪和思想,它们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的遗产,是由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带来的。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气质永远不会使奥地利的德国工人运动的朴素的世界主义政治特征变得模糊不清,而这种世界主义政治特征是从工人阶级生活条件中自发产生出来的。

德意志民族主义政治家们很喜欢指责奥地利的德意志工人,指责他们缺乏“民族主义感情”,远远不像他们的斯拉夫的或者意大利的同志们那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德意志工人阶级的青年时代,

---

<sup>①</sup> 恩格尔伯特·佩纳斯托费尔(1850—1918)——奥地利民主主义者,1896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属于右翼。——编者注

阶级意识最初是以一种革命本能的面目成长起来的,他们从这个青年时代带来的思想遗产和基本情绪是与奥地利其他民族的无产者不同的。这个事实就是在今天有时也会偶然发挥作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能逐渐发展成关于阶级矛盾、阶级利益的明确意识。所以,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一些民族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就这样逐渐消失,就像另一些民族的朴素的世界主义也逐渐消失一样。从这两者中缓慢地、同时又是不断地发展出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对自己的独特类型具有明确自觉的国际主义政策。

如果我们要对于这个政策在千百万人身上发挥作用的推动力逐一进行清点,归纳总结,对它的组成因素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必须以工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为出发点。

工人阶级创造了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并没有归工人阶级所有,而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使统治阶级获得权力,拿出工人阶级创造价值的一部分来打发他们,其余的,即剩余价值收归他们自己。这个事实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全部政策。工人阶级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价值产品的分配问题:在社会价值产品中应当拿出多大部分交给工人阶级,拿出多大部分交给生产资料所有者?在这里,阶级利益是完全对立的。交给工人阶级的社会价值产品比例越高,有产者阶级占有的比例就越少,或者相反。价值产品的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除了仅限于使工人能够单纯维持生命的分配以外,有产者阶级对于任何一种分配比例都不会满意。除了把全部价值产品都交给全体工人阶级以外,任何其他的规定都不会使工人阶级满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不到一个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公正的点;没有一种公正的劳动工资:没有一个法院能够对于价值产品在两个阶级之间的分配做出决断。因此,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权力问题。由此必然会产生工人阶级反对有产者阶级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为了劳动工资数额而进行的工会斗争。

工人所获得的始终仅仅是他们创造的价值产品的一部分,其余的

都落到有产者阶级的手里,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也可以做出如下表述:工人只能用劳动日中的一部分时间来生产那些归自己所有的商品,而在其他劳动时间所制造的商品就构成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收入。在劳动日的这个第二部分时间内,工人是从事剩余劳动,亦即为了有产者阶级的无偿劳动。从这个事实中就产生了劳动日长短的问题。工人拒绝为有产者阶级进行劳动:劳动日的长短应当保持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在这个时间内所生产的全部商品都构成工人阶级的收入。与此相反,有产者阶级则希望把劳动日延长到极限,如果他们不明智,他们会要求工人长时间地站在机器旁边,只要他的肌肉还能活动;如果他们明智,他们会要求工人长时间地疲劳消耗,只要劳动日的延长还能增加他们的剩余价值。在这里,在这两个劳动日极限之间也还有一个宽泛的活动余地。但是,就是在这里,法院也无法决定在这个界限内把劳动日规定为多长时间才是适当的、合理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权力问题,它在阶级斗争中才能解决。这种阶级斗争表现为围绕劳动时间的长短所进行的工会斗争。

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使所有民族都发生了分裂:在任何一个民族内部工人与有产者阶级的经济利益都是截然对立的。与此相反,任何一个民族的工人利益都是与所有其他民族的工人利益重合的。

劳动工资的多少取决于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

我们可以首先设想,在一部分经济地区——例如在波西米亚的德意志人地区——劳动力供给是比较低的,而在这个经济地区的另外一个地方——例如在波西米亚的捷克人部分,供给远远超过了需求,直接的后果是,波西米亚的德意志人地区的工资比捷克人地区高。这个事实还会导致工人们从王国的捷克人地区迁移到德意志人地区,因为他们在那里更容易找到优惠的就业条件。这种捷克工人向波西米亚德意志人地区的迁移还会发生以下影响,就是使那里的工人的供给增加,使波西米亚德意志人地区出现了工资降低的趋势。另一方面,工人迁移出捷克人地区还会使当地的劳动力供给下降,使当地出现劳动工资上

升的发展趋势。结果就是：波西米亚德意志人地区的工人由于捷克人地区工人的劳动工资较低而受到伤害，捷克人地区的工人却由于德意志工人享有优惠的劳动条件而获得一种直接的好处。如果捷克人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比较低，当地的工资又比较高的话，对于德意志人地区的工人也会带来好处。使波西米亚的德意志工人享有较好的工资收入，这也是捷克人地区工人非常关心的事情。捷克工人关心德意志工人能否获得较高的工资，德意志工人也关心捷克工人能否获得较高的工资。

迄今为止，我们研究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对于工资水平的影响。如果我们研究劳动力需求的作用，我们也会获得同样的结果。假设在波西米亚德意志人地区对于劳动力商品的需求是很大的，当地的工资会因此上升。相反，在捷克人地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如果很低的话，当地就会存在降低工资的危险。资本家是把工资打入生产成本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这个假设的例子中，德意志人地区的生产成本就比较高，而捷克人地区则是比较低的。生产成本越低，利润就越高。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捷克人地区的利润率就远远超过了德意志人地区。资本总是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区转移。所以，流向捷克人地区的资本就比流向德意志人地区的多。在这个地区建立起越来越多的新的企业，原有的企业也在迅速扩大。在这种资本流动的影响下，捷克人地区的工资开始提高，与此同时，在德意志人地区，劳动力需求上升缓慢；由于工人人口不断增长，这里的失业者的数目也在上升，工资开始下降。德意志工人再度由于捷克人地区工资较低而遭受损失，所以他们希望，那里的工资能够提升。这也再次证明，德国工人的高工资最终也会使他们的捷克阶级同志增加工资，所以这些捷克阶级同志也会非常关心德国工人是否会获得较好的工资报酬。

但是，劳动工资的多少并不仅仅取决于供给与需求，而且还取决于工会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拥有一支失业者大军。在经济萧条时期，在营业不好的时候，这支大军是很庞大的，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在有利的景气时期，它的人数开始减少，但是，它永远也不会完全消失。在



资本主义社会里,失业者具有确保剩余价值、使工资保持较低水平的作用;因为失业的无产者无法获得世界的任何商品,所以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劳动岗位,即使工资仅仅足够维持生命。资本家因此能够不断地拒绝工人的奢望,在失业率上升的时候甚至能够降低工人的工资,并且威胁他们说,要用失业者来取代他们。饥饿迫使这些失业者要不惜任何代价找到一份工作,而工会的任务就在于改变失业者的这种作用。它们主要是用两个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第一,它们要改变失业者的心理,它们教育工人说,与他们的阶级同志进行压低工资的竞争是丧失尊严的,是不道德的。第二,它们通过失业援助使失业者在经济上能够勉强维持自己在失业期间的的生活,不必为了低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工会所能够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失业者的人数还很少,以致资本家无法用失业者取代工人,或者如果工会对于失业者进行大量培训,或者对他们给予足够的援助,从而使工人不必担心那些失业的同事会夺去他们的工作岗位,那么,工会还会人为地导致暂时的失业状况:通过罢工迫使企业主承诺提供优惠的劳动条件。在这里,失业者的作用转向自己的反面:暂时失业从压低工资的手段变成了提高工资的手段。

如果我们设想,德意志工人在工会中组织起来并且进行工会斗争,那么他们就会直接面临那些在捷克人地区压低工资和破坏罢工的人的威胁。只有在由于工会的培训教育和工会的经济支持而使捷克失业者的作用发生变化的时候,德意志工人才能进行他们的工会斗争。就是说,德意志工人首先要关心捷克工人能否得到一种失业援助。如果德意志工人支持捷克阶级同志组织起来,那么他们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但是,事情还不仅如此!工会斗争从来也不仅仅以获得失业者的支持为前提条件,它还需要工人的心理发生一种变化:必须使工人感到,与在生产车间中的伙伴进行压低工资的竞争是不道德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为了阻止失业者(帮助雇主)压低工资,对于失业者的经济援助必须与工人工资同样多。居民的这种心理变化

是各种不同力量的作用的结果。它首先要以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为前提条件。所以,例如德意志工人要关心捷克工人能否进入一个很好的学校。失业者的心理变化要以个人尊严意识的提高为前提条件。所以德国工人还要关心,使他们的捷克阶级同志在法律、官方机构和法院面前,在资产者面前不要像奴隶那样卑躬屈节,而是作为自由的男子汉昂首挺胸。所有使捷克工人成为懦夫,扼杀他们的尊严意识,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威胁他们的劳动工资的因素都会伤害德意志工人的自身尊严意识,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威胁到他们的劳动工资。工人的心理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推动的。所以,德意志工人对于捷克工人政党的成长具有一种直接的利益。

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成熟的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与他们年轻时代的朴素的世界主义政治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他们不再把民族差异的经验事实抛到一边,他们也不再把民族性看作是人们在解放整个人类的努力中不应受其迷惑的那种“资产阶级偏见”,不仅如此,他们的政策还植根于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即本民族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在积极支持其他民族的工人斗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促进,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这种国际主义不是起源于人道主义思想,而是起源于对阶级的国际团结互助的认识。由此产生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所有民族的工人在反对他们直接的阶级敌人,即企业主的斗争中要联合起来,工会组织要包容所有民族的工人,而在这些工会内部,任何一个民族的工人都要把所有其他民族的工人的利益当作他们自己的利益来维护。

工人阶级斗争的锋芒不仅指向了他们直接的敌人,即企业主,还指向了国家。国家通过各种不同手段对于经济生活施加影响。工人要求的是这样一种经济政策,它要能够增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有利于工会斗争,能够提高工资。但是,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不仅取决于他们工资数额的多少,还始终取决于这些货币工资的购买力,于是,他们就要继续提出经济政策措施方面的要求,这些措施要能够提高货币工资的购买力,把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或者继续降价。许多的工作机会和便宜

的面包,这是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目标。而企业主所追求的则完全相反,他们要把商品的生产成本降下来,把商品价格提上去。廉价的劳动力,高的价格,这是他们的努力的目标。在这里,工人利益与有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截然对立的。制定一种双方共同的政策完全是不可能的。相反,在这里,各个不同民族的工人的利益却是聚合到了一起。任何一个民族的工人与本民族的企业主在关税税则方面达成一致意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德意志与捷克的纺织工人、德意志与捷克的五金工人对于国家的贸易政策提出同样要求,倒是确实可能的。这种经济利益的重合迫使工人首先在经济与社会政策问题上肩并肩地共同进行反对所有民族的有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情况很快就表明,不仅在决定国家经济政策的斗争中,而且在其他的立法问题上,工人的利益也都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在讨论一部刑法的时候,任何一个民族的工人都无法同本民族的有产者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应当如何在法律上处理小偷、流浪汉、乞丐、罢工者、以及对待一个(在罢工期间)愿意工作者的问题;与此相反,所有民族的工人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同样的利益,所以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在讨论任何一部新法律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全部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不是别的,而是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除了把生产资料从资本的私人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在这里,在每个民族内部,工人阶级再度遭遇有产阶级的反抗,他们不想放弃这种所有制,不想放弃他们的收入、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权力的来源。相反,任何一个民族的工人在这方面的要求都是与所有其他民族无产阶级的要求完全一样的。

就像在工会斗争中一样,在政治斗争中所有民族的工人阶级必然也会联合在一起。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感伤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狂热,而是出自于一种清醒的估计:所有在国家中共同生活的民族的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致的,相反,他们的利益与所有民族的有产阶级的利益都是截然对立的。如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要求组织国际工会

运动一样,工人在阶级国家中的地位强烈要求开展国际的政治阶级斗争。

这个要求与下一事实发生了矛盾,即在既集中又分散地调节民族关系的情况下,所有民族问题都是权力问题,所以居民被迫加入民族政党,以便参与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而从阶级对立的事实出发,推导出来的要求就应当是,所有工人应当联合组成一个国际阶级政党。从既集中又分散宪法的出发推导出来的要求就是,所有德意志人,所有捷克人,都应联合组成一个包括不同社会阶层的民族政党。也许有人认为,这两个要求并不是矛盾的:捷克工人阶级在社会问题上必须与德意志工人阶级联合,在民族问题上必须与捷克资产阶级相联合。但是,把这两个要求如此合并在一起,在逻辑上就已经是说不通的。在最初的基本政治行动中,即在选举活动中,就已经被证明是完全不可能的。例如在一个选区中,一名德意志资产者的候选人与一名捷克工人的候选人彼此竞争,那么,德意志工人应当帮助谁获得胜利?如果他们投票支持德意志资产阶级候选人,他们就削弱了自己的阶级的权力,如果他们把选票投给捷克工人,他们就削弱了自己的民族的权力。在代表机构所进行的政党斗争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内,几乎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具有民族意义。如果说,在东加利西亚,为波兰地主服务的国家曾经用铁和血镇压了鲁提尼<sup>①</sup>的农民和农业工人,那么,波兰工人代表是应该支持波兰地主,以便扩大自己的民族权力,还是应该支持鲁提尼的工人,以便加强自己的阶级力量呢?但即使假定,把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在心理上人们却无法接受:工人阶级同本民族的有产阶级一同进行争夺民族财富的斗争,同其他民族的工人阶级一同进行争夺社会财富的斗争。因为民族的权力斗争长期以来,就其整个事业来说,都是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决定的,被这种民族激进主义情绪控制的工人就没有能力在工

---

<sup>①</sup> 鲁提尼人是指当时居住在奥匈帝国和波兰等地的乌克兰人。——编者注

会与政治斗争中与其他民族的阶级同志并肩作战。受民族主义激动的人们把任何需要清醒确定无产阶级斗争目标、清醒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的问题,把任何组织和策略问题都看作是民族问题。民族权力政策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在逻辑上是很难协调一致的;在心理上它们是相互排斥的。民族矛盾在任何时候都会使无产阶级大军发生分裂,民族斗争使阶级斗争无法进行。既集中又分散的宪法使民族权力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在多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宪法政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制定这样一部宪法,在这部宪法中,各民族不再被迫进行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权力,就是贯彻自己意志、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它是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的。只有那些既集中又分散的宪法规定才会迫使各民族谋求权力,通过争夺国家权力来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各民族的满足自己文化需求的权力,都必须从法律上确定下来,以便居民不再被迫加入民族主义政党,因而再也不会由于民族斗争而使阶级斗争无法进行。

工人阶级的政策必然是民主的。无产阶级首先要为了使多数人民能够决定国家的总意志而进行斗争。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民的绝大多数。多数人民的统治得到保障,也就保障了工人阶级最终夺取国家权力。但是,在奥地利,有一批民族的权力可能会由于民主的胜利而被削弱,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变得十分困难。在1848年,那些没有历史的民族——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同反动派联合在一起,背叛了民主。自从1861年以来,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古老的有历史民族——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他们的民族权力是依靠在国家中、在各邦和乡镇中少数人被多数人统治。通过这种把民主与民族权力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几乎无法实现任何民主的进步。例如在1867年,实行新的结社法与集会法时,议会拒绝批准可以解散那些“危害国家”的社团组织的决定。但是,第二天,德意志自由主义多数派又提出了这个决定,因为内阁声称,没有这个条款就无法击破捷克反对派。数十年来,这个条款为迫害工人组织提供了最有利的借口,因此这

些组织从这个插曲中很容易看到,民族的权力斗争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制造了什么样的障碍。然后是争取平等选举权的斗争再次为我们证实了这个经验。如果德国资产阶级和波兰贵族没有能够用平等的选举权会使民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动这个证明理由武装自己,那么他们的力量会比现在少得多。除了根本不为选区的划分规定任何普遍原则,除了把选举几何学提升为原则以外,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消除这个论据。但是,一旦选区平等的原则被放弃,人们就允许资产阶级民族政党根据自己的需要合并选区,当然,社会选举几何学还要加到民族选举几何学之上,以致在选区划分方面工人们受到了歧视。无数的这种经验支持工人阶级提出如此调整民族关系的要求,即不要使民族权力依赖于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由于民主的发展而使自己的民族权力受到威胁。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需要起初是从消极的角度决定他们的宪法草案的。他们要求这样来调整民族关系,必须使各民族不再进行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民主的发展不会对任何一个民族的权力造成威胁。但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需要也从积极的角度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多民族纲领。从对于工会斗争条件的认识出发,我们已经看到,每个民族的工人阶级都对其他民族工人的文化发展十分关心。对于政治斗争来说也是如此。其他民族的工人阶级所受到的教育培训越好,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的个人尊严意识越强烈,就越容易作为战友站在自己这一边,在反对阶级国家的斗争中成为品质优秀的战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教育 and 语言问题上,工人阶级必然会采取与其他阶级完全不同的立场。

德意志资产阶级对于捷克人或者波兰人的学校教育没有丝毫兴趣。民族权力斗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之上,即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会由于国家对于其他民族教育事业的投资而受到阻碍。希望国家经费更多地投给本民族的教育事业,而不是投给其他民族的教育,在有产阶级那里,这种愿望逐渐地变成了对于其他民族教育事业的仇

恨：德意志资产阶级和德意志小资产阶级担心，捷克工人阶级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文化水平越高，他们就会越快地摆脱奴隶式的恭顺，在阶级斗争中对于资本家和手工业者的利润就会造成更大的威胁。知识分子同样地也会担心其他民族教育事业的扩大会加剧与自己的竞争。德意志工人阶级就完全不同了。德意志资产阶级担心的，正是德意志无产阶级所希望的。他们希望，捷克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越高，那些压低工资、破坏罢工的捷克人所造成的威胁就会越小。所以，德意志工人阶级真正关心其他民族教育事业的扩大。

工人阶级在语言问题上的立场也完全类似。如果捷克工人从官方那里没有获得自己的语言权利，那么德意志资产阶级和在德意志乡镇定居的小资产阶级集团是不会反对的。德意志知识分子把作为官方语言的捷克语看作是日益增长的竞争威胁。相反德意志工人却在关心，捷克工人在国家官僚机构和法官面前不要孤立无援。面对国家暴力机关，工人的觉悟越高，他们越有勇气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的个人尊严意识就越高，在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中，面对我们社会的大人物和权势者，他们就会更加勇敢，他们对于在阶级斗争中的联盟同志——德意志工人，就会采取更加热烈的欢迎态度。

所以，德意志工人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希望，所有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语言需求都应该得到满足。德意志工人是这样，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也是这样。由此产生了所有民族的无产阶级对于这样一种调节民族关系的规则的要求：要使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不断推进文化发展的机会，确保所有民族的工人都能够参与分享民族文化。

这个要求首先是以对各民族工人利益的清醒估计为基础的，这个要求从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从他的阶级地位产生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物质财富和自由是所有文化的前提条件。所以，居于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首先也是所有精神文化的载体。但是，如果说事实上，占有和

统治是精神文化的支柱,那么,统治阶级却不断设法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试图把他们对于占有和统治的资格恰恰建立在占有高等教育的基础之上。地主阶级在最初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经常引证说,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更高,所以更有权利进行统治和剥削。同样的,今天资产阶级在民族内部的权力所依靠的也是他们是高级文化的载体这一情况。当初为民族内部阶级斗争服务的论据现在被移用到民族之间的斗争。富有民族的统治阶级为他们剥削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进行辩护,他们说,自己的民族在文化上更加高级,而其他民族则是“劣等的”。

对于剥削和压迫所进行的这种主观臆想的权利要求是工人阶级不能容忍的。在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中,这也是工人的阶级敌人的论据。在这里,工人立刻就明白了:你们说,你们有权利对我们进行统治和剥削,因为你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事实完全相反,正是因为你们统治和剥削我们,所以才能更多地分享精神文化。高等文化并不能赋予人们进行剥削的权利,事实是,正是因为你们把我们劳动成果的很大一部分据为己有,所以你们才拥有高等文化。我们提出了一种与你们的法律秩序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法律秩序,在这种法律秩序之中,应当使与劳动相分离的文化再度与作为文化源泉的劳动结合在一起,每个从事劳动的人都有权利分享精神价值,身体健康的成年人,除非以劳动为基础,否则没有任何权利参与分享文化财富。

如果说,工人们反对在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实行这样的原则,反对拥有高等文化的人有权利进行剥削、占有别人的劳动,那么他们也不允许在民族斗争中实行这种原则。在这里有这样一事实,德意志民族拥有他们的康德与黑格尔,他们的哥德与席勒,与此同时,捷克民族受到德意志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剥削,恰恰由于这一点,他们才没有能力向更高级的文化发展。根据工人们的意见,这一事实决不会使德意志民族的有产阶级有权利剥削和压迫捷克民族。如果说,德意志资产阶级在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中都提出了这样的原则,即高等文化使人们有权利占有别人的劳动,那么,所有民族的工人阶级,包括德意志民族



在内,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道德观念:所有从事社会劳动的人都有权利参与分享自己的文化。这个起源于无产阶级伦理的要求,是与我们从工人阶级的工会与政治斗争的需要中所推导出来的要求一样的:要求制定这样一部宪法,要从法律上保障每个民族都能发展自己的文化,所有的工人都能参与分享本民族的文化。

一部使每个民族都有权力发展自己文化的宪法,一部再也不会迫使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在围绕国家权力的斗争中才能一再夺取和捍卫这种权力的宪法,一部再也不会使任何一个民族把权力建筑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上的宪法——这些就是无产阶级的民族政治要求。任何一种形式的既集中又分散的宪法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帝国集权制和诸侯联邦制一样,都是不行的。这种制度的宪法在所有方面都是与无产阶级的理想完全相反的:它不会保障任何一个民族自由发展自己的文化;它强迫各个民族在国家中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它特别迫使古老的历史民族进行反对民主的斗争。于是,无产阶级的目光就必然转向另外一种可以设想的调节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办法,鲁道夫·施普林格勒<sup>①</sup>曾经把这说成是一种有机的观念。每个民族都应该依据自己的力量自由地满足本民族的文化需要,应该进行自我管理;国家应当使自己仅限于保护那些不存在民族差别的、所有民族共同的利益。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必然会成为多民族国家中所有民族的工人阶级的宪法纲领。

但是,决非偶然的是,自由主义企图以既集中又分散的设想来调整民族关系,因为这种调整是从它的整个国家思想观念产生的,而无产阶级的民族自治要求也会同工人阶级关于共同体任务的全部设想完全一致。

人们可以把工人阶级的全部斗争概括为一种争取自决、争取自治的斗争。

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有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生产资料

---

<sup>①</sup> 鲁道夫·施普林格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右翼领袖卡尔·伦纳的笔名。——编者注

私有制赋予有产阶级权力,使他们能够把一部分社会价值产品据为己有,统治工人,向他们发布各种命令和禁令。工人阶级对于经济发展进程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他们也没有权力决定文化发展本身的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给人们带来了自决,它把权力赋予工人,使他们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它使任何一个阶级都无法向劳动者发号施令;它把权力赋予全体人民,使他们能够有计划地管理自己的劳动,而且还能够自觉地决定自己文化的继续发展。所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说成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一场争取自决、争取自治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第一个任务就是争夺政治权力。实现的手段是人民的统治,是民主。争取民主的斗争再次意味着一场反对异己统治的斗争,反对绝对君主制的统治、官僚统治、资产阶级少数派的统治。全部民主的意义就在于人民自决,也就是自治。

自由主义曾经创建了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它最大的成就就是到处都使法律成为法典,也就是编纂成大部头的法典:民事法典、商业法典、刑事法典等等。古老的自由主义曾经努力把行政管理限制在单纯执行法律的范围之内;它做的事情越少,就越招自由主义喜欢。它的原则是,国家应当把自己限制在保障个人自由和公民财产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不要干扰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竞争。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并没有引进新的法律体系,而是对古老的资产阶级法律制度赋予了新的内容。他们不需要制定保护个人的新法律,而自由主义所鼓吹的个人自由要由他们来实现,他们通过把国民经济变成国家行政管理的任务而消除了恰恰是奴役和剥削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的权力。工人阶级不必制定新的财产法,他们只需要用国家的公共事业取代私有主,使财富为人民所有并且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对象。无产阶级不必建立新的法律体系,而是要改变法律的主体。所以,对于工人阶级本身来说,今天,行政管理也许与立法同样重要,在进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过渡阶

段,它将会愈来愈重要。所以工人阶级不能满足于掌握立法,而是必须使他们为之管理的那些人本身变成国家行政管理机关。所以,工人阶级要求自我管理,也就是这种狭义的自治。

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种理由要做这件事情。在多数国家,资产阶级都把军队和行政管理机构保留在君主和他们的官僚手中。施普林格曾经把这种民主说成是一瘸一拐的民主。这种民主所依靠的基本上是一纸空文。掌权者随时都可以消灭民主立法,解散议会。面对人民的愤怒,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军队。尽管人民非常不满,但是,国家制度还继续存在,国家机器并没有停止,这是因为它的官僚行政机构在为此操心。无产阶级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民主。不伤害掌权者的利益,不打破他们的权力,无产阶级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无产阶级需要使自己的权力在立法中得到更加可靠的支持,而不再使法律成为那些依靠士兵和官僚支持的人随时都可以撕毁的一纸空文。所以,工人阶级一方面需要把现有的军队变成一支人民军队。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求用自我管理来取代官僚行政机构。民主只有在它牢固地用双腿站立的时候才能保证自己对付任何推翻民主制的企图:自我管理与自我立法几乎同样重要。

就这样,自治是全部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所在。自治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民主的意义。即使是狭义的自治,即自我管理,也是无产阶级获取它所企求的权力的手段和支柱。

无产阶级关于民族自治的要求也可以纳入这个思路。我们所谓的诸侯自治并不是真正的自我管理。因为它缺乏自我管理的首要前提条件,即相对同样的利益:这种自治对于少数人来说,始终意味着他人的统治,而由于我们的特权选举法,它也经常成为对于多数人的他人统治。民族自治是真正的自我管理,因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全体民族同胞的共同利益。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在任何一个民族内部,都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对立。工人阶级要以与有产阶级不同的方式获取民族所需要的资

金,并且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他们要用不同的方针改造民族教育,要在不同的方向确定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我们社会内部,民族自治仅仅是实现充分民族自决道路上的一个步骤,而后者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坚固基础之上才能实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民族自治是那个被迫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必然要求。奥地利的工人阶级是明确认识到这一点的。一方面,他们正在逐渐克服朴素的世界主义政治,另一方面逐渐克服朴素的民族主义,当然,在民族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这种发展不会毫无挫折地进行。1897年,党在维姆贝格举行的代表大会在党内实行了民族自治。虽然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党在内部结构上实行的是与国家宪法完全不同的法律,但是在每次重新调整党的组织规章的时候,民族自决的思想就会关键性地发挥作用。1898年在《新时代》发表了考茨基关于奥地利民族问题的出色文章,要求实行“民族联邦主义”。1899年出版了西诺普提库斯<sup>①</sup>的小册子《国家与民族》,把个性原则引入辩论。

在这些年代里,在奥地利的政党报刊,首先是在《工人报》上,有大量文章承认了民族自治的要求。在这一年的布尔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党的多民族纲领,要求奥地利变成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要从法律上保障每个民族都能实行充分自决。

民族自治并不是聪明人想出来的一个使国家摆脱困境的计划,它是多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必然提出来的要求,这个要求来源于无产阶级经济与政治斗争的需要,来源于无产阶级关于国家公共事业的思想,最后还来源于他们特殊的意识形态,来源于他们关于文化与工人关系的思想。民族自治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必然目标,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政策的一个必要手段,这种阶级政策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特殊的民族政策——这样一种进化的阶级政策,它的最终目标就是,使

---

<sup>①</sup> 西诺普提库斯是伦纳的另一个笔名。——编者注

全体人民成为一个民族。所以,在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民族的工人阶级都要用民族自治的要求与有产阶级的民族权力政策对抗。

## 第六章 民族原则的变化

### 第三十节 社会主义和民族原则

法国无产阶级用巴黎公社回答德法战争。俄国无产阶级用革命回答日俄战争。毫无疑问,未来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也必然引起革命运动。当资本在争夺销售市场和投资领域的斗争中投入数百万的现代化强大军队时,资本就登上了它的权力顶峰,多走一步就会跌入深渊。恰恰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动荡将引发社会主义性的世界彻底变革。因此,帝国主义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其民族主义原则:当无产阶级首先在欧洲文化圈内的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夺取权力之后,彻底改变各民族共同生活法则的新力量就将充分发挥作用。这些新的法则首先将同崩溃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旧法则进行斗争。但是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最终战胜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一样,同它的国家结构及国界划分的基本准则最终——哪怕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之后——彻底实现并摧毁了封建主义的国家结构一样,社会主义社会最终也将在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废墟上实现其关于共同体(Gemeinde)构成和界限划分的原则。

从法律形式上讲,现代国家是拥有主权的地域团体(Gebietskörperschaft)。当工人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将劳动资料转化为国家和由国家控制并领导的范围较小的地方团体的财产时,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变。未来的共同体也不可能丧失拥有主权的特性;这就意味着共同体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分配的最高领导者。无产阶级首先改变的并不是法律准则,而是法律主体和法律准则的作用;但是国家毕竟由此转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现代国家最初是随着货币经济产生的,后者本身就是商品生产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基础不再是税收,而是这样的事实,即它自己领导生产并分配劳动所

得；现在国家不再通过税收获得商品生产者的价值产品的一部分，而不如说是自己作为所有者来决定将哪些社会劳动所得用于它自身的目的，哪些要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现代国家在一切领域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为商品生产只有作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能够成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形式，作为现代国家基础的货币经济才能够推广。与此相反，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同体消除了阶级冲突，因而也废除了资本家的阶级统治；这时才确实是由全体国民来决定集体意志。工人阶级在夺取现代国家政权的时候，也就废除了现代国家，将它转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但是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通过改变自己的本质，就不仅要与现代国家对立，而且要与国家本身对立。当领土的划分瓦解并最终清除了旧的氏族法律时，国家就作为地区团体而出现了<sup>①</sup>。单从法律形式上讲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因为未来的共同体也将是地区团体；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and 一切生产的基础——是它发挥作用的自然基础。但是这个地方政权的本质将彻底改变。因为，目前在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中隐藏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统治。但是当社会主义共同体消除了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时，它也就废除了一切阶级统治。国家的领土主权现在不再隐藏着人对人的统治，而是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单纯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共同体不仅将与现代国家，而且将与所有历史上的国家形式相对立。至于人们是否还想称这个共同体为国家，则是一个多余的专业术语问题。

每一种新的经济构成都造成国家构成的新形式和划分政治结构的疆界的新规则。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共同体彼此之间如何划分呢？在那里也是由公民的民族性来决定共同体的疆界吗？

如果我们要回答关于社会主义与政治的民族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一

---

<sup>①</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斯图加特 1900 年德文版，第 105、149、177 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0—171 页——编者注）。

问题,那么我们必须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即只有社会主义才会为全体民族同胞提供参与民族文化的机会。随着人民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而背井离乡,随着民族发展成为统一的教育、劳动和文化共同体,狭隘的地方团体丧失了活力,而维系所有民族同胞的纽带却变得愈来愈有力了。蒂罗尔农民今天由于这个州特殊的农民文化而与其同乡紧密相连,而与这个州之外的德意志人严格区别开来。这一民族存在的事实也在民族意识中得到反映。蒂罗尔农民认为自己首先是蒂罗尔人,却很少想到自己的德意志属性。蒂罗尔的工人就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与蒂罗尔农民的特殊性的共同点较少,却以更加紧密得多的纽带与德意志民族相连。当社会主义社会使每一个德意志人都成为德意志文化的产品,为他提供共同享受德意志文化进步的机会的时候,它才会消除民族内部的地方主义。毫无疑问,这一发展将加强政治民族原则的力量。

另外一系列现象也朝着同一方向推进。农民群众还受一切传统习俗束缚,对于他们来说,祖先的家用器物是珍贵的,所有新东西都是令人厌恶的。他们对过去时代的价值的热爱也发挥着政治作用:这是他们宗教信念的根源,是他们爱乡观念的根源,是他们对王朝的忠诚的根源。当我们探索保障奥地利生存的力量时,我们就会看到这是多么重要了:无法摆脱数百年传统束缚的农民是这个国家的支柱之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群众第一次加入民族文化共同体并且也由此加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也根除了对过去几百年阻碍民族原则真正实现的意识形态的热爱。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加强民族原则的推动力量,而且还清除民族原则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但是,这一切只是为民族原则的胜利作了准备。它只有通过理性主义的巨浪才能实现。只要资本主义的大坝一崩溃,理性主义的巨浪就会淹没所有的传统意识形态。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伟大时代——一切旧事物被摧毁,一切旧权威被推翻,最终连旧的所有制关系也被铲除了——旧的传统的事物丧失了它们的神圣光环。这时,群众才会学会摧毁旧事物,以便在其废墟上开展符合自身目的的

建设。群众意识的这一革命将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实践得到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赋予群众自己决定自己命运、通过自由协商和自由决议来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力,并使人类文化的发展成为协商的、坚定的、自觉的人类行为。群众意识的革命将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成为可能,而社会主义教育将为每一个个人提供全民族的文化财富——也就是全人类的文化财富的很大的一部分——由此才使个人完全从狭隘的地方圈子的传统里解放出来,扩展他的视野,才使他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的并聪明地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人们在早就过去的时代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划分的国家疆界没有哪一段是神圣的。现在所有民族的群众都能成熟地应对在 19 世纪只是有文化者才提出的那一问题,即在民族与国家的冲突中表现出来的内部共同体和外部权力的关系问题。当一个民族内部的狭隘的地方团体丧失了力量、民族的文化共同体却使所有的民族同胞密切地凝聚起来的时候,民族共同体对于他们来说就成为安全的、不会改变的事实;但是他们这时就会把外部权力理解为必须服务于人类目的、必须适应人类目的的工具。因此,外部权力适应内部共同体这一基本规律,也就是民族原则的基本思想,在他们中间是有生命力的。

就其内容来讲,民族原则意味着外部权力应当使内部共同体凝聚起来并为之服务的规则。但是从因果关系上讲,只有当劳动方式和劳动条件的彻底变革使与这一基本规律不适应的传统国家构成变得不可忍受的时候,这一基本规律作为动机才起作用。过去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传统的小国家不再符合资产阶级的需要,资产阶级就因此将民族原则写到他们的旗帜上。将来只要社会生产从资本主义方式向社会主义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人类的思想,摧毁了他们旧有的文化价值,使他们有能力应对关于“自然的”国家疆界的问题,这样的事情还会再次发生。

然而,如果说群众认为自由的民族共同体才是他们的目标,那么社会主义也为他们开辟了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必然要以



民主为基础。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共同体也将强迫少数派屈从全体意志；至于是通过直接强迫还是间接通过将他们排除在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之外的方法，是不重要的。但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决不会包含整个不愿意从属于它的民族。这些民族的群众完全拥有民族文化、具备参与制定法律和自我管理的权利，拥有武装起来的群众——怎么能强迫这样的民族屈服于一个它们不愿意归属的—共同体的控制呢？所有国家的权力都是以武装部队为基础的。但是今天的人民军队——多亏一种高明的机制——依然还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阶级的权力工具，如同过去的骑士军队和雇佣兵军队—样。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共同体里，由具有高度教养的人们——他们在车间不再屈从于外来势力的命令，在国家内有资格全面参与立法和管理——所组成的军队不再是独立的势力，而是与武装起来的人民本身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所有异族统治的可能性都消失了。

现在，我们社会中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不仅在于一大批民族还未拥有实现它们所追求的民族国家的权力，也不仅在于许多民族的大多数人由于受过去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没有被包容在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之内，所以反对民族统一和民族自由的思想；不如说民族原则的真正实现也由于现代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区域**这一事实而受到阻碍；那么现代国家难道不是必须力争包含这样一个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经济区域吗？当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为了真正实现民族划分原则，仅仅打算包含一个狭小的，毫不考虑生产而划分出来的经济区域时，劳动产量不会下降吗？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提及这样的事实，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有计划地实行国际分工。简单的商品生产首先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一个城市及其交通所及的地区内部——实行劳动分工，它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劳动的产量。然后，资本主义在广大的经济区域里实现了劳动分工，从而而再次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还奠定了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古典国民经济学随后论证了如下定理，即如果每个区

域的居民只生产那些在他们区域内具有良好生产条件的产品,他们所需的其他产品则用他们的产品去交换,那么每个经济区域内的劳动产量和每个经济区域的财富将增长。这一思想在理论上是无可辩驳的。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实现,也不会实现商品自由交换和国际劳动分工。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不是尽最大可能去提高劳动产量,而是尽可能增殖利润;它不是试图通过将生产资本分配到最可能增加劳动产量的各个生产部门,而是通过加速使闲置资本流向生产领域,通过不断拓展销售领域和投资领域来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在国际劳动分工的需要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需要恰好偶然吻合的地方——如同直到不久以前英国的情况——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贸易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则相反,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丧失了全部意义。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将能够实现国际劳动分工和与之相适应的在各个经济区域内的劳动分配。但是这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当一个国家已经利用关税保护扶植起钢铁工业,而不是通过自由的货物交换以采用其他国家的品位更高的铁矿石的时候,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让已经存在的高炉和钢铁厂突然停工。但是每一年就业人数都在增长,社会的生产设备在增长;社会总是把新的工人、新的生产资料投入到在本国具有有利的生产条件的生产部门,并用它的产品去交换其他国家的产品。这样,社会主义共同体就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实现古典经济学所要求的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

实行民族原则的最大障碍将由此被排除掉。因为就连最小的民族现在也能够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大的民族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小的民族将全部劳动力投入到一个或少数几个物品的生产中,而所有其他的货物都通过与其他民族交换来获得;这样,小民族尽管弱小,却利用了大企业的一切优点。现在,就连那些居住在由自然界赋予的地下资源最贫乏的地区的民族也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李嘉图早已不容置疑地证明了,即使是那些自然条件最不利的经济地区也能通过国际分工得到它的任务:它将生产那些货物——与它比较起来,

所有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优势都是最小的——并必须用这些货物去换取其他国家的产产品。这样,整个文明人类通过国际分工而成为一个巨大的有机体;正是通过这一切,所有民族的政治自由和统一才成为可能。在一个每个共同体都自给自足、自己满足其所需的社会里,想真正实行民族原则是不可能的;对于小民族和那些居住地区生产条件不利的民族,民族自由必然是不起作用的。相反,只要国际分工包括了所有民族,阻碍人类政治划分适应于历史文化共同体划分的最重要的限制就被排除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劳动内部的流动也获得崭新的特征。因为那受盲目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竞争法则支配的,完全不受自觉的规则影响的个人流动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共同体自觉地对人口流动的调节。在就业人数增加能够提高劳动产量的地方,就会吸引流动人口迁入,在土地随着人口增加而收获减少的地方,一部分居民就被迫外迁。当内外迁徙得到社会这种有意识的调节的时候,每个民族才掌握了关于他们语言疆界的权力。这样,违背民族意志的社会流动就不再总是违反民族原则。

民族原则的实现与社会主义胜利联系在一起并非偶然。在氏族共产主义时代,共同体——至少从起源上讲——的民族是统一的。即使是在一个部族屈从于另一个外来部族的地方,前者起初并不丧失其政治组织,而是作为依附胜利者共同体的共同体向胜利者纳贡。随着原始共产主义民族分解成狭隘的地方团体,民族的政治分裂也出现了。而且随着阶级分化,随着民族分裂成民族同胞和民族佃农,异族统治也成为可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表现为有历史民族对无历史民族实行统治的形式。自从社会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政治上的地方主义受到了压制;在广大的经济区域内实行劳动分工的需要促使庞大的民族国家在无数小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但通过这种发展,异族统治也变得不可忍受:无历史的民族产生了历史生活并同样追求实现民族国家。最终社会生产脱掉了它的

资本主义外衣,这时民族文化共同体将得以实现;民族内部的所有地方主义将消失,所有的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将不再可能;劳动分工包括了整个人类,将人类从政治上划分为自由的民族不再存在障碍。人类的政治划分反映了它的民族文化的存在(Sein),而后者又是由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发展决定的:政治上的地方主义和异族统治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现象,这个时代在民族上是以民族分裂成民族同胞和民族佃农、民族分解成狭隘的地方团体,在经济上是以定居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民族原则是统一和自治的民族在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立国原则。19世纪大民族国家的建立只是彻底实现民族原则的时代来临的征兆,正像文化共同体通过现代资本主义的传播是民族文化共同体通过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征兆,资本主义形态下的社会生产是通过社会和合作生产的合作生产的征兆一样。

这样,社会主义预告了所有民族都将实现其对政治统一和政治自由的要求。这对德意志民族也同样适用。因此,德国工人与大德意志主义的儿戏没有共同点,与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敌视工人的活动没有共同点。他们知道,他们在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也在为自己的民族的政治统一而战。为此德国工人——远离草率的泛德意志冒险,怀着必胜的沉着心情——向德意志人民朗读诗人的词句:

忍耐吧!这一天将会来到,那时所有德意志土地将笼罩在唯一的穹庐之下

但是当民族原则刚刚由于社会生产和国际分工的进步而出现时,它很快就遭到其自身的限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就已经愈来愈紧密了;一个普遍适用的交往规则、一个超越各个国家界限普遍有效的法律体系愈来愈有必要了。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现代大国家的出现、欧洲民族势力向海外殖民地的扩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国际法也产生了。各个国家起初通过条约来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旧

的联盟条约和和平条约之后又产生了陆地战争法和海上战争法。逐渐地,经济关系也通过国家之间的条约来调节。这样就出现了那些各式各样的构成现代国际法基础的条约体系:关于内河和海上航运的条约、关于贸易和关税的条约、关于铁路、邮政和电信的条约和关于度量衡和货币的条约。国际法很快就超越了直接经济利益的范围。因此,今天国家之间用条约来规定卫生检查,尤其是反瘟疫、反女童买卖和奴隶买卖的斗争;人们也试图通过条约为制定同样的私法和诉讼法铺平道路。从所有这些条约里面涌现出一个创造一系列崭新机构的国际部门。也就是说,在需要通过条约来为共同的行政管理奠定基础的地方,各个国家就会建立一个共同的机构,一个部门,由它来探索完成根据国际委托,通过国家条约赋予它的任务。国际卫生委员会、监督各个国家财政运行的委员会、国际河流委员会就具备这些特征,国际河流委员会被赋予通常只赋予主权国家的权力,因此国家理论也试图将它设计成特殊的国家构成,即“河流国家”。但是,这些国际部门中远为最重要的是所谓的管理共同体。它们自(19世纪)60年代出现并根据条约在原则上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加入,包括诸如世界邮政协会办公室、国际电报协会办公室、保护工商业财产的国际协会办公室、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国际联合会的办公室、反奴隶拐骗的国际联合会办公室、国际运输中央机构、常设糖业委员会办公室等等。这些办公部门中的一部分已经被赋予了法官的权力,如卫生委员会和河流委员会、世界邮政协会和铁路共同体的办公部门;此外,自1899年以来,常设的仲裁法庭就在海牙存在了。

尽管上述的某些机构还不完备,但在其中已经包含了新社会有机体的富有生命力的萌芽。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国家法律和国家机构已经不够用了。这一发展促成了一套超越国家法律并使这些国家相连的法律体系,创造了其活动不再受国界阻碍的机关。国际条约和国际部门今天满足了这些需要,但它们自身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国际法共同体具有章程和机构,但它们本身还不构成法人。我们有了章程,但我们却不了解确定这些章程和保障它们的权

力的集体意志；我们有了国际机构，但还不了解这些机构应当属于他的那个法人。

在社会主义社会，共同体之间的条约和国际机构无疑将迅速增加。不同共同体之间由于实行国际分工而日益增加的交往关系首先迫使这种情况出现。一旦今天的由无数单个人的决定和行为组成的社会行为受到各个不同的共同体有意识的调控，国际的规章制度也就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内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例如较大规模的迁徙因此就只有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最后，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有必要有计划地调控国际交往关系，也是因为今天发生在个别商人和外迁者身上的每一个落空的期待、每一个错误的计算都将完全直接地影响整个社会。例如，人们不妨想象一下，当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安排了一种用于交换其他民族产品的商品的生产，但这一期待却落空时情形会是怎样！当商品交换和交通不是实行国际领导和调控的时候，国际分工是不可能的。

因此，国际条约和管理共同体最后就不再能满足未来社会的要求了。它们的章程不能受到组织起来的集体意志的保障，它们的机构不能作为某个具体人的机构发挥作用，因此二者都不足以满足未来社会的要求。未来社会最终将使国际法共同体成为拥有常驻代表的法人。这将可能发生在那一天，那时各民族共同体将设立一个由其赋予共同体之间商品交换的最高领导权、从而也间接地赋予每个共同体生产的最高领导权的国际部门。如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将中世纪分散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城市联合起来形成现代国家一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分工将超越民族共同体，创造一个新型的社会结构，即由各个民族共同体参加的“国家的国家”。因此，“欧洲合众国”不再是梦想，而是一个各民族早就已经开始并将被已经可见的力量大大加速的运动的不可避免的最终目标。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民族原则的实现。但是当社会主义社会超越民族共同体而逐渐建立一个由各个民族共同体重新参加

的联邦国家时,民族原则就会转变成民族自治,作为国家构成准则的民族原则就会转变成作为国家宪法准则的民族原则。社会主义民族原则是民族原则和民族自治的更高层次的统一体。

所以,社会主义原则有能力把资产阶级民族原则和民族自治的所有优点结合起来。当这个原则使民族组织成共同体时,就使它能独立立法和自我管理,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拥有使用武器的权力。但当这一原则使民族加入一个作为法人构成的国际法共同体时,它就保证民族也拥有超越它的地区疆界的权力。例如,让我们假设,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在德国减少劳动人数时能提高德国的劳动产量,与此相反,通过增加劳动人数能提高南俄罗斯的劳动产量,那么它将试图将一部分德国居民迁到南俄罗斯。可是德国不会在它的儿女的文化独立性不能得到保证的条件下把他们送到东方。因此德国的殖民者不会是零散地,而是要作为公法团体在乌克兰共同体中出现。只有当各个民族区域团体统一成一个国际共同体时,才会通过有计划的殖民使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出现讲外语的人员团体(Personenverbände)。这些团体在某些方面与它自己民族的区域团体,在另一些方面与居住地区的异族共同体在法律上结合起来。因而,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将提供一个民族人员团体和民族区域团体的色彩缤纷的画卷;它将与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和极端分散相结合的结构不同,而中世纪的同样如此复杂分割的社会与这种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想在这里描绘对未来社会的想象。我们在这里对它所做的陈述是根据对它的本质的客观判断得出的。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人的改变必然导致人类划分成民族共同体。国际分工必然导致民族共同体统一成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社会结构。所有民族都为共同驾驭自然界而联合起来,但整体又被划分成有资格独立发展和自由享受本民族文化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

## 第七章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

### 第三十一节 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

如果党在不太远的将来会感到有必要修改一下自己的民族纲领，那么，它就必须有一天把它关于奥地利的体制的纲领纳入工人阶级总的社会纲领之中，并且阐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目标的民族内容；它还必须以要求少数民族自治来补充关于体制的纲领本身。如果要简短地以纲领的形式概括我们探讨的结果，那么，我们大体上是可以这样来表述的：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被排除于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外。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独自地把民族文化财富据为己有。社会民主工党力求使民族文化、即全民族的劳动成果也成为全民族的财产，从而把所有民族同胞联合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这样才能使民族成为一种文化共同体。

如果工人阶级为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时间而斗争，如果它想扩展学校事业使学校也为无产阶级子弟掌握其民族文化宝藏打开方便之门，如果它要求完全的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那么，它就是为扩大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条件而斗争。

但是工人阶级懂得，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决不能完全地享受民族文化。因此，它将夺取政权，并且把劳动资料从私有的财产变为社会的财产。只有在以社会财产和合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全体人民才有资格分享民族的文化财富，有成效地对民族文化作出贡献。民族必须先成为劳动共同体，它才能成为完全的、真正的和自主的文化共同体。

因此，劳动资料的社会化是工人阶级民族政策的目的，而阶级斗争则是它的手段。



二、在这一斗争中,每个民族的工人是把本民族的有产阶级作为不可调和的敌人与之对立的。与此相反,每个民族的工人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进步是以一切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进步为条件的。因此,只有在反对一切民族的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并且同一切民族的工人阶级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每个民族的工人阶级才能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才能加入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共同体。

三、在奥地利,这一阶级斗争受到既集中又分散的制度的阻挠,这种制度迫使一切民族为国家中的权力而斗争。有产阶级歪曲利用了这种权力斗争,使自己的阶级斗争和竞争斗争披上了民族斗争形式的外衣;它们以此掩盖阶级对立,使被剥削被奴役民族的广大群众为其统治利益服务。因此,这种既集中又分散的制度无论是表现为国家中央集权制还是各邦联合制的形式,对各民族的工人来说都是不能容许的。各民族的工人阶级要求一种可以结束各民族的权力斗争的制度,为此各民族的工人阶级给每个民族确定一个有法律保障的权力范围,确定一种制度,使每个民族有可能自由地进一步发展本身的文化,使一切民族的工人有可能争取到他们在本民族文化中的份额。因此,社会民主党要求按照下列原则来彻底改造奥地利:

1. 奥地利应改组为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
2. 应组成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团体来代替历来的邦,每个团体的立法和行政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选出的民族议院管理。
3. 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区域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
4. 每个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组成为公法团体,这些团体完全按自治原则来管理少数民族的学校事业,并且在官厅和法院面前给其民族同胞以法律方面的帮助。

四、工人阶级只能在历史上形成的国家范围内进行它的阶级斗争。它并未期待民族问题会由于一次帝国主义世界性变革的不可靠的胜利

而得到解决,因为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以大的资本主义邻国工人阶级的失败为前提的,因为这一胜利在奥地利本身会引起尖锐的民族斗争,而这种斗争必然延缓一切民族的阶级斗争,从而也必然延缓它们的文化发展。

工人阶级不是指望通过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而是指望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来实现一切民族政治上的统一和自由。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像它以前的任何新的社会制度一样,也将彻底改变建立和划分共同体的原则。它将消灭那些今天还支持从封建时代和早期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多民族国家的那些势力。它将把人类分为按民族划分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掌握它们的劳动资料,自由地和自觉地掌握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将实行国际分工,因此它也将把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联结成许多国际性的管理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最终将成为组织成团体的民族权利共同体的机关。这样,它将逐渐把民族共同体变为一个巨大的新型的国际共同体的自治成员。把整个文明人类联合起来去共同征服自然,并把人类分成享有本民族文化财富和自觉地掌握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的民族自治共同体,这就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民族方面的最终目的。”

1907年发表。译自1924年维也纳德文版第1—9、109—138、302—322、507—521、530—533页。其中部分译文选自《鲍威尔言论》第1—12、29—32页。殷叙彝、杨威理、张世鹏、张文红等译

# 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摘录)

(1916年)

##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观

1848年革命的失败是受唯心主义哲学教育的一代德国资产阶级的失败。当刺刀战胜了观念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失望地抛弃了唯心主义哲学。由于资产阶级转而致力于促进了50年代繁荣的经济实践,它就把自己的思想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自然科学上。由于资产阶级为终于赢得自由竞争这一革命的后果而感到高兴,它就把自由竞争的影子投射到整个宇宙。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了。

但是德国的自由主义在1866年和1871年的战场上被打败了。在俾斯麦胜利的强大影响下,德国资产阶级投入了容克军事专制国家的怀抱。资产阶级从1871年以来放弃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从1878年俾斯麦的转变<sup>①</sup>以来放弃了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保护关税、中产阶级政策、农业改革、劳动保险——这就是1878年以来的口号。对自由竞争的信仰破灭了。历史学派和讲坛社会主义击败了自由贸易主义。国民经济学和历史著述教育了新一代人,使他们相信国家的创造力量。

---

<sup>①</sup> 1878年2月,俾斯麦宣布支持烟草专卖,从此公开实行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经济政策。——编者注

唯物主义也开始随着自由主义而动摇。与国家缔结了和平的资产者也必须与国家教会缔结和平。由于教会的精神力量显示出自己是反对正在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最坚固的堤坝,资产者就更加乐于缔结这种和平。但是不仅从资本主义的方面,而且从反对资本主义的方面也产生了唯物主义的新反对派。讲坛社会主义作为敌视自由贸易的专制国家的代表,作为在农业危机和土地负债迅速增多的时代的具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农业的代表,作为受到大企业胜利进军威胁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越是有效地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相对立,也就越是强烈地动摇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时代为获得一种新的世界观而斗争,这个世界观应该克服唯物主义。在俾斯麦抛弃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三年之后,即 1881 年,《纯粹理性批判》的百年纪念日表明,力求满足这个要求的新康德主义加强了。

在俾斯麦所创立的保护关税制度的范围里,一种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克服了比较旧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了。卡特尔、农业合作社和工会组织了市场。时代的口号不再是自由竞争,而是组织起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日益严密地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时代的信念不再是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而是为达到经济目的对内对外直接运用政治权力。当有组织的、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随着金融资本的加强,随着卡特尔的发展,随着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发展起来时,旧的市民的个人主义就失去了力量。现在一个市民感觉自己首先是组织的成员和国家的公民;对于他具有最高价值的不再是个人自由,而是对国家的忠诚和组织内部的纪律。随着他的社会观念的这种转变,他的自然观也必然会转变。

首先,他关于自然科学的任务的全部观念都要转变。只要资产阶级还处于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它就为获得应能克服封建时代思想体系的一种世界观而斗争。从哥白尼到达尔文的自然研究的一切丰功伟绩,必然为它提供了反对陈旧观念的武器。现在却是另一回事了。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者从自然科学中寻找的不是对于世界

观需要的满足,而是可以直接运用到技术上的、能够改善他们的生产方法的知识。于是马赫、彭加勒、詹姆斯的怀疑论的实证主义教导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自然科学:我们的认识是生存斗争的一种工具,只是为达到实际目的的一种手段。认识不能去探讨事物的本质,而只能为达到实际目的收集和整理经验。自然科学凭借假说推断出它的可用实验检验的自然规律,这些假说满足了老一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对于世界观的兴趣,是他们用来与封建时代世界观对抗和斗争的一种世界观的基石。对于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来说这些假说本身并不重要,它们仅仅可以当作一种方法使用,来整理经验事实,通过计算把经验事实联系起来。哥白尼的行动对于老一代人来说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势力思想体系的一个革命行动,对于我们时代的相对论来说,则是单纯地更换坐标系而已。我们宁可选择哥白尼的而不选择托勒密<sup>①</sup>的坐标系,这仅仅是因为哥白尼的坐标系使一种更加简便的计算成为可能。

随着把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这种变革,对自然规律的理解首先发生改变。当无限的君权成为一切法律的创立者时,自然神论者认为他的上帝就是自然界的立法者。当共和国内受法律支配的人民成为立法者时,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世界对泛神论者来说就和立法的神成为同一的了。当资产阶级宣布人类永恒的道德天性是一切法律的源泉时,它从人类永恒的认识能力中寻找自然规律的源泉。当历史的法律学派把法律看成有系统地发展着的人民精神的流露时,自然规律也成为辩证地运动着的世界精神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的时代创造了另一种法律概念。当我们说到社会的法律时,我们考虑的不是以人类的道德天性本身为根据的永恒的人类法律或市民法律,不是体现了人民精神各个发展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上的法律制度,而是我们国会的日常立法工作,国会经过法律今天规定预防口蹄疫,明天调整交易所中的股票投机。我们时代的法律是为了达到经济目的而日常运用的手段。

---

<sup>①</sup> 克罗狄乌斯·托勒密(约90—168)——著名的古希腊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地心学说”的创始人。——编者注

而这种法律概念现在也传播到自然规律方面,自然规律对于我们也只不过是达到了经济目的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知识只是我们劳动的一种手段;我们力求使这种手段最合乎目的、最简单、最经济,为此目的我们尽可能把许多个别的认识概括为一种规律,我们把这些规律叫作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不是上帝给予世界的一种规律,不是自然的永远不变的认识能力强加的一种规律,不是世界精神的一项规定,而是人利用来为自己服务,以使用最简单、最合乎目的、最经济的方式整理他的经验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手段。这些自然规律不再向我们揭示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它们仅仅是合乎目的地整理我们的知识的一种手段,而知识本身只是使我们的劳动合乎目的的一种手段。

机械论的自然观要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运动规律。在它看来物质微粒的运动就是世界的本质;光、热、电只是那些运动借助我们的思想器官在我们的意识里引起的感觉。对于新的观点来说这种观念不再有任何意义了。我们所经验到的正是我们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所经验的自然过程描述为物质运动的现象,那么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即用对于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方式整理这些自然过程,如果使用这种方法能够允许我们比不使用这种方法更加简单地、更加经济地整理我们所经验的现象,这种方法才是正确的。

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人的一切劳动都是通过人力的物质运动;如果要把自然过程同人的劳动相类比来加以理解的话,就必须把这个自然过程设想为通过力来推动的物质运动。采用机器也没有改变这一点;机器只是作了从前必须用人的手和脚来进行的运动,因此工厂时代把世界同这一时代的劳动相类比,把世界看作力学机器的体系。但是在现代,机器工业越来越远地落在仪器工业的后面: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突出地引起我们的兴趣。除了仪器工业的进步以外,农业的技术改革也使我们感到兴趣:植物的营养、化肥的作用、土壤细菌的活动今天使我们感到兴趣,正像一百年前人们对纺织机器感到兴趣一样。这样我们的劳动概念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劳动是仪器内部的化学和

电的过程,从技术上说这个过程是主要的东西,而劳动者的活动只不过引起这个过程,他通过扳动一个杠杆或者按一个按钮而发动这一过程。生产就是给植物提供营养,把肥料撒在地上的短工的活动仅仅是生产的一个条件。于是我们不再认为人的劳动的本质是机械运动;而认为它是化学的、电的、生理的过程,人的机械劳动只不过引起这些过程而已。如果以我们的劳动为模式来设想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们就再也不能把自然现象归结为通过力来推动的物质运动了;现在在我们看来,化学能和电能本身并不比机械的劳动更难理解。

原子论也随着机械论灭亡了。在封建的领主联盟和同业联盟被专制主义摧毁,而专制主义又被自由主义摧毁的时代里,时代的思想致力于分析整体和个别之间,国家和公民之间,宇宙和原子之间,上帝和造物之间的关系。正如在社会上一样,在思想上集体的整体性和个体的独立性,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在彼此斗争。从个人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同时克服了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

个体的独立自主被破坏了。单个的人将组织起来并且仅仅在他所隶属的各种组织里发挥作用。今天个性只有在有组织的活动中才能发展;个性只有通过组织才能发挥作用;个性为了能够在组织中发挥作用,必须为组织服务。个体是组织的产物和工具,就像组织是个体的产物和工具一样。随着非组织的个体的灭亡,它的理论模写即原子也灭亡了。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者看来,原子不过是人们可以利用的一种思想的方法,它使人有可能简单地表述经验,但是它不再是真正的实体。在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者看来,原子自行分解成电子的行星系——但是同时他只把这个体系看成思想的实用方法,而不是真正的实体。

普遍主义也和个人主义同时消失了。今天的具体的国家本身只不过是许多组织中的一个,它的立法是由对它施加影响的那些组织的力量决定的,它的政府是争夺政权的各党派力量的合力。国家不是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普遍性,而是个体的力量较量的结果。随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消失,它的模写,即自然神论的立法的神、康德的立

法的人类理性、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也消失了。

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都消亡了。现代人的世界观所包含的无非是要素的复合体，知觉群。要素的复合体，知觉群由交替着的知觉构成，它们忽而互相联合，忽而重新分离，它们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截然互相分离，而是到处都在互相转化。任何地方都没有彼此截然划分的个体，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按计划组织起来的整体——就像在印象派的画里一样，避免了一切鲜明的轮廓，让一切线条互相融合，一切色调彼此混合。这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在这个时代里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旧对立在一种实践中消除了，在这一实践里个体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而仅仅是组织的产物和工具，但这个组织还不是整体的组织良好的体现，而仅仅是个体的工具，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公团，而是股份公司和卡特尔、合作社和工会。这是一个时代的世界观，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关于个性和人性的权利、关于世界和神的本质的这些古老的重大问题不再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时代的政策只是要贯彻经济集团的利益，它的科学只是要经济地整理我们所经验的东西，它的艺术只是要再现我们所知觉到的东西。

因果性和目的论之间的对立也随着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对立一同消失了。机械论的自然观只容许有现象的因果性联系。而被黑格尔也转用到历史方面的、对纯粹因果性科学提出的要求，由马克思的历史观加以满足了。但是这种历史观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起而反对它的首先是来自目的论方面的反动。新康德学派(什坦姆列尔、温德尔班德、李凯尔特)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把因果律局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他们认为，科学不应当按原因和结果的范畴，而是应当按手段和目的的范畴去整理历史和社会。但是此后目的论也敢于再去碰自然科学了。因果性的自然规律只是用以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因果性本身只是以目的论为论据的。因果律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说明，而只是对我们的经验的经济的表述；它不能向我们指明，一个原因怎样产生一个现象，它只向我们指明，一个现象怎样继另一个现象



之后发生,一个现象怎样伴随着另一个现象发生。由此可见,因果性概念被人用休谟的方式重新加以考虑;这种概念只能从生物学角度,只能通过它的实际效用来证明。因此它的权力只达到它的效用所达到的程度。当按照手段和目的来整理能够比按照原因和效果来整理更加简单地表述过程的时候,就宁可采取前者而不采取后者。国家是应该听任“各种力量的自由较量”来满足一种社会需要,还是应当通过国家的立法和行政的有计划的活动本身来加以满足,这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只是一个是否适合目的的问题;那么现代科学是应当把一种现象同自由竞争相类比而描写成一种机制的结果,还是应当同有计划的活动相类比而描写成目的明确的努力的结果,这对于现代科学也是一个是否适合目的的问题。目的论特别是在生物学方面又得到采用;许多人对达尔文失望了,重新去援引拉马克。由于资产阶级不再置身于反对神学的斗争中,它也就不再惧怕目的论了。

最后,对科学的数学方法的看法改变了。这一方面的转变也是首先在社会学范围内实行。重农学派、古典学派和马克思按照数学的自然科学的榜样创立了就其全部方法而论是数学的国民经济学说。现在对一种应当既反对古典自由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科学的需求首先在德国产生了。历史学派拒绝接受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提供理论的数学方法。它宣称,国民经济学不应该把个别的收入表述为社会劳动的量,而应描写经济现象在性质上的多样性,并且分别阐明这些经济现象的发展。记述的历史的国民经济学说与推论的数学的国民经济学说是相对立的。以后才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对数学方法的正确性提出了问题。这里当然没有人能敢于声称要仅仅用具体经验内容的摹写代替数学推论的方法,用自然历史代替自然科学。但是人们在这里也学会不能过高估计数学方法所能提供的东西。从质到量的分解没有使我们像洛克和唯物主义一样去认识物体的第一性的、唯一真实的性质;这种分解只是我们的悟性加以利用的一种手段,以使用最经济的方式表述到处都存在质的规定性的物体世界,从而更加完全地

掌握物体世界。对于新的认识论来说,数学并不像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天赋观念体系,不像洛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对物体的第一性的、唯一真实的性质的认识,不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悟性的规律性,而是人为了达到他的技术上的目的而思考出来的一种适当的手段。

对数学方法的这一比较恰如其分的评价最终上升成为对于不再把世界分解成量,而是从它的质的方面表述世界的一种世界观的需要。对于不劳动而享受的、游手好闲的富人,对于不是把劳动当成单纯谋生手段的、从事创作的艺术或学者,对于笃信宗教的人(他反过来问道,如果我们赢得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同时却失去了我们的灵魂,这有什么益处),对于厌恶地躲避重利盘剥者世界的、具有伦理感或美学感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我们的物品世界是由使用价值而不是由交换价值组成的,我们的社会不是由经营的主体和国家公民,而是由有个性的人组成的。他们用蔑视或怜悯的眼光看待把一切都还原成金钱数量的劳动大众。因此数学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永远不能使他们满足,这种世界观本身只是达到经济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按照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模式把整个世界分解为价值量——质量或能量。他们是那种反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逆流的支持者,这一逆流作为有闲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哲学,即使在唯物主义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代也从来没有完全枯竭过。但是今天逆流的力量增长了。第一是因为,逆流适应其需要的那一阶层同经济生活的对立比以前激化了,这个阶层的食利者生活随着货币的贬值被经济生活破坏了。第二是因为,机械论的自然观的解体使人有可能满足对于一种非推论性的世界观的需要,而不致同数学的自然科学发生矛盾;因为如果数学的自然科学只是达到技术目的的一种有限的手段,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任意为另一些目的创立一种和数学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

这样,整个机械论的自然观连同一切以它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分解成现代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古典世界观完

成了这样的自我分解的话,那么这种分解毕竟首先还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范围内完成的。把现代认识论从这个范围解放出来的任务还有待解决。

##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从**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发展出来的。当它从这个母体分离的时候,它同在它的发生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即同**唯物主义**发生联系;它的名称是由于这种联系而获得的。但是当唯物主义也随着机械论的自然观解体的时候,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同晚近的认识理论联系起来,时而同**新康德主义**,时而同**马赫**的实证主义联系起来。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的哲学体系的威力还如此强大,以致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已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却仍旧虔诚地接受这一资本主义世界在观念上的映象,不敢破坏这些映象,而是力求同它们联合。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世界观的自我分解才摧毁了这一哲学体系对于我们的威力,这一分解才使我们有勇气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体系相结合,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方法去理解这些体系的历史依附性和时代局限性,并且从而把我们从它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在产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时代,对机械论的自然观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唯物主义**是作为自然科学重大发展的最近的和不容置辩的成果出现的。只有在机械论的自然观的解体使唯物主义失去基础以后,我们对唯物主义采取批评的态度。现在我才领悟到,唯物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在宇宙上的投影。这样一来,把社会主义历史观与资本主义最后的教条主义体系联系起来的纽带才断裂了。

但是立足于机械论的自然观的不仅有唯物主义的教条的体系,而且有**康德的批判**的体系。现在我们对它也采取了另一种态度。重农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的自然秩序。只有马克思

才教导我们,要把重农学派和古典学派看作一切人类经济的“自然范畴”的东西,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范畴”来认识。康德是重农学派的同时代人。在他看来,个体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形式是一般的人类认识能力的思想形式。个体资本主义的自然观的自我分解才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被康德简单地看作人类的观念和思想形式的那些观念形式和思想形式,是“历史的范畴”,是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阶级的观念形式和思想形式。现代相对主义克服了牛顿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才使我们能够理解,康德的先验的观念形式只是一个今天已被克服的发展阶段上的自然科学的先验的观念形式。

在现代人的、首先是马赫的认识论中,机械论的自然观完成了分解。但是当这一分解鼓励我们把以机械论的自然观为基础的那些体系放进它们的社会和历史的联系中去的时候,这一分解就使我们也超越了现代人,也超越了马赫。

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国家通过它的法律管理经济生活。资本家阶级宣称,这些法律是达到普遍的社会目的的手段,是用从社会来说最合乎目的、最经济的方式安排经济生活的手段。恪守这个法律概念的马赫把它应用到自然规律方面:自然规律是最合乎目的、最经济的方式整理我们的经验的一种手段。但是事实上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并不为普遍的社会目的服务,而是为统治阶级的特殊需要服务。因此自然科学也不是用最合乎目的、最经济的方式来整理我们的经验,而是用符合一个特定阶级的特殊精神需要的那种方式来整理。

马赫认为科学是一种用最简单的方式整理我们经验的事业。马克思的历史观引导我们把科学看作一种以某种方式整理经验的事业,这种方式最充分地适应处于某一具体社会状况、属于某一特定阶级的人们的倾向。马赫认为自然科学的历史就是思想相互之间的不断前进的适应和思想对自然事实的不断前进的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把它看成思想对社会状况和对由这些状况决定的精神需要的不断前进的适应。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彭加勒和詹姆斯

都不能企及的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必须详尽地指明那种方法,即那种精神过程,人们通过这一精神过程,按照他们自己劳动的样式,按照他们要争取的社会制度的样式,按照他们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斗争的需要创立他们的世界观。我们指出了——当然只是大略地——这样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认识论怎样才是可能的;我们在这里只能描个轮廓的东西,如果加以发挥的话,就会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译自《活着的马克思主义》1924年耶拿德文版  
第450—464页。选自《鲍威尔言论》第35—46页

# 给考茨基的信

(1917年9月28日)

1917年9月28日于维也纳

亲爱的考茨基同志！

我到这里已有一个星期。他们的欢迎使我非常高兴。

三年来我和世界完全隔绝，对德国知道得很少，对奥地利根本什么也不能知道。只是在俄国革命以后，我才能得到彼得堡的党的报刊，从这些报刊上对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党的情况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后来我去了彼得堡，在那里不仅从和我们同志的私人交谈中了解到很多情况，而且还补看了战争年代的文献，所以我相信我现在对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一般说来，我的观点和您的观点是一致的，尽管当然并不是在每个细节上都这样。无论如何，我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完全像从前一样仍在同一个阵线中工作。

我暂时当然完全无法考虑党的工作。我只有30天的假期，而且不知道以后我的情况怎么样。我利用这个假期来进一步了解一下我不在的那段时间的情况。

我对俄国自然应当有很多可讲的东西，但写出来几乎不可能。总的说来，我站在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立场上。真正的孟什维克制定了一个我认为行不通的政策。他们大致是这样论证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如果无产阶级要求的東西比资产阶级革命所能

给予的要多,就会出一个镇压无产阶级的卡芬雅克<sup>①</sup>。为了使卡芬雅克不致出现,宁可由我们自己来行使卡芬雅克的职能。这样我们就挽救了革命并且使无产阶级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这种政策当然使大批工人离开了孟什维克。但是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推行一种最危险的冒险政策。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策略忠实地表现了由于三月事件<sup>②</sup>必定会在俄国无产阶级中出现的对自己力量的过高估计。雅各宾派对断头台万能的迷信以对机关枪万能的迷信的形式在彼得堡复活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马尔托夫领导下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保持了真正的中间道路。“马克思主义中派”在那里也是正确的。

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完全像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发生分裂。他们有他们的孟什维克(阿夫克森齐也夫)和布尔什维克(最高纲领派),而且现在又有了他们的国际主义者,因为过去和右翼同行的切尔诺夫现在向左摆了。

没有人能预言事态的结局。农民和士兵革命情绪很旺盛,并将保持这种状态,直到土地问题得到解决。虽然如此,我担心,如果战争还要长期打下去,革命会走向灭亡。不在军队里重新建立军纪,战争将不可能继续下去,而军纪在俄国就是革命的士兵屈服于无疑是反革命的军官。因此我认为只有立即实现和平才能保卫革命。

这次革命的社会成就是极为巨大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取决于这次革命能否得到挽救。尤其必须使法国和英国的民主派懂得俄国革命的成败对整个欧洲的民主化有什么意义。但是可惜我现在完全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对法国和英国的民主派施加影响。

我暂时只有短期的休假,我的情况在那以后才能得到决定。鲁道夫<sup>③</sup>想在我的假期内就能到维也纳来,然而他不得不稍稍推迟一下他

---

①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1848年5月起任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编者注

② 指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俄历的2月是公历的3月。——编者注

③ 指鲁道夫·希法亭。——编者注

· 鲍威尔文选 ·

的假期,他在信里让我把这一点也告诉您。

向路易莎夫人、令郎和您本人致最衷心的祝愿。

您的奥·鲍威尔

译自《社会史国际评论》1970年第3期第470—472页。

选自《鲍威尔言论》第48—50页。殷叙彝译



# 给考茨基的信

(1918年1月4日)

1918年1月4日于维也纳

最尊敬的考茨基同志!

您对反伦纳论<sup>①</sup>的增补我已收到,并把它传给了丹年别尔格,因为原稿已在他手里。他是人民书店的经理,主管技术上的事。

您的关于亚尔萨斯—洛林的小册子<sup>②</sup>,我已在《工人报》<sup>③</sup>上登了广告,也许您已经看见了。广告刊登在圣诞节的那一期上。

《莱比锡人民报》对布尔什维克攻击之猛使我非常吃惊。我认为这种攻击既不公平,也不恰当。不公平,是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显然只能像他们所做过的那样去做,而且既然欧洲无产阶级本身未能用任何一种方式去支援俄国人,他们就没有多少权利要求俄国人为他人的利益牺牲革命。不恰当,是因为我们实在不可能用引起德国工人对革命的反感来使德国工人的思想革命化。

这种依我看来是错误地对待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其原因在于人们只是注视俄国的事变对外国、对缔结和约的时间以及和平条约的内容

---

① 指《战争马克思主义》(《Kriegsmarxismus》)。这是考茨基为批判卡尔·伦纳的《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一书而发表的著作,1918年在维也纳出版。——编者注

② 指《亚尔萨斯—洛林》(《Elsaß-Lothringen》)1917年斯图加特德文版。——编者注

③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1889年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维克多·阿德勒创刊。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的机关报。——编者注

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却完全忽视了事变过程的内在意义。这确实正是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这一专政多半只会是转瞬即逝的,但是它却将造成具有极大影响的、任何一个未来的政府都不能避开的既成事实。孟什维克责骂它是个人专政、士兵阴谋、专制政府等等,这纯粹是幼稚的。人们可以这样去骂任何一种革命专政。如果说托洛茨基把立宪民主党人赶出立宪会议,那么他只不过是重复独立党人的先例<sup>①</sup>,还远远赶不上雅各宾派的先例。如果说他查封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刊,那么他对它们所做的无非就是克伦斯基政府在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当部长时对布尔什维克的报刊曾经做过的事。我从来没有同情过布尔什维克,却总是同情马尔托夫集团。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只能采用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形式,这却是孟什维克多数人本身的罪过,他们拒绝听取马尔托夫的任何建议。我认为,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就有义务至少是给布尔什维克以同情,并且把德国工人的注意力首先引向俄国事变的社会方面,引向这一事变作为阶级斗争的意义方面。我相信,如果您把这一点向爱德华<sup>②</sup>和《莱比锡人民报》说清楚,那会是很有益的。昨天匆匆见了本德尔<sup>③</sup>一面,我很喜欢他那过人的风采,可惜没有能够和他详谈。

向路易莎夫人和您致以衷心的问候。

奥托·鲍威尔

译自《社会史国际评论》1970年第3期第473—474页。

选自《鲍威尔言论》第51—53页。殷叙彝译

---

① 1653年英国独立党领袖克伦威尔解散长期议会并赶走议员。——编者注

② 指爱德华·伯恩斯坦。——编者注

③ 指贝奈狄克特·考茨基(1894—1960)——卡尔·考茨基的第三个儿子。本德尔(Bendel)是爱称。——编者注

# 布尔什维克和我们

(1918年2月24日)

从60年代到1904年的俄国革命的历史是“知识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史。那时在俄国只有知识分子才形成了一个革命阶级。然而他们要单独去推翻专制制度还嫌太弱，于是他们力图让人民群众为他们效劳：最初——从60年代就开始了——是利用农民，后来——从90年代以后——是利用产业工人。就像德国三月革命前的知识界渴望由“带着激进锁链的阶级”获得“德国的解放”一样，90年代俄国革命的知识界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作为工人政党而是作为一批知识分子的政党出现的，这些知识分子打算唤醒、组织和训练工人群众去进行阶级斗争，以便依靠工人的力量推翻专制制度。

1893年以后，俄国的一些城市建立起了《斗争协会》。这是一些小小的社会主义的团体，差不多完全由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组成，它们的各个成员同工人有联系。最初，他们自然未能赢得工人去参加政治斗争，因为警察镇压得很厉害，并且工人本身觉悟太低，于是他们仅仅限于在工资利益方面打动工人，在他们的工资斗争中向他们提供建议，组织他们罢工。《斗争协会》的各个成员就这样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小群工人，同他们保持固定的联系。这样，党的“外围”，即一些本身不属于党、对社会主义根本不懂或者懂得很少、但受到社会主义影响的工人，就在真正的党员，即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的知识分子（《斗争协会》仅仅由他们组成）的周围聚集起来。但是这整个组织的实践活动局限于组织和领导工

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发展阶段被称为“经济主义”<sup>①</sup>阶段。

经济主义产生于 1895 年至 1898 年这一工业繁荣时期。在这期间,罢工浪潮波及全俄。当 1898 年一次经济危机爆发时,罢工运动进入低潮,从而使“经济主义”不能发生任何作用。相反,第二年,俄国各大学的学生运动却开始了,它导致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工人也被卷了进来。俄国社会民主党因此被推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1900 年,由列宁和马尔托夫编辑的《火星报》创刊了,这是社会民主党第一个真正的政治性刊物。在该报的各栏中经济主义得到了克服,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被确定为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那时一群定期地、专职地把《火星报》从外国秘密地运进俄国并在这里组织散发的“职业革命家”就聚集在《火星报》的周围。这些革命家渗透到各个城市的党小组中去,在反对“经济派”的斗争中夺取这些党小组的领导权并把在这些党小组周围的无产阶级“外围”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

当时党组织的外貌是这样的:在各个城市都有“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五至六个“职业革命家”和知识分子组成。如果其中有一个委员退出,其余的委员要补选一位同志;工人对“地方委员会”的组成没有任何影响。而只有这种地方委员会的成员才是具有充分资格的党员。他们把工人组织起来,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把较小的、大多由十人组成的工人小组联合成许多小的组织。但是这些工人组织对党的领导不起任何作用,而是必须简单地执行党的指示,为地方委员会提出的口号进行宣传,散发《火星报》和地方委员会交给他们的传单。这就是“革命的秘密组织对群众运动的专政”。

经济派起来反对这种专政。他们主要依靠的是那些对政治斗争还

---

<sup>①</sup> 对知识分子来说,工资斗争最初只是用来激发工人的手段。但是由于在实践中一直从事组织工资的斗争,他们终于把这种手段本身看作目的。这样一来,他们的意识形态就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任务,只有争取工人阶级直接的经济利益的斗争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种阶级斗争观点的论据,是他们从德国修正主义那里抄袭来的。

很不理解并把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看作是组织工资斗争的工人。相反,地方委员会则掌握在那些把政治斗争看作无产阶级最重要的任务的“政治家”——《火星报》的拥护者的手里。因此,经济派要求党组织民主化,要求地方委员会服从属于它们的工人小组。而多数“政治家”则坚持革命的秘密委员会对那些还未经过训练的、还未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实行专政,因为他们臆想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运动充分保持政治的、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性质。

然而就是在经济主义完全得到了克服、俄国整个社会民主党将其全部力量集中于政治斗争之后,党组织内部争取民主化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这场斗争在1903年党的伦敦代表大会上终于使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列宁)和孟什维克(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布尔什维克坚持由一个秘密的、严格集中的、由“职业革命家”和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党组织对那些受他们影响的群众实行专政。孟什维克要求党组织民主化,要求把党组织改变为全体社会主义工人的组织。于是,围绕组织形式问题的一场争论导致了分裂。但是在这场围绕组织形式问题的争论中已经隐藏着一种更深的对立。布尔什维克首先是革命家。他们牺牲党内的民主,仅仅为的是使党具有最鲜明的革命性。他们的理想是由最革命分子对那些目标不很明确、革命思想较少的群众实行专政。相反,孟什维克则不重视组织的革命性,而注重其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性质。他们希望党组织民主化,希望把工人吸收进来,即使因此冒暂时削弱运动的革命性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他们的理想是一种以西欧和中欧为榜样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sup>①</sup>

\*                                 \*                                 \*

---

<sup>①</sup> 关于这次组织形式的争论可参看由马尔托夫、马斯洛夫和波特列索夫编辑的文集《俄国的社会运动》(1909年彼得堡俄文版)中叶戈罗夫的文章和该文集所引用的俄文资料;德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向国际社会主义者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报告》(1904年慕尼黑德文版,也收在《社会主义的武库》半年合订本第4期中,190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的状况》,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委员会的“使者”编,1912年柏林德文版。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初在组织形式的争论中表现出来的对立,不久后也在策略的争论中公开化了。当1904年在满洲遭到失败后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内阁试图建立一种“新纪元”——“信任的纪元”<sup>①</sup>时,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开始了一场自由主义运动。社会民主党人必需确定他们对这场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首先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孟什维克,力图利用这场自由主义运动,以便唤起一次无产阶级运动,通过这次无产阶级运动来加强自由资产阶级并推动它前进。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应当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参加自由主义游行示威。相反,首先作为革命家的布尔什维克,则用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来激烈地对抗自由资产阶级的合法行动;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应当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游行示威,应当针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的口号提出革命共和国的口号。

策略上的这种对立在书报中扩大到对日益临近的革命的看法的对立。孟什维克宣告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支持它,以便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去取代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相反布尔什维克则认为,俄国革命将在俄国导致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专政;俄国革命决不是结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不如说是将开创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国际资本主义将被这场革命推翻,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实现。同这些观点相一致的是这两个派别的策略,即孟什维克宣告无产阶级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以反对沙皇制度;布尔什维克则宣告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不仅反对沙皇制度和地主阶级,而且也反对自由资产阶级。

1905年1月22日革命到来了。党突然从“地下”潜伏转为公开活动于广大公众之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突然落到昨天的一个小小的宣传团体的手中。而这一群众运动的戏剧性的进程看来却同样地违背了这两个派别的期望。

---

<sup>①</sup> 1904年日俄战争后被任命为内务大臣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为了争取资产阶级,允诺进行改革并声言当时是“政府信任社会的时代”。——编者注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激起了经济斗争。1905年10月迫使沙皇第一次屈服的那些工人的觉悟忍受不了工厂中的暴政。在进行了争取宪法的斗争之后,运用基本的权利继续进行了争取提高工资和减少工时的斗争。资产阶级由于受到了惊吓和愤怒,就到沙皇的刺刀下去寻找保护。当斗争对无产阶级来说真正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资产阶级却宣告革命已经结束。阶级矛盾使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彼此尖锐地对立起来。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的希望原来是空想。

然而布尔什维克对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希望同样也是虚幻的。尽管农民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举行起义反对庄园主,但是使庄园化为灰烬的火焰只会把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分子赶入专制制度的怀抱。而自己刚刚起义过的农民却穿起士兵的制服镇压了城市里的革命。

无产阶级被打败了,革命遭到了镇压。两个派别怀着极其不同的心情离开了战场。孟什维克批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犯了“错误”,说无产阶级因此把自由派推进了反革命阵营;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阶级运动不可避免的结果(恐怕是有道理的),在孟什维克看来却是策略错误造成的后果。孟什维克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党必须为一个在立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较长的和平时期做准备,因此要首先利用杜马中那些新的、虽然是有限的合法行动的可能性,如疾病保险、工会、合作社、教育协会。布尔什维克不相信革命已经结束;“它时而铿锵有声地直冲云霄,时而又全副武装再次来到”。他们坚持把革命的秘密组织和号召武装起义的革命口号作为手段,把立宪会议作为最近目标。孟什维克注重合法组织,并用比较有限的斗争目标,如结社权,去代替革命口号,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取消派”,他们要“取消”旧的党组织和党的传统。派别斗争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sup>①</sup>

---

<sup>①</sup> 参看俄国社会民主党向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托洛茨基《革命中的俄国》,无出版年代,德累斯顿德文版;切尔万宁《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1908年斯图加特德文版;加米涅夫《两个政党》1911年《工人报》出版社俄文版;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党》,《斗争》杂志第2卷。

\* \* \*

战争来到了,并且引起了第二次大革命。在三月斗争中出现了以苏维埃(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为一方,以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为另一方的两个政权。事实证明,两种相互敌对力量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难以维持的。五月事变结束了这种局面并撤销了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职务。事态将怎样发展呢?

孟什维克确信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应当把国家交给自由资产阶级来统治。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从而取代其地位的任何尝试都只会招致反革命。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支持自由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策烈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参加了“临时政府”。

布尔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提上日程,这场革命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工人必须同革命士兵和农民结成联盟去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取国家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他们的口号。

最初,孟什维克占优势。但是由于同资产阶级进行联合,他们必然采取背离工人群众要求的政策。他们必须赞成继续进行战争,必须反对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要求,必须对士兵采取严厉的强制措施,必须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工人对孟什维克感到失望,愤怒地离开他们并且涌向布尔什维克。把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当作自己的理想的党到头来发现自己被无产阶级群众抛弃了。

而布尔什维克不仅赢得了产业工人,也赢得了士兵。把俄国军队的瓦解完全归罪于布尔什维克是不公正的。这种瓦解不如说是由于那些厌战的、目不识丁的、受最天然的本能支配的士兵群众的文化水平低下,他们不能理解反对外敌而保卫祖国和革命的必要性,也不能用革命军队自觉的民主的纪律去代替被粉碎了的、旧的、机械的纪律。但是,布尔什维克用他们的反战和反对反革命军官的宣传去激发士兵的这种天然本能,促进军队的瓦解,这也是事实。他们因此对俄国的解除武装,对德国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实力的加强起了一份作用;但另一方面,



也正因此，他们使一度有成为反革命工具的危险的军队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当科尔尼洛夫在九月初向彼得堡进军的时候，政府不得不把彼得堡工人武装起来，防御迫在眉睫的反革命的进攻。但是正如 1871 年当巴黎人民被武装起来去抵抗德国人时巴黎落到了无产阶级手中一样，一旦政府把武器交给彼得堡人民去进行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彼得堡就落到了工人的手中。科尔尼洛夫的叛乱阴谋导致了俄历 10 月 25 日的革命。这次革命使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成了首都的主人。由于布尔什维克得到军队的支持，对首都的统治成为全国性的专政。

布尔什维克只代表俄国人民的少数。但是他们依靠“赤卫队”和大部分军队的武力的支持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他们由于镇压了同他们敌对的多数才使自己得到了巩固；因此他们必须查封报纸，监禁敌对党派的领袖，驱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现在就这样在整个广大的俄国重复他们十五年前在党组织的小范围内做过的那种尝试：革命的少数对那些糊涂的、未受过训练的、还没有明确目标的多数实行专政。但是，十五年前他们在党组织内的专政只是依靠一个组织章程的条文，它现在依靠的则是“赤卫队”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获得了一个完全独特的、使西欧和中欧的社会民主党人感到陌生的特征。

首先，它使自己同传统的民主口号对立起来。布尔什维克把由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选出的议会所代表的民主共和国这一最初的斗争目标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他们针对这种理想提出了一个“苏维埃的苏维埃”的新国家理想，即应当由一个全俄国的工人士兵苏维埃选出的委员会来管理国家。这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事实上连多数农民对他们所服从的国家意志的形成都起不了任何作用。产业工人和士兵尽管是国家人口中的少数，但国家完全由他们统治。布尔什维克这样嫌弃民主是有其先例的。例如在法国革命中，当还占人口少数的

无产阶级试图夺取政权的时候，它曾经不得不再（1848年、1871年）起来反对民主的议会，因为其中占多数的是受农民支持的资产阶级。在集中了比较大量的产业工人的个别公社，工人能够夺得政权；而在全国他们却败于取得多数票的农民。因此法国工人提出“公社联盟”的国家理想来反对中央集权的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理想。这种国家理想现在又以“苏维埃的苏维埃”这种国家形式出现了。在无产阶级还是人口中少数的国家，这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必然的国家理想。

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在无产阶级执政时，它必须努力使工业生产受自己的领导。但是革命摧毁了旧的官僚统治机构，却没有建立起新的民主的管理组织。因此，布尔什维克未能使工业受一个民主团体的机构的监督；他们把每个工业企业置于在该企业从事劳动的工人的监督之下，即铁路由铁路员工监督，纺织厂由纺织工人监督等。但是这一来他们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组织原则——社会主义要求每个工业部门服从整个社会的领导——并接近工团主义的社会理想。法国工人是这个民族中的少数，他们由于法国人口增长缓慢而不能指望很快成为多数，他们的理想不是使工业归民主共和国领导——这个国家将意味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多数对产业工人的统治——而是使每一个工业部门归这些工业部门的工会领导。今天俄国工人正在力图实现法国工团主义的这种理想。这种由布尔什维克发号施令的“工厂中的工人监督”是工业的组织原则，在那些不能指望一个民主团体并通过这个团体去掌管工业的地方，工人不得不把这种原则定为目标。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优越是由于这一事实：德国无产阶级是多数，是德国民族的一个迅速增长的多数，因此它可以指望在民主的基础上获得国家政权并通过民主国家掌管工业。在无产阶级只是民族的一个少数并且尽管如此却能够暂时夺取国家政权的的地方，如1848年和1871年在法国，今天在俄国，社会主义是另外一种样子；在这些地方，社会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公社或者苏维埃），反对民主

制,维护工团主义的“工厂中的工人监督”,反对工业受民主团体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是使社会主义适应一个资本主义还年轻,还不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是民族的少数的国家,是使社会主义适应俄国落后的经济状况。

三月、五月和十月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权意识,它掌握了武装并且看到军队站在它那一边,于是它进行了打碎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这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进行这一巨大尝试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尝试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它也是必定要失败的。卡尔·马克思曾经向我们说明1848年和1871年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必然要失败:“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本国的疆界内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sup>①</sup>。俄国无产阶级也被革命不知不觉地给予它的这种“实际的力量”所迷惑而“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但是就是这种超越也将在下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386页。——编者注

列事实面前遭到失败：在一个资本主义工业还是“局部性事实”的国家里，铲除资本主义统治不能成为全国性革命的内容。

\*                     \*                     \*

孟什维克胜过其对手的地方在于他们洞察到：社会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是可能的，而俄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但是由于确信俄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他们要求无产阶级不经战斗而放弃政权，让位给资产阶级。由于他们总是害怕无产阶级的任何一种过分大胆的行动可能招致反革命，他们就放弃制定一种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有成效的、勇敢的无产阶级的策略。这一来他们自己就把无产阶级推开，把它赶入布尔什维克的怀抱。

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他们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忠实地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情绪、意志和理想。但是既然他们全力献身于无产阶级，他们也就同无产阶级抱有共同的幻想。这样，他们就把无产阶级引向了只能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的试验。

在俄国也有既不受左的也不受右的幻想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这就是在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谢姆柯夫斯基领导下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聚集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新生活报》周围的国际主义者（阿维洛夫、巴扎罗夫等）；目前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同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中的少数人。我们把这些称为“国际主义者”。

国际主义者从五月以来就反对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联合，反对他们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反对他们支持克伦斯基的战争政策，反对他们向资产阶级政党让步。当联合政府难以维持下去的时候，他们提出由民主党派即社会主义革命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阵线来接受政府，选举立宪会议，然后由那个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俄国人民自己投给的多数票的政党担任国家领导。但是他们今天像过去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那样，坚决地同布尔什维克的专政进行斗争。他们反对

“赤卫队”的恐怖,反对解散立宪会议,反对那种认为通过每天的新命令——这些命令没有任何行政机构来加以实行——就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命令主义”。国际主义者曾经同孟什维克进行过斗争,是因为孟什维克把自己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他们今天反对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抱有同样的幻想,并且助长这些幻想。他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可推诿的反右和反左的任务,即他们不像孟什维克那样把自己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而是在无产阶级内部捍卫马克思主义;但又并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醉心于无产阶级一时的幻想,而是在对发展和斗争的条件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幻想提出他们深思熟虑的见解。

在急风暴雨的时期,常常是左的和右的极端取得胜利,中派总是暂时处于无权状态。但是只有追求功利的人才把这看作是中派即“泥潭派”犯错误的证明。伦纳同志在《斗争》<sup>①</sup>杂志一月号中说我曾经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观点解释俄国十月的事件,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错误地”作了解释。今天,我“恐怕自己又成了布尔什维克”<sup>②</sup>。伦纳误解了。我今天仍旧像在十月时一样确信:俄国和世界的历史终将承认在俄国由国际主义者所代表的中派的反右和反左的斗争、反对孟什维克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是正确的。

\*                     \*                     \*

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一个胜利。布尔什维克今天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发言人。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同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我们理应给予他们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就像他们理应给予全世界正在战斗的无产阶级同情和帮助一样。恰巧在现在,即在德国帝国主义代表资产阶级制度对布尔什维克进行征讨的时候,对布尔什维克进行如不久前德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奥托·布劳恩对他们所进行的那

---

<sup>①</sup> 《斗争》杂志(《Der Kampf》)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907—1938年在维也纳出版。——编者注

<sup>②</sup> 伦纳《策略争论》,《斗争》杂志第11卷(1918年),第30页。

种恶毒的攻击<sup>①</sup>，是对由于国际无产阶级国际团结而产生的义务的粗暴践踏。资产阶级用他们的报纸的诽谤、用他们的士兵的刺刀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斗争，我们必须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去反对资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国际共同性、由于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我们现在是，将来也是同布尔什维克连在一起的。

但是，自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也必然抱有同布尔什维克一样的幻想，必然赞同他们所有的方法，必然接受他们所有的定理。

伦纳同志写道：“如果我在俄国，我现在恐怕会同布尔什维克一道走”<sup>②</sup>。对既了解伦纳又了解布尔什维克的人来说，这一自白听起来也许有些滑稽，而且伦纳本人今天恐怕未必会再重复它。但这里面却包含了一个小小的真理。

战争初期德国无产阶级感到，德国的失败将使德国的国民经济遭到破坏，从而给德国工人阶级也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他们陷入了爱国主义情绪。谢德曼的政策就由此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使伦纳能够理解和说明德国无产阶级中这种情绪的形成；但是伦纳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也必须维护从这种情绪产生的政策。这一来，他就站到了谢德曼的一边。

在革命的进程中，俄国的政权落入无产阶级手中。因此俄国无产阶级感到受到了鼓励，要“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于是，形成了产生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那种情绪。并且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使我们能够懂得这种情绪的形成，因此伦纳同志认为，如果我们生活在俄国，我们就必须维护同这种情绪相适应的政策。这样，如果伦纳在俄国或许会站在列宁一边。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根据每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条件，去说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任何眼前的精神状态。伦纳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任务仅仅在于表达他本国

---

① 奥托·布劳恩《布尔什维克和我们》1918年2月15日柏林前进出版社德文版。

② 伦纳《策略争论》，《斗争》杂志第11卷，第29页。

无产阶级当前的情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必须伴同他所在国家的无产阶级一起犯错误,必须同他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抱有同样的幻想,这仅仅是因为对一切错误和一切幻想都可以根据无产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去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有另外的任务。它要反对单个国家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普遍利益;反对工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捍卫其未来的发展。所以在战争开始时我也不会和谢德曼一道走。马克思主义应当反对一瞬间的幻想而维护建立在历史经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之上的理论。因此我今天就是在俄国也不会和布尔什维克一道走。

当马克思主义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它必然对右的错误和左的幻想作斗争。马克思自己曾经既同右的英国工联派、法国蒲鲁东派、德国的拉萨尔派,又同左的俄国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进行过斗争。同样,今天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一方面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另一方面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履行着他们的繁重的义务。同样,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中派”在考茨基和哈阿兹的领导下,进行着既反对右的谢德曼之流,又反对左的拉狄克之流的斗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称为“左派”——同样也要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基本原则,他们既反对我们右边的机会主义,即把我们的任务看作使无产阶级一般地适应资本主义的国家、并且特殊地适应奥地利的多民族国家的那种机会主义,也反对比“左派”还要左的“左倾激进主义”,这种“左倾激进主义”的基本错误在于这样的幻想:无产阶级为了彻底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只需要愿望,而无须顾及斗争和胜利的客观条件。

以亨利希·维贝为笔名发表。《斗争》杂志第11卷(1918年)第3期第137—150页。选自《鲍威尔言论》第55—68页

# 到社会主义之路\*

(1919年)

## 一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推翻了皇室、消除了贵族院、粉碎了存在于各邦和各行政区的特权选举制度。一切政治特权都被铲除了。全国公民,不分阶级、出身、性别,现在都是享有同等权利的公民。

但是,政治革命只是革命事业的一半。它消除了政治上的压迫,可是并没有终止经济的剥削。资本家和工人——他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他们享有同等政治权利,但是资本家仍然是资本家,工人仍然是工人;这一些人仍然是工厂或矿场的主人,那一些人仍然像教堂老鼠似的赤贫而无保障。

政治革命没有消除经济剥削,毋宁说倒使经济剥削更加露骨了。我们推翻了皇帝的无上权威,难道是为了继续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无上权威吗?我们粉碎了将军们、官僚、封建主的统治,难道是为了继续充当银行经理、卡特尔巨头、交易所投机家的奴仆吗?工人群众提出了这

---

\* 这本小册子共分十节,本来是陆续发表在维也纳的《工人报》上的一组论文,后来汇辑成单行本出版。——编者注



样的问题。一半的革命事业唤醒了完成整个革命的意愿。政治的革命唤醒了走向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意愿。民主主义的胜利揭开了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序幕。

民主主义在中欧的胜利是战争的结果，是中欧同盟国战败的后果。战争粉碎了作为两个军国主义专制政权权力工具的军队，剥夺了专制国家的强制工具，因而导致民主主义的胜利。但是这次的战争也招致了巨大的经济变化；这种变化使社会主义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性。

在四年半之久的期间中，各族人民都没有建造住屋，而只挖掘了战壕；没有制造机器，而只生产了炮弹和开花弹；没有从事耕种，而只操纵了大炮。我们的耕地缺乏肥料，我们的机器已经耗损，我们的铁路因失修而损坏，我们的衣着和日用布制品已变成褴褛破布——社会的所有财富遭到了毁灭。各族人民经过战争都变贫困了，不可言状地贫困了。

各族人民都成了贫困的人民，可是中欧各族人民贫困的情况比所有其他各族人民尤为严重。因为我们是战败者。我们必须向战胜者赔偿他们的战争损失，缴纳贡款。尽管我们贫穷到这种地步，我们还必须在贫困的处境中向他们——战胜者支付巨额税款！

我们要工作。但是我们为什么而工作呢？首先，我们要清除荒芜了的田地上的野草，要制造新的机器以代替耗损了的机器，要修复已遭破坏的铁路。然后，我们必须为生产商品而工作，我们就用这种商品向战胜者缴纳贡款。我们在这样情况下，还能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来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衣服、日用布制品和住宅等等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吗？

我们变得贫穷了，不可言状地贫穷了。在这样贫困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作这种奢举，即用我们劳动所得向那些脑满肠肥的教长们、不可一世的伯爵们、骄奢淫佚的发战争财的富豪们、闲散懒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缴纳贡款吗？变得如此贫困的人民还能忍受这样不平等地来分割他们寥寥无几的劳动所得吗？

我们贫困得已经担当不起资本家和地主来分割我们的劳动所得

了。通过战争赔款的形式向外国资本家纳贡,已经够糟糕的了。我们不能另外又负担向国内资本家进贡的义务。在我们经济困难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出路,没有别的,只有:社会主义!战争既然把民主主义导向胜利,它也会迫使我们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新秩序呢?我们如何才能使那些今天还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工厂和矿场、森林和耕地以及广大的土地和资本成为人民公有的财产呢?

政治革命可能是一日之间可以完成的事业。以共和国来代替专制政权,以权利平等来代替寡头特权——这一向都是在一个伟大的时刻突然地一举成功的。有些人认为社会的变革也能像政治革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完成。有那么一天,工人就会一下子占有了所有的工厂、矿场、企业、银行和农庄,并且把资本家和他们的经理们轰走了事;这样的话,那么早晨还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晚上就成了劳动人民的财产了。事情真的能够这样发展吗?社会革命真的能够这样迅速和简单地实现吗?

和我们的幸福密切关联的有两件事情:第一,整个国家究竟生产多少财富;第二,财富是如何分配给社会各阶级的人民的。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改变财富分配的形式。今天,一个继承“父亲大人”财产的懒惰资本家从整个财富中得到的分配量要比一个勤劳干练的工人所得到的多得多。这种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允许存在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能按照平均主义方法来分配财富。对于勤劳的人要比懒惰的人给予较好的报酬;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勤劳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那些改进工作方法的发明家以及那些为国民经济指出新途径的人,比对那些不费思索而只完成日常工作的人所给予的待遇当然要较为优越;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努力改进工作方法了。只有对社会的真正贡献才能享受多分社会劳动果实的权利,而不是由那些世袭地产和毫无顾忌地攫取得来的资本享受这种权利。所以说,社会主义要首先改变整个财富的分配制度。但是在改变分配制度

的同时,必须不减缩财富生产才能有益于劳动人民群众。因为,假使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所生产的财富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的财富的一半,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生活决不会好转,也许甚至比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更坏得多,这就是说,如果可分配的财富减少了,即使是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职责是:必须在不使财富生产受到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

我们变得赤贫了。由于我们整个生产机器的耗损,由于缺乏原料,由于缺乏营养所造成的体力衰弱,我们所生产的财富比战前缩减了许多。但是,生产减少,当然消费也随之减少。也就是说,社会的劳动果实越少,社会所拥有的财富量越少,那么即使采用最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分配到每个人手上的财富也越少,每个人能够消费和享受的财富也越少。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任何行动不得导致生产机器的更加破坏,原料来源的更加困难,财富生产的更加减缩,以及我们的劳动总产量的更加减少。我们的贫困迫使我们进行较为合理的财富分配,但是贫困也迫使我们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贯彻这种变革。

如果我们现在想象一下,突然一天,工人们用暴力占有了所有企业,他们直截了当地轰走资本家、资本家的经理和管理人员,并且他们自己掌管了企业的领导权,那这种变革当然只能在流血的内战中才可能实现;但是,内战会不可避免地破坏大量的生产资料、机器、铁路材料等等;不言而喻,我们如此破烂不堪的生产机器又要遭到严重的破坏。资本主义的外国将拒绝对我们提供我们所迫切需要的原料和我们用以购买原料的信用贷款,美国和协约国将保持对我国的封锁;我们的企业将由于缺乏原料而继续停闭。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领导企业的必要知识的大多数经理、工程师、化学家、农庄管理员、技术员、企业职员以及各种商业部门的职员将拒绝和我们合作;难道工人自己就能找到原料的来源,就能组织现代化大企业的复杂工作吗?在大企业工作的工人所担当的只不过是工作的某一部分,所以他们所能理解的,也只是

工作的某一部分罢了。至于工人本身,他们受到内战惨痛打击的影响,既没有搞工作的安定心情,也没有搞工作的意向;工作的效率势必大大下降。所有这些现象的结果,不外就是所生产的财富比现在还要少得多。不错,财富的分配比从前合理了,即使如此,每个工人的所得并不能增多,或者甚至比现在所能得到的还会更加减少,其原因就在于生产的财富减少了,所以财富的分配量也就必然随之减少。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来改善处境的人民,面对这种事实会感到很大的失望,这种失望可能会驱使他们投向资本主义反革命的怀抱。

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开辟别的途径。我们必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有目的地、稳步地、逐渐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任何一种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都必须经过再三思考;这种措施不只是一要照顾到财富的合理分配,也要照顾到财富生产的改进;除非能同时建立起社会主义的财富生产的组织结构,不然不得破坏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组织结构。并且社会主义的这类组织结构,其完善程度至少也要不亚于资本主义同样的组织结构。政治革命是暴力所能完成的事业;社会革命只能通过建设和组织工作才能完成。政治革命是几小时中所能完成的工作,社会革命却是勇敢地、深思熟虑地进行多年工作的成果。这种见解是和昨天或前天的肤浅的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的妄想决不相干的。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认为,根本不需要暴力革命,社会即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是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而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从前是、今天仍然是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的。如果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无产阶级所负的使命就是一个全新的任务,完成这个新任务就不是革命的手段所能胜任的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政治革命永远只能是“为未来社会基本要素扫清道路”。在这种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正是这样一种任务,它不能通过巷战的方式,也不能通过内战的方式,而只能通过创造性的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来完成。

## 二 大工业企业的公有化

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必须从重工业着手：煤矿、金属矿和钢铁工业必须首先成为公有化企业。这些都是最容易社会主义化的工业部门；因为这些部门的生产早已集中在不多几家大企业，所以容易集中领导。同时，这些也是最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化的工业部门，因为，谁拥有煤和铁，谁就能统治整个工业。

我们用剥夺的方式来开展社会主义化：国家用法律宣布重工业企业的所有权为无效。但对原业主必须补偿损失；因为，如果所有其他资本家仍然保持他们所有权，而独独剥夺了煤矿或炼铁厂股东的所有权，是不公平的。但是，国家补偿重工业原业主的款项要由所有资本家和地主来共同负担。为了这一目的，国家向所有资本家和地主征收累进财产税，利用这种税收来补偿重工业企业股票持有人由于企业被剥夺而受到的损失。对企业被剥夺的股票持有人来说，这种办法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因为他们的企业是通过十足清偿的办法出手的，至于他们在财富方面所损失的部分则与所有其他资本家因交财产税所损失的部分完全相同。劳动人民于是毫无损失地获得了重工业的所有权，因为支付补偿款项的并不是劳动人民，而是资本家。

那么什么人应该管理公有化企业呢？政府吗？绝对不是的！如果政府管理了所有的企业，它的权力势必超过人民的权力和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力；政府权力这样的增长，对民主制度可能是一种危险。另外，政府也不会管好公有化企业；最坏的企业管理者莫过于国家本身了。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要求企业国有化，而只要求企业公有化。但是，既然政府不适于作这项工作，那么究竟应该由什么人来领导公有化企业呢？

今天的大工业企业是由股东选出的管理委员会掌管的，将来每一个公有化工业部门也都要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领导，但是这个管理委

员会就不再是通过资本家的选举产生出来的了,而是由这样一些社会阶层的代表选举出来,这些社会阶层的物质需要将来要由这个社会主义化工业部门来满足。那么什么人最关心这个社会主义化的工业部门的管理呢?第一是那些在社会主义化工业部门工作的工人、职员和公务人员;第二是消费该工业部门产品的消费者;第三就是代表全民的国家当局。因此,每一个公有化工业部门的管理委员会大致都将按照以下情况组成: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是由该企业工作人员的工会组织和职员组织共同推举的。第二个三分之一是消费者的代表。例如煤炭企业管理委员会的消费者代表,其中一部分代表是代表消费合作社的,作为消费煤炭的一般住户的代表,其中另一部分代表是代表消费工业用煤的企业组织的代表。管理委员会成员的第三个三分之一是国家的代表。一部分国家代表是由财政部长指定的,作为国家财富的代表者,另一部分是由国民会议选出的,作为一般国民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工人和职员的代表为一方,消费者代表为另一方,他们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因为,那一方希望有较高的工资,这一方希望有较低廉的煤价。国家的代表者作为居间人,在双方之间发挥仲裁作用。

通过上述方式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承担这个工业部门的最高领导职责:领导人的任用、售价的规定、与职工会订立集体合同、盈余的分配以及重要投资的决定等等。另外,也有必要制定特殊规定,以预防管理委员会由于徇私或政治动机在任用领导人时发生偏差。并且必须选用最能干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化学家。为此,可以作出以下最现实的安排:高等科技院校的教员组织和所有工业方面的技术领导人应共同组成审议会;该会在委任每一公有化工业企业技术领导人之前应预先提出建议;有关的工业企业的管理委员会然后从所推荐人选中选择任用。正像现在教育部根据教授委员会的建议聘请教授一样,管理委员会也要根据由全国科技领导人组成的审议会的建议来聘任公有化工业企业的经理。将来也同现在一样,技术方面的和业务方面的职员,在通过如上方式任用的经理的监督之下,进行企业的管理工作;在管理机构中,无

论如何也要避免发生官僚主义。

至于工人委员会在各个企业中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来参加管理工作,容待后文讨论。

公有化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要改善在公有化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和职员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把一向只流入资本家私囊的企业收入提供全民应用。因此,必须谈一谈如何分配公有化企业部门盈余的问题。每年必须把盈余一部分用于该企业部门生产机器的充实和改善方面,这是理所当然的。盈余的其余部分,应分配给国家和在该企业服务的职工这两方面。所有在公有化企业工作的人员都有分享一部分盈余的权利,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劳动强度。

通过这种方式来贯彻重工业公有化的措施将有益于全民。它为国家增加了收益,但没有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对在重工业服务的职工,既保证他们有权参加企业管理,又保证他们有分享企业盈余的权利;并赋予煤铁消费者能够影响煤铁生产的权利。这一切都不是阻碍工业技术前进,而是提高劳动强度的手段,因而生产费用也将降低。

但是这样的公有化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企业部门。对某些工业部门,我们将用别种方式来处理:国家剥夺某些工业企业的私有权之后,再把它们出租给消费合作社的大型收购公司或农业合作社的联合组织。譬如,国家可以把制皂和制蜡厂出租给消费合作社,把化肥厂出租给农业合作社。在合同上不只注明承租的消费合作社应当将固定的租费上缴国库,也注明对服务于出租企业的职工既要保证他们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也要保证他们有分享盈余的利益。

另外还有一些工业企业宜于通过专区和市政府来实行公有化。国家赋予专区和市政府代表——当然,这是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一种权力,他们可以把那些专为地方的需要进行生产的工业企业划归地方公有。例如电车、轻便铁路、运输车辆等工业企业,发电厂、面粉厂、牛奶场、酿酒厂、砖瓦厂以及其他类似的企业等。对这些企业的原业主实行补偿损失的办法当然又不同于通过国家实行公有化的办法了。因

为,地方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如果地方政府仿照通过国家实行公有化的补偿办法行事,那么属于地方所有的资金势必外流。因此,国家指令这类原业主必须接受作为补偿损失的业主证书,用以证明业主有从公有化企业的收益中支取定息的权利。专区和市政府有权决定偿付这种债务的年限,在二十年内或三十年内付清。这种限期届满之后,划归地方政府公有的企业就不再对私人资本承担任何付给定息的义务了。

上述办法的公有化方式,可应用于许多工业企业部门。但是也还有许多工业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根本还不成熟。我们对这类企业暂时还不能实施社会主义化,必须先进行组织工作,以便为将来实行公有化作好准备。

个别商业部门也可用类似对待各种工业企业的办法实行公有化。譬如,等世界市场恢复正常情况之后,国家也可以对经营咖啡、可可、茶、棉花等商业企业实行公有化措施。经管国内煤炭工业的管理委员会也可以接受国家的委托,管理进口煤炭的业务。国家也可以赋予地方政府权力,把大百货公司划归地方公有和接收某些资本主义商业企业,例如,畜类贸易行就应该强制接收。

### 三 工业企业的组织工作

只有那些生产集中于几个由股份公司掌握的企业的大工业,立即实行公有化的条件已经成熟。大多数的工业部门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如果某项工业还分散在许多中小型企业中,这就不可能对它实行公有化措施,也就是说,这种工业还不能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在一个企业中,只要它的技术和业务不是由经理或管理人员而是由业主本身来领导的,那么就不能让业主脱离企业,否则会由于没有内行的领导者而不利于生产。因此,我们不能立即对大多数的工业部门实行公有化,而是首先要对它们进行组织,以便为未来的公有化工作作好有目的的准备。



企业主自己早就看到对工业进行组织的必要性。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联合起来成立卡特尔。卡特尔消除了企业主之间的竞争，因此节省了大宗不必要的竞争费用(如广告费、行商费等)。他们把售货交易集中在卡特尔的办公室，买卖商人也成了卡特尔办公室的代理商，因此，商业资本的实力和利润受到了显著的限制。最后，他们规定了生产的范围，并且划分了各企业的生产任务。通过上述办法可以使生产适应动荡不定的市场需要，因而可以避免经济危机，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起缓和经济危机的作用。虽然，卡特尔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较多好处，但是对社会来说，却是很大的损失，因为，卡特尔惊人地加强了工业资本势力，既加强了反对消费者的势力，也加强了反对工业工人的势力。组织起来的资本势力强使消费者承受高昂的价格和非常巨大的剥削，成了与工业工人相对立的占优势地位的敌人。

在战争时期也产生了新的工业组织机构：如德国的战时公司，奥地利的中心站和战时联合组织等。这些设施也曾起了有利的作用。由于实行对消费的强迫限制以及由于有计划的物资分配，保持了较低的物价，如果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上述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即使如此，这也是社会的莫大损失：某些中心站不外就是由国家组织的强迫性的卡特尔，譬如煤油中心站就是这样的一种。其他中心站不外都是一些军事管理机构的征用工具，譬如棉花中心站。

我们今天所负的任务并不是要整个地破坏工业组织而转向毫无约束的自由竞争，现在已经没有回转到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自由竞争主义——的余地了，尽管像基督教社会党这一类党派，它们早年虽然曾向曼彻斯特自由主义作过斗争，并且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现在自己却成了“自由贸易”主义的崇拜者。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消除工业组织，而只在于如何建立为全民需要服务的工业组织去代替资本主义的工业组织。只要卡特尔和中心站有利于国民经济，未来的工业组织也有必要起这种的作用；但是，它们所起的不再是如卡特尔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作用，也不是如中心站为军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作用，而是起

为全民利益服务的作用。

为了这一目的,应责成所有工业部门的企业隶属于各该部门的联合组织;由各工业联合组织代替各卡特尔和中心站执行权力。但是,工业联合组织不能同卡特尔一样受企业主的控制,也不能同中心站一样听从没有管理经济事务能力的官僚主义者的领导。工业联合会须由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来领导,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的管理机构应该为这些社会阶层的利益服务。这就是说,每一个工业部门的联合组织都要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领导,它大致可通过以下的办法组成: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四分之一是国家的代表,代表中的一员将由工商部委任,其他代表是由国民会议推选的,被推选者不一定是国民会议成员。他们的任务是在管理委员会中维护国家和国民经济的利益。管理委员会成员的第二个四分之一是由消费者的代表组成的。如果该工业部门的产品是日常消费品,则由消费合作社委任代表;如果该工业部门的产品是原料或生产资料,那么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则由消费该类产品的工业组织委任。管理委员会成员的第三个四分之一由在该工业部门工作的工人、职员和公务人员的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来自职工会。下余的第四个四分之一才由组织起来的工业部门的企业主代表组成。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管理委员会的活动不只为企业主的利益服务,而是为全民的利益服务的。这样,未来的工业联合组织才显然不同于已往的卡特尔以及现在的中心站。

工业联合组织所负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它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工业方面的技术发展和降低生产费用。它们应该拥有或建立设计处、试验室以及原料检查所,并公布有关规格及产品类型的规章。无数五花八门的商品式样的争奇立异,乃是自由竞争的恶果,针对这种现象,工业联合组织应颁布生产规章,限制产品的式样或类型。通过这种措施,不只是每种标准类型的商品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也可以降低生产费用。另外,工业联合组织也将促进各工业部门的专业化:工业联合组织将限定工厂只生产指定的商品。这种办法是过渡到大量生产的、节省

劳动力的自动化生产方式的桥梁。通过上述措施,工业联合组织不只是起了显著降低成本的作用,也起了能使产品价廉物美的作用。

在某些地区,如果有需要的话,可通过工业联合组织集中购买原料,然后再把原料分配给各工业单位,各工业单位的制成品也可以由联合组织集中对外批发。这样,它就为社会节省了各企业主之间商业竞争所消耗的费用。联合组织调整生产量的大小,因而可以避免经济危机。商品的价格也要由联合组织来确定。管理委员们确定物价时应共同保证,使企业主所得利润大约只能相当于他们劳动应得的工资。工业联合组织也同职工会订立集体合同,所有该工业部门的企业单位都须受由工业联合组织订立的集体合同的约束。这样,当订立集体合同时,与职工们打交道的就不单单是企业主了,而是其成员中除企业主之外还包括议会、消费者、工人和职员代表的工业联合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委员。

如果立法机构认为有必要的话,也可以作出规定,将组织起来的企业的盈余的一定部分划拨给国家。工业联合组织在大大降低生产费用方面如能获得成果,这就增加了企业主的利润,利润的增加部分将通过工业联合组织上缴国家,国家也就是工业联合组织的缔造者。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在无须加重消费者负担的情况下,从工业利润方面获得了收益。

只能在工业联合组织颁布的规章所允许的范围内,准许个别企业主保持企业领导权。对这种类型的企业主来说,暂时还不完全取消他们的职责,但是,公司要有效地监视他们,使他们由企业主变为公司的委托人。

但是,工业联合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却是使生产集中于技术最完善的企业单位。每一个工业联合组织都有权勒令某些技术不完善的企业停工,并将其生产任务移转给技术完善的企业。当然,接受这种生产任务的企业主也要对停工企业的业主承担补偿损失的义务。通过这种方式,生产任务将逐渐集中在不多几家技术完善的企业单位,到了这

时候,才能对整个工业实行公有化。这时才有可能剥夺企业主的企业所有权,并把企业部门的领导权直接委托给工业联合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同时也要撤销企业主代表在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所以对工业企业进行组织工作并创立工业联合组织,都是走向工业完全公有化的过渡阶段。

#### 四 工人委员会

当通过平等的普选产生出来的议会已经接收了最高立法权时,我们还不能说在整个国家范畴之内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所要求的远不止此,它要求州、专区、市的地方行政权也要掌握在有代表性的民主团体的手里。与此完全相同的是,当每一个工业部门都由一个由人民的、消费者的、工人的全权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来管理的时候,也不能说民主的经济法制已然实现了。经济民主还有进一步的要求,它要求各个工业企业本身的管理权也必须民主化。就像自由的国家以自由市为它的基础一样,民主的企业法规就是整个工业民主组织的基础。

凡是工会势力所达到的地方,那儿就早已奠定了民主企业法规的基础。企业主的独断独行通过工会的势力而被粉碎了。企业主于是不得不同那些通过工会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的代表来共同执行企业管理权,这也和一个国家的专制君主必须同议会共同行使行政权的情形相似。

但是,工人群众的代表参加工厂的管理只是现实的状态,并不是法律规定的状态。事情就在于,要使现实状态成为合法状态,通过法律把这种状态固定下来,以便制止企业主的专横,消除资方与劳方之间权力比重摇摆不定的现象。为了这一目的,所有各工业企业、农庄、商业企业和交通企业,其雇用工人多于二十人者,都必须选出工人委员会。选举方式以及工人委员会的权力都应当用法律规定下来。所有在企业中

工作的人员,无论是技术工或非技术工,无论是工人、职员或公务人员,都享有参加选举的权利。一些特殊的工作部门,可以依据特种法规进行选举。这样选出的工人委员会,法律必须承认它对工厂管理方面一切有关职工福利事务有干预的权利。

工人委员会首先必须在招收和解雇工人方面起干预作用。工人委员会应该留意到,当招收工人时,要履行集体合同的规定,并应保护工人,防止任意解雇。如果工作时间和工资还没有经集体合同确定下来,那么企业主与工人委员会对此要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工人委员会尤其应该在制定计件工资和包活工资时起干预作用。在当前时期,如果轻率地取消为许多工人所欢迎的包活工资制度,未必到处行得通,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全民已贫困到极点,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提高劳动积极性,并使用一切必需手段来保证工作时间得到十足利用;我们把工作时间规定得愈短,这种办法也就愈加不可缺少。凡是由于上述原因不能取消包活工资制度的地方,我们必须设法减低包活工资制度的弊病。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在工人委员会的监督下制定包活工资的标准。但是,如果工人委员会无权审查工资账、核算单和收支表等,就难以完成它的职责。假使包活工资的标准要通过工人委员会认可后才能生效,那么当工人委员会通过这种工资标准之前,必须先对企业主的核算进行审查,以证实所拟订的工资标准是否正确,这样,包活工资制度本来所具有的弊病将失去其危害性。工人委员会对发付工资也应进行监督,并审核工资是否计算得正确。

工人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也包括以下各方面:调解在企业中发生的各种纠纷,无论是企业主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纠纷、技师与工人之间的纠纷或工人自己之间的纠纷;惩罚违反经工人委员会协同制定的纪律规章的人。

另外,工人委员会有权监督为避免工伤或预防职业病所公布的各种规定的切实执行。工人委员会在完成该项任务时,将与工商业检查官合作:应向工商业检查官提出建议和检举,按时向工商业检查官作出

有关卫生状况的报告,并监督贯彻由工商业检查官所交给的任务。

直接或完全为工人福利服务的某些设备,其管理权必须移交给工人委员会执掌,如工厂宿舍、工厂消费合作社、伙房和其他各种福利设备。这些设备应该完全脱离企业主及其所控制的机构的影响。

如果工人委员会能够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对于委员会的成员必定要有一定的保障,因为它们的工作会为它们导致一定的危险。这就像议会的议员没有足以制止官僚主义的专横和报复的不可侵犯特权,就不能发挥他们的议会活动的作用一样,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如果不能摆脱企业主的专横行为或不能保持他们的职位,工人委员会也是不能发挥它的作用的。因此,法律必须作出规定,对工人委员会成员不得无故解雇,除非专业性法庭证明该成员没有用真正工人的那种诚挚勤劳的态度进行工作,或犯有某种错误,以致企业主有权依据工商业规定不预先通知而解雇工人。

无论工人委员会的任务范围是多么广大和重要,我们对它仍然要用法律加以限制。我们不能把企业的技术的和经济的领导权委托给工人委员会。不把技术领导权交给工人委员会的原因在于,技术领导权掌握在有经验的、在理论和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定修养的技术员、工程师和化学家等人的手上,才能免除生产上的损失。但是,为什么经济领导权也不交给工人委员会呢?其原因就在于,对每个企业进行管理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在该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正如铁路不是为铁路工作人员修建的,而是为全民修建的;对象具工业企业实行管理,也不是专为木匠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上述原因,我们不想把工业的技术和经济领导权委托给各个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而是要把技术和经济领导权委托给其成员中不只是有各该企业的工人代表,并且也有国家的和消费者的代表进行协商的管理委员会。我们不想让企业工团主义化,而是要让企业社会主义化,这就是说,不能让一个企业部门归该企业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所有,而是要让所有企业部门都归社会所有,也就是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因此,技

术和经济领导权必须交给全民性机构掌握,而工人委员会只能是从属于全民性机构的有局限性的机构,它在各个企业管理委员会的事务中起协助的作用,正像市行政机构在国家范围的个别方面对全国行政所起的协助作用一样。

企业法规的发展情况同国家宪法的发展情况很相像。国家宪法的发展过程是:从专横独断的君主政体,经过君权民权并立的君主立宪制而达到权力属于议会的共和政体。企业法规也必须经过类似的途程。我们先经过了企业主独揽工厂大权的专制阶段。通过工人委员会的设立,我们就进入了工厂的君主立宪阶段:法律许可的工厂统治权是由有继承权的工厂君主——企业主和企业的工人议会——工人委员会共同享有的。此后就该走上企业的共和宪法的道路了。企业主消逝了,各个工业部门的技术的和经济的领导权交给了由国家代表、消费者代表和工人代表共同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并且每个企业管理权则由专业人员和工人委员会共同掌握,前者是由管理委员会任用的,后者是由该单位的工人选出的。

## 五 大地产的公有化

土地在古代是人民的产业。随着君主权力的增长,土地的支配权也落入君主的掌握。君主使无土地者成为君主的部属、主教、教长等的采邑的附属品,并且还承担为宫廷效劳以及服兵役的义务。几世纪以来,采邑制就是国家的基础。但是,自从中古时代末期起,采邑制就开始瓦解。地主们以采邑形式获得的土地,到后来都成了他们的私产,并且摆脱了采邑原有的义务。地主还通过侵占村社的共有财产扩充了他们的私产,因而也出现了个体农民。大地主的庄园就是这样产生的。古代人民的土地共有权于是落到贵族和教会的手中。把人民的土地共有权归还给人民,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最大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了。

这种变革是不能一下子完成的。首先必须把森林所有权从私人所有转变为社会所有。我们的森林是德意志奥地利最大的财富；占有了森林资源，我们的民族才能掌握国民经济的最重要基础。其次就是对世袭采邑、永久管业的地产和其他大地产实行公有化。等到经营这些大地产有了经验之后，再开始对一百公顷以下地产实行公有化。至于剥夺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当然是不可能的。不只是就社会观点来说，剥夺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不合理的，即使在技术上说也是行不通的。

大地产的公有化是以剥夺它的所有权开始的。它可以按照剥夺大企业所有权的办法实行：地主可以获得被剥夺部分的全部补偿，但是，补偿的金额由全体有产者通过征收累进税的办法共同负担。对被没收的土地须使用不同的经营方法。有些农业项目宜于利用对待大农业企业的方法来经营，譬如森林的经营。也有某些农业项目宜于使用小型农业企业的经营方法，譬如葡萄园的经营。通过剥夺，国家首先取得对这两种农业项目的支配权；国家不只是拥有原属于贵族的森林，也要拥有原属于教区、教堂和寺院的葡萄园。国家须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经营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农业。对那些宜于利用大农业企业经营方法进行经营的农业就使用公有化农业企业的经营方法，对那些宜于利用小农经济经营方法进行经营的农业就都纳入用小农经济经营方式经营的范畴。

那些利用大农业企业经营方式一定可以获得较好收成的土地，其经营管理机构的组织是与公有化的大工业企业的组织很相似的。我们首先把剥夺了所有权的农庄交给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是由以下成员组成的：农庄所在地的专区人民代表，由专区农业局聘请的、既有理论学识又有实际经验的农民，在该农庄工作的工人和职员的代表和专区消费合作社的代表。管理委员会将依据专区农业局的建议指派农庄管理员，与农业工人和林业工人签订集体合同并规定盈余的分配。盈余的一部分上缴给国家，作为国家投资基金；其余部分划分为两份，一



份交给专区政府，一份分配给在该农庄工作的职员和工人。管理各农庄的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由州垦殖委员会来监督领导，州垦殖委员会是按照管理委员会的方式组成的，它应向国家农业委员会负责，这是农业的最高领导。它是由国家的代表、农业大学的代表、农业工人和消费合作社的代表共同组成的。国家农业委员会有权支配国家投资基金，它将指定哪个农庄需要较大数额的投资，哪个农庄需要资金来改善机器设备。它将指定各种农作物所占耕地的比重，以便有不同需要的农林各业能够一致得到满足。

那些不宜于采用大农业企业经营方式而宜于采用小农经营方式的被剥夺所有权的农庄，可划分为许多小块耕地，授给小农或农业工人。这是什么性质的授给呢？那些移居到被剥夺所有权的土地上来的小农或农业工人，他们就变成这块被授给的土地的私有者了吗？要不是这块土地上的佃户吗？

如果农民把这块土地买下了，但他限于实力，买价的大部分仍须仰仗抵押借款的方式来付清，并且必须从土地的收益项下每年支付抵押借款的利息。等这个农民死后，他的儿子当中的一个接受了这一耕地的继承权，同时还要用一笔款项把其余“退出继承”的子女打发走。为了这项债务也要把土地抵押出去，并由土地所得来付利息。土地的收益愈多，这块土地的地价也愈高，地价愈高，购地欠付的价款和解决继承权问题的用款愈多，那么该农民每年所付抵押借款的利息也就愈多了。当农产品价格跌落的时候，土地的收益当然减少，农民的处境于是变得危险了，他无力交付抵押借款的利息，只好宣告破产，他的土地于是被拍卖了。因而我们看到，凡是小农成为他的土地的所有人的地方，国家就不能降低农产品的价格——主要的食用农产品的价格如果降低，就会给这一地区导致农村社会的危机。那些所谓付租地产也存在着同样的危险。农民的土地不是通过购买方式获得的，而是通过按年付租的办法租赁的。租金数额根据当时土地产量制定。但是，等到土地上的产量增加了或退减了，都表示着当初租金数额制定得不是偏低

就是偏高。

凡是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人，而是佃户的地区，自然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佃租不是固定的，它随着收成的增加而提高，随着收成的减少而削减。租佃关系似乎较为优越，因为它是随着农产品价格的高低为转移的，可以免于遭受国家降低食用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租佃关系虽有上述优点，但它也有其他缺点。因为，佃户对在合同满期之后是否仍然续约永远没有把握。所以一个佃户绝不会在基本建设方面投入较多资金，因为他不知道，他将来是否能够收到这种投资的果实。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才能获得一种法律形式，既能保障农民在土地上的权利，又能鼓舞农民对较大的基本建设投资感觉兴趣，同时，通过这种法律形式，使国家也有可能针对价格的高低灵活地提高或降低农民所应上缴的地租。为了完成这一工作，最好制定一种切合实际的有永佃权的土地租赁法。

把被剥夺所有权的土地租给农业工人和小农，应尽先选择因战争而残废的退伍军人为租户。租赁权是无限期的，并且是可以继承的。只有那些经专业法庭证实他们确系不好好经营农业的农民，才剥夺他们的租赁权。每十年由县农业局重新估计一次应缴租金的数额，数额的确定必须以承租者和同他共同劳动的家庭成员都能得到足够的劳动报酬为标准。租金的一部分划归专区政府，另一部分交给国家作为国家基本建设基金。掌管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基金的全国农业委员会将从基金中向租地农民提供改善设备和基建投资的费用。

通过上述方式来经营被剥夺所有权的大农庄一定是很适当的。到今天还归大地主享有的地租将上缴给专区政府，因而国家的地方管理机构的开支能以平衡。对农业工人来说，他们既能参加管理工作，又得到了享有大公有化农庄盈余分配的保障，同时，上万的小农和农业工人，在获得永佃权的担保下，也都可以定居到其他性质的被剥夺所有权的农庄了。对消费者来说，他们也有权直接参加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用被剥夺所有权农庄的盈余壮大起来的国家基建基金，将通过大规模

基建投资和改进投资等措施迅速提高我们土地的生产。

所有上述改革办法,当然都是针对那些现在仍属于贵族、教堂和资本家的土地而言的。至于有关个体农民的经济改革是要采取另外方式进行的。关于这方面,让我们在下一章叙述。

## 六 个体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化

有两种劳动资料的所有制:一种是劳动所得,一种是剥削所得。农民是自耕土地的所有者,这块土地上的收成是农民自己劳动的果实,这纯粹是劳动所得。大地主是广大土地的所有者,他自己并不耕种而是雇人耕种,从这些人的劳动果实中榨取利润;一个股票持有人,如果他是矿场股东之一,可是他连矿场一次都没有看见过,如果他是工业企业的股东之一,可是他们一天也没有在这家企业劳动过,他们的利润是从在该企业劳动的工人身上榨取来的,这都叫剥削所得。社会主义所要铲除的是剥削所得,不是劳动所得。贵族、教堂和资本家的土地应该实行公有化,农民的土地仍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虽然有理由保持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但是小农经济也要适应社会要求,服从有计划的社会措施,以有利于全民。这不只是关系到农民本身的利益,不只是通过农民的积极作用和有计划的社会领导而使农民有可能在农业上尽量利用现代科学成就来增加他们的劳动果实,来提高他们的适合人类尊严的生活,而且也关系到城市和工业区居民的利益,因为城市和工业区居民如果能够获得丰富的、价廉物美的生活必需品,首先就要从农村调运远比现在多得多的农产品。如果农业政策的任务首先在于维持农产品的高价来保障农民的利益,那么社会主义农业政策就首先力求教育农民,使他们有可能从土地上获得远多于前的收成。

为了这一目的,首先必须改变土地的法律关系。主要是为了促进耕地的集中经营和减轻耕地集中的困难。奥地利大部地区个体农民的

土地是极其分散的,每个农民都拥有好几块耕地,甚至拥有十几块之多。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个体农民应该用他们那些混杂交错的分散土地通过调整换取价值相等的整块土地。普鲁士的经验可以证明,通过土地交换的方式,不只是可以大大节省劳动力、显著减少生产费用,并且还能大大提高公顷产量。关于共有土地的使用权和管理权须有一定规定,同时要禁止共有土地的随便分割,对小农户和在农村租屋居住的工匠等人在共有土地上或在村公有土地上的使用权,须有一定保障。农民从前在封建地主的土地上所负林牧服役义务应该在剥夺大地主的所有权时重新调整。阿尔卑斯山保护法不得妨害畜牧制乳业对阿尔卑斯山的利用。打猎权应当归村集体专有,并且要通过严格的条例限制过分猎取。村集体对一切在它辖区以内出售的土地有优先购买权。

必须避免以土地作过多的抵押借款。现有的抵押借款也要逐渐改变它的性质,抵押债权人不得通知限制取消赎回权,使负债者能于一生中分期还清。火险、雹灾险和畜疫险等,对农民来说,必须是强迫性的保险措施,这样才能避免在万一发生不幸时,迫使农民加重他的土地抵押借款负担。还要用强迫性养老储蓄保险法来代替养老田。

当通过这些改革,合理地革新了个体农民的小农经济之后,国家还要设立一些专门机构,来负责领导农民合理化地改变他们经营农业的方法。每一专区都设立专区农业局,由具有理论知识和富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负责领导。农业局中驻有由专区农会选举的顾问。专区农业局主要通过有计划的宣传工作,通过设立和维持冬学、试验田和模范田来领导农民去改善他们经营农业的方法。在顾问的同意下,专区农业局也颁布强迫性措施,如:指定什么土地种植一定农作物,选种,化肥的使用,轮种,种畜的选择,厩栏的设立,饲料,牛奶的处理等等。同样在顾问的同意下,专区农业局也可以责成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和准备实行土地合并的方法。

这个新设机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要完全消除农产品的私人买卖和

投机行为。首先必须把社会上的粮食贩卖业务组织起来。责成个体农民和佃农组织售粮合作社,农民售粮时,只能售给该合作社。售粮合作社先将粮食储存在自建的粮栈,然后出售给国营粮运公司。领导国营粮运公司的有专设的管理委员会,其组织内容如下:三分之一的成员由议会委任,三分之一来自农业合作社,三分之一来自消费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制订购买农民售粮合作社粮食的价格。它制订的购粮价格并不以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为转移,而是以保证农民和同他共同劳动的家庭成员能够得到足够的劳动报酬为标准。国营粮运公司可以按照国际市场的粮价免税购进外国粮食。然后,无论进口粮或国产粮,一律按照平均价格售给面粉业联合会;粮运公司不得从这种平均价格中求得利润。

这样组织的售粮机构具有很多优点。在战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贩卖商,他以低价购进农民的粮食,又以高价售给城市居民。通过上述售粮机构,就废除了抬高物价的中间商。粮食市场的投机勾当也就无法施展了。粮税将来也必然失去意义。直到现在为止,国产粮的价格一直受进口粮的制约,国家不能提高农民的售粮价格,使其高于国际市场的粮价,如果这样提高国产粮的售价,势必就要增加进口粮的税款来拉平差价,这就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这种现象必须消除。如果将来国际市场恢复了正常情况,国家将有可能用高价购进国产粮,低价购进进口粮,再以平均价格售给消费者。另一方面,我们的组织也完全不同于战时经济的垄断组织。因为,它不能引用现在战时粮运公司那种官僚主义的组织方法,它必须通过民主的方法,在农民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将来,等度过最困难时期之后,国际贸易又恢复自由的时候,征粮条例当然也会取消,国家对粮食的专卖就只限于农民自愿售出的部分。

私营牲畜商业、私营牛奶业以及其他一些经营农产品的私营商业企业,也都能利用类似上述的方式来取消。农民把他们的产品售给他们所必须参加的合作社,合作社再把这些产品直接运交给市政府或消费合作社。

经过一定时期之后,也可以通过其他改革措施使不动产抵押银行公有化。只要国家控制了不动产抵押银行和保险公司,它就能按照国民经济的观点向农民发放抵押贷款。如果抵押贷款的宗旨完全在于促进生产的最高利益,那么国家实行农业抵押贷款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那些通过贷款能最有效地提高耕地产量的或通过贷款而能满足消费合作社迫切需要的地区。另外,关于不动产抵押银行的规定还能扩展到其结果更加重要的新形式。因为国家既然是农民的唯一债权人,或者说,国家既然是农民的几乎最大的债权人,它也有权废除不动产抵押权,而以地租来代替。根据农民工作效能的不同,把地租分为几种不同等级,并且依据市场价格的升降和土地出产多少的不同,每十年重新规定地租一次。

对富农应订出比他现在付出的抵押贷款利息较高的地租,相反的,对贫农应订出比他现在为他的地产所负担的抵押贷款利息较低的地租。通过这种形式来消除农村的阶级矛盾。同时,为国家也创造了减轻城市消费者负担的机会。现在国家不能过多减低粮食、牲畜、牛奶等的售价,因为这样的话,农民可能因此而无力交付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利息而宣告破产。如果由国家决定地租来代替贷款利息,当国家适当地降低地租之后,农产品的售价也就显著地降低了。

对小农经济将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化。也就是说,在不取消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实现小农经济公有化。国家将通过产权关系的改革、专区农业局的领导工作和有计划地提供农田改良贷款等来改良小农经济,使之合理化,并且为了农民本身的利益以及城市消费者的利益来提高土地的产量。与此同时,国家一方面将调整农民所需的劳动工具的价格和农民必须上缴的地租,另一方面也要规定农民售出产品的售价。这样,国家就调整了农民的收入额,既不使农民剥削城市,也不使城市剥削农民。这样,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取消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通过整顿、调整和领导的方式把我国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吸收进来了。

## 七 住宅用地和家务的社会主义化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居民大量集中在大都市和工业区。房租、地租和地价也随着大都市和工业区人口增长的程度在增长。城市房地产主由于人口的增长，获得了大量非法利润，但是广大群众却越来越密集地拥挤在出租房子里。住屋少、人口过多形成了人民健康的最大威胁，成了传染肺病的源泉，使少年儿童失去良好教养，并造成家庭生活的分裂。战争又更加扩大了这种危险。过去五年间并没有建造任何住宅，每个市区都在受着住宅荒的无比威胁。房屋造价现在正空前高涨，人们提心吊胆，唯恐一旦保护房客的条例失去效用，会形成租金飞涨。战争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所以解决住房问题，已倍加必要了。

在这方面，市区应该负起重要的责任，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只须给市区以法律上的权力。为了这一目的，国家必须付给市区没收一切可以建造城市住宅的土地和城市的出租房屋的权力。原业主当然应由市区负责补偿损失。原业主应获得补偿证明书，证明他们有权从划归市区所有的地产收入项下领取定息。市区没收地产或没收出租房屋的权力经法律规定后，每个市区于是有权自由选择没收的对象，如果认为只没收可以建造房屋的空地相宜，就只没收空地，如果认为也没收出租房屋相宜，就也没收出租的房屋。当一个城市看到它的居民将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新形势而退减的时候，它自然也不会认为把地产收归市区所有是有益的举动。但是，当某些城市肯定它们的居民将来还要不断增加的时候，就会以时价收回地产，以防将来房地产价格由于人口增加而上涨，从而增加私人的收益；增长的价值是应该归市区所有的。

如果一个公民以当地通常的租价租不到合乎他个人情况的住屋，国家应该赋予他一种控诉市区的权利。当确立了这样的“居住权”之后，市区迫于形势，自然会兴建住宅，以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住宅的趋

向。“居住权”将促使那些增加人口的市区行使没收城市可用空地的权力,并且自己兴工建造住宅,或者市区通过规定了继承权的建筑法规,准许有兴趣自建住宅的人们或建筑合作社在空地上兴工建造。而且建筑工程的进度,一定要达到使空房的准备量能够适应增加的人口对住屋的需要。

另外,国家必须调整归市区所有的房屋租价。基本原则必须是:市区对小型住宅、小工厂、商店等所订租金,应以够成本为标准。市区从这种类型房屋的租金中不得求取利润。但是,对那些讲究的住宅、地点优良的住宅或商店,市区可以用高价出租,用在这方面所得的利润来削减小住宅的租价,或者用来作为市区为满足广大群众要求的公益事务的开支。

最后,国家还要认真修改租赁法。应该作出规定,对租用归市区所有的住宅、厂房、商店等的租户,不得无故勒令搬家,除非出租处证实租赁人不爱护房屋、扰乱安宁和秩序或由于自己的错误而不付房租。

恰当地规定出归市区所有的出租房屋管理制度,也是极关重要的。如果全市区的出租房屋统由一个管理处直接管理,这当然是难以设想的。因此,有必要责成租赁人自己来管理出租房屋。各地段的管理工作应由各地段租赁人委员会负责,委员会既要负责出租房屋的保养工作,也要负责出租房屋的清洁卫生工作。同时,要作出规定:任何因不爱护房屋而遭致的损失,都要由租赁人补偿,修理费用应按房租比例分摊。

为上述目的成立了租赁人委员会之后,委员会也还要对其他任务承担责任。为了减轻家庭主妇的负担,租赁人委员会有权为单幢房屋或成片房屋设立集体厨房、集体洗衣房、暖气设备、儿童游戏室、儿童读书室、公共餐厅、公共阅读室、成人文娱室等,同时为了维持和管理上述公用设备,租赁人委员会也有权聘请所需的女厨师、女洗衣员、儿童教养员等。一切设备所需费用,由全体租赁人按房租比例付给。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家务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化;许多今天仍由各个住户自己



解决的事务,于是可以通过租赁人委员会和它的机构为所有住户集体地解决了。劳动妇女就可以不再沉陷于职业和家务双重劳动的绊累。对儿童来说,他们将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教养;当母亲到工厂或办公室上班去之后,孩子们就不再是无人照管的了,而是把他们交到儿童公共游戏室和读书室托付给由委员会聘请的教养员。最后,通过家务的部分社会主义化,男人们也能过舒服的家庭生活。今天,男人们消磨他们工余时间的地点,既是厨房又是洗衣室和儿童嬉戏的地方,因此他们为了逃避不愉快的家庭常常宁愿跑到酒店去,而通过家务的部分社会主义化,他们在住宅的旁边就能找到阅读室、文娱室和谈天的所在,因而可以很好地消磨他们工余休息时间。

城市新建区的社会主义化,就这样地改变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整个生活条件。如果可建造住宅的空地和出租房屋划归市区所有,就不会再发生缺少住所的现象,因为每个人都有要求配给适合他的情况的住宅的合法权利。也不会发生涨租的情形,因为市区订立的租金是以足够开支为条件的,所以租金不会像现在的情形那样因人口增加而上涨。同时也不会发生撵房客搬家的情形,因为如果不是不爱护或不好好利用住屋的不规矩的房客,市区不会勒令房客搬家。房主、房产管理员、收租人等的为所欲为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了,租赁人自己选出的委员会已经接收了他们的职权。索然寡味、令人不快的个体家务也不再存在了,公用房间和公用设备补充了每个家庭的小住宅的不足,这一切都是民主的租户集体自己为大家所创造的。

## 八 银行的公有化

工业家、商人和农民一切可以使用的资金,所有小额储蓄存款以及所有人在一定期间不动用的现款,都集中在银行。这样,银行经常支配着大量归别人所有的资金,这种对资金的支配给银行造成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在战前最后的几十年里,银行已经把全数大企业控制在

它的统制之下,金融资本已经成了骑在企业家头上的主人。当初如果有人斟酌过,实行企业社会主义化应从何着手,他有理由相信首先对银行实行社会主义化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因为,假使社会成了银行的主人,社会也会因此而成为企业的主人。

但是战争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银行在经济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在战争期间,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国家借款的工具了,与此相较之下,银行的其他作用已大大落后。实际上,银行在战争期间只是军事管理部门的征发部门,它的任务不外是,为进行战争的目的要锱铢必较地征用一切可用的金钱。因此,银行资产的大部分都是国家欠款和用公债作抵押的贷款。所以说,银行的公有化绝不能起战前所能起的作用了。由于我们需要来自外国的贷款来建设国民经济,银行的公有化因而今天也就不那么容易进行,现在实行银行公有化既不能像战前那样值得推荐,它也不可能发挥那样的作用了。我们工业生产的社会主义化将不能以银行的公有化来开始了。我们将首先清算银行在战争期间的业务,再重新展开和平时期的营业,然后才能谈到银行的社会主义化问题。银行的社会主义化虽然不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化事业的起点,但是,银行的社会主义化将是这一伟大运动的最后阶段和完成。

银行的社会主义化负有完全与大企业或大地产公有化不同的任务。在这方面,问题并不在于剥夺土地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使土地或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而是要剥夺金融资本由于支配银行中别人的资金而获得的权力,并把这种权力变成社会的权力。因此,并不需要使用剥夺的办法,只要把现在由银行股东选举的管理委员会的权力移转到全民代表的手上就成了。为了完成这一手段,必须通过法律作出决定:每一个大银行的管理委员会成员不得再由股东大会产生,而由法律指定的团体选举。譬如,法律可以作出规定,大银行管理委员会 1/3 的成员应由国民会议选出,其他 2/3 的成员应由工业联合组织、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职工会等团体委任。关于这样组织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将足以对银行支配亿万巨款的权力进行社会主义化了。

假使各大银行摆脱了它们的大股东的控制,而改由全民的代表来管理,这便有可能毫无困难地使全国所有大银行归并为一个中央银行。该银行的领导于是也就是全国贷款事项的总领导。人们当然会尽力选择最优秀的专家担任该银行的领导职务。或者,最好创立一个特为推荐国家中央银行有领导权的经理人选的委员会。这种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包括:国家财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人、工业联合组织和商业组织的有领导权的经理、高等商业学校的教员和银行工作人员组织的代表等。只要国家中央银行需要任用一位经理,推荐委员会就必须推荐人选,国家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必须从推荐人选中择一任用。

许多大银行合并为一个中央银行,有最优秀专家领导,有全民代表监察,这个银行将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各银行之间的竞争既然消除,利率自然也就降低了。由于中央银行与全国所有产业机构直接发生业务关系,也就不再需要证券交易所去推销证券;因此,证券交易所失去了经济作用,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直到现在还控制着工矿企业的金融资本的整个权力于是转入民主社会的掌握。银行这才能够在贷款方面对消费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工人的生产合作社提供优惠条件,促进生产的发展,因而银行才成为许多企业部门实行公有化的重要工具。

但是,国家中央银行的任务并不局限于此。它将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最高领导机构。它将是把资金和工作分配到各个生产部门的调整枢纽。

现今,资本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他的资本。没有人限制任何一个资本家,指令他投资创立铁工厂或砖瓦厂,玻璃厂或纺织厂。社会上也没有把资本分配到各生产部门的管理机构。所以不断发生某些生产部门资本过剩,而某些生产部门又缺乏资本的现象。资本家们设立了上打的水泥制造厂,一直等到创建完毕之后,他们才知道,市场上并不需要这样多的水泥。营造厂限制建筑规模,但是不久他们会见到,所建造的住宅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人关心生产部门的比例均等,无人关心各生产部门的平均的、与需要缓急相适应的发

展,确是一再发生经济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关心也正是国家中央银行的任务。中央银行掌握整个社会的资本,应该对哪一个生产部门投资,将由它作出决定。在全民代表的监督下,由中央银行运用的资本将用于人民所需用的方面,也就是说,资本必将用于其产品不敷社会需要的工业部门的扩建,而对于非人民所迫切需要的产品的工业部门,则决不投资。银行的公有化于是成了克服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有决定性的步骤。国家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就是最高经济机构,就是整个国民经济最高领导机构。通过银行的公有化,社会才获得权力,有计划地领导银行工作,对各生产部门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对人民有计划地满足他们的需要。

## 九 剥夺剥夺者

社会主义将把人民被资本家和地主所剥夺的一切还给人民。于是对迄今剥削了人民的人进行剥夺,即剥夺剥夺者,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先决条件了。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对剥夺者实行剥夺,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对他们实行剥夺。粗暴地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私产的方式是不适用的,因为这种没收方式只能导致生产资料遭受破坏,人民群众反而蒙受损失,甚至丧失了国民收入的源泉。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应该是一种有条不紊的方式,实行时才不至于让社会的生产机器受到破坏,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的生产也才不致受到阻碍。有步骤地剥夺剥夺者的最主要办法莫过于征税的手段了。

前几章已经指出,首先实行公有化的是重工业企业、矿业企业、森林、大地产和永久管业的地产等。对原业主补偿损失的款项是利用财产税来筹措的。我们估计,对德意志奥地利来说,只须对于有产阶级整个资产平均征收  $1/6$  的财产税,就足以完成对剥夺者的剥夺了。当然,财产税是累进的,使大的有产阶级所付出的税款多于他的资产的  $1/6$ ,小的有产阶级所付出的税款少于他的资产的  $1/6$ 。征收相当于总资产

1/6 的财产税是不会有技术上的困难的。要为此设立专门负责征收税款的信贷机构,以免引起显著的经济紊乱。同时,决不准许逃避交税。根据一切可靠的财政学知识,征收这种税款既不会刺激物价上涨,也不会压低工资。这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毫无问题地把社会生产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既不影响经济生活又不加重人民群众负担地成为全民所有了。

立法机构的第二个重要任务将是设法解除人民所负担的沉重的国债税。战争使得国家负债累累。这种负债是要付息的。如果用简单的停止付息的办法会造成国库倒闭,这是不堪设想的,因为这将意味着所有银行、储蓄所、保险公司、孤儿救济金储蓄所、农贷金库等全部金融机构的倒闭,也意味着抢夺了无数小公务员、职员、手工业者、农民等的小额储蓄金,同时,企业家和商人的企业资金也就一无所有了。这样的不幸事件是不容许发生的,因此战时借款的利息是不得不付的。但是,支付这种利息的款项不得由工人阶级来负担,应该由有产阶级来负担;因为国家从工人身上抽税,把税款当作国债利息奉献给资本家,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必须用特种税来筹措支付国家债权人的公债利息的款项:国家对于依赖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平均征收约 1/3 的累进所得税,使大资本家付出的税款多于收入的 1/3,小资本家付出的税款少于收入的 1/3。这样的税收将足够抵补战时负债的利息。这样,只有资本家和地主是承担付息责任的对象了,并且,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的特别税不属于收益税,而是累进的所得税,根据财政学理论,这种所得税是无法逃避的。

我们上面提出的两种税法,其目的在于,利用财产税和所得税的办法,由有产阶级自己来付清对企业主和地主的损失补偿,并且由有产阶级自己承担国家对公债付息的责任,而使社会不受损失地成为重工业和大庄园的主人。整个剥夺过程因而毫无痛苦地得以完成。有产阶级交出的财产税税款约合他们财产(也就是他们的收入)的 1/6,他们剥削所得的其余 5/6 的 1/3 又作为不劳而获的所得税上缴了。他们总共

所损失的,平均只是他们剥削所得的  $\frac{4}{9}$ ,大资本家上缴的约多于  $\frac{4}{9}$ ,小资本家上缴的约少于  $\frac{4}{9}$ 。与由于战争造成的收入悬殊的现象相较之下,这样的剥夺方式绝对不是过火的。

在实行剥夺剥夺者的办法的同时,也将实行另外一种剥夺的办法。市和专区政府将剥夺那些属于地方需要的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区房地产的原业主的所有权。这类原业主能获得证明他们有权从原有私产的收入领取定息的证明书,这就是说,原业主所持有的已经不是他们的地产、房屋、面包房、磨房等等了,而是定息证券。下一个步骤将是如何逐渐消除这种债务和战时负债了。这是可以通过限制继承权和征收遗产税来实现的。

我们应该从法律上把继承权限制在夫妻和最近的直系血亲的范围之内。根据遗嘱继承的财产应当承担累进的遗产税。国家根据部分遗产收归国有的归属法获得的收入和遗产税的收入,都用于清偿社会所负担的债务。通过这种方式,在不多几代的期间中,这种债务必能完全还清。

国家的经常支出要通过其他方式加以平衡。到现在为止,国家财政是以税收作基础的,但是,等到生产公有化实现之后,公有化的企业就成了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了。公有化重工业、公有化矿业、公有化大农庄和用集体方式经营的大农庄等的部分盈余收入要划拨给国家。那些在大农庄土地范围内落户的、有永佃权的佃农,也要向国家交纳地租。各个属于工业联合组织的组织起来的企业,它们的一部分盈余也划归国家。各公有化商业机构的部分盈余也划归国家。总而言之,随着社会主义化的进展,国家从税收方面得来的收入越来越少,而从公有化企业方面得来的收入越来越多了。

国家财政的改进是和社会变革并进的。利用赐给领地作为酬劳臣仆的办法,这是封建国家的特征。利用税收来维持作为统治工具的军队和官僚机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采取征收捐税的办法而是要通过公有化企业的收益来平衡它的开支。

但是,在税收作为国家正常收入逐渐消失的同时,它在作为改变社会财产和收入分配的工具方面却有更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国家预算不再以税收而是以公有化企业收入为平衡收支的工具,所以,国家有必要利用高税率的财产税作为使企业公有化的办法,并且利用高税率从不劳而获的收入中征收所得税作为清偿国家战时负债的办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使税收的作用完全改变了:从作为平衡国家正常收支和弥补统治开支的工具,一变而为剥夺剥夺者的方法了。

资本主义国家使人民大众负担着沉重的消费税,却把税收所得用来偿付国家所欠债务的债权人,这就是说,国家通过间接税的手段,剥夺人民群众而为资本服务。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要走的恰是与此相反的道路:使资本承担财产税和遗产税的负担,并使不劳而获的收入承担特种税款的负担,以利用这样的税收,使土地和生产工具成为全民所有,并利用税收来剥夺资本而为劳动人民群众服务。征税本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来剥夺人民的工具,现在却成了为人民的利益来剥夺资本家的工具了。

## 十 社会主义化的先决条件

我们试图用一系列的论文来取得这样一种概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便为了人民的利益,并且在不妨碍生产的情况下,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现在,还要最后指出,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先决条件,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系列复杂的、彻底的改革措施。

社会主义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不言而喻,就是和平。只要我们还处于战争状态下,只要我们的国界还没有确定下来,只要海运还不自由,那么我们上述的措施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譬如,只要我们还不知道,哪些疆土确实属于我们国家,只要我们国土的重要地区还被外国军队所占领,只要我们对各个新成立国家所负担的战争赔款的比数还没有清楚地确定,那么我们就还不能施行财产税的税法。只要我们的

生活必需品和煤炭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换来,而是通过暂欠方式从胜利者的手上借来,那么我们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受协约国统治阶级约束而自由地重新建立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必须先恢复和平时期的状态,生活必需品和原料的进口一定要先恢复自由,我们的生产机器必须先开动起来,我们大家也要先开始工作,以便我们不再倚赖胜利者的恩赐,不再受胜利者的专横命令的束缚,而能真正自由地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我们自己的意愿建立我们的社会秩序。

和平和工作是完成我们的任务的外部先决条件。其内在的先决条件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广大劳动群众对于社会改造的要求。某些人认为,只要几千有思想有作为的人,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就能一切成功了;他们于是可以命令广大人民群众实行社会主义。但是,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极少数人如何能够通过威胁手段迫使广大人民群众服从他们的意愿来掌握如此之大的社会生产机器呢?不错,少数人也可以通过无情的威胁手段来剥夺资本家,他们也可以从一个革命中心来管理生产机器。但是,这只是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革命中心除去通过一个强迫军队服从它的命令的官僚集团来管理工厂、矿场和农庄之外,是别无办法的。但是,我们不想要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统治全民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要求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由全民自己掌握经济。人民应该通过一系列民主机构自己管理自己的经济生活,这些机构已由前文介绍过了。这就是:各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各公寓的租赁人委员会、工会、消费合作社联合会、农业合作社、城乡行政委员会、各企业管理委员会、各农庄的监察委员会、专区农业局及其顾问、州农业委员会、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中央银行的管理委员会和国民会议以及通过它组成的政府,这些都是代替资本家和地主来管理生产资料、领导工作、调整经济生活的主要组织。这种人民自己掌握经济的制度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参加和热情协助为前提。极少数人对人民使用威胁手段的是办不成事的,只有出自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意愿才行。



因此,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是人民的大多数必须深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不移的意志。

但是,实行社会主义还须具备另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有一个根据其性质有可能贯彻社会革命的国家。我们在德意志奥地利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德意志奥地利究竟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部分呢?或者它将加入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联邦——“多瑙河联邦”呢?我们未来的社会制度主要是和上述决定有密切关联的。

现在,假设我们已经加入了多瑙河联邦!那么哪个联邦成员国应该贯彻社会主义呢?是不是德意志奥地利政府呢?我们简直不能想象,在同一联邦并且在同一经济系统之内,一个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奥地利能够同资本主义的邻邦互相联合在一起。或者,整个联邦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该怎样呢?这—个由许多民族共同组成的联邦政府能够贯彻社会主义化吗?但是社会主义化的先决条件,主要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有作为的政府,它能够击破资本家和地主的抵抗,它能够有力地、统一地、有目的地建设社会主义组织。一个松懈的联邦的联邦政权对于这样艰巨的任务是绝对不能胜任的。所以说,假使我们加入了多瑙河联邦,那么这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将会在一个很长时期中是阻塞不通的。

假使德意志奥地利是一个大德意志共和国的成员国,那么我们的远景就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了。大德意志共和国不会是松懈的国家联合组织,而是成员国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联邦国家,它具有强有力的、统一的政府,也具有共同组成的立法议会。有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议会才能具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打倒统治阶级的抵抗,才能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至于说这样的国家政权为什么就能够受向往社会主义的意愿的支配呢?关于这—层,德国工人在人数、觉悟程度和革命坚决性方面给了我们有力的保证。

换句话说,德、奥两国联合起来,会为我们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联合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国家争取德、奥合并的斗争必要先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

如上所述,我们已经指出了我们如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上面所述的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唯一可以想象的道路。社会主义也能通过其他道路而实现。假使我们的人民还不能理解当前的必然趋向,假使资产阶级不顾必然趋向和不可避免的现实情况而进行抵抗,假使广大人民群众迷失了方向,并且由于受到蒙蔽而分辨不清什么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不懂得利用民主共和国提供他们的政治的权力工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就要通过其他方式出现了。这样出现的社会主义就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工作所获得的结果,而是一种可怕的武装进攻的结局。这种进攻将首先破坏一切,然后再从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新的世界。如果社会主义通过这样的道路建设起来,那么我们为此要付出惊人的代价。这种代价中包括经年累月的内战,包括生产工具的无比破坏,包括要度过多年的悲惨生活,也包括比战争带给我们的困苦还要可怕得多的灾难。社会主义已经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如何,社会主义是要来临的。问题只在于,它将通过什么途径而实现。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使社会主义作为无比灾难的结果而是使社会主义作为有目的工作的果实而实现吧!

译自 1919 年维也纳德文版。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王志涵译

## 考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

(1919年10月11日)

1914年,一批从事理论工作和政治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准备出版一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集子来庆祝马克思学派的大师卡尔·考茨基六十诞辰。这批马克思主义者在近几十年的斗争中聚集在卡尔·考茨基的周围并把他在弗里德瑙的寓所当作他们的精神中心,正如30年前卡尔·考茨基本人和他同时代的人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的寓所当作他们的精神中心一样。几个月以后,由于战争爆发,这个计划成了泡影。战争和革命使我们分道扬镳了。库诺和伦纳这部分人离开了考茨基过去和现在给我们指引的轨道,远远地滑到了右边,而托洛茨基和梁赞诺夫那一部分人则远远地滑到了左边。但是,在过了意义深远的五年之后的今天,在考茨基以充沛的工作热情和旺盛的战斗精力欢度自己六十五寿辰的日子里,我们愈加强烈地感到有必要阐明他过去和现在对我们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1883年,即卡尔·马克思逝世那一年,卡尔·考茨基担任了新创办的《新时代》杂志的主编。从这时起,36年来,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马克思学说的传播、深化和发展上。首先,他写出极其大量的通俗读物,普及了马克思主义。1883年前后,只有少数人真正掌握和理解马

---

\* 这是鲍威尔为庆祝考茨基六十五岁生日而写的文章。——编者注

克思的历史观、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和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改革；一种折中的庸俗社会主义还控制着各国的工人运动。正是考茨基的通俗读物为广大群众打开了接近马克思的大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战胜了一切其他社会主义体系、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对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事件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观察方法而取得了成果，向群众灌输了马克思的思路，以上这些都是那种巨大的通俗化工作的成就，考茨基本人从事这项工作已有一个世代，并且把它教给了他的学生。然而考茨基并不只是做了使马克思易于为群众所了解的工作，他同时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新的工作领域，从而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库增添了一些最好的作品。他写作的《土地问题》和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关于原始基督教和托马斯·摩尔、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的历史著作，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的最好的和最丰硕的成果之列。

但是，谁把考茨基只看作理论家，把他的成就只看作是使马克思学说通俗化并使之完善，谁就是还根本没有看到他的本质。因为考茨基的过去和现在都把全部精力献给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无产阶级日常的实践服务，这是他本来的任务。他用有关时事问题的无数文章、论著和小册子系统地教育我们要从广泛的历史联系去认识当今的每个事件，要从经济生活的千变万化的形态中去把握时代的潮流，要根据历史的和经济的认识去确定无产阶级对待各种事件的态度，要根据对敌对力量的经济和历史的考察来认识当代赋予工人阶级的任务，也要根据这种考察来认识无产阶级的力量的限度以及它的每一种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的限度。正因为他教导我们要从广泛的历史联系去认识当今的每个事件，所以他总是告诫我们不要醉心于日常的细小的斗争而忘记了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另一方面，由于他也经常向我们指出，我们能做到的决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愿望、我们的勇气、我们的献身精神，而且首先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经济状况，取决于各阶级间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因此他要我们避免把力量

集中在办不到的事情上,避免由于从事力不胜任的工作而把无产阶级引向失望和失败。于是出现这种情况:一些只看到日常的细小斗争的人经常指责他是一个“革命空想家”,而另一些不愿看到我们愿望的客观局限性的人把他说成是一个“刹车者”。但是他始终同样坚决地反对这两种人。

群众总是根据新近获得的经验和一时的情绪作出判断的。因此他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一再发生变化。群众的一时的情绪反映在社会的时髦理论中,这种理论突然出现,迅速取得统治,但是没有过几年又消失。这种时髦理论就是修正主义。因为欧洲有数十年之久没有经历过战争和革命了,大多数人就以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算是过去了,我们不当再考虑政治灾难了。因为工人阶级在几年之内遇到非常有利的经济条件而能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大大改善他们的状况,群众就以为不再需要通过革命去战胜资本主义了,似乎有可能和平地、通过议会的、工会的和合作社的成就逐渐地“挖空”资本主义。谁反对这种产生于1895年至1901年繁荣时期的情绪和经验的时髦理论,谁就被看作一个没有能力按照经验的成果去修改传统信条的“教条主义者”,一个把他的圣经条文看得重于生活经验和生活必然性的“正统派”。对任何人的讥笑都没有比对考茨基的讥笑更加无礼了,他被骂成“死守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教会”的“教皇”和“宗教裁判长”。但是几年后,这种喧嚣声过去了。经验证明考茨基在一切重大事情上是正确的。

如同考茨基当时坚决地同修正主义的时髦理论作斗争一样,今天他也坚决地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时髦理论作斗争。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使无产阶级统治整整一个大国,从而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受到极大的鼓舞。战争给群众带来的贫困化和革命化到处推动人们模仿俄国十月革命。这样,从群众的情绪中产生出来一种新的时髦理论。这种时髦理论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被环境所迫而采取的那种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是唯一可能的、唯一能导向目标的、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加以运用的斗争手段和组织形式,其实,那种环

境却是极其特殊的、受地点和时间限制的,甚至在俄国当地已经部分地过时了的、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会重复的环境。按照这一时髦的理论,俄国的这种方法变成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莫斯科是麦加,列宁是先知。考茨基反对这种偶像化。而所有那些总是喜欢梳最时兴发式的人立即起来反对他。就像一年半前,当考茨基确认工会能力有限时,工会官僚们指责他敌视工会那样,今天那些苏维埃的新领导人因为他不迷信“苏维埃制度”的神奇力量而咒骂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那些最年青的十一月共产党人竟可以辱骂这位老革命家是一个“社会叛徒”,因为他不愿意走一条从他的根据经济的和历史的认识形成的信念看来必然导致工人阶级不幸失败的道路。但是,这位65岁的人还像他最年青的时候那样不屈不挠和勇于战斗;他的不知疲倦的笔为我们写出一本又一本出色的论战性著作。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发表了出色的小册子《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他以前那些声讨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性著作的续篇。关于这本小册子,哈阿兹说得对:它是一本人人必读的书。

谁要想充分了解考茨基的坚定性,就把目前考茨基所主张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思路和20年前他所坚持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思路作一番比较吧!为此目的,我们举出那时他写的许多论战性著作中的一本,即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社会革命》<sup>①</sup>。这个书名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挑战:修正主义不是已经把社会革命赶入神话世界了吗?研究工人阶级在“革命后的次日”将着手干什么,这对修正主义来说难道不是愚蠢的骗人的思想游戏吗?当时围绕着这本小册子的斗争,思想界发生了分裂:修正主义者对这本小册子冷嘲热讽,革命者则把它看成战斗号召。考茨基当时得到了所有那些今天把他看作“社会叛徒”的人们的赞同而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17年后的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考茨基在那一场斗争中是怎样决定我们在“革命后的次日”的任务的。

---

<sup>①</sup> 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第1编《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第2编《社会革命后的次日》。1902年柏林前进出版社版。

考茨基同布尔什维克之间矛盾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二者对社会化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不同。布尔什维克首先看到的一项任务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产阶级占有的剩余价值迅速地和全部地归工人阶级所有。为此目的，必须无偿地从迄今的占有者手中没收生产资料并把它交给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考茨基早在 1902 年就这个问题的这种幼稚观点提出过警告。他曾设想，如果可以把剩余价值分摊给工人，那么没收剩余价值当然能够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一倍。但事情并非如此。资本家并不是把剩余价值的一大部分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而是用于扩大和发展他们的企业。如果资本被剥夺，社会则必须担负起现在资本家行使的职能。因而社会就不能把一大部分剩余价值分给工人，而必须把它用来扩大和发展转入他们手中的生产设备。另一大部分剩余价值则必须用来教育后代和维持那些丧失了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我们将资本一下子加以没收，从资本家目前的收入中也不会剩下太多来提高工资。因此，为了能够提高工人的工资，绝对必须使生产超出迄今为止的规模”（《社会革命》第 2 编第 21 页）。早在 1902 年就已经是说对了的东西，今天愈见效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愈长和劳动生产率（相对剩余价值）愈高，剩余价值则愈多。然而今天，工时大大缩短，大批群众失业，另一些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同时，由于战争造成的生产设备的破坏和劳动力的削弱，劳动生产率较前大大降低。因此，今天的剩余价值无疑比 1902 年要少得多，所以，今天显著提高工人的实际收入，决不能靠剩余价值的没收，而只能靠生产的提高。从这种认识出发，在考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布尔什维主义力求立即没收剩余价值，哪怕这种没收只有在持续的、破坏生产的国内战争中才能得到实现也在所不惜；考茨基却认为必须通过不是阻碍生产而是提高生产的方式实现社会化。

布尔什维主义只看到政权问题，而看不到经济问题。战争严重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统治机构，因而目前无产阶级能够特别容易地夺取

政权。正因如此,布尔什维主义相信,必须立即在战争的直接影响下实行社会化;如果坐失良机,如果世界性的社会革命没有立即在世界大战之后爆发,社会主义就会失败。考茨基却认为,社会化不仅是政权问题,而首先是经济问题,因此他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在1902年预言过:政治革命首先会导致生产的严重破坏。因此,首要的任务是使工人复工。他当时的确认为这是不难做到的。因为第一,工人习惯于他们的劳动,因此不劳动就很不舒服;第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易于使他们重新回到生产活动中去(《社会革命》第2编第15页)。显而易见,与1902年不同,今天这些先决条件完全不适用了。战争使广大群众失去了工作习惯。在战壕和兵营中他们荒疏了自己的工作。现在他们只能逐渐使自己重新习惯于工厂的单调无味,只能逐渐地重新获得从事于持续的、紧张的劳动的精神力量。就连群众的纪律和群众对组织的信任也被战争动摇了。但是这里涉及的当然不仅是恢复群众的工作的问题,而且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为此目的,1902年考茨基曾经建议,技术比较差的工厂停工,把生产集中到技术最完备的工厂里(《社会革命》第2编第21—24页)。但是这种方法现在不适用,它需要事先迅速扩大技术最完备的工厂厂房和机器设备并为集中到这些工厂的工人群众建造新住宅。所有这一切,今天由于煤的匮乏完全做不到。因而考茨基在他的1902年的著作中打算用来在革命后维持和提高生产的所有的办法今天都不适用了。如果说考茨基认为当前的时机对社会化特别不利,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只能很谨慎地、慢慢地和逐步地实现社会改造,那么他还是忠于自己1902年的观点的。

布尔什维主义一举完成“剥夺剥夺者”。考茨基在1902年也没有推荐这种方法。当时他也就认为,社会革命“或许长点或许短点,但仍是个持续许久的历史过程,它可以在艰难的斗争中延续几十年之久”(《社会革命》第2编第3页)。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首先通过实行国家失业补助来加强工人反对企业主的力量,然后必须通过税收法和劳动保护法压低利润。这样一来,资本家最后剩下的仅仅是承担资



本主义企业的风险和负担了；到那时，他们自己就会催促别人购买他们的企业（《社会革命》第2编第8页）。这件事可以逐步地做到，而且从购买交通工具和原料生产开始（《社会革命》第2编第9页）。也就是说，对生产资料不会简单地剥夺，而是要用补偿金进行赎买；然后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通过征税没收”补偿金额（《社会革命》第2编第13页）。通过这种方式，“对剥夺者的剥夺”将在不破坏生产的情况下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完成。这就是考茨基在1902年的著作中推荐过的道路（那一年他所进行的、得到所有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赞同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达到了顶峰）。这就是他今天针对布尔什维主义而提出的、我们打算在实践中运用的那种方法。然而，考茨基却因此成了“社会叛徒”！

布尔什维克实行的那种突然的用暴力剥夺的方法需要专政和恐怖。考茨基的方法不仅同民主制并行不悖，它还要以民主制为前提，这是因为这种方法要防止旷日持久的内战给生产造成的混乱，于是考茨基在1902年的著作中宣称充分实现民主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首先”，考茨基当时这样开始他的描述：“首先不言而喻的是无产阶级将补做资产阶级延误了的事情。要铲除一切封建残余，实现资产阶级也一度维护过的民主纲领。要把普选权给予一切社会团体，要给予充分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社会革命》第2编第5页）。考茨基继续阐述说：无产阶级要实现民主的地方管理，使教会同国家分离，废除军国主义，使教育制度民主化。所以，不是苏维埃专政，而是普选权的统治，不是取消而是实行出版自由，不是建立红军，而是建立民主的民兵，这就是考茨基1902年的纲领。今天考茨基提出同样的纲领来同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

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没有恐怖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取消出版自由始终是它的第一格言。相反，考茨基的民主社会主义则要求充分的思想自由。如果说，社会恰恰在必须解决巨大的任务时，即在它需要具有最大的思想灵活性时，不应当僵化的话，那么它就需要个人精神活动的充分自由，需要批评的充分自由。因此报刊和图书出版不应当由国家

来垄断,否则它们就会成为当时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统治工具了。所以考茨基在1902年要求“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第2编第45页)。今天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施加于精神生产的暴政而大力捍卫的就是这种精神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可见,考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批评都出自他同修正主义进行论战时(当时他是所有国家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公认的领袖)曾主张过的同一信念,从那时以来考茨基从来没有“重新学习”过。如果说有人“背叛”了考茨基当时站在国际社会民主党革命一翼的前列而为之斗争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他是不属于这些人之列的!

无疑,今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和幻想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交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朋友。这就是说,整个资产阶级都在凶狠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资产阶级力图挑起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变种的狂热,正是要中伤一切社会主义。

当然,考茨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较之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考茨基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是因为他确信布尔什维主义是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一种错误的、导致失败的方法,是因为他要用其他的更可靠的方法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尽管存在着种种策略上的意见分歧,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考茨基当然跟列宁是站在一起的;无可置疑,我们大家,布尔什维克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人,都是站在战壕的同一边的。

尽管上面所说的这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内心里同考茨基一样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面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却害怕参加考茨基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因为他们担心给人这种印象,似乎他们参加这一斗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了。然而这种恐惧不是没有危险的。

布尔什维主义不能改善无产阶级的境况,因为它不能提高而只会破坏生产。所以它必然使无产阶级失望。“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必然同无产阶级发生矛盾,因此它必然要垮台。但是如果社会主义不严格地

同布尔什维主义划清界限,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终究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如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听任右派社会党人一手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那么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就会成为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对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布尔什维主义严格地鲜明地区别开来,是革命社会主义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考茨基之所以对革命社会主义的未来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正是因为他作为几十年来革命社会主义的领袖领导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所有害怕同群众的一时的情绪相对立的人,自然会胆怯地从这个比较勇敢的领导人面前走开。在他自己的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只有少数人公开站在他一边。我们宁愿遵循一个更为可敬的榜样。1873年马克思写道:“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得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sup>①</sup>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sup>②</sup>。我们也要这样做。如果那些被革命潮流推上来的、现在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乐于像马克思时代大胆的德国教授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考茨基,即把他当作“死狗”,那么,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老年的导师、领袖和朋友的感恩的学生。

译自《斗争》杂志第12卷(1919年)第28期第661—667页。

选自《鲍威尔言论》第119—126页

---

① 莫泽斯·门德尔森(1729—1786)——德国资产阶级自然神论哲学家。——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编者注

# 给考茨基的信

(1920年3月29日)

1920年3月29日于维也纳

亲爱的朋友!

我本来打算复活节时去柏林,一方面为了了解一些政治情况,另一方面为了和你详细谈谈怎样使你能够迁居维也纳。可惜这个打算看来目前不能实现。我觉得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的政治局势都不太稳定,我不能离开维也纳过久。同时,这里的共产主义运动最近一个时期重新明显地高涨起来,这使得我要写一本小册子<sup>①</sup>,为此需要利用复活节假日,因为在这以后我要忙于议会的事,不再会有时间去写了。不过我将利用下次出现的机会去柏林,也许圣灵降临节可以。

如果我能够知道你怎样判断德国当前的情况,这对我会是非常宝贵的。我很悲观,我认为解除反革命武装的最有利的时机已经错过,并且担心反动只不过是推迟了。但是在这里很难得出比较确切的概念。因此,要是你和鲁道夫<sup>②</sup>能把情况告诉我,这对我会是非常宝贵的。

由于德国事件的影响、粮食供应情况不佳和联合政权毫无成就,最近一个时期,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的力量增强了,我们的群众也激进化了。不过我并不预料这会导致直接的政治后果,除非有来自德国的

---

① 指《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见本书第169—306页。——编者注

② 指鲁道夫·希法亭。——编者注

推动。虽然没有人能说应当用什么来代替联合,但是无论如何联合是再也维持不了多久的。工人们目前肯定还不会忍受一个纯资产阶级的政权。我们现在正努力建立新的国防军,以便在联合破裂之前至少这件事能有保证。

我从本德尔<sup>①</sup>最近的信里看出,你们误解了奥斯特利茨<sup>②</sup>对你的关于战争原因一书<sup>③</sup>的沉默态度。他曾一再告诉我(几天以前刚刚又说过一次),他想就此写一篇文章。他没有写出来,这肯定丝毫不是出于政治意图,而是由于疏懒、由于实际事务和过多的工作分散了精力,因为整个报纸都是他一个人管。无论如何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你和《工人报》的合作会遇到某些困难。尽管奥斯特利茨现在和过去一样,在细节问题上会异想天开,但是总的说来他确实确实是站在你的立场上的,而且他会以得到你的文章而感到欣幸。他还曾经拒绝发表卡利<sup>④</sup>的一篇文章,这同上述情况并不矛盾。我也认为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如果早来三天就行了。

本德尔信中也说到对俄国采取的态度,这是一个更为困难得多的问题。工人们确实像着迷一样注视着俄国革命。每一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仅仅由于和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恰好一致就会引起工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但是首先是由于工人们固执地抱着从俄国开始、在最短时期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将要天翻地覆的巨大希望,并且不愿接受别人的劝告放弃这一希望,正像一个虔诚的灵魂不愿接受别人的劝告放弃对天堂的希望一样。任何一种反对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都在工人中引起一种简直是狂热的反抗。可以在理论著作中同布

---

① 见本书第 80 页脚注。——编者注

② 指弗里德里希·奥斯特利茨(1862—193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派,1895年起任《工人报》主编。——编者注

③ 指《关于战争爆发的德国文件》(《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编者注

④ 指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 1892—?)——考茨基的第二个儿子,和父同名,卡利(Karli)是爱称。——编者注

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也能够有成效地向人们说明,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是以俄国特有的情况为条件的,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但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直接的、敌意的批评却会引起如此狂热的反抗,以致如果我们在《工人报》上进行这样的批评,就会恰恰因此而招致党的分裂。我相信,这种看法不仅对奥地利适用,而且在国际上也适用。因此我认为,任何要建立一个排除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际的口号都是既不可能而又危险的。自然,独立社会民主党、龙格等人的与此相反的建立一个“中派”国际的口号也是一样。必须把真相告诉工人,即重建国际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一个排除工党和德国、捷克、波兰等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而又不能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或者只能达成虚假的协议的国际是一个无用的、无头无四肢的残体。所以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能等待历史本身使事情稍微明朗起来。

虽然我原来的复活节计划落空了,我还是希望很快就有机会和你们谈谈这个问题以及许多别的问题。

最衷心地一并问候你们大家和鲁道夫。

你的奥托

译自《社会史国际评论》1970年第3期第475—477页。

选自《鲍威尔言论》第127—130页。殷叙彝译

# 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1920年)

## 序 言

一个世纪以来曾是欧洲反革命堡垒的俄国成了最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无产阶级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取得了统治。第一次进行了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尝试。

资本主义世界在发抖。一旦它发现死敌当前，它的传统、它的思想就化为乌有了。雅各宾派的继承者同过去的列奥波特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sup>①</sup>一样，现在也联合起来发动战争反对革命了。潘恩的后裔在执行伯克<sup>②</sup>的使命。德国将军们为了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甘心情愿为凌辱德国的骄横的胜利者——“世仇”法国和“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sup>③</sup>效劳。波兰自由战士的子孙们甘愿充当新的神圣同盟的附庸。

---

① 列奥波特二世(1747—1792)，奥地利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1744—1797)，普鲁士国王。他们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组成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但遭到失败。——编者注

② 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共和主义者，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艾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极力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编者注

③ 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是指英国。——编者注

大炮和榴弹炮,机关枪和喷火器,在俄国招募反革命军队的黄金,胁迫弱小国家加入反革命行列的外交阴谋,封锁的饥饿束带,潮水般的印刷品,数不清的歪曲、造谣、诽谤——这些就是国际资产阶级进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战争所采取的手段。

然而,全世界无产者的心更加强烈地向着俄国无产阶级。各国工人群众没有受资产阶级谣言攻势的迷惑,他们热烈欢呼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他们庆贺苏维埃共和国战胜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胜利,把这当作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瓦尔米和热马普<sup>①</sup>。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的国际无产阶级第一次团结起来不断强烈抗议对俄国的武装干涉。它迫使西方列强从俄国撤走他们的军队,从而取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胜利。

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样巨大的事件影响下,也对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思想发生怀疑了。协约国曾经在民主制的名义下进行了反对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的军事君主国的战争,现在这种民主制被可耻的凡尔赛和约和圣热尔门和约<sup>②</sup>撕去了伪装。中欧由于战败而得到的民主制势必使群众感到失望,因为它无法克服战争、失败和强制性的和约所带来的贫穷和困苦。无产阶级对于它在西方一个世纪以来、在中欧 1848 年以来所争得的那种民主制的信仰动摇了。俄国革命向无产阶级指出了达到目的的另一条道路:凭借暴力建立不加掩饰的残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对民主制的失望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使无产阶级走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但是在西欧和中欧,无产阶级在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和俄国迥然不同的障碍。于是,思想发生了分歧。苏维埃专政还是民主——这一争论使无产阶级分成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使社会

---

<sup>①</sup>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1792 年 9 月 21 日法军在瓦尔米战役中击溃了进犯的普鲁士军队,1792 年 11 月 6 日在热马普战役中又大败奥地利军队,从而取得了对欧洲反革命联军武装干涉的重大胜利。——编者注

<sup>②</sup> 《凡尔赛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签订的。圣热尔门和约是以上述战胜者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奥地利为另一方于 1919 年 9 月 10 日在巴黎附近的圣热尔门签订的。——编者注



民主党本身发生了分裂,使国际四分五裂。

俄国革命的方法是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所产生的,还是俄国社会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 布尔什维主义是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唯一可能、唯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还是仅仅适合俄国的特殊情况而不能应用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方法? 全世界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模仿俄国的方法,还是斗争条件的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致在俄国历史本身迫使无产阶级采取的方法在其他国家不能应用而必须代之以完全不同的方法? 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要力求回答的一些重大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得了解俄国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进行斗争的特殊条件。俄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它 3/4 的人口从事农业。只有通晓俄国农业的历史,只有认识俄国农民生活条件,才能了解俄国革命的起源和过程。因此,我的阐述是以从废除农奴制到革命为止俄国农民的这段简要历史开始的,在此基础上叙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一庞大的农民环境中的发展。我们这样来了解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斗争条件,并从这些条件出发去了解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了解它的起源和它在自己的胜利进军过程中的内部发展,然后我们再把它们同西欧和中欧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作一对比。认识到斗争条件根本不同,我们就懂得斗争方法也必须不同,虽然我们在这里和在那里都是为同一事业——无产阶级事业而斗争,都是为同一目标——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奋斗。

铜墙铁壁仍然把我们同俄国分开。从苏维埃共和国传到我们这里来的只是一些贫乏的和充满矛盾的消息。难以得到详尽可靠的消息,这是我们队伍中发生争论的原因之一。我的阐述所依据的大量资料是,苏维埃当局的合法出版物和官方报告、亚历山大·托伊布莱尔<sup>①</sup>从俄国战俘营回国时付出极大的辛劳和牺牲带给我的俄国书籍、小册子

---

<sup>①</sup> 亚历山大·托伊布莱尔(1872—1944)——早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任《工人报》编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被俄军俘虏。1934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编者注

和报刊杂志。这些资料也远不是完备的。首先,它只包括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年的文献;我不得不设法根据比这贫乏得多的报导去勾画第二年的发展图景。但是政治家并不处于历史学家那样的幸运地位,历史学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题材,在他没有获得研究资料之前,不必从事那个领域的研究。政治家是被迫对时事发表意见,他不得不大胆根据不充分的研究材料作出自己的判断,甚至冒着研究资料不足有时会使他作出错误判断的危险。

奥托·鲍威尔

1920年4月12日于维也纳

## 第一章 俄国革命的社会前提

### 1. 农奴制的废除

直到1861年以前,俄国人民还是农奴。在俄国,农奴制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为广泛、更为完整,也更为残酷。地主随意规定农民服徭役或交租税。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或把土地重新收回去,也完全随心所欲。地主可以把农民连同他所在的土地或不连同土地卖掉或送掉。地主可以把农民变为他的家奴。不经地主的同意,农民不能结婚,不能离开土地,也不能寻找别的职业。地主是农民独一无二的法官;农民不能进国家法院。地主可以用皮鞭惩罚农民,派农民服兵役,把农民流放到西伯利亚,判处农民作强制劳动。俄国农民,俄国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在60年代前还处于这种奴役状况。

地主以各种方式剥削农奴的劳动力。按照他们剥削的方式,我们可以分为徭役经济和地租经济两种。

在徭役经济中,地主也让农民使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地主交给农民的土地只够农民养活自己及其家庭。其他的大部分土地仍旧是地主的土地。农民必须用自己的牲口和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在地主的土地上服徭役。农民一年用一部分时间在交给他使用的土地上为自己劳

动,用另外一部分时间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剩余劳动是徭役劳动,剩余价值具有劳动地租的形式。

地租经济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里地主是将大部分土地交给农民使用。因此农民得到的土地要多得多。但是农民使用的土地不仅必须养活农民的家庭,而且必须向地主提供剩余价值。就是说,农民有义务从他们的土地收入中向地主交纳一种租税——代役租。随着货币经济的推广,这种原来规定用实物交纳的租税就变为货币租税。剩余价值起初具有产品地租的形式,这种形式逐渐为货币地租所代替。<sup>①</sup>

在自然经济时代,农民不仅从事耕种土地和饲养牲畜;农民家庭也生产织物、衣鞋、家具和工具等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城市、交通、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的逐渐发展,也向农民提供了把他们的手工产品带到市场上进行交换的机会。向国家交纳赋税和向地主交纳租税的双重负担迫使农民利用这种机会。这样农民就在手工业活动中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副业。在冬季,他们作为手工业者、工艺工人、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和在家里做定活的手工工人,为资本主义订购人服务。农民从他们的手工业副业劳动中取得的货币收入越大,地主能够向他们要求的货币地租就越高。因此,不仅货币租税代替实物租税,而且地租经济代替徭役经济、代役租代替徭役劳动,对地主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在土地收成低的森林区,农民有足够的机会去从事手工劳动,地主就宁愿将土地分给农民,但农民得为此交纳高额的货币地租。劳动地租和产品地租为货币地租所代替。在土地肥沃的黑土地带,地主的土地能获得较高的收成,农民很少有机会通过手工劳动去获得高额的货币收入,因而也就不能负担高额的货币地租,只有在这种黑土地带,地主才认为由服徭役的农民替他耕种大部分土地是更为有利的。<sup>②</sup>

---

① 关于在俄国农业中再次看到的三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形式——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可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册第323—348页(中文译文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2—906页。——编者注)。

② 马斯洛夫《俄国土地问题》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5—9页。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货币地租是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的形式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形式”<sup>①</sup>。这种形式使封建的、建立在农民人身不自由基础上的农业经济和逐渐渗入的货币经济相适应;但是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同封建的农业经济制度根本不相容了。随着劳动地租和产品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而引起的对农奴剥削形式的变化,对整个农奴制的反抗也增强了。农民的反叛越来越频繁。工业资本家越来越抱怨: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使工业无产阶级不能得到发展,在黑土地带继续保持徭役经济使具有购买能力的国内市场不能得到发展。正在发展中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农奴制是俄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地主阶级本身对于“解放”农奴的反对也越来越微弱。因为对于徭役经济来说,农奴制是不可缺少的,而一旦徭役经济为地租经济所代替,农奴制就不需要了。既然农民交给地主的已经只是一种货币地租,那么农奴制的封建权利关系就可以为一种纯粹的契约关系,即一种按其形式来说是资产阶级的租佃关系所代替。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俄国出现的强大骚动的压力下,沙皇制度不得不第一次屈服。通过1861年2月19日的法令,农奴制被废除了。

这个法令既然取消了地主对农民的人身统治,它也必须调整土地的所有制关系。法令从根本上规定:全部土地归地主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但法令规定地主有义务将土地分给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耕种。但是,农民必须为这些交给他们长期使用的土地向地主交付一种赎地费,即土地的赎金。农民摆脱了徭役,但是,向地主缴纳的赎地费代替了徭役。旧的代役租以这种赎地费的形式保存下来。因此法令只是使得由劳动地租变为货币地租的过程普遍化。在这以前,在俄国的少数地区,这一过程已经在没有法律强制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法令并没有取消占有剩余价值的封建形式,它只是迫使它普遍地过渡到它的最后的、与货币经济相适应的形式。

---

<sup>①</sup>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1页。——编者注

农民固然也可以在地主同意下获得土地归自己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向地主赎买取得地租的权利;国家向地主支付的资金,农民以后必须在49年内偿还国家并付年利6%的息金。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地主从国家那里得到补偿,农民向国家偿还赎金并付息金的情况下,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完全解除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代役租也没有消失,它只是采取每年向国家付息和偿还一部分赎金的形式。而整个行动过程只许可在地主的同意下进行!农民只有在取得地主同意的地方,而且只有在49年以后,才能获得对分给他们的土地的自由的、没有负担的所有权!

地主必须分给农民多少土地?法令规定了分给农民的份地的最低额和最高额。在通常情况下,农民应该得到他在农奴制废除前实际上使用的土地数量。如果农民的份地低于法令规定的最低额,应该按最低额给农民补足。如果农民的份地高于法令规定的最高额,农民只能得到最高额,多余部分由地主收回。最高额和最低额在俄国各个地区规定得不一样。这种规定是按地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在森林地区,地主在过去就不怎么重视土地而重视高额的货币地租,最高额规定得相对地高一些。相反地,在黑土地带,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粮食的输出成为可能,肥沃的土地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最高额就规定得低于农奴制废除前农民实际上使用的份地数量。因此,在这里,改革使地主有权从农民手里夺走他们世代代耕种和使用的一部分土地。在黑土地带,农民土地的24%被地主夺走。“解放农奴”变成了对农民土地的残酷掠夺。直到现在,黑土地带的农民仍然记忆犹新:他们的广阔的农民土地在60年前被地主夺走了。

这种分配土地的结果是农民得到的土地极少。整个国家平均计算,国家农民获得6.7俄亩<sup>①</sup>,皇族农民获得4.9俄亩,地主农民<sup>②</sup>只获

---

① 1俄亩等于1.09公顷。——编者注

② 在农奴制的沙皇俄国,农奴按其依附对象主要分三类。在贵族土地、修道院、教会土地上的农奴称地主农民(亦称私有农奴),在国家土地上的农奴称国家农民,在沙皇皇族土地上的农奴称皇族农民。——编者注

得 3.2 俄亩土地。在黑土地带,分配给地主农民的土地平均只有 2.2 俄亩,在个别省分配得更少,在波多尔斯科省为 1.9 俄亩,在波尔塔瓦省和基辅省甚至只有 1.2 俄亩。在俄国,一个农户要维持生存,至少需要 5 俄亩以上的土地,在广种薄收的地区几乎不能少于 10 俄亩的土地。但在欧俄地区的 50 个省当中,只有 18 个省的农民平均得到 5 俄亩以上的土地。15 个省的农民得到 4—5 俄亩土地,12 个省的农民得到 3—4 俄亩,4 个省的农民得到的土地少于 3 俄亩。因此,农民得到的土地远远少于土地的收成能够养活他们的数量。这是同沙皇政府的意图相适应的。在解放农奴的时期,农村还没有一个自由的雇佣工人阶级。地主要想不顾这一情况而维持他们的经济,就必须强迫农民在废除农奴制以后仍旧去耕种地主的土地。这一点是通过给农民分配少得可怜的份地达到的,因为农民的土地不够养活他们自己,他们就被迫作为雇工或佃农去耕种地主的土地。因此改革一开始就形成这样的局面:虽然废除了农民在法律上的不自由,农民在经济上的不自由和他们在地主土地上服徭役的义务依然保留着。

农民为交给他们长久使用的土地交纳赎地费的规定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赎地费规定得高于土地的纯收入,这样农民就不能从他们土地的经营中偿付欠下的赎地费,因而被迫到地主的土地上去服工役,以偿还赎地费。因此,对农民来说,占有土地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权利,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农民“为土地而哭泣”,他们拒绝在这样沉重的条件下接受土地。这就为新的残酷的掠夺土地提供了机会。因为按照改革法令,地主和农民可以互相达成协议,地主把法律规定的最低额份地的 1/4 送给农民,因而农民在不必支付赎地费的情况下无偿地得到这部分土地,但农民却因此放弃了对土地的一切进一步的要求。因为赎地费规定得这样高,以致很多农民宁愿无偿地接受这种“乞丐份地”,而不接受多好几倍的、有义务偿付赎地费的份地。因此,很多农民放弃了他们世代耕种的 3/4 的土地,他们只保留了“乞丐份地”这个没有负担的财产,而他们的 3/4 的土地变成了地主的土地! 这些乞丐份

地的面积为 0.9—1.1 俄亩——也就是说,最多只够一个农户维持生活所需的 1/5。

但是,在农民对乞丐份地不满足,承担了偿付赎地费的义务而接受法令规定归他们所有的份地的地方,赎地费的数额使农村的占有关系具有了完全独特的形式。土地所负担的国税和赎地费在彼得堡省共占土地收入的 128%—150%,在莫斯科省占 205%,在斯摩棱斯克省占 220%,在特维尔省占 252%,在弗拉基米尔省占 276%。<sup>①</sup>

因此,由于土地承担的赎地费比土地的收益高,农民不可能将土地卖给别人,如果农民要把土地转让给某人,他就得向这个人支付一笔赔偿费,因为这个人使他摆脱了租税过重的土地。如果农民想离乡背井,他就不得不“赎买”自己。在农奴制废除以后,农民继续通过这种形式被封建的绳索束缚在土地上。

俄国社会的基础是地主剥削农民。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这种剥削是以农奴制为前提的;地主需要农奴制,以便能够强迫农民交代役租和股徭役。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的剥削就有可能披上别的法律形式的外衣。农奴制可以消失,但封建的剩余价值占有并不因此而消失。代替代役租的是农民必须向地主缴纳的赎金;代替徭役义务的是强迫农民在地主的土地上服工役,以抵偿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经营土地来偿还的赎地费。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名目改变了,它的经济内容并没有改变。但是法律名目的这种改变使地主有机会将黑土地带 1/4 的农民土地据为己有,而黑土地带的土地价值由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已大大提高了。因此,沙皇 1861 年的“解放农奴”并不意味着封建剥削关系的废除,而只是这种剥削关系的法律形式的改变。构成 1861 年到 1917 年俄国社会基础的土地制度始终还是建立在封建的基础之上的,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伟大的俄国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sup>①</sup> 见《政治科学中型辞典》中西姆科维奇写的《俄国的农奴解放》这一条目。

## 2. 土地公社

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并没有使俄国农民阶级原始的自治机构——农民公社即村社解体，而是将这种机构变成了他们的剥削工具。国家和地主使整个农民公社即村社对它所有成员的各种赋税和租税义务承担责任，从而保证国家得到赋税，保证地主得到代役租。但是既然村社必须对它所有成员的赋税和租税承担责任，那么它也必须支配提供赋税和租税的土地。因此不是单个的农民，而是农民公社即村社对分配给农民使用的土地有支配权；村社把农民土地及其所承担的租税分摊到各个农民家庭，村社常常调整分配的情况。所以农民的土地公社，农民公社对农民土地的支配权是俄国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封建农业的基础之一。

农奴制的废除很少使这种状况起变化。即使在将来，村社不仅要担保向国家交纳赋税，而且要担保农民向地主交纳他所承担的赎金。因此，即使在将来，村社仍然必须支配承担赋税和赎金的农民土地。因此，按照 1861 年法令分配的农民土地并不属于单个的农民，而是属于村社；村社仍然要调整各个农民家庭对土地的使用。

村社按照农民家庭“丁口”的数目，按照“人口”或劳动力的数目，把农民土地分给各个家庭。但各个家庭通过这种分配并没有获得永久的固定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一再进行重新分配——通常是每 12 年到 18 年分配一次，人口增长超过平均数的家庭的份地就会增加，而其他一些家庭的份地就得减少。所以，俄国的农奴解放并没有确定私人土地所有权，并没有确定永久固定的私人土地使用权，而是保留了农民公社对全部农民土地的支配权，并按照人人都有一份份地的同等权利的原则，定期给农民重新分配土地。保留这些，是为了使全体农民共同负责偿还地主所要求的赎金。共产主义的土地公社在为保证封建的货币地租效劳。

在存在土地私有制的地方，农民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他的一个儿子



继承,农民的其他孩子就得让路,他们成了无产者,他们不得不在农业或者工业中作为雇佣工人谋生。随着人口的增长,从农村中就分化出一个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俄国农村的情况则不同。在村社出生的每个孩子一出生后就有权获得一份份地。一个家庭的孩子越多,这个家庭在下次重新分配土地时得到的土地也就越多。在这里,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导致从农村中分化出没有土地的无产者,并没有导致农民阶级的后代分成有地的农民和无地的无产者,而只是导致这样的情况:村社中每一个“丁口”所分配的份地必将随着农村中“丁口”数目的增加而减少。因此,人们将土地公社誉为防止产生无产阶级的壁垒;事实上,它只是使农民本身无产阶级化了。

如果说,在“解放农奴”时农民分配到的土地就已经很不足,那么,由于村社人口的增加,分给每一个“丁口”的份地必然十年十年地减少。从1861年到1905年,农民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由4500万增加到将近一亿。伴随着这种人口的增加而来的是各个农民家庭的份地的减少。全国平均计算,在1861年一个农户的份地有4.8俄亩,在1880年还有3.5俄亩,在1900年就只有2.6俄亩多一点。<sup>①</sup>显然,这样少得可怜的份地是不够养活农民家庭的。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同等权利只不过意味着普遍的饥饿、普遍的贫困、没有文化和野蛮。

但是土地公社不仅导致个人的份地的不断减少,它同时也阻碍了农民通过过渡到更合理更集约的经营来增加他们份地的收益。

农民公社的所有成员对每个成员的赋税和租税负有连带责任,使农民完全丧失了劳动热情:比较勤劳的人每天得为不勤劳的、懒惰的、酗酒的邻居承担交纳赋税和赎地费的责任。土地的定期重新分配使得较大规模的农田改良(这种改良的费用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才能得到补偿)不可能进行。谁愿意在下次重新分配时可能被拿走的土地上花费大量资金来经营农田的排灌设备呢?此外,农民也无法自己筹集改良

---

<sup>①</sup> 普雷赫尔《俄国的土地改革》1914年耶拿版第46页。

农田的资金；因为份地不是农民的财产，农民也不能把它典质，不能把它当作抵押品。既然农民得不到抵押贷款，他就得靠私人贷款。如果农民需要应急贷款，那就只好听凭最无耻的高利贷者去摆布。农民根本得不到改良农田的贷款。

在重新分配土地时，农民过分细致地关心使农民公社的每个成员得到同样大小、同样土质的土地。和过去古老的德意志马尔克公社一模一样，农民公社把农民的土地分成同样土质的若干“地块”，然后从每一个地块中分给每一个农户一块。因此每一份份地都由数目较多的杂七杂八的零星小块土地组成，因此每个户主都要服从强制的耕作制；公社给农民规定了农田的耕作方式，特别是规定了轮作制。休耕地可以被公社全体成员当作牧草地使用，因此村社强迫所有的农民保持传统的三圃制。过渡到更高级更集约的轮作制是不容许的。

农民人口增长得越多，份地因而减少得越多，农民也就越要被迫缩小牧草地而扩大耕地，减少种植饲料而扩大种植粮食作物，只求保证他们每天的口粮就行了。随着牧草地和饲料作物的缩减，牲畜的数量也就必然减少。在 1870 年，在 1000 俄亩的农民土地上有 664 头耕畜，在 1900 年就只有 602 头耕畜。牲畜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土地施肥状况的恶化，意味着土地收益的减少和经常发生歉收。

由于这一切原因，农民农业的每公顷的产量非常低。在 1901 年至 1905 年之间，俄国每公顷黑麦产量平均为 740 公斤，德国为 1560 公斤，英国为 1700 公斤，比利时为 2130 公斤。如果说，由于土地公社遵守村社中的所有后代都有使用土地的同等权利的原则，因而土地被分割成一些很小的份地，那么，另一方面，土地公社由于经营不合理又使这些份地只能获得和它们的面积也不相称的非常低的收成。在土地公社所实行的这种粗放经营中，农民不可能在变得极为狭小的份地上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在 1900 年，按照官方统计，为了收获份地上的庄稼，需要劳动力 1100 万，而实际上当时可以支配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有 4400 万。在整个西欧和中欧的农业长期缺乏劳动力的时期，俄国的农村没有工

作的劳动力却有过剩。非常狭小的、用原始方式经营的土地自然不能养活这些过剩的劳动力。在 90 年代,份地的谷物收成平均比农民生活最低需要低 17%,饲料收成平均比农民饲养牲畜最低需要低 41%。<sup>①</sup>

由于农民在份地上不能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也不能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牲畜,因而农民被迫通过耕种地主的土地去谋生。这样一来,土地公社最终所起的作用同 1861 年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和规定高额赎金完全一样,虽然农奴制废除了,土地公社仍强迫农民继续为地主耕种土地,它还抱有这样的目的:向地主阶级提供廉价的、无自卫能力的剥削对象,把农民过去的徭役义务以改变了的形式维持下去。农业共产主义在为封建主义效劳。

伟大的、从斯拉夫浪漫主义中发展起来的俄国民粹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流派(这一流派的最后的后裔就是现在的社会革命党)把村社看作一种社会主义的机构,并把希望建立在村社的存在之上,认为俄国能够在共产主义土地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发展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不必经过资本主义,不必经过资产阶级所有制方式的时期。事实上,土地公社是为了保证农民交纳封建的货币地租和在地主土地上服封建徭役而保留下来的俄国农业中封建组织的残余。而人口越是增长,这种封建主义的残余就越来越成为俄国农业生产力的桎梏,成为俄国经济上贫困和文化上落后的原因之一。这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最终必定为人口的增长所突破。俄国革命的历史消灭了民粹派的种种幻想,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言: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sup>②</sup>

---

① 普雷赫尔《俄国的土地改革》1914 年耶拿版,第 47 页。

②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94 年柏林版,第 64 页以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00 页以下——编者注)。

### 3. 俄国农业的封建性质

在革命前的俄国,最大的地主是国家。按照 1905 年的土地占有统计,在欧俄部分,国家占有的土地为 15470 万俄亩。当然国家的一大部分土地是在荒无人烟的高纬度的北部地区。除了这种国家占有,还有大量的私人大地产。占有 500 俄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有 27833 个。总计有 6200 万俄亩土地属于这些大地主,因而这些大地主平均每人所占的土地不少于 2227 俄亩。

国家的大地产占有和私人的大地产占有如此骇人听闻,农民占有的土地却只是一些分散的零星小块。农民占有的绝大部分土地是土地公社内的份地。1230 万农户总共有 13690 万俄亩份地。此外还有农民私人所有的土地;但它的面积是微不足道的。每人土地少于 50 俄亩的 618983 个土地所有者总共有 650 万俄亩土地。

数量极大的大地产占有和农民的土地占有就这样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亿万农民所有的全部土地只占三万个大地主私人占有的土地的两倍。中等地产相对地说是无足轻重的。占有 50 到 500 俄亩土地的这类所有者有 106065 人,他们占有的土地总共只有 1730 万俄亩。大地产经济是俄国的特征。

直到 1861 年以前,大地产的经营是建立在农奴的劳动义务上的。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尽管废除了农奴制,1861 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要保留农民耕种地主土地的义务。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目的是如何达到的。

土地改革分给农民的土地已经少到农民靠自己的土地收入无法糊口的程度。因此农民就要被迫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需要租种这么多的土地,以便使他们的份地同租种的地主土地加在一起刚刚够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牲畜,并使他们能够用出售土地收获物的所得来向国家交税、向地主偿付份地的赎金。但是通常情况下农民出售的土地收获物不可能多到使他们还能偿付租种地主土地的租金。由于他们不能

用现金偿付租金,他们就有义务在地主土地上“服工役”。因此,农民一方面要耕种自己的份地和租种的地主土地,以便养活自己和偿付赋税和赎金;另一方面,农民又要耕种地主的土地,以此来抵偿租种的地主土地的租金。

在农奴制废除以前,农民一方面耕种农民土地,另一方面又在地主的土地上服徭役。在“解放农奴”的时候,农民的一部分土地被夺走了。因为剩下的部分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农民就不得不向地主租借地主刚从农民那里夺去的土地。在法律上他们现在不再有义务在地主土地上服徭役,但事实上他们必须跟从前一样耕种地主的土地。过去农民在农奴制的基础上被迫在地主土地上劳动,现在,为了偿付在废除农奴制时从他们那里夺走的土地的租金又得在地主土地上劳动。从根本上说,除了法律名目外,通过改革什么也没有改变:过去让农奴使用的一部分土地,现在以租佃的形式出现,过去农奴必须在地主土地上服徭役,现在以为偿付租金而劳动的形式出现。

在农奴制时代,农奴曾经使用过地主的森林和牧草地。农奴制废除后他们失去了任何使用权。但事实上,他们不能缺少地主森林里的木柴、建筑用材和其他木料,他们也不能不使用地主的牧草地。地主让农民继续保留这种使用权,但为此农民又得承担在地主的土地上“服工役”的义务。在这里,法律形式虽然改变了,经济内容依然没有改变:农奴制的关系一方面产生了农民在地主土地上服徭役的义务,另一方面产生了农民对地主的牧草地和森林的使用权;农奴制废除后,通过“自由的”契约保留了同样的经济关系:农民得到保证继续对森林和牧草地有使用权,但为此农民承担了在地主的土地上服徭役的义务。

支配农奴劳动力的农奴主不让农奴饿死,正如他不让自己的耕畜饿死一样。因此,在农奴制时代,当农奴由于歉收或自然灾害陷入困境时,农奴主救济过农民。农奴制的废除破坏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人身关系。如果农民在歉收后的冬天和春天没有粮食养家、没有饲料喂牲口,那么在农奴制废除以后,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地主借粮食和饲料,并

承担义务为偿还这种实物借贷夏天在地主土地上“服工役”。如果说,在1861年前,地主不言而喻地为了他本身的利益用困难救济去补偿农民承担的徭役,那么在1861年以后,农民就必须以契约方式承担徭役去换取困难救济了。徭役的法律名目改变了,徭役本身依然存在。

因此,农奴制废除后,地主土地的经营方式是这样的:一部分土地租给农民,另一部分土地由农民耕种,农民在这部分土地上“服工役”以偿付租地的租金、森林和牧草地的使用费以及地主的困难借贷。这两种经营形式基本上还带有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的特征。

农民必须租借地主的土地,因为他靠份地的收入不能维持生活。急需租地的农民的竞争促使地租上涨。由于农民不是支付地租,而是“服工役”,所以地租的高低不受土地收益,不受土地产物的价格和劳动资料的价格制约,而受农村中现存的、在份地上不能得到利用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制约。因此,地主从出租土地中得到的地租,并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地租,并不是农业利润超过由价格和生产费用决定的平均利润的余额,而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劳动地租,它的高低是由可供利用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决定的。

同样,在地主土地上“服工役”来偿还货币债务的制度还带有资本主义以前的特征。资本主义工资关系的特征是,资本家提供劳动资料,工人提供劳动力。“工役”制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1861年以后的“工役”农民同1861年以前的徭役农民完全一样,都必须用他自己的牲畜和农具来耕种地主的土地。这种劳动的价格和自由雇佣劳动的劳动市场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由于农民通常不能在几个地主之间进行选择,由于农民不能逃避必须通过“服工役”偿债的义务,他不得不满足于以低于自由雇佣工人的价格来提供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工役”农民的日工资通常比自由工人的日工资要低,虽然农民用的是自己的工具,而自由工人用的是地主的工具。<sup>①</sup>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60—61页。——编者注

这种经营制度同资本主义经营土地的方法处在竞争之中,地主可以作这样的选择:或者是把自己的土地一部分租给农民,一部分让“工役”农民来耕种,或者是把土地租给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或用自己的农具让自由雇佣工人来耕种。在黑土地带,过剩的农民人口在份地上既不能养活自己和他们的牲畜,也不能利用自己劳动力。他们把农民交纳的地租提得这样高,把“工役”农民得到的报酬又压得这样低,以致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的经营方法压倒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因此,在黑土地带“工役制”在 20 世纪初还是占主要地位的经营方式。

尽管实行这种经营方法获得的利润率要比利用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获得的利润率更大,但在这种经营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毕竟要比资本主义农业低得多。农民在耕种土地时使用的种子和工具都很糟,他们耕种地主土地比耕种自己的土地还要差。租给农民耕种的地主土地每俄亩平均产量为 45 普特<sup>①</sup>;由“工役”农民耕种的土地每俄亩为 50 普特;而农民份地每俄亩的产量则为 54 普特,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地主土地每俄亩的产量则为 66 普特。所以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土地收益比农民份地要高 22%,而实行资本主义以前的经营方法,地主土地的收益比农民份地要低 7%—17%。如果说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比农民经济在技术上优越,那么墨守资本主义以前的劳动制度的大地产部分地甚至比原始的俄国农民经济还要落后。<sup>②</sup>正如土地公社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农民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在地主土地上封建经营方法的继续存在使得在大地产上提高生产率和农业的集约程度成为不可能。这两种原因加在一起造成了俄国农业的土地产量极为低下,造成了俄国的贫穷落后状态。

在中欧,专制制度也已经废除了农奴制。但专制制度只是废除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农民交纳租税和服徭役的义务依然存在。这种义务通过 1848 年的革命才被取消。俄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那里,专制制

---

① 1 普特等于 16.4 公斤。——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2 版,第 62—63 页。——编者注

度虽然也已经废除了农奴制,但是农民交代役租和服徭役的义务依然保留下来,尽管采取的是一种隐蔽的形式。代役租在赎金中、徭役在“工役制度”中继续保存着。因而即使在这里,也要通过革命把农民从徭役和赋税中解放出来。这种革命必将来,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必将最终冲破土地公社和徭役经济的束缚。在俄国,20世纪的这种革命还得解决法国1789年和1793年革命、中欧1848年革命早已解决的任务,这就是:把农民从徭役和赋税的义务中解放出来,摧毁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用构成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基础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代替封建的所有制和劳动制度。这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古典任务,这个任务还保留给俄国20世纪的革命。

#### 4. 工业化和贫困化

1861年的“农奴解放”夺走了农民使用的一部分土地,并使农民担负了沉重的无法忍受的高额赎金。在俄国的一些地方,农民们起来反抗这种“解放事业”。实施改革引起了多达1100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的农民受到血腥镇压。起义的失败把农民吓住了。农村中重新恢复了平静。

但是农民们在痛苦中呻吟。为了能够偿付高额的赎金和赋税,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一部分收获物卖掉;剩余的东西不足以使他们糊口。当粮食出口增加的时候,在农村中却到处发生饥荒。农民们常常根本无法偿付赎金和赋税,负债累累。农村动荡不安。1878年俄土战争重新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骚动。这一次沙皇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1881年的改革法减轻了农民负担的赎地费。此外,按照1861年法令农民赎买土地须得地主的同意,现在则宣布为必须赎买。农民土地成为农民公社的财产,地主从国家得到赔偿。农民不必向地主交纳赎地费,而是在49年内向国家每年偿付一部分赎金和息金,由于改革在1883年生效,因而需要偿付到1932年。

1881年的改革降低了赎金,从而缓和了农民的情绪。80年代和90



年代前半期农产品价格的低廉也使农民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因为谷物价格低廉,地主乐意把土地相对便宜地租给或卖给农民。农民可以通过租佃或购买迅速扩大他们的土地占有。因此农村出现了平静。在以后 15 年内农民阶级的平静是亚历山大三世反动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把希望寄托于农民运动的“民意党”革命运动被完全镇压下去了;对农民阶级感到失望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产业工人阶级身上(1883 年的“劳动解放社”)。

但是在 1881 年改革以后表面上平静的 20 年内,一个后果严重的分化过程在农村里实现了。农民阶级中少数人,通过租种和购买地主的土地大大地扩大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并把他们经营的重点从少得可怜的份地转到他们租种和购买的地主土地上,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经济。一个富裕的富农阶级,“农村资产阶级”开始发展起来了。另一方面,从农村中开始分化出一个无产阶级。随着人口的增长,份地越来越小。那些不能租种和购买地主土地的农民在份地上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他们已经没有农具去经营份地。他们靠份地的收入已经不能养活自己。他们把自己的份地租给邻居,而且他们常常得不到租金,反而必须因租种者接受租税过重的份地而向租种者付出一笔款项;这些农民本身就成了雇佣工人,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或富农,或者流入城市。他们作为“农业工人”从中央地区跑到边疆地区。他们作为工业无产阶级集中到城市里。

如果说俄国在 1861 年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那么农奴制废除后就开始了工业化过程。铁路的修筑普及了货币经济,从而扩大了工业的国内市场。从 70 年代末起沙皇制度过渡到保护关税制度。年青的俄国工业在反对外国的竞争方面越来越有效地受到了保护。国家对工业的巨大需要,特别是军队和铁道管理的需要通过大型的、迅速增长的工业企业而得到满足。高额的赋税迫使数以万计的小农放弃他们的份地并在工业中寻找工作,同时向国家提供了大量购买工业产品的资金。在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加速的工业发展,在 90 年代进入了极为迅猛的

发展过程。而这种工业的发展最终也改变了农民阶级的生存条件。

在大部分森林地区,农民仍旧把手工业、家庭劳动和家庭手工业当作一种不可缺少的副业。工业的发展剥夺了他们这种副业,因为手工业抵挡不住工厂的竞争。农民一直作为小农经济补充收入的赚钱活动被剥夺后,他就陷入了困境,他已经不能交纳赋税和赎金了,他现在单靠土地的收入为生,但土地的收入已经不能保证他的生存了。

在欧俄南部的广阔地区,农业很快地工业化了。制糖业和制酒业加速了农业向纯粹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过渡。农民的租佃和“工役制”再也经不住资本主义农业的竞争。地主让自由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来经营土地,或者把土地交给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而不租给农民。农民已经租不到土地了。他们仅局限于利用自己的份地,但份地不可能养活他们自己了。

这个过程最终也发展到黑土地带。从 90 年代中期起,世界市场上谷物价格上涨。谷物价格的提高使得更加集约的土地经营可能实现。但集约经济促进了农民的租佃向资本主义大经济的过渡。黑土地带的农民要是还想得到租地的话,就必须向地主交纳越来越高的租金。

从废除农奴制直到 20 世纪初,由于购买地主土地,农民的土地从 11600 万俄亩扩大到 14000 万俄亩,即扩大了约 1/5。但在同一时期内,农民的人口由 4500 万增加为 8500 万,即增长了约 90%。农民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农民的土地却只增加了 1/5。<sup>①</sup> 这种发展在农民能够租种到地主的土地以前还可以过得去。一旦由于谷物价格上涨,使资本主义大经济扩大而排挤了农民的租佃,一旦农民因此根本不再能租种到地主的土地或者只能以很高的、迅速上涨的租金租种地主的土地,这种发展必定导致严重的危机。

从 20 世纪初以来,农民阶级的状况变得无法忍受。从 1901 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农民起义,这些起义由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开始,

---

<sup>①</sup> 普雷赫尔《俄国的土地改革》1914 年耶拿版,第 54 页。

时而在这个省,时而在那个省爆发,一再受到血腥镇压,一直到发展为1905年的革命。但这些农民起义与1878年和1881年的起义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过去那些起义是反对过重的赎金。而现在,在谷物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以每年向国家支付息金和一部分赎金来代替交纳赎金,这已经不再是沉重的负担了;土地的收益现在已远远超过这些费用了。现在,农民起义是反对地主拒绝把土地租给农民,或是反对地主向农民索取高额租金。农民冲击的是把农民的经济限制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的地主土地。因而现在不再像1881年那样,仅仅通过减少赎地费就能使农民满足,而只有通过土地所有制关系本身的革命才能使他们满足。<sup>①</sup>

俄国农民不是私有者。农民的土地是公有财产,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分给各个农民,而且只是分给他们使用。因此俄国农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是“上帝的”。一旦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再能糊口的时候,这种想法就开始变为反对地主的私有财产。在农民群众中滋长着这样的想法:地主的土地也是“上帝的”,对这些土地,人人都有同等的使用权。因此,农民很容易接受反对地主私有财产的社会主义宣传。

但在另一方面,农民越来越反对村社的统治,反对土地公社,反对定期重新分配农民的土地。土地公社使那些富裕农民不可能把他们的经营集约化。每一次重新分配土地时也要缩减中农的份地。他们在每一次重新分配中不得不把一些地块让给农村无产者,由于农村无产者没有耕畜和工具,根本不可能自己耕种,因此他们又得把土地从无产者那里重新租回来!当农民必须把土地转让给那些长期离开农村流入城市从事工业劳动,但仍保留在家乡取得“份地”的权利的村社成员时,这种例行的重新分配就显得更加没有意义了。人口越多,农民的土地相应地越狭小,农民反对重新分配的起义也就越激烈。土地公社陷入崩

---

<sup>①</sup> 哥尔恩《1905年以前的农民运动》,载于马尔托夫、马斯洛夫、波特列索夫编辑的文集《俄国的社会运动》第1卷,1909年彼得堡版。

溃状态,重新分配的次数越来越少,在很多村社,农民决定把份地“一劳永逸”分配给各个农户。

农民一方面非常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宣布为人民的财产,另一方面却力求解散土地公社,实行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反对现存的地主私有制而主张农业共产主义,又反对现存的村社农业共产主义而主张私有制。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把地主土地社会化的宣传;但在土地社会化的词句背后却隐藏着农民没收地主土地以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民私有制的意图。这样,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可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成为用暴力建立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工具。

然而,在本世纪头五年农民骚动的时期,这种思想在农村中才刚刚开始萌芽。当时农民阶级还处在极低的文化水平,在1898年俄国士兵中2/3是文盲。俄国农民对于各种政治概念仍然都是陌生的,在沙皇的压迫下,在农村没有任何报纸,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党派,也没有任何政治鼓动。农民起来反对个别的地主和个别的官吏,农民还没有进行反对剥削制度和统治制度的阶级斗争。农民只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力,而不能进行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如果农民阶级要摧毁封建的所有制,那他们就需要有一个给农民运动发信号,定目标,从而将地方性暴动统一并提高为全国性革命的领袖。对于俄国的农民阶级来说,工业无产阶级就成了这样的领袖。

从90年代以来就促使农民状况明显恶化因而也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这一发展过程,同样也促进了工业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和自觉性与力量的增强。谷物价格的上涨使农民租种的土地越来越狭小,使租金越来越增高,也使俄国的地主、商人和俄罗斯国家靠损害进口谷物的国家的利益而发财致富,谷物价格的上涨扩大了俄国工业的国内市场并加速了俄国工业的发展。农村人民的贫穷加速了农村人口的逃亡,加速了使农村无产者变为产业工人。工业无产阶级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如果说90年代的工人运动还只是停留在要求增加工

资的斗争上,那么从 1901 年以后它就具有政治的性质。只是由于有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发展,俄国农村人民庞大的、在痛苦中呻吟的躯体才有了一个能支配这个庞大躯体的头脑。而只有掌握亿万农民群众自发的、粗野的、未开化的但是巨大的力量,最终才能使俄国工人运动具有把整个俄国封建资本主义社会打得粉碎的威力。

## 第二章 俄国革命的社会内容

### 5. 三次革命

日俄战争发出了信号。在满洲的失败引起了自由主义的贵族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当 1905 年无产阶级走上街头的时候,运动发展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大罢工也唤醒了农民。农民暴动席卷全国。有两千多个地主田庄被烧毁。财主被赶走,农场被抢劫,森林受到任意砍伐。农民拒绝在地主的土地上劳动,拒绝交纳租金和赋税。但农民运动还只具有地区的性质。在农村叛乱的农民,却穿上制服,在城市里镇压无产阶级的暴动,在邻省镇压农民起义。革命失败了。但它并不因此是毫无成果的。

1905 年的风暴向整个俄国社会表明俄国的土地制度已无法维持下去。一切党派都不得不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牺牲地主土地来扩大农民的土地占有。这些党派用它们的土地纲领在杜马的选举中争取农民选民。农民并不想知道这些党派所说的“国有化”、“地方公有化”,有偿的或者无偿的“剥夺”是什么意思。对所有的说法农民只有一种解释:把大地产分给农民!从农民的贫困中自发地本能地产生出来的要求形成成为政治纲领。

反革命本身也不得不设法解决土地问题。反革命不能通过剥夺地主的土地来解决土地问题。它企图通过分化农民阶级本身来解决这一问题。它想创造一个保守的农民等级;应该给予农民对自己土地的私有权,应该使一部分农民阶级得到充裕的土地,以便使他们变得像西欧

和中欧的农民那样保守,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支柱。这就是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所提出的目标。

按照 1906 年和 1910 年的改革法令,每个农民可以退出土地公社,并要求把他的份地变为他的私有财产。结果却出现了土地的合并:退出村社的农民的份地是由很多小块土地组成的,而他退出时却应得到连成一片的、整块的土地。这块土地完全从土地公社中分出来;它不再服从强制的耕作制,村社中其他成员对分出去的土地的放牧权也取消了。

通过反革命立法而开始的土地改革是竭尽全力推行的。从 1907 年到 1912 年的六年中,有 827305 家农户将 8400 万俄亩以上的土地面积变成和合并为私有财产。在土地公社的所有农户中,从村社中分出来的有 15%。<sup>①</sup> 退出村社的农民主要是两种类型:一方面是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他们不再愿意听任村社的强制的耕作制妨碍他们实行更加集约的经济,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村社内部下一次重新分配土地时要缩减自己的份地而分给村社其他成员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农村的无产者也将他们的份地从村社分出来,那些因本身缺乏农具而无法耕种土地的人、农村中的寡妇孤儿、在家乡还保留一份份地的产业工人和已经迁移到西伯利亚去的人,他们将份地从村社分出来,好把它出卖。他们自然是把土地卖给农村里富有的农民。如果说,土地改革将较富有的农民从村社中解放出来并在牺牲农村无产者利益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的地产,那么,在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又加倍恶化了农民广大群众状况。一方面,恰恰是人口多的农民家庭获得土地的权利受到了损害,因为孩子少的农民家庭为了逃避将来重新分配他们的份地退出了村社。另一方面,农民群众饲养牲畜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在从土地公社分出去的那些土地上传统的放牧权也被取消了。同时,农民群众还由于土地改革而处于经常的不安定之中。因为经常有农民想退出

---

① 普雷赫赫《俄国的土地改革》1914 年耶拿版第 247、348 页。

土地公社，他的零星的份地就得合并，而留在村社中的农民的份地又得重新划分。同时，每次分地自然都会在农民本身之间，首先是在村社和地政主管机关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地政主管机关受到农民的指责，说它袒护退社的人，说分给这些人的土地太多或者太好。

如果历史给予反革命土地改革以时间的话，这一改革可能会达到它的目的，在俄国农村造成一个保守的富农阶级。但是反革命的土地改革并没有赢得这样的时间。在它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战争就爆发了，战争结束了改革的工作。但如果说在战争开始时巨大的土改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的话，那么可以说行动本身却在农民阶级中引起了不安、不满和骚动。战争遇到的是这样的农民阶级：它因刚开始的土地关系的变革而惶惶不安，它对变革的最初一些成果愤愤不满，它对于传统的土地所有制的信仰先是被革命的口号，后是被反革命的实践完全动摇了。战争将这些革命的农民群众从与世隔绝的农村里赶了出来，把他们组成连和营，并把武器硬塞到他们手里。这样，战争建立了穿军装的农民大军，这些农民必然要破坏俄国农民阶级无法容忍的土地制度，把地主土地夺过来交给农民，并摧毁俄国封建主义的残余。

1917年2月，当士兵们——穿军装的农民站在无产者一边的时候，彼得堡工人的反饥饿的暴动发展成了革命。这个革命从一开始就被农民士兵思想中仅有的两个要求所支配：士兵要求和平，农民要求地主的土地。临时政府不得不拖延满足这些要求。由于受到德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束缚，它不可能签订和约。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临时政府就不能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因为在农村中开始分配地主土地的消息会使前线的军队立即瓦解，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渴望土地的农民坚守在战壕里。农民士兵就这样有半年之久徒然地等待着和平与土地。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等待着，农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农民失望了。他们认为自己受了骗。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布尔什维克答应他们立即实现和平和立即分配土地。1917年10月，当彼得堡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克伦斯基的时候，它把大部分军队

争取过来了,而其他的军队瓦解了,士兵们各自跑回他们的家乡,以免在分配土地时吃亏。俄国无产阶级就这样取得了政权。俄国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建立它对俄国的统治,是因为俄国的农民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行动,只能从无产阶级的手中得到地主的土地。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而且一定在俄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这个革命在这里能够完成西欧和中欧已经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完成的任务:摧毁封建农业制度,在农村建立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 6. 土地革命

1917年10月25日(旧历),彼得堡苏维埃在首都夺取了政权。就在第二天,10月26日(旧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一项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并将地主的土地以及国有土地、教堂地产交给农民的土地委员会支配。土地的使用以后按照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社会化的基本法”<sup>①</sup>加以调整。但这个基本法的内容不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决定的,而是按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决定的,这一派当时同布尔什维克实行联盟,在这一联盟中他们是农民阶级的代言人。

在俄国,革命运动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时期,西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还只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而俄国早自90年代起,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已经成了革命的先锋。因此,社会主义成了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在革命斗争中反对沙皇制度的所有政党都说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都采取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要求,即使它们表达的实际需要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需要,它们想要取得的实际目标也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目标有很大区别。这一点对社会革命党人来说也是如此。社会革命党人作为旧民粹派的继承者,在1905年以前是俄国农民

---

<sup>①</sup> 《法令汇编》1918年3月4日第25号,德文译本载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立法》,布尔什维主义研究总书记处编,1919年柏林版;以及克利班斯基《布尔什维克的立法》,布勒斯劳东欧研究所《资料和研究》第2册1920年莱比锡版。



阶级的思想家,1905年以后他们在农民群众中获得了牢固的立脚点,在1917年的革命过程中他们真的成了革命农民群众的代言人。社会革命党体现了农民争取将地主土地分配给各个农户的革命斗争,也就是说,这种斗争不是为了农业的社会化,而是为了通过牺牲地主阶级的利益来巩固和扩大个体农民的私有经济。但由于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革命政党,他们给争取在农村建立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斗争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他们的土地纲领充满了这样的幻想:在大地产的废墟上通过建立个体的农民经济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没收地主土地以利于农民个体经济应该同取消土地的商品性质,同消除资本对农民的奴役和在农业中禁止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这种空想通过1918年2月19日的“基本法”载入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法令汇编。

基本法规定,“各种土地所有权永远废除”。各种土地所有权,就是说,也包括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全部土地的所有者是全体劳动人民。农民苏维埃和城市苏维埃以全体劳动人民名义支配他们管辖区的土地。凡是没有为成立国营农场即苏维埃自己管理的大经济而保留下来的土地,均归各个农民使用。享有土地使用权的只能是亲自同家属一起耕种土地的人;雇工劳动是禁止的,并可能受到剥夺使用权的处分。分配土地按照消费定额和劳动定额、按照“人口”和“人手”的多少、按照各地区历史上形成的适用于村社内部分配土地的规定来进行。在分配中,首先是将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且要一直进行到使这些农民占有的土地与富裕农民的土地相等,使占有土地的数量上的差别趋于消灭,使所有农户按照“人口”和“人手”的多少分得同等数量的土地。按照这种原则授予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个人的权利。这种使用权不能转让,不能出卖,也不能出租,并且随着使用者死亡而丧失。这些土地交还全体人民,由苏维埃重新分配。

基本法允许个体农民经济的存在。农民经济仍然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农民仍然是商品生产者,他们只是通过买卖商品同社会发生联系。但是基本法企图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达到一种结果,而这种结果是只

有从个体生产过渡到社会生产才能产生的结果,是只有从为市场的个体商品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通过社会和为社会的生产)才能产生的结果。社会革命党人独特的幻想恰恰在于:他们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言人想要扩大和巩固个体农民的生产,而且认为这样可以达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才能达到的结果。在这种幻想的束缚下,他们的基本法陷入了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使基本法就一部分来说根本无法贯彻,就另一部分来说,如果得到贯彻又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

土地的“社会化”,土地所有权转归“全体劳动人民”已经成了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在个体农业经济和生产商品的农民经济的条件下,土地的“社会化”只有通过国家向各个农户征收地租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国家要对各项不动产收取土地税,这种土地税是按照不动产的质量和状况而分等级的。但是向国家偿付地租在基本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苏维埃政权也没有付诸实施的办法。使用权只限于使用者生前有效这一条是停留在纸上的,苏维埃政权虽然颁布了废除继承权的法令<sup>①</sup>,但它并没有打算实行这条法令去反对农民。1918年5月1日的法令明确规定: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条款对农民的财产并不适用,但是如果社会化法令关于不许通过继承来转让土地的条款真的发生了作用,上述规定就毫无意义了。事实上,农民将土地遗留给他们的子女,苏维埃政权也不能阻止农民间彼此交换土地和买卖土地。<sup>②</sup> 因此不管法令如何,土地仍然是一种商品。1893年沙皇的法令已经规定禁止抵押农民的土地;这一法令使农民只能使用私人信贷,听任农民受高利贷者盘剥,并使农田改良和农民经济集约化无法实现。只要苏维埃不能通过在紧急情况下直接给予帮助和直接提供改良农田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

---

<sup>①</sup> 《法令汇编》1918年5月4日第34号,德文译本载于克利班斯基《布尔什维克的立法》,布勒斯劳东欧研究所《资料和研究》第2册1920年莱比锡版,第151页;并参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批法令汇编》1919年彼得堡版。

<sup>②</sup> 加夫龙斯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总结》1919年柏林版第48页。

办法来代替信贷,这个禁令现在也一定会起同样的作用。禁止雇工劳动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已经实行集约经济的地方,并且当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这种禁令就行不通了。因为集约的农业是一种季节性的生产,它不能长年养活在它最需要劳动的几个星期内所利用的那么多的劳动力。生产商品的农业没有雇工劳动就不能存在;让个体的商品生产继续存在,又想取消雇工劳动,这是办不到的。事实上,1918年5月20日关于“贫农”组织的法令规定:即使是利用雇工的农民,对贫农委员会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要他们的经济收入不超过“口粮标准”,即不超过他们自己的需要。<sup>①</sup>如果在5月,利用雇工的农民还算作“贫农”,那么2月份规定的取消雇工劳动就不可能得到贯彻。这样一来,改革的“社会主义”外衣就什么也不存在了。改革的真正内容不是地产的“社会化”,而是把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不是农业的社会化,而是相反,用小农经济的个体劳动来代替大经济中的社会化(自然是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化)劳动。

在土地法令的实际内容和“社会主义”装饰之间存在的矛盾表明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苏维埃共和国土地立法的影响:掺入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革命中的旧民粹主义的因素。但这种影响不是偶然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得社会革命党人能够将他们的土地纲领当作法令来宣布,这一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为农民阶级达到其社会目的开辟了道路。布尔什维克让社会革命党人去决定基本法的内容,这一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只有让农民阶级按照它的需要和意志,甚至按照它的幻想去实现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才能夺取和保持政权。

但是土地法令的历史意义同它的各种规定是完全无关的。它的历史意义倒是仅仅在于:法令一方面使得已经发生的对地主土地的分配在法律上得到了批准,而另一方面是向农民阶级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在至今还没有夺取地主土地的地方,最终也得这样做。对地产的占有是

---

<sup>①</sup> 《法令汇编》1918年6月18日第43号,德文译本载于克利班斯基《布尔什维克的立法》,布勒斯劳东欧研究所《资料和研究》第2册,1920年莱比锡版第29页。

自发地、野蛮地在造成巨大的破坏与荒芜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与农民阶级的文化水平相适应的,农民阶级没有受过教育,大部分还是文盲,他们几十年前才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又由于战争而变得野蛮起来。摆脱了枷锁的群众并不关心土地法令的内容。根据一些条款应该首先照顾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应该消除农民阶级中间土地占有的差别,但是这些条款没有起作用。正是那些富农和中农把大部分的土地据为己有。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农村中是比较积极的、居于领导地位的阶层<sup>①</sup>,而且还因为农村委员会通常分给每个农民的只是他能够耕种得了的那么多土地。由于少地和无地的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量的耕畜和农具,因而他们只能分到少量的土地。恰恰是在分配土地后的一年中,“农村资产阶级”和“贫农”之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斗争,这一事实已经证明,分配地主土地并不像基本法规定的那样,是“在平均的劳动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尽管分配土地进行得多么野蛮和混乱,分配还是进行了。这样俄国农民才从徭役和租税的义务中解放了出来,这种过去以农奴制为基础的义务以隐蔽的形式比农奴制多存在了 60 年。这样才将农奴制的最后残余,封建劳动制度的最后残余摧毁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形式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资本主义的、隐藏在商品价格中的地租;而地租现在落到作为自由的商品生产者的农民自己手里。不管农民对土地的关系在法律上如何解释,只要地租归农民,而且只归农民,在经济上农民就是土地的所有者。尽管新的土地所有制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然而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为农民建立资产阶级所有权,因为这一制度并没有取消剩余价值的占有,而是以地租的形式把剩余价值交给农民。<sup>②</sup>

随着经济上的所有权而来的是法律上的所有权。土地公社早已成

---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农民的俄国和社会主义》,1918年彼得堡版第6页。

② 国家粮食贸易垄断丝毫不能改变这一情况,即使它能够取缔农民的投机倒把而得到贯彻。垄断可以通过它的粮食政策取消绝对地租,但是不能消除由土质和位置决定的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同生产商品的个体农业经济是分不开的。

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革命前,农民阶级就已经起来反对土地公社,他们实行“永久地”分配份地并阻止定期重新分配的情况越来越多。现在,因为农民得到的土地要多得多,他们就更加力求获得对土地的固定而永久的权利。而土地经营越是集约化,这种要求就越是强烈。一次土地革命,如果不是使农业劳动社会化,而是通过摧毁大经济使农业劳动个体化,其后果无非是:或者建立农民私有制,或者最多不过建立十分类似农民私有制的、永久性的、不再重新分配的、可以继承的土地使用权。

但是,在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这种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像在西欧和中欧那样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而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从这里吸取了它的力量。因为农民阶级是从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接受了土地,因此,农民阶级的命运就同无产阶级统治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农民害怕躲在威胁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每一支反革命军队后面的地主重新将土地收回去。因此,农民阶级准备反对任何反革命威胁,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少数人的统治由于亿万农民群众害怕反革命而受到了保护。

## 7. 农民和共产主义

直到革命前,俄国的农民为了能交纳赋税、赎地费和租金,都得出售自己的一部分农产品。革命后农民起初停止交纳赋税,土地革命又使农民免交赎金和租金。农民就不再被迫出售农产品。过去,农民并不乐意出售农产品,因为当时城市付给他们的代价只能是贬值的纸币,而不能给他们提供工业品。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陷于停顿。苏维埃必须采用暴力征集粮食,派遣武装的工人分队到农村中去征粮。他们遭到了农民的武装反抗。如果说城市无产阶级的胜利曾使农民获得了地主的土地,那么为了粮食储备的斗争却使农民阶级处于同城市无产阶级的尖锐的阶级矛盾之中。

在这场斗争中,城市无产阶级曾经在农村寻找同盟军。无产阶级

企图把“贫农”组织起来反对农民阶级,使他们为征集粮食服务。那些无地和少地的农村居民不能靠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收成为生,他们只能同城市无产阶级一样靠在农户中征用的粮食过活。因此,人们希望能够使他们为苏维埃的粮食供应组织服务。按照 1918 年 5 月 20 日的法令,农村居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应该在每个村里选出一个“贫农委员会”。由于让贫农委员会将一部分没收过来的粮食分配给贫农,这些委员会应该是和苏维埃当局的粮食征集休戚相关的。人们希望粮食供应组织能够依靠这些委员会。

但是即使这种在农村中发展阶级对立的企图是直接从争取粮食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一企图在各阶级和党派的思想意识中仍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布尔什维克助长和允许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按照他们的方案颁布土地“社会化”法令。但是布尔什维克完全没有社会革命党人的幻想。布尔什维克并不把分配地主的土地、扩大并巩固农民私人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一项措施,而是看作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局。但他们只是把通过摧毁封建主义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当作一个过渡阶段,在革命的风暴中能够比较迅速地度过这个阶段。如果说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分配地产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那么布尔什维克则认为,在完成了这种被他们完全正确地认识和指出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立即能够实行农业劳动制度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没有社会革命党人的幻想,却陷入了与此相反的幻想,他们认为:刚刚战胜并摧毁了封建资本主义大地产的小农经济现在就能够迅速的发展中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经济。

农业公社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组织的基础。1918 年 8 月 3 日(16 日)的指示给公社组织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加入公社的人放弃全部私有财产。他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特别是他的房屋庭院、牲畜和农具,以及他的货币都转为公社财产。公社领导向全体社员大会和由社员选举出来的委员会负责。按照公社委员会的指示,公社的土地由社员共同耕种。用合作化的大经济代替个体耕种土地的小经济,这是公社的

首要任务。公社支配社员的劳动成果。公社首先从中扣除为满足社员共同需要所必需的部分；同时，公社应努力为社员建造公共住宅、劳动和娱乐场所、学校、图书馆等。剩余的劳动成果归公社社员。如果说每个人必须按照他的能力为公社劳动的话，那么每个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公社分得一份。

公社的组织计划(这个计划与其说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社会主义农业的一个计划，不如说是一个章程)听起来像是空想。但它并没有被认为是空想。因为布尔什维克相信看到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将迫使它去实现这种空想。在城市中失业的产业工人群众又流入农村。他们在农村也占有一部分地主的土地；但他们在地主的土地上找不到可以作为农民在那里定居的田庄；他们没有耕种土地的农具和牲畜。但是他们从城里带来了在工厂中养成的社会劳动的习惯和在革命中激发出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的热情。人们难道不应希望那些回到农村中的产业工人宁愿共同耕种土地，而不是每个人单独地在分给他的小块光秃秃的土地上为建立独立的农民经济去进行艰苦的斗争吗？在农村中“贫农”也处于类似的境地。他们也缺乏农具去耕种他们在分配地主土地时所得到的小块土地。难道贫农不想通过互相联合去置办个人没有能力置办的必需的劳动资料吗？如果现在国家鼓励他们去建立公社，如果国家不是向个人，而是向公社发放信贷和提供农具，那么“贫农”难道还不愿意加入公社吗？难道已经建立的“贫农委员会”不是公社的自然而然的组织者吗？难道农村的无产者(其中很多人作为掘土工和流动短工曾经组成劳动组合和生产合作社，以便共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不会很快学会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来经营农业吗？

但是如果产业工人和农村无产者已经首先组织了大量的公社，那么逐渐吸引或迫使农民加入公社也就不是没有指望的，有些狂热的人就抱这种希望。贫农在分配地主土地时所得甚少。他们对那些攫取了最大最好的一份的农民怀着强烈的不满。他们力求再次调整土地所有制关系。现在他们不再是反对封建地主，而是反对富农和中农了。他

们在贫农委员会领导下组织起来。如果已经在一个公社里联合起来的贫农能够在村里掌权,能够压制农民,那么他们就能将全村合并成一个公社,使农民本身都变成公社的成员。那些相信正在农村中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他们的希望大概就是这样的。<sup>①</sup>

建立农业公社的种种努力没有奏效。1918年建立了五百多个这样的组织。毫无疑问,很多公社与在《指示》中描绘的理想图景相差很远;而一些不懂得农业的理想主义者建立和领导的公社很快地垮掉了;另一些公社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公社,大规模地经营黑市买卖,把邻近的小农当作自己的雇工加以剥削;在个别情况下,资本家竟能在公社的幌子下保持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所有这些事实也为布尔什维克的作家所确认。<sup>②</sup> 但是如果 we 设想一下:一个不仅在生产资料而且也在消费资料方面企图完全实现共产主义的组织,一个不仅要使劳动而且也要使家务和消费都社会化的组织,跟农村人民的传统和本性是多么对立,那么在几个月内能够成立五百多个这样的组织这一事实毕竟可以证明,俄国革命能够唤起多么强烈的追求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热情。在这方面,产生农业公社的运动事实上同产生基督教骑士团的争取更高、更富有崇高精神的生活制度的斗争很相似。但是,正如世界并没有因为在市民和农民中间存在着寺院而成为共产主义的世界一样,俄国农业也并没有因为在千百万农民中间有几千个工人实行财产公有和共同耕种他们的土地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农业。<sup>③</sup>

村社使俄国农民习惯于土地公有制,但是它并没有使俄国农民习惯于共同耕种土地,习惯于在生产、家务、消费方面实行共产主义。公

---

① 见《村社》,1918年彼得堡版;美舍利亚科夫《论农业公社》,1918年莫斯科版;《关于公社的指示和章程》,由米特罗范诺夫作序,1918年莫斯科版。

② 例如美舍利亚科夫《论农业公社》1918年莫斯科版,第9页以下。敌视布尔什维主义方面的东西见加夫龙斯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总结》1919年柏林版,第48页以下。

③ 《国家监察部通报》中关于建立少数的农业公社的报道,1918年莫斯科版第3期,第89页以下。



社的思想并不是从农民本身的习惯和需要中产生的。整个运动不如说是把一种农民所不熟悉的、与农民的习惯和需要格格不入的生活组织从上面、从城市强加给农民的一种尝试。贫农并不比有财产的农民更接近共产主义；贫农心中所想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为了他们的利益重新分配土地和农具。因此公社必然始终是个别现象。在贫农掌握了村政权并接过城里来的口号“宣告成立公社”的地方，事实上贫农通常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农业的共产主义组织，而只是在农村里重新分配土地和农具。

但总的说来很快就表明：“贫农”决不是一个能够压制农民阶级和强迫农民阶级接受苏维埃政权意志的强大力量。在农民的土地过去是村社的财产而且定期重新分配给村社全体成员的地方，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由无地村民组成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在过去俄国农户过多的地方，农民家庭平均拥有的人手比它们能够使用的人多得多，因此没有人数众多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容身之地。而大地产也不可能在俄国本土的绝大多数地方使过多的农业雇佣工人就业；它不是把土地交给雇佣工人耕种，而是租给农民或由农民“服工役”。虽然在革命前最后的一个世代，某些农民能够通过买地和租地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他们的份地，因而农民发生了分化，但是个人占有财产的差别在农村里还没有引起尖锐的阶级分化。此外，农村中的淘汰恰恰又不是把最优秀的分子变成“贫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领袖卡姆柯夫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干脆把贫农委员会说成是流浪汉委员会，把动员贫农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当作号召流氓无产阶级去反对农民阶级的一种尝试<sup>①</sup>，这当然是一种过甚其词的说法。但是这里面也隐藏着一点真理。因为在土地定期重新分配、每个家庭都有权同样分到一份土地的地方，经济状况降低到平均水平之下的通常只是这样的人：他不是遭受了特殊的不幸事故，就是一个无能的经营或者酒鬼。因此，一般说来，革命前一直保

---

<sup>①</sup> 乌斯提诺夫《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崩溃》，1918年莫斯科版，第11页。

持着土地公社的地区，“贫农”在智力上和道德上与农民可说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这些地区革命也没有能废除农村中传统的等级制度；富裕农民懂得保护他们在农村的威信和领导地位。在实行其他非俄罗斯的土地制度的“边缘地区”，情况完全不同。在那些地方，封建的土地制度已经把农民明确地分为雇主和工人、农民和无地农民。在那里，例如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就能够产生无地农民反对农民的强大的独立的运动。但在俄国本土，贫农并不是一个数量上足够多、界限上划得足够明确、在智力和道德上以及在组织能力和主动性方面的水平足够高的阶级，所以贫农还不能在农村取得统治并彻底变革农民的土地制度。

无产阶级向农民进攻的高潮发生在 1918 年。它使得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关系完全破裂。贫农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围绕批准和贯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而展开的斗争的社会基础。两党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激烈冲突、刺杀米尔巴赫伯爵和 1918 年 6 月 6 日(19 日)叛乱<sup>①</sup>标志着这一斗争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布尔什维克虽然能够镇压并粉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但对农民群众的默不作声的、消极的然而顽强的反抗却束手无策。农民用节制耕种来回答用暴力征集粮食。因为农民没有保证能得到他们的多余的收获物，他们只好耕种仅够他们自己消费的那么多土地。耕种面积大大减少，大量的土地荒芜。农民也往往起来积极进行自卫：他们对征粮队进行积极的反抗，用暴力解散贫农委员会，把这些委员会从村里赶走。抱怀疑态度的人(即使在共产党内也不乏其人)结果证明是正确的。执政党不得不终止对农民阶级的进攻。

从 1918 年秋天以来，苏维埃政权改变了对农民阶级的态度。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看法：苏维埃政权如果不放弃任何反对农民阶

---

<sup>①</sup> 应为 1918 年 7 月 6 日。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挑拨德国对苏维埃俄国作战，于 1918 年 7 月 6 日刺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并在莫斯科举行反革命叛乱。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反革命叛乱很快就被苏维埃政权镇压下去。——编者注

级的暴力行为，不设法将“中农”即农民阶级的广大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它就不能维持下去。

1918年7月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只是号召城市工人阶级同“农村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进行共同统治，而现在则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明确地号召“中农”参加共同统治和合作。1919年3月苏维埃代表大会<sup>①</sup>批准了这些基本原则。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说：“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经济方面对农民采用暴力。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过渡到最好的制度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在这一方面，同志们，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sup>②</sup>事实上，从这次代表大会起，暴力干涉农村经济的任何尝试都放弃了。苏维埃政权听任农民在村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农业中建立社会主义大经济的种种努力在继续进行。但是目前还只限于促进和发展所谓的国营农场。在人口稀少地区，很大一部分国有土地和皇室土地没有分配给农民。这些土地留作国家财产并由地方苏维埃来经营。现在苏维埃政府正努力促进这种国营农场。我们不能把这种农场的数量设想得太多；在1919年2月，农业大经济——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共耕社加在一起——可能不超过1510个；此后它们的数目可能增加到5000个左右。<sup>③</sup>农业中这种国营大经济是技术进步的体现者，是供养城市的基地，它们在这些方面可以起到比公社更为重大的作用。

在1919年5月通过的共产党新党纲中，苏维埃政府对农民态度的变化表现得很明显。在这个党纲中，也提出在农业政策方面最迫切的要求是“组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但为了这一目的，首先要求建立国营农场和由国家耕种未播种的土地，最后才提到公社，并明确地把

---

① 应为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② 转引自伊萨耶夫《苏俄的工业国有化》，1919年12月11日《正义报》。(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5页。这里的引文与列宁的原话有出入。——编者注)

③ 《俄国新闻简报》1920年1月第2号。

公社解释为“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自愿联合”，以此来反对用任何强迫方式将农民的财产公社化。党纲接着强调：“小农经济还将长期存在”，并提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能提出的措施，如合并零散土地，国家促进使用人造肥料和优良种子，过渡到更完善的轮种制，改良农田以及由国家支持农业合作社等。党纲还规定，共产党有义务把农村的无产者组织在工会里，党纲还要“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为了这一目的，党对于中农必须“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是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成立实际协议，在确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时向他们让步。”<sup>①</sup>

布尔什维主义掩盖它向农民投降的办法是，只呼吁同“中农”实行合作而宣布现在仍旧向“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是现在对农村资产阶级的理解与在组织“贫农委员会”时期完全不同了。当时，把全体正派的农民阶级都当作农村资产阶级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对立起来。现在则把中农，也就是农民阶级的广大群众看成同盟军，而被当作农村资产阶级的，则只有农民所憎恨的高利贷者、中间商、酒店老板和买卖地产的捐客。实际上小农经济第二次取得了胜利。农民起先摧毁了封建主义的残余，然后又击退了共产主义的进攻。

然而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正是建立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已经及时地认识到对农民阶级的进攻没有前途并终止了这种进攻。俄国农民并不是“政治生物”。只有为争取地主土地的斗争才能将农民卷入历史的漩涡之中。一旦农民得到了地主土地并确保了新取得的财产，他们又会回到政治上漠不关心的状况。苏维埃政权如果让农民在农村不受干扰，农民也不会关心苏维埃政权在城市里干些什么。这样农民就会脱离历史的运动；农民就会重新陷入纯粹地方性利益的狭隘圈子之中，重新陷入无历史的生存的深渊之中。历史舞台上只剩下无产阶级同

---

<sup>①</sup>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5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只有当无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反革命的威胁,封建主希望跟在反革命队伍后面返回他们的田庄的时候,农民才会起来同无产阶级一起去击退共同的敌人。

## 8. 苏维埃宪法的本质

在1918年7月10日的宪法<sup>①</sup>中,把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说成是仅仅由工人和农民选举产生的、并通过工农的代表行使政府权力的城乡苏维埃的联邦。宪法的条文剥夺一切剥削他人劳动力的人对苏维埃的选举权,条文承认只有“劳动者”享有选举权和信仰、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等各种基本权利,条文还规定武装劳动群众并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通过宪法的这些条文,人们以为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有些人人为此赞扬这个宪法,说它是终于发现了的,使无产阶级能够确立为统治阶级,能够用暴力镇压剥削者,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的国家形式。另一些人也为此反对这个宪法,说它是一种残酷的阶级统治的产物,是对于永恒的民主原则的摧残,是对于不可侵犯的人权和公民权横施暴力。但是一些人的赞歌和另一些人的愤怒都无助于我们理解俄国的苏维埃宪法。因为如果只是从宪法的条文来解释和判断,就不能理解这个宪法。和其他任何宪法一样,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也只是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一种反映。和其他任何宪法一样,这种宪法的作用也是依赖于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它将随着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动而变化。如果我们想真正理解苏维埃宪法,我们就必须把它同目前俄国内部各社会力量的机制联系起来。

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机关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它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者制定法律并选举人民委员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

---

<sup>①</sup>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载于《法令汇编》1918年7月20日第51号。半官方的通俗解说有卡尔宾斯基《苏维埃政权及其组成》,1918年莫斯科版。德文译本有施特鲁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1918年苏黎世版。以及格律恩堡主编的《社会主义历史文汇》和克利班斯基的《布尔什维克的立法》。

会由市苏维埃代表(每 25000 名选民中选举一名代表)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每 125000 名居民中选举一名代表)组成。市苏维埃直接从有选举权的工人中选举产生。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则由间接选举产生。每一个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市苏维埃的代表(每 2000 名选民中选举一名代表)和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从每 10000 名居民中产生一名代表)组成。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乡苏维埃的代表组成,每个乡苏维埃可以把它的 1/10 成员派去参加县代表大会。这种非常复杂的选举制度使市苏维埃对乡苏维埃处于一种极为有利的地位。市苏维埃直接选举它的代表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此外,市苏维埃派它的代表参加省苏维埃代表大会,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也同样选举代表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市苏维埃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有双重代表参加。这种双重代表制自然就意味着市苏维埃对乡苏维埃、产业工人对于农民拥有多次选举权。

但在俄国,农民阶级在数量上对工业无产阶级占巨大优势,以致尽管产业工人具有双重代表权,农民仍然完全能够控制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如果乡苏维埃能像市苏维埃那样充分利用苏维埃宪法赋予它们的代表权,那么尽管产业工人拥有多次选举权,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的代表将不是由工人代表,而是由农民代表组成。这样,苏维埃宪法建立的将不是工业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农民的阶级统治。实际上,情况显然相反。组成人民委员会的人离农民很远,他们是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人。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不能以农夫的思想方式来解释,农夫的眼界没有超出乡村的范围。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是由无产阶级对于世界革命的期望决定的。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婚姻法、教会地位、继承法的急进的立法措施当然并不适合农民阶级的观点,而只适合革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唯理论。因此,尽管苏维埃宪法使得农民阶级有可能完全统治苏维埃共和国,但农民阶级的观点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立法和政策中——只有苏维埃的土地立法和土地政策除外——根本没有表达出来。这一事实只能这样解释:农民阶级没有利用苏维埃

宪法赋予它的权力手段。

俄国的农民群众在政治上还没有组织起来,还没有受过训练,也并不关心政治。如果国家让他们平静地呆在农村里,那他们就不会关心国家是由谁和怎样来治理的。农村人民中只有很少的一小部分人对一般的政治问题具有较强烈的兴趣和较高的政治积极性。苏维埃宪法所依据的间接代表制度,其目的和作用只是使这些政治上积极的少数人有发言权。管理乡村的乡苏维埃的选举可能引起全体农民阶级的兴趣。但是迟钝的农民群众对从乡苏维埃选举参加县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不太感兴趣了。与此相反,回乡的产业工人、战时在城里当过兵并卷入过革命工人运动的农民却懂得:县代表大会是组成苏维埃国家躯体的细胞。他们对选举的兴趣比农民群众要大得多。他们也比其他农民活跃些,能说会道些,派他们当代表很容易通过。所以,县代表大会看起来就与乡苏维埃不同,在县代表大会上农村中积极的革命无产阶级少数的代表比在乡苏维埃中肯定要多一些。在选举县代表大会参加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更是又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农民对省代表大会不感兴趣。举行代表大会的遥远的城市和乡村里的农民有什么关系呢?派遣代表参加省代表大会的是县代表大会里积极的、革命的少数人。在省代表大会上他们同市苏维埃的代表相汇合,并接受后者的思想领导,在选举省代表大会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中,他们投票赞成市苏维埃的代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省代表大会通常也不是派遣迟钝的、不识字的、保守的农民群众的代表,而是派遣城市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乡村中的少数人的代表到全俄代表大会上去。在全俄代表大会上市苏维埃直接选举的代表跟他们联合在一起。这样就保证了城市无产阶级在代表大会上的统治地位。间接代表制度的整个结构使各阶层代表的多少以他们对政治关心的程度和他们政治上活跃和积极的程度为转移。这样,对政治漠不关心、不够活跃和不够积极的农民群众就被排斥在代表之外,从而保证了工业无产阶级或者不如说是城市无产阶级中最关心政治、最活跃、最积极的阶层对全

体“劳动”人民的领导。

间接代表制度的作用是通过恐怖政策得到保证的。对于一般农民来说,如果他们找不到领导人来唤起他们对于县和省代表大会选举的兴趣,在这些代表大会中组织他们的代表,在苏维埃内部捍卫他们的利益和观点,那么他们在间接代表制的框框内就不会有出头之日。俄国的农民群众不能从自身产生出这样的领导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向他们提供这样的领导人。但是知识分子在农民阶级中的作用受到了阻碍,这不仅是由于革命把知识分子也看作“资产者”,使农民加深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首先是由于存在着恐怖政策,几乎不可能在农民群众中开展任何较大的、较引人注目的、针对执政党的鼓动。因而农民阶级被束缚在间接代表制度的罗网之中,始终没有领导人。农民阶级由于无力运用这种复杂的机构,他们在政治上就处于附庸的地位,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直接影响就被剥夺了。

如果我们用一个民主共和国来代替苏维埃共和国,用普遍的直接的议会选举来代替从乡苏维埃到县代表大会、从县代表大会到省代表大会、从省代表大会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间接选举,用完全的竞选自由来代替恐怖政策,那么农民的选票就会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量。如果把国家分为若干选区,各选区按照居民人数的比例规定固定的代表名额,那么农业地区就会像城市那样保证得到与其选民人数相适应的数量的代表。如果在农业地区通过竞选把群众动员起来,也引导在政治安定时期漠不关心的群众来参加投票,那么就不会由农村中政治上活跃的少数人,而是由一般农民中的广大群众来授与代表权了。结果就会是:在农村中,积极的少数人被农民群众所压倒,在整个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少数被农民阶级“密集的多数”所压倒。这个“密集的多数”将选出多数代表,从而对国家的治理起决定作用。苏维埃宪法剥夺了“密集的多数”的这种权力。不是实行普遍的发动群众的人民选举,而是在各级苏维埃中实行间接的、逐级的、由群众的委托人进行的不发动群众本身的选举。竞选由人民的集会移到苏维埃会议大厅,并且用恐怖政



策来限制。竞选没有人民群众普遍参加，但受积极的少数人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因此，在各代表团中，各选民阶层的代表不是由这些选民阶层的人数，而是由它们政治上的活跃程度决定的。这样，在所有选民阶层中最不活跃的农民阶级事实上不起决定作用。

但并不是苏维埃宪法本身排斥了农民阶级，而是农民没有能力去利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俄国农民的身上还带有农奴制的伤疤，他们 60 年前才从这种农奴制中解放出来，比西欧和中欧的农民的解放迟了半个多世纪，比英国的农民的解放迟了 500 年。俄国的农民到现在才打碎沙皇制度的锁链，沙皇制度曾经使他们处于无权和愚昧无知的状态，阻止他们通过报纸、集会、组织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接受各种政治训练。俄国的农民刚刚通过革命从一种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中解放出来，这种制度曾使农民处于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极端贫乏的状况。因此，俄国农民在政治上是无知的、没有训练的、没有组织起来的、漠不关心的。正因为这样，俄国农民无力使苏维埃宪法为自己效劳。正因为俄国农民没有文化，因为俄国农民所处的野蛮状况，才使得苏维埃宪法成为排斥农民阶级的手段。随着农民对苏维埃宪法的机构逐渐熟悉，农民也懂得了在宪法的范围内使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中农”对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已显著增加。如果俄国农民成为有文化的人，如果他们对一般政治生活和城里人一样有兴趣，并像产业工人那样懂得利用他们的公民权，那么即使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也会充分发生作用，而苏维埃的宪法，即使它的条文没有一条改变，也会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农民阶级专政的工具。

如果俄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没有文化的俄国农民就会成为各种口号、各种蛊惑宣传的毫无抵抗的俘虏。如果有选举权的群众在文化上还处于这样落后的阶段，那么，正如盖得派的党纲曾经说过的的那样，普选权就不是一种解放的工具，而是一种欺骗的手段了。这样，资产阶级利用农民的私有者本能，利用他们的传统观念，利用他们对城市、赤贫者和犹太人的厌恶心理，把农民的大批选票争取过来达到自己

的目的,也许是并不困难的。在大陆上几乎所有的议会里,资产阶级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选民的人数(他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比无产阶级选民的人数少得多)来掌握多数,而是通过使农民选民追随资产阶级政党而帮助它们获得多数。在一个民主主义的俄国也许会出现相似的情况。俄国农民在1917年的几个月之内经历了从黑帮直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路程,在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一旦得到满足以后,他们也许会同样迅速地重新回到右边去。俄国农民也许会像西欧和中欧的农民所做的那样,很快地凭借自己的大量选票让资产阶级掌权,或者像1848年以后法国农民做过的那样,让以资产阶级制度拯救者面目出现的僭位者掌权。苏维埃宪法不允许这样做。苏维埃宪法通过它的恐怖政策使得资产阶级不可能把农民争取过去。宪法通过间接代表制度使得农民的选票不起作用,从而使资产阶级丧失了依靠农民选票的可能性。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统治俄国,是因为苏维埃宪法由于俄国农民没有文化而从政权斗争中排斥了农民群众,从而也排斥了资产阶级唯一能够依靠的强大力量。

在布尔什维克抛弃了民主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人民群众面前这样来说明放弃民主原则的理由:为了能够消灭剥削,国家必须使剥削者无力反抗。因此,苏维埃宪法不得不剥夺资产阶级的公民权。这里,从表面上观察就可以看出苏维埃制度的本质。实际上,即使苏维埃政权给予资产阶级选举权,对资产阶级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资产阶级自己的选票数量太少了,它不可能靠这些选票来获得自己的统治。具有决定意义的倒是:宣布公开地无情地对资产阶级横施暴力为暗地里隐蔽地剥夺农民的权利提供了机会和辩护的理由,因为只有农民阶级的选票能帮助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怎么依靠公开地对资产阶级横施暴力,而是依靠暗地里剥夺农民阶级的权利。

当然,这并不是说,俄国的农民没有什么力量。在自己的农村里,农民还是绝对的主人。我们已经看到了苏维埃政权是怎样不得不停止对农村的进攻而向农村投降的。然而恰恰是因为苏维埃政权这样做

了,农民才不关心在他的村子以外发生的事情。恰恰是因为苏维埃政权让农民不受打扰,农民才对参加苏维埃政权的机构不感兴趣。恰恰是因为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利益范围不加干涉,它才获得了在农民的利益范围之外不受农民的影响和干扰进行统治的自由。

苏维埃宪法是各阶级之间这种现实关系的法律表现。这是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状况相适应的宪法,这个民族中数量很大的农民多数虽然由于渴望土地而参加革命,并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摧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机关,由于害怕被剥夺的地主重新回来,他们一再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击败反革命,但由于没有文化,他们不能与无产阶级共同统治他们参与创建和保卫的国家,相反地他们只满足于在自己的农村中的自治,而把国家的统治交给数量很小的无产阶级少数。

因此,如果说苏维埃宪法是俄国社会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和各阶级的文化成熟程度的必然产物,那么在苏维埃宪法从十月革命以来所经历的内在发展过程中,也反映出了俄国社会内部的阶级配置状况。

十月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机关。军队和官僚主义的行政机关被完全打碎了,军官集团和官僚制度被摧毁了。从而旧的国家组织就完全瓦解了。各个市和县的权力就自行落到地方苏维埃的手中,地方苏维埃是在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瓦解后存在下来的唯一的社会机构。因此,地方苏维埃的独裁统治最初是不受限制的。每个市和县的苏维埃都推行它自己的政策。有的将工业社会化,有的让工业留在资本家手中。有的集中力量搞零售商社会化,有的企图组织城乡之间的货物交换,而有的则企图在农村建立公社。每个苏维埃都擅自在农村征集粮食,每个苏维埃都禁止向邻近的县输出粮食,每个苏维埃都征用经过铁路运往别的地区的粮食。面对在地方苏维埃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发的群众行动,苏维埃的中央政权显得无能为力。俄国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各地方苏维埃政权的非常松散的联邦。

但是这种无政府状态必须加以克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就不可能建立、维持并武装一支强大的军队，也不能保证大城市的供给和克服工业和交通事业极其混乱的局面。于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了为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对地方苏维埃的威信而进行的斗争。

为此目的而采取的的第一个手段是建立共产党的权威。共产党在大多数苏维埃中掌握着领导权。各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党团遵循党中央的指示行事。国家中松散的联邦制在执政党内严格的集中制中得到了纠正。执政党的党组织对地方苏维埃的影响使地方苏维埃服从于作为国家中央政权组织起来的党中央。

同反革命的斗争促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成立了“肃清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非常委员会”，它被赋予了不受限制的全权。这个委员会建立了自己的机构，在各个省和专区都建立了地方委员会，它们都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而它们又各自任命各个市和县的委员。地方委员会拥有自己的军队和一支“侦探”队伍，还有它自己的经济机构。<sup>①</sup>因而，与苏维埃组织相平行，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拥有特殊的、独立于地方苏维埃的地方机构的警察组织，它是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拥有不受限制的全权的机构。这个中央政权的统治机构也可以转过来反对地方苏维埃。它可以把持反对态度的成员从地方苏维埃中开除出去，可以将地方苏维埃解散，并在它的恐怖政策的压力下重新进行选举。

但首先是战争要求加强中央政权。战争迫使苏维埃政府建立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因此它必须取消由士兵们来选举领导人，而是实行由总司令部来任命领导人，强迫士兵们接受领导人的指挥。必须怎样向工人、士兵说明由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来任命领导人的必要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托洛茨基曾经说过：“冶金工人选举了他们的工会领导，工会领导然后任命了秘书、会计员和出纳员。如果冶金工人们问：为什么会计员和出纳员要由工会领导任命而不是由会员们自己选

---

<sup>①</sup> 《关于省和县的非常委员会》，载于《法令汇编》1918年9月16日第66号。

举产生?不!没有一个有头脑的工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工会领导会这样回答:你们自己选举了我们。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们,你们可以选别人来代替我们。但是只要你们让我们当工会的领导,我们就可以去任命职员。我们不难判断可以让谁来担任会计员和出纳员。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你们就可以把我们赶走,再选举一个新的工会领导。苏维埃政府和工会的领导,情况是一样的”<sup>①</sup>。这样,托洛茨基首先论证了中央政权有任命各营、连领导人的权力,而不是让士兵们来选举。但托洛茨基又立即把这一论据应用到行政管理方面。在这个领域里,中央政权也必须有权自行选择管理各个行政部门的“技术人员和专家”。事实上,随着苏维埃中央政权在红军中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权力工具,它也就有足够力量将各省、州、县的行政部门越来越有效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它向各个行政区派遣自己的委员并赋予他们一定的行政职务。这些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员既跟地方苏维埃并存又凌驾于地方苏维埃之上。

随着苏维埃制度迅速走向中央集权,它不可避免地要官僚主义化。十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官僚机构。将社会从任何官僚统治中永久解放出来,这是革命在这个阶段的希望,是建立在旧的官僚主义结构的实际瓦解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当时列宁写道: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sup>②</sup>所以人们曾经认为:可以不需要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公职人员队伍。行政事务可以直接由苏维埃的成员来处理。苏维埃成员甚至可以在这些工作中彼此替换,以便使他们不致变成官僚。但是当人们得以从破坏旧的国家机构走向建设新的国家机构的时候,当人们企图将各个苏维埃的自发行动变为一种受控制的国家行政管理的时候,当调节并领导整个经济生活的必要性使得行政管理的任务日益广泛和复杂的时候,人

<sup>①</sup> 托洛茨基《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讲话》,1918年彼得堡版第25页。

<sup>②</sup>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编者注

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行政管理不能缺乏专门的训练和经验。苏维埃政府、地方苏维埃和各经济机构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在它们的工作中任用公职人员、“专业人员”、“专家和技术人员”。一个新的官僚产生了。共产党的纲领也确认，“由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被群众推荐到重要岗位上来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方面的技能，在困难的条件下因为有必要而匆忙地吸收了一批旧的专家参加工作，调走了一批最先进的城市工人去担任军事工作——由于这一切，就使得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sup>①</sup>。

这样一来，从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的后果——无政府状态中，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产生出一个极其强大的中央政权，它依靠一支军队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将地方的苏维埃变为单纯的自治机构，从而保证了自己成为全国的决定一切的政权。中央政权凭借恐怖政策赋予它的各种权力手段，不受任何社会上起作用的公开反对派的干扰，也挣脱了在各种意见的公开争论中形成的“社会舆论”的任何批评。拉狄克说道：“苏维埃代表大会赋予人民委员会以全权，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有过这样的全权”<sup>②</sup>。这个强大的统治机构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建立这个机构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并把农民阶级的权力局限在他们狭隘的农村范围内。

但是当无产阶级的统治机构正在这样增强的时候，无产阶级本身却越来越削弱。国内战争破坏了经济生活，使城市工人遭到饥饿和失业。工人们从城市跑回农村，那里分配地主土地也使他们有机会得到土地。城市人口迅速下降。工业无产阶级是俄国人口中的少数，现在变得更加少了。随着工业的破坏，工业无产阶级实际的社会力量逐渐衰退了。<sup>③</sup> 无产阶级的基础对于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庞大的统治机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4—535页。——编者注

② 拉狄克《无政府主义者和苏俄》，1918年彼得堡版。

③ 参看奥尔堡《来自苏俄的信》，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19页以下。

构来说已经有变得过于狭窄的危险。随着上述情况的出现,无产阶级就丧失了领导并监督它所建立的统治机构的力量。苏维埃官僚和红军的统治机构开始脱离了无产阶级的基地而自行其是。这个统治机构有变为一个独立的、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的权力的危险,它只是在思想上代表无产阶级,但在实际上,它不再是仅仅对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实行独裁统治,而且也对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实行独裁统治。如果我们从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实际作用和工作来观察,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发展倾向正在发生。

### 9. 工业的国有化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每一次胜利也改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力地位。当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它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之际,工人在工厂中也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赋予工厂中的这种统治关系的变化以法律形式的第一次尝试,是1917年11月16日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法令并不意味着工业的社会化:企业主仍然是企业的所有者和生产的领导者,他仍然取得利润并承担风险。但企业主的活动被置于工人阶级的监督之下。在每一个工厂,工人监督通过工厂委员会实行,在每一个省,则通过“工人监督委员会”实行,工人监督委员会由工厂委员会、工会和合作社的代表组成。在每一个工厂里,工厂委员会有权监督业务管理、查看账目和商业来往信件,并作出有关业务管理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企业主具有约束力;对于工厂委员会的决议企业主只有向“工人监督委员会”上诉的权利。后者作出最后的决定。<sup>①</sup>

实行“工人监督”在很短的时间内必然就会使资本主义的企业活动无法进行。要让企业主既承担工厂的领导职能,为工厂的成果和企业的风险承担责任,同时又要在整个业务管理方面服从工厂委员会的决议,

---

<sup>①</sup> 《法令汇编》1917年12月8日第3号,德文译本见克利班斯基《布尔什维克的立法》第101页;《工厂委员会手册》工人监督委员会1918年莫斯科版;《工人监督》,工人监督委员会机关报,1918年莫斯科版。

这是不可能的。企业主和工厂委员会之间极为严重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结束的：工人把企业主和工厂的领导职员从工厂里赶出去，自己担任工厂的领导。当然，工人经营工厂的资本很快就没有了。国家就得干预。政府就得决定把工厂“国有化”。

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六个月内，实行国有化完全是无计划的。政府不愿意实行国有化，只是在群众自发行动的压力下才决定实行国有化。通过法令实行国有化是跟在工人们自己实行“粗野的社会化”的后面姗姗来迟的。因此，实行国有化的并不是全部工业部门，而始终只是一些企业主和工厂委员会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的企业。国有化在形式上是作为惩罚措施出现的；企业主的财产被宣布没收，因为他们抗拒执行工人监督的法令。到1918年5月底总共有513家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其中只有123家企业是根据中央政府的法令实行的，其他的企业则是根据地方苏维埃当局的指示实行的。运动涉及各个工业部门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冶金工业最甚，纺织工业很少，国民经济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业部门，例如煤矿业，则根本没有。<sup>①</sup>

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经济管理工作。在各个省、州、县都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它们由苏维埃当局、工会和合作社的代表组成。这些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组织国有化企业的行政管理。但是它们当然不可能为各种各样毫无联系的、由于偶然的原因实行了国有化的企业建立一个有条不紊的管理机构。但是如果国有化企业处于完全混乱的状况，那么那些仍由资本占有的企业的情形也并不更好一些。因为在企业主不知道自己的企业是否会在第二天遭到没收的情况下，企业主的任何有条不紊的活动都不可能开展。工业所处的状况是不能持久的。人们不得不开始用一种有计划的、系统的国有化来代替毫无计划的国有化。

即使在执政党内，关于国有化的范围和方式的观点也不一致。在

---

<sup>①</sup> 米柳亭《关于工业国有化问题》，《国民经济》杂志第1卷第5期。



预先讨论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时,就已经出现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派别:一个是激进的工团主义派别,这一派想把工人监督的重点放在各个工厂委员会,对工厂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不加任何限制,另一个是温和的国家社会主义派别,它希望主要通过中央苏维埃政权机关来实行工人监督,并通过法令对这种监督加以严格的规定和限制。<sup>①</sup> 当时,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时期,激进的工团主义派别得到了胜利。在确定国有化计划时又出现了同样的对立。激进的工团主义派别要求所有较大的企业都立即实行国有化,并把国有化工业部门的领导权转交给这些工业部门本身的工人。与此相反,温和的国家社会主义派别则希望把国有化的行动局限在少数“条件成熟”的,也就是说非常集中的、对国民经济特别重要的工业部门,并通过中央苏维埃政权机关来管理国有化的工业部门。<sup>②</sup> 1918年5月举行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决定采取一条折中的道路。国有化的行动应该局限在几个大型的工业部门。对个别一些企业不应该再实行国有化。国有化企业的管理应该以下列方式加以组织:每个企业都由一个“企业管理处”来领导,管理处的成员中2/3由国民经济委员会任命,1/3由企业内参加工会的工人选举产生。企业管理处的全体成员中1/3必须由技术上和商业上受过训练的职员组成。整个工业部门的管理机构根据具体情况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或由省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组织,而且每个工业部门组成一个中央的工业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由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以及企业管理处的代表共同组成。各个企业管理处从属于工业部门的中央和省的管理局,特别是在任命企业的领导人员时,中央和省的管理局有权提出建议,在有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不顾企业管理处的意愿任命企业的领导人员。整个管理组织建立在由国民经济委员会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同被管理的工业部门本身的工人共同管理工业的各级管理机构的基础之上。<sup>③</sup>

---

① 波波夫和罗日柯夫《十月革命》,1918年彼得堡版,第280页以下。

② 维格《国民经济的组织》,《国家监察部通报》第1卷第3期,第27页。

③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1918年莫斯科版。

这样就开展了有计划的国有化行动。整个生产部门有计划的国有化代替了个别企业的“惩罚式”的国有化。但是,苏维埃政府很快就发现它再一次不得不比它原来所打算的走得更远。工人作为国家主人不能容忍在工厂里依然受人统治。而企业主(国家政权已经把他们交给了工人阶级)又不能领导企业。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五月代表大会后几个星期,人们不得不决定对几乎全部的大工业实行国有化。这是通过 1918 年 6 月 28 日的法令贯彻的。既然这样一来几乎全部大工业都为苏维埃政权所掌握,那么组织国有化工业的管理问题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工业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具有两重性。资本家领导社会劳动过程,但他同时又剥削工人。无产阶级革命把资本家从企业中赶出去,是为了把社会劳动过程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就失去了把个体的劳动集合起来加以组织和监督的企业领导者了。如果工人阶级不能亲自承担领导、组织和监督它的劳动的这些职能,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导致社会劳动过程的全面的破坏和瓦解。资本主义并没有使工人群众有机会去获得领导和组织社会劳动所必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但资本主义却从工人阶级中分离出“特种的雇佣工人”(马克思语)<sup>①</sup>,它以资本的名义执行着领导和组织劳动的职能,并以资本的名义在劳动过程中进行指挥。只有当无产阶级利用这种特殊类型的雇佣工人为它效劳的时候,它自己才能担负起领导和组织它的劳动的职能。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社会劳动过程在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以后不致停顿并继续发展下去。

这一先决条件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并没有实现。很多经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离开了他们的岗位。他们有时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自愿这样做的。常常是工人们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因为工人们不再愿意服从不久前还以资本的名义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人。但是,那些在工厂里坚持下来的人员的作用受到了阻碍,这一方面是由

---

<sup>①</sup> 《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5 页。——编者注

于工厂的集体管理机构的经常干预,这些管理机构不给负责的工厂领导人员必要的行动自由,从而扼杀了他们工作的兴趣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工厂官僚充满不信任态度的工人们的反对。因此国有化的企业就缺少那些内行的和具有足够威信的领导,而没有这样的领导,任何社会劳动过程都不可能进行。

马克思说:“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sup>①</sup>。只有当无产阶级在文化水平和组织上都处于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单个的工人才能不仅只从资本的要求,而且同时也从社会劳动的需要去理解他和他的同事在职能上的联系,才能把他对于总体的服从不再只是理解为对他人权力的服从,而是理解为编入生产劳动集体。俄国的无产阶级从历史上来看还年青,它在最近的一代才从农民阶级中分化出来,在沙皇制度下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组织起来,在组织上和文化水平上还没有达到这个发展阶段。一当资本家的权威垮台了,工人们就不再能将他们在社会劳动过程中职能上的联系维持下去。一当他人的意志不再使他们的活动服从于这个意志的目的,他们作为生产总体的统一就会解体。如果旧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了,又没有一种新的、建立在谅解、自愿和团结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劳动纪律来代替它,那么在工厂里就会出现一种无纪律、无组织和无政府的状态。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灾难性的下降成了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最大威胁。

苏维埃政府必须使用一切力量来反对生产过程中的无政府状态。首先,苏维埃政府通过许诺给予经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高工资以及保

---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编者注

证他们在工厂里独立的职权范围,努力使他们回到工厂去。同时还开始了那种巨大的、连德国读者也熟悉的鼓动工作,苏维埃政府的发言人尽量使工人们相信恢复劳动纪律、提高劳动强度和承认企业领导人权威的必要性。<sup>①</sup>而工会首先被用来为完成这些任务效劳。

一旦工业国有化,工会的职能就起了变化。它们由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机关变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机关,它们一方面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和中央工业管理局内代表各个工业部门中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在各个企业中加强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工会代表大会提出了“为了一定的、有保证的工资作出一定的、有保证的劳动成绩”的原则并决定每个工会联合会成立一个“定额局”,为各类劳动和各劳动部门规定每个工人必须完成的最低定额,超过定额的将特别给以奖励。<sup>②</sup>

但是,运用说服的手段和工会纪律的手段还不足以克服国有化工业中的无政府状态。因而苏维埃政权决定再前进一步。国家社会主义派别和工团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又重新出现。早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五月代表大会以前,国家社会主义派别就主张这样的原则: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命的厂长独立进行技术上的领导,工厂委员会在企业技术领导的所有问题上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这一原则在关于国有化企业管理的最早的法令中也采用了。<sup>③</sup>然而国民经济委员会五月代表大会不得不放弃这一原则而向群众所支持的工团主义派别屈服。由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的企业集体管理机构处于厂长之上。但是在反对企业中的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中,苏维埃政府又回过头来采用了最初的纲领。它认为,要克服无政府状态,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最能干、最有经验的组织者召回工厂并赋予他们不受限制的独断

---

<sup>①</sup> 参看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伯尔尼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508页。——编者注);托洛茨基《劳动,纪律和秩序将拯救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巴塞尔版。

<sup>②</sup> 《国家监察部通报》第1卷第3期,第32页。

<sup>③</sup> 《国民经济》杂志第1卷第2期。

专行的全权。他们有权重新实行计件工资制度,贯彻泰罗制,并有权立即开除一切不好好干活的工人,要求工人阶级“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sup>①</sup>。如果工人中有些人反对重新恢复厂长的独裁,有红军充当支柱的苏维埃政府将不惜使用暴力迫使工人服从。苏维埃政权是有权利如此行事的。因为群众现在必须重新绝对服从的厂长不是资本的一种工具,而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工具。对进行反抗的工人使用暴力,不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的利润,而是为了反对个别工人阶层用他们的无纪律行为来危害无产阶级的总利益,以拯救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总利益。必须使用的强制手段是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对抗“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的强制手段。没有文化的、在几年前才从农村中分化出来、还过着农民一般生活的工人们自己是不能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中解放出来的。<sup>②</sup>

但是,既然人们首先决定用强制手段和暴力手段去克服工业中的无政府状态,那么,把最强有力的强制暴力手段即军队直接运用来为这一任务服务,是很自然的。这一步骤也已经采取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纲》<sup>③</sup>指出了这一道路。其中我们看到:“在继承了沉重的过去遗产的社会的发展过渡阶段中,不对过着寄生生活的分子以及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落后分子采用强制措施,要过渡到有计划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是不可想象的。国家掌握的强制手段是它的军事力量。因此**劳动军事化**——在这样或那样的程度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任何建立在普遍的劳动义务基础上的过渡经济是绝对必要的。”(第21条)为此目的,托洛茨基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1.“在当前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或遭到全面破坏的**个别企业**或者工业部门形式上的**军事化**是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实行的,目的是**暂时**

---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列宁的原文与鲍威尔的引文有出入。——编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504页。——编者注

③ 《俄国新闻简报》1920年2月第4期。

保证企业得到工人并建立更为严格的制度,同时使相应的机构拥有广泛的纪律惩处权,如果用别的办法不能使企业得到恢复的话。”(第 24 条)这是工人在战争时期就很熟悉的企业军事化最严格的形式——取消工人的迁徙自由权并使他们服从军事纪律惩处的权力——这就是建议的内容。

2. 为了消除缺乏工人的现象,为了恢复交通工具,为了采伐和运输木材,为了开采泥炭和页岩,为了在采煤、采矿和采油地区进行劳动,为了重建遭到破坏的地区,为了耕种荒废的田地,可以将一切有劳动义务的男男女女动员起来。征集工作按照地区、年龄和职业进行。在最近期间应该“首先将军事动员最少涉及的那一类人员吸收进来;应该尽可能首先将大批妇女吸收进来。”(第 17 条)在征集工作中成立“军事性的劳动组织”(第 25 条),以便派去进行一些必要的劳动。特别要把那些离开了城市的熟练工人征集起来;要把他们“从军队中,从后方的苏维埃机构中,甚至从国营农场和公社中,从手工业中,从农村中,首先是从当前还存在着私营商业中召回来(第 5 条),在必要时可以使用强制措施”(第 6 条)把他们吸收到工业中去。

3. 最后,对于那些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而变得多余的军事编制,不是把它们复员,而是把他们变为劳动大军。

1920 年 1 月举行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采纳了这一纲领。纲领已经在贯彻实施。已经有两个军从军役转到生产劳动。有几个省已经为几个年度内招募劳动大军作出了安排。俄国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正在进行中。

这就是从 1917 年 11 月的“工人监督”到 1920 年 1 月的劳动军事化所走过的一段重要路程! 发展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在从十月革命大约到 1918 年 7 月的第一阶段中,事情的推动力量是无产阶级群众本身。这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在工厂中实现了“工人监督”,把企业主从工厂中粗暴地赶了出去,还违反苏维埃政府的意愿迫使它首先对个别工厂,然后对整个生产部门,最后对全部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它

不顾苏维埃专家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计划,而由这些工业部门的工人本身对国有化工业部门实行共同管理。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群众的创造力”。这时是无产阶级本身,是整个无产阶级,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强迫制定了法律,而苏维埃只是宣布了这些法律。在这个阶段,苏维埃政权只是工人阶级的执行机关,苏维埃专政在当时真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从1918年年中起,情况逐渐起了变化。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它的官僚主义机构建立起来了,它的军队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它对于自发的群众运动已经不再束手无策了。它可以反抗自发的群众运动,可以对这些群众运动施加暴力。但是当苏维埃政府的统治机构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无产阶级群众本身的力量却削弱了。由于很多工人从城市逃跑,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减少了。它把它的最能干、精力最充沛的分子给了苏维埃官僚机构和红军,因而缺乏自己的、没有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工作的领袖。它的社会职能由于工业遭到破坏和生产停顿而失去了意义。无产阶级对自己的信心动摇了,因为它不能通过自由的首创精神去组织国有化的工业。于是,在领袖和群众之间,在苏维埃政府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大大改变了。自从1918年年中以来,历史的主动性就从群众转到政府那里去了。由于工业遭到破坏,政府不得不转过来对付工人。它不得不试图一步一步地迫使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并迫使工人服从厂长的意志。它不得不最终使工人军事化,把他们束缚在企业里,使他们服从军事纪律惩处权的“严格制度”。

如果人们也把苏维埃共和国今天的状况看作一种“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些字眼的意思显然与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完全不同。当时,发号施令的确实是俄国真正无产者的粗野的广大群众,而苏维埃政府确实只是这种群众意志的执行机关。今天的情况显然不同了。俄国今天实际上是由共产党的党员统治,像列宁所透露的那样,共产党在清洗混进来的不够资格的分子以后,大约有10万至20万党员<sup>①</sup>。这10

---

<sup>①</sup> 列宁《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俄国新闻简报》第3期,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编者注

万至 20 万人中的多数当然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这 10 万至 20 万人只是俄国无产阶级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庞大统治机构为之服务的一个阶级,而是这个统治机构本身。正是这 10 万至 20 万人组成了执政的苏维埃党团、苏维埃官僚、工业、企业和工会的管理机构以及红军的指挥机构。这个统治阶层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它显然不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意志的单纯执行机关;它丝毫不是在贯彻无产者的意志,相反地,它是在使用军事强制手段来迫使无产者服从它的意志。这是一种不同的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代表运动的未来”<sup>①</sup>。这就是俄国共产党人所依据的东西。由于确信他们“胜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sup>②</sup>。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为了无产阶级整个运动的利益把各个工人阶层,为了无产阶级未来的利益把俄国无产者的广大群众在必要时也用暴力引导到他们的道路上来。如果人们想把一个党的专政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党不再像十月革命后的第一阶段那样是无产阶级群众意志的一个单纯的执行机关,而是现在不仅把它的意志强加给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且还强加给无产者广大群众本身),那么这种专政就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俄国无产者的专政,而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专政。

这种专政现在掌握着各种最可怕的权力手段。整个工业、矿业、交通业和商品分配的机构都直接受它管辖。它支配全国的所有劳动力。它随心所欲地将男男女女召集起来,并使用军事纪律分派他们从事它所需要的工作。它使企业服从军事纪律。它运用恐怖政策的可怕武器来压制各种反对派和批评。一个权力无限的国家被亿万人民中的极少数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着,这个国家使个人在其生活的一切方面服从它,它不再让个人有政治上自由活动的地盘。这就是以这种方式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5、306 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5 页。——编者注



生出来的一个新的可怕的专制制度。

一个由无产阶级(它本身在俄国人民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中很小的少数人统治着的国家具有无限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俄国社会主义的特色。那里出现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苏维埃政权剥夺了资本家的劳动资料,把劳动过程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取消了资本家对劳动所得的支配。它既然按照自己的计划支配着全国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现在就自己组织有计划的、直接的社会劳动和对劳动所得的有计划的、直接的社会分配。如果说这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一个专制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里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自己支配他们的劳动资料,领导他们的劳动过程和分配他们的劳动所得。相反地,社会主义在这里意味着:一个脱离人民、只代表人民中极少数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政权支配着人民的劳动资料、劳动力、劳动过程和劳动所得,并以强制手段使人民的一切力量服从他们的劳动计划,纳入他们的劳动组织。

这个专制的社会主义不是按照事先设想好的计划产生出来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曾把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群众的创造力”之上,正是布尔什维克赋予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可设想的最广泛的活动范围。但是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很年青的时期就取得了最充分的权力。俄国的大工业在最近一个世代才产生。俄国无产阶级的多数是由出身于农村、几年前才来到城市的人组成的。俄国无产阶级不像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那样经历了几十年的组织方面的发展和教育。俄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年青说明它在文化上的落后。而这种落后迫使布尔什维克走上专制社会主义的道路。当事情表明群众自己不能在国有化的企业里恢复劳动纪律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转向用暴力来贯彻反对落后工人阶层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必要性。

民主的原则也不是“永恒的真理”。民主也是发展的产物和发展的阶段。只有在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群众的文化水平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时才可能有民主。凡是这些先决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先进的少数

人的专制主义就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就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暂时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俄国农民的缺乏文化才说明，为什么沙皇专制制度必然不是由俄国人民的民主自治，而是由俄国人民中很小的少数——无产阶级的专政所取代。只有俄国工人的文化落后才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从无产阶级群众本身的统治转变为无产阶级很少数的先进分子的专制制度。专制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发展在俄国的农民还没有成熟到实行政治民主，俄国的工人还没有成熟到实行工业民主的发展阶段上就引起了社会革命。专制社会主义是俄国缺乏文化的产物。

#### 10. 俄国革命的历史地位

“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基础上的欧洲最集中的工业”，托洛茨基是这样来描述俄国革命的社会基础的。<sup>①</sup> 一个还处在古老的半封建形式中的农业（农业的发展必然不可避免地在暴力革命中冲破这些半封建形式）和一个在它之上的大工业（它是欧洲的金融资本在最近一个世代移植到俄国来的，它正在极其迅速地发展着，以最现代化的一切技术成就装备起来，它已经使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集合在它的指挥之下）——这就是俄国革命的基础。因此可以这样来理解俄国革命的历史地位：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也必须冲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枷锁，这种革命只有在在一个高度集中的大工业即一个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的时代才能实现。

法国大革命也负有冲破已经无法忍受的封建土地制度枷锁的历史使命。当时农民阶级的自发运动也推动了革命前进，并瓦解了旧制度的统治机构。当时农民也从城市革命那里得到了地主的土地，因此，农民起来捍卫城市革命，反对外部敌人。但即使在当时，农民在摆脱了封建主义以后，也立即回到自己的农村，而把国家的统治交给城市。因

---

<sup>①</sup> 托洛茨基《处在革命中的俄国》，德累斯顿版，无出版年代，第23页。

此,即使在当时,革命也是首先导致城市对农村的专政,而因为在城市里革命把人数最多、最革命的阶级推到前面,所以革命也导致城市平民对城市的专政,从而也是对农村的专政。1917年到1920年俄国革命的发展与1789年到1793年法国革命的发展在这方面完全相似。但是,1917年俄国的城市平民与1793年法国的城市平民已经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巴黎的长裤汉都是巴黎郊区小手工工场的师傅和帮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则是现代大工业的无产者。因此,1793年巴黎长裤汉的专政仍然局限在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内,而1917年俄国的专政则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但这样一来,冲破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就直接转变为消灭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了。

资产阶级革命找到了一个反抗封建主义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能够利用这一农民阶级的自发力量为它服务,并借此摧毁旧的制度。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找到的这个农民阶级是处在由封建主义决定的文化水平上,也就是处于一种愚昧的状态。因此,虽然农民阶级是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它本身还没有能力去继承旧制度的遗产。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导致城市的专政,即城市中人数最多、最革命的阶级的专政。但在城市中人数最多、最革命的阶级还立足于手工业和小商业的时候,这个专政依然是小资产阶级专政。只有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城市中人数最多、最革命的阶级已经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刻,这个专政才是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1848年革命的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这种由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同1793年法国的工业相比,1848年的德国工业已经处于更高得多的发展阶段。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城市的专政——它将重新像1793年那样成为一场胜利的革命的结局——将直接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专政。通过城市革命摆脱了封建主义的德国农民将会反对沙皇的军队以保卫革命,正像1793年法国农民反对联军以保卫革命那样。但德国农民太缺乏文化,它本身不能掌握对德国的统治,它不得不将统治交给城市的无产阶级,像

1793年的法国农民将统治交给巴黎郊区的平民那样。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德国所抱的希望,现在在俄国成了现实。俄国革命的过程证实了1847年马克思的设想的英明。

但在1848年,革命过程本身却完全不同。当时,欧洲革命的领导权落在法国手里。但法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建立自己的专政。它不可能将农民争取过来,因为法国农民在60年前就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城市的革命不再能给予他们任何东西。它也不可能建立城市对农村的专政,因为在1848年,法国的农民阶级已不再是1793年的无历史的群众了。从大革命以来,它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发展过程,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思想和幻想。“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它以前”<sup>②</sup>,无产阶级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制度。无产阶级只限于依靠自身力量,被打败了。而“国民大众”即农民们却实现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把王朝推上去掌握政权,对他们来说,这个王朝体现了他们最伟大的历史回忆,他们希望从这种最伟大的历史回忆的再现中再现他们的伟大时代——“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sup>③</sup>的时代。法国二月革命经过六月战斗到第二帝国的发展,也决定了伴随二月革命发生的一些别的革命的发展。巴黎工人在六月战斗中的失败,使得无产阶级专政在德国也不能实现。马克思的设想在1848年的德国未能实现,而69年以后才在俄国复活。

1848年的法国革命同1789年至1793年的法国革命这一对比表明: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类型。大革命必须完成一项重大的社会任务:摧毁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而对于1848年的法国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编者注

命来说,这样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因此,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是社会革命,而只能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革命。大革命遇到了一个反对封建主义、但同时又处于封建的没有文化状况中的农民阶级。因此,大革命能够建立城市的专政。1848年的法国革命遇到了一个不革命的农民阶级,因为这个农民阶级已经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较早的阶段中摆脱了封建主义,而且它在政治上也已不再是没有意志的了,因为它自从获得解放以来已经经历了伟大的政治历史。因此,1848年的法国革命首先并不是导致城市对农村的专政,而是直接导致以农民为支柱的僭位者对城市的征服。在大革命中,作为全国革命群众的先锋战士的巴黎平民得以建立了他们的专政;在1848年革命中,巴黎的无产阶级只有反对国民大众才能建立它的专政,从而只有在无产阶级强大到足以单独地用自己的力量不仅把资产阶级,而且也把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镇压下去的时候才能建立自己的专政。

俄国现在处于法国大革命的形势中。在那里,无产阶级作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先锋战士得以建立它对国家的专政;像在法国国民公会时期那样,那里人民中很小的少数对全体人民实行专政同样也是历史的必然性。相反,封建主义已经被较早的革命摧毁了的西欧和中欧国家,则处在1848年法国革命的状况之中。在这里,无产阶级只有当它单独地强大到足以这样做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不仅能够制服资产阶级,而且也能制服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本身,首先是制服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时候,它才能建立它的统治。但只有在无产阶级不再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的时候,而是在它已经“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sup>①</sup>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它本身已经组成为国民大众的时候,它才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在西欧和中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同东方的俄罗斯完全不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386页。——编者注

同。马克思从 1793 年的法国革命中概括出来的和对 1848 年德国革命所指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能够在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中得到了实现;但正如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对 1848 年的法国革命已经不适用一样,由于同样的理由,它对当前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运动也是不适用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长裤汉对城市的专政以及城市对农村的专政只是一个短暂的发展阶段。农民曾经反对外部敌人以保卫专政,这些外部敌人有将封建的反革命引入国内的危险。但是抵御封建反革命势力的农民军队也镇压了平民的城市。雾月十八日只是由城市控制的农村的报复,由城市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的农村的报复。农民帝国代替了城市专政。

今天,俄国的农民也反对外部敌人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但一当农民刚刚战胜了外部敌人,一当战争刚刚结束,城市和农村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潜伏着的对立也将在俄国起作用。

俄国必须从外国进口大量的工业品,以便重新建立自己的交通业和工业。此外,它大概还必须给外债付息并偿还外债。为了能够给外国商品付款和给外债付息,俄国必须出口大量商品。但它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农民经济的产品。因此,俄国必须迫使它的农民出售大量的粮食、亚麻、皮革、黄油等,使之不仅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还能大量出口。为了这一目的,苏维埃政权必须向农民征收高额赋税。因为农民负担的赋税越重,他们为了能够交纳赋税而出卖的农产品就必然越多。苏维埃政权和农民阶级之间围绕赋税额而开展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

一旦取消封锁,俄国农民对商品的迫切需要就会起作用。为了能够购买农民需要的外国工业品,俄国将需要大量的外国贷款。俄国希望得到这样的外国贷款,它把森林、铁路和矿山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采伐、修筑和开发。但外国资本会向一个曾经一笔勾销了一切外债的政府提供贷款吗?外国的资本家会向一个时时刻刻实行无偿剥夺的国家

投资吗? 俄国的农民阶级不会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策看作是满足他们对商品的迫切需要的障碍吗?

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也必须将农民经济的产品销售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在俄国,农民也要求“自由贸易”。社会主义也必须能够支配农村人口的劳动力。今天,把征兵看作战争措施而忍受下来的农民,在和平时期将反对征集他们去参加劳动大军。苏维埃政府关于教会、婚姻、继承法和家庭法的法令只要还仅限于对城市起作用,就同农民毫不相干。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加强,它必须想方设法强使它的法令也在农村起作用,这样一来,苏维埃政权就会同农村中旧的、传统的观念发生冲突。

社会主义企业的产业工人和农民经营者彼此是完全不同的。只要农民还没有摆脱封建的愚昧的文化水平,他们就会容许产业工人单独进行管理。然而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的苏维埃政权,也同样破坏了农民的无文化状态的基础。苏维埃政权扩大并巩固了农民的占有,在农村里设立了学校,给农村带来了较高的文化,这样一来,它自己也就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因为,随着农民在文化上的成熟,农民对政治发生了兴趣,并且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他们也就获得了在国家生活中实现他们的利益和观点的愿望和能力。但是一当构成国民大众的农民阶级具有自己的政治意志,并有能力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城市无产阶级的独占统治就要垮台。

这种发展最初可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俄国农民逐渐学会利用苏维埃宪法赋予他的各种权利,使苏维埃宪法的机构为他的目的服务,把由于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缺乏积极性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苏维埃宪法变为农民意志的工具。但农民阶级的进一步兴起就必然使苏维埃宪法最终完全丧失它的社会基础。因为苏维埃宪法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它表现了由于农民群众的封建愚昧才能够实行和需要实行的无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只要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本身取得了统治权,农民阶级就一定会摧毁少数人专政的法律形式。它的统治可能暂

时采取一种依靠农民群众支持的专制制度的形式。但是,多数人即国民大众的统治的持久的法律形式则是民主制。

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对于民主制的战胜,而是走向民主制的一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是:提高俄国的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他们摆脱在沙皇专制制度下所处的没有文化的状况,从而才为俄国实行民主制创造前提。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像布尔什维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俄罗斯国家最后的、最终的形式,将一直存在到国家完全“消亡”为止。相反,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至多将维持到俄国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为止。

农民阶级上升为政治力量自然也决定俄国社会制度的形式。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由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起来的销售商品的合作社组织,农民的个体经营,趁城市缺粮而增长起来的农民财产,依靠黑市(这在农民的私有经济基础上是不能根除的)并同它一起发展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在特殊的租让权基础上产生的、由外国资本建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俄国的新经济将由以上这些因素组成。这样,俄国就获得了根据我们仅仅从过去的经验中得来的知识还无法加以分类的混合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制度具有多少社会主义的特征,具有多少资本主义的特征,这首先取决于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否被克服了和克服到了什么程度,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是否建立起来了和建立到了什么程度。但只要俄国未来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它就不会停留在一种专制的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这种社会主义将对全体人民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专制的支配权交给了一个由很小的少数人统治的权力无限的国家),而是继续向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这种民主的社会主义将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交给参加这一部门的、跟它的繁荣休戚相关的全体人员进行自治。因为专制的社会主义只是没有文化的群众的社会主义,所以必须由一个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权力来强制执行劳动纪律和劳动计划。如果国民大众的文化程度



提高了,那么他们就不再容忍国家的独断独行,就不再屈服于权力无限的国家政权。他们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在经济生活中实行人民的自我管理,实行“工业自治”(industrial selfgovernment),工业民主。

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全国的很小的少数,它在那里只能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旦全国的农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自行承担统治,无产阶级就一定会重新丧失这种统治。相反,在工业的西方,无产阶级本身已经形成为人民的多数,如果工人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那么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只要还存在着国家,工人阶级就能够持久地统治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统治,而少数人的统治的法律形式是苏维埃宪法。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是群众的统治,人民的绝大多数人的统治,而多数人的统治的法律形式是民主制。俄国的人民群众还处于半封建的文化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在一种专制社会主义中实现。在群众文化水平高得多的工业的西方,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在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的一切部门的民主自治中得到实现。工业社会主义在农业俄国的暂时统治,只是号召工业的西方的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一个信号。只有当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业社会主义的持久统治才能建立起来。

### 第三章 欧洲革命问题

#### 11. 工业国的社会革命

在西欧和中欧,早在封建社会内部,一个强大的市民阶级就发展起来了。在中世纪后半叶,它就创造了自己的城市文化并且在反对封建领主的流血斗争中争得了地方自治的自由。在宗教改革时期,它就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民族的统治思想。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就成了日益上升的王权反对封建领主的支柱。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它粉碎了王权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封建制度的残余。它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基础。

俄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俄国从来没有产生一个强大的市民阶级。如果说,在西欧和中欧,行会手工业构成现代城市的基础,那么在俄国,城市手工业则从未得到发展。在那里,家庭手工业者、农民手工业者起了西欧和中欧的城市手工业者曾经起过的那种作用。因此,俄国的城市不再是民事和军事管理的中心,其居民的多数始终只是由公务员、士兵、仆役和小商人构成,而西欧和中欧过去那种自觉的、有战斗能力的手工业师傅和手工业帮工阶层则常常是俄国城市所缺少的。因此,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俄国城市从来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些城市不像过去西欧和中欧那样是专制制度的支柱,而仅仅是专制制度的产物。这些城市不像后来西欧和中欧那样是摧毁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而仅仅是专制制度统治机关的中心。俄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制。

城市发展的根本差别说明,为什么俄国不可能有西欧和中欧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一个人数众多的、经济上独立的、因而也是自觉的市民阶级在俄国从来没有得到发展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只有在工厂改造了俄国城市,在城市中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之后,俄国革命才得以成功。因此,一方面,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俄国的专制制度维持的时间能够比西欧和中欧长得多,为什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比西欧和中欧晚得多。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说明,为什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但城市发展的这种根本差别同时也说明,为什么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面对着一个比俄国在人数上多得多、经济上强大得多、精神上自觉得多的市民阶级。<sup>①</sup>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俄国和欧洲的市民阶级的差别更加扩大了。在西欧和中欧,资本家阶级是从本国市民阶级内部发展起来的。而且资本的生存本身就是新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生存的基础。因为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给医生和律师、学者和艺术

---

<sup>①</sup> 托洛茨基《处于革命中的俄国》,德累斯顿版,第23—27页。

家、工程师和商人支付工资和供养各式各样奢侈品行业的基金。这样，在西欧和中欧的城市中，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随着资本家阶级一起发展起来了，它们在经济上的生存同资本家阶级的生存直接联系在一起。它们二者之间的利益共同性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展而更加密切。一方面，金融资本的发展使资本占有“民主化”：把自己的储蓄投入工业公司作为股份的“脑力劳动者”，感到同统治工业公司的大资本是团结一致的。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发展又使企业的管理同企业的占有相分离：工厂的职员了解到他们个人发展的前途、他们晋升的机会都仰赖于股份公司的扩展。这样一来，西欧和中欧的现代资本主义就把新的、人数众多的阶层聚集在自己周围。这些阶层（他们在经济上的生存是同“民族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是民族主义思想和帝国主义思想的体现者，在这种思想中表现了他们对资本家阶级领导的服从。<sup>①</sup>

俄国也几乎未曾有过这一发展。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国内生长起来的。它是西欧和中欧的金融资本移植到俄国去的。在俄国拥有工厂、矿山和铁路的资本家不是俄国人，而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比利时人和德国人。俄国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而是在巴黎和伦敦、布鲁塞尔和柏林被吞噬了。因此，这种剩余价值并没有用来支付给俄国的医生、教师、演员、妓女和新闻记者，而是支付给了法国的、英国的、比利时的和德国的这类人。俄国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并没有供养俄国的奢侈品工业，而是供养法国的、比利时的、英国的和德国的奢侈品工业。俄国工业企业的股份并没有在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推销，而是在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推销。外国人在俄国的大工业中仍然保持着领导地位。因此，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不像西欧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那样感到自己同统治俄国大工业的大资本如此团结一致。因此，俄国的现代资本主义是由外国资本建立和统治的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俄国没有像

---

<sup>①</sup> 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年维也纳版，第438—448页。

西欧和中欧那样形成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这些阶级出于它们的经济利益又同资本休戚相关并且在思想上处于资本的领导之下。<sup>①</sup>

因此,在西欧和中欧,与无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同俄国相比,它们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它们同大资本的团结也紧密得多。但是,不仅是无产阶级需要战胜的敌人比俄国人数多得多,团结也紧密得多。而且这里通过俄国方式实行的社会革命本身的后果也会和那里完全不同。突然用暴力方式无偿地剥夺资本,简单地取消一切剩余价值名目,取消股票、国债券、取消不动产抵押券和动产抵押契约,受到以上这些打击的,在俄国一般说来仅仅是大资本,尤其是外国大资本。在西欧和中欧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职员和公务员阶层和农民阶级遭到剥夺,从而就会引起比俄国严重得多的社会动荡,因为这些人已经通过现代金融资本所发展的各种形式,即通过股票、国债券和动产抵押契约的形式投放了自己的储蓄、储备金。如果在俄国资本被剥夺,处于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俄国工业公司的股东将会直接受到打击,从而为这些资本家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法国、比利时、英国的奢侈品工业就会间接受到打击。如果在西欧和中欧资本家被剥夺,本国的各种奢侈品工业就会一下子丧失其生存的基础,数十万小手艺人、工人、职员和各种知识分子的收入就会一下子遭到掠夺,而且将这些群众转移到其他职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和痛苦的过程,因而这里就会出现一场无比严重的经济危机。

俄国和欧洲的市民阶级的差别也表现在这两个地区的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上。在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到处都是革命者。资产阶级革命到处都是在他们领导下完成的。在西欧和中欧,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站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前列。在俄国,知识分子没有遇

---

<sup>①</sup> 考茨基《美国工人》,《新时代》第24年卷,第1册,第677页以下。

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在这里,除了参加工人运动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以实现他们革命主张的活动地盘,除了社会主义思想外,他们不可能掌握其他革命思想。因此自 90 年代开始以来,全俄国的知识分子都受过社会主义的训练。没有一个地方像俄国那样,参加社会主义政党的知识分子如此之多,没有一个地方像俄国那样,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学术的影响如此之大,没有一个地方像俄国那样,社会感情在艺术上所获得的表现如此有力。当西欧和中欧的知识分子还完全为帝国主义所控制的时候,俄国很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却完全处在社会主义影响之下。当“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成了西欧和中欧知识分子的骄傲和希望的时候,俄国的知识分子却在无产阶级反对外国资本(它统治着俄国的工业并且使俄国专制制度成了它的税收官)的斗争中看到了俄罗斯民族反对外国压迫者的解放斗争。<sup>①</sup>

然而就是这些直到革命前受到社会主义如此强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当他们终于明显地看到真正无产者的狂热运动的时候,他们就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畏缩不前了,他们就立即回到了资产阶级阵营。十月革命遇到了知识分子的极其愤怒、极其强烈的反抗。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周,工厂里工程师怠工,教师罢教,医生拒绝看病。<sup>②</sup> 尽管俄国知识分子一个世代以来一直是在社会主义强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在那里都要遇到知识分子这样的反抗,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和中欧将遇到知识分子多大的反抗啊!因为这里的知识分子的利益同资本无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处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在这里,善于演讲和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的领导是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在这里,没有知识分子的合作就不可能管理国家,就不可能开办工厂,就不可能组织国民经济,知识分子的反抗必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大障碍。

---

① 考茨基《美国工人》,《新时代》第 24 卷,第 1 册,第 680 页。

② 乌斯提诺夫《知识分子和十月革命》,1918 年莫斯科版,第 12 页。

如果资本主义在西欧和中欧能够比在俄国更强烈地使城市的市民阶级受它的利益的束缚和服从于它的影响,那么它在这里的农村同样也找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经济上强大的和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农民阶级作为自己的最坚强的支柱。自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以来,西欧和中欧的农民阶级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同发展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在基本上决定了和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力量对比。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农民是反对地主的。废除世袭隶属制和徭役,取消向地主交纳租税,重新调整地主土地上的森林和牧场的使用权,把地主的土地本身分配给农民,——这都是这一发展阶段中反封建的农民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农民还没有成熟到通过实行独立的、自觉的政策来达到这些目标。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sup>①</sup>。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把农民从封建主义下解放出来,却又同时作为他们的主宰反对他们,——这就是国民公会的暴政,这就是波拿巴的军事专制制度,这就是苏维埃的专政。<sup>②</sup>

封建制度一解体,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随着大城市和大工业的发展,地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农民直接把粮食卖给磨坊主,把牲畜卖给屠户)被民族市场和国际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在农民和消费者之间插入了一连串的商人)所代替。没有经营经验的、不习惯于用货币算账的农民发现自己同狡猾的商人处于对立地位。他们发现自己产品的价格是由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交易所中的投机操纵决定的。与此同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678页。——编者注

② 在意大利、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斯洛伐克、波希米亚,也许还有波兰和匈牙利,现今还存在着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农民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随着农民被硬拉入货币经济,农民对资本的需要也增长了,农民陷入高利贷者的魔掌。在他们的土地上,各种抵制层出不穷,而且自70年代以来美国和俄国的粮食竞争使粮价开始下跌,抵押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农民现在不再把封建领主看作敌人,而是把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抵押资本和交易所资本看作敌人了。“在19世纪的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sup>①</sup>于是农民政策的反资本主义的阶段就开始了。它的目标是恢复取缔高利贷法和一子继承权,废除土地债务,禁止期货交易,组织农民信用合作社。但是,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态度并没有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使农民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而是使他们成为城市小资产阶级,首先是从属于资本的手工业者的同盟者,这种手工业者这一时期也进行了类似的反对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斗争。而且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反资本主义成了封建领主和教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他们利用激烈反对“流动资本”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充当自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攻城槌。这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的全盛时期,这是各种反动政党把农民阶级组织起来以实现自己目标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农民阶级的政治兴趣被激发起来了,农民阶级被训练去阅读报纸,进行选举斗争,利用地方自治,以实现自己的阶级目标。因此,经过这一发展阶段,农民阶级的政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这一时期的这些斗争首先是大大推动了农业合作制度的发展。

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明显地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这一代人已经受过较良好的国民教育,并且受到城市文明的较强烈的熏陶,他们不再那么强烈地受传统势力的束缚,他们使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0页。——编者注

农民生活显著地合理化了。这也表现在农民私人生活方式上(例如可以想想旧式服装的消失或者二孩制的推广),但是首先表现在农民经济的合理化和集约化上。每公顷面积产量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9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市场上的谷物价格开始上涨,同时由于城市和工业区的扩大又使牲畜、牛奶和蔬菜价格开始上涨,这就使农业集约化更容易实现。既然在每公顷面积产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上涨,那么抵押制就根本不再是沉重的负担了。农贷协会金库把高利贷从农村中驱逐出去了。贸易活动一部分被合作社排除了,一部分在农民学会更好地算账之后也不再是可怕的了。自从交易所标出的价格日益上涨以后,农民也不再抱怨它了。农民阶级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消失了。现在使农民阶级感到恐慌的完全是另一些问题。它首先力图通过关税保护来维持农产品的高价。在关税斗争中,它不仅同大地产,而且也同需要关税保护的大工业携起手来反对城市工人阶级。在关税斗争中,农民阶级彻底掌握了在政治上代表它的阶级利益的一切方法,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阶级出现了,而且它也学会了把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主要敌人。与此同时,工业的迅速发展又把劳动者从农村吸引到城市中去,使由于农民经济的集约化而提高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再能得到满足,“人手缺乏”也激发了农业工人的“欲望”。农民现在对城市工人状况的任何改善都采取了对立态度,因为这种改善促进农民从农村外流,也就是说,加剧了农村中的“人手缺乏”和农村工人的“欲望”。农民再度认为无产阶级是他们的敌人。农民开始觉得自己首先是有产者,他们由于共同的利益同大地产和工业企业联合起来了。农民政策的反无产阶级发展阶段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战争加速了这一发展。战争使农民摆脱了抵押制。农民积累了相当大的资本,他们将这些资本购买了国债券和存入银行;他们非常关心各种剩余价值名目的不可侵犯性。同时他们同城市商业资本携起手来反对为了城市消费者利益而强加于他们的、由城市工人阶级掌握的对他们的产品所实行的国家经营管理。最后,战争和革命也唤醒了农业



工人。他们中间的多数人第一次发现了组织工会的道路,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资斗争。这样一来,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极度尖锐化了。

俄国农村的人口过剩是造成俄国革命的终极原因。农民住宅里的人数超过了能够在农民土地上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和通过劳动获得食物的人数,这一事实促使俄国农民起来革命。在西欧和中欧,对农民思想起决定作用的事实是农村中人手缺乏和变得空旷无人。这种情况驱使农民投入资产阶级阵营。俄国农民甚至必须在地主的土地上从事雇佣劳动;西欧和中欧农民的全部思想方式则由他们作为业主的利益决定。俄国农民获得土地要归功于无产阶级;西欧和中欧的农民则仇视压低他们农产品价格和抬高他们工人工资的无产阶级。俄国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麻木不仁;西欧和中欧的农民则有两代人参加了政治斗争并在使用各种政治斗争手段的过程中受到了训练。无产阶级能够使俄国农民服从于自己的领导;西欧和中欧的农民则结成统一的斗争阵线同无产阶级相对抗。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他们的苏维埃宪法在形式上赋予农民充分的公民权,而实际上把农民变成自己的附庸;西欧和中欧的农民则不再能成为附庸,在这里苏维埃专政恐怕必然要用暴力来剥夺他们的权利,用暴力来打倒和镇压他们。然而,革命通过暴力方式只能剥夺只构成人口一小部分并且是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的那些阶级;要用暴力方式剥夺一个人数极多的、在社会机体中起着极其重大作用的阶级,是难以成功的,因为这个阶级的社会劳动是不可缺少的,这个阶级的消极反抗就必然导致社会物资交流的严重停滞。

只要革命在农村根本找不到任何支持,革命就无论如何不能取得胜利。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把农民争取过来,它在农村中就必然要依靠农业工人和无地农民。在西欧和中欧,农村居民的政治划分,“农村贫民”和“农村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要比俄国容易实现。俄国由于有土地公社,农村居民的社会差别比西欧和中欧要小些。1918年的中欧革命使这个基础削弱了。农业工人的觉醒暂时就是这次革命

所造成的最重要的结果。

当然,条件并不到处都是相同的。即使在中欧,例如在我们的阿尔卑斯山区,我们也有一些广阔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里,农民阶级的差别很小,农业无产阶级仅仅体现为仆役。而仆役又是从农民的子女中招募来的,他们完全分担农民家庭的命运,因而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也以农民住宅为立足点。对于实行这种土地制度的地区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在农村是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支持的。

相反,在农业大生产占优势并拥有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阶级为之服务的地区,或者在大农业生产占优势而它们又能从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阶层中找到劳动力的地区,工业无产阶级就能够在农庄和农村找到同盟者。不过,对于这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又产生了另一些复杂的问题。

在俄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大地产不是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它的土地,而是一部分租给农民,一部分按照“工役制”交给农民耕种。因此那里地主土地上的劳动生产率很低,经营地主土地的集约化程度也很低。西欧和中欧则相反,大地产是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基础,这些大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小生产高得多,大生产供给城市的剩余物多得多,因此它是城市粮食供应的基地。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只能使农业大地产社会化;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不想使农业退回到很低的技术水平,从而不仅不想在眼前损害对城市的粮食供应,而且不想长期压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话,那它就不能容许把农业大地产分割给小农和农业工人。俄国类型的革命首先是简单破坏私有制的界限并听任“群众的创造力”去重新建立土地所有制关系,在中欧和西欧实行这种革命大概也要导致大地产的分割,从而也将导致一场对农业制度形式上是革命的、而实际上从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来说都是反动的变革。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和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是,注意不把土地所有制关系的革命交给农村无产阶级的自发运动去实现,而是通过国家政权有计划地并且根据社会的共同利益加以实现。

一般说来,现代工业国的复杂机体不可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即采取俄国十月革命后上半年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把对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交给自发的、本能的、无计划的群众行动去完成。俄国绝大多数居民仍然是农民;他们的粮食供应无论如何不会受到威胁。而城市人口相对来说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必要时总是可以通过在广大的农业区进行征收来得到最必需的供应。在西欧和中欧,聚居在各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工业区的居民要多得多,这就需要有一套复杂得多的运输、分配和交换机构,以免使城市和工业区挨饿。社会物资交流的任任何破坏在这里都会引起饥荒,而在饥荒中革命本身必然也要失败。俄国革命最初使整个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机器听凭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自发的暴力去摆布,只是在通过这种暴力使整个官僚国家机器和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组织解体之后,才过渡到逐渐从混乱中建立新秩序。的确,这种办法是彻底破坏整个旧统治机构和彻底腾出基地来建设新建筑的一种最激进的手段。但是,如果说一个农业国的结实的机体可以经受得住这样粗暴的、旷日持久的、使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连续性遭到彻底破坏的手术,那么一个工业国的比较敏感的机体将会在这种手术中死亡。在西欧和中欧,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关注的是使社会物资交流不致中断。因此,在接替资本主义组织和继续执行其职能的社会主义组织还没准备就绪以前,不应破坏任何资本主义组织。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也不应当使国际经济联系中断。像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国,靠本国的收获为生,在它的国民经济中,依靠外国原料的工业相对地来说只占次要地位,这样的国家多年同国外隔绝也可以过得去。一个现代工业国就办不到了。中欧和西欧即使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输入海外食物也无法生存;今天,既然战争已经使我们的土地枯竭,我们更不能缺少这种输入。而且没有美洲的棉花和铜,没有澳洲的羊毛和非洲的橡胶,中欧和西欧就无法进行生产。而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的产量也比正常条件下少多了。我们的劳动力因多年营养不足而降低了工作效率,我们的锅炉因缺少煤炭而无法加热,我们的工作机缺

少劳动材料。因此,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劳动产品去交换我们所需要的食物和原料。西欧和中欧各国的贸易平衡表都有庞大的逆差。既然我们所需要的食物和原料不能用我们目前的劳动产品来支付,那我们就得用我们过去的或未来的劳动产品来支付。使用我们过去的劳动也就是必须把我们的一部分生产机构,把我们的工厂和我们工业公司的股份出卖给外国资本家。使用我们未来的劳动也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外国的信贷,答应把我们未来的一部分劳动收益作为利息付给外国资本家。我们必须呼吁外国资本进入本国,让它在这里建立新企业,将来在这里占有剩余价值。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战争后果。因为根本没有别的可能来弥补我们贸易平衡表的逆差,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别的可能来获得我们所不可缺少的、而且还不可能用我们目前的劳动产品来偿付的粮食和原料。而这种必然性对参加战争的所有西欧和中欧国家来说都是存在的,虽然在程度上极不相同。但是,假如无产阶级革命以无偿的剥夺来威胁外国资本家,那他们会购买我们工业公司的股票,贷给我们工业原料,将他们的资本投入我国吗?假如无产阶级革命本身使取得外国粮食和原料的唯一可能的方法无法实行,那它想怎样保证人民得到粮食供应,保证工业获得原料呢?中欧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这里再度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根本不需要外国粮食、也不像那样迫切需要外国原料的农业国俄国的革命来说,其意义要小得多。确实,大战已经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主观的、心理的条件,因为它使欧洲工人群众革命化了。但是,同样确实的是,大战使参与大战的各工业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的、经济的条件根本恶化了,因为它破坏了它们的生产,从而大大增加了它们对外国的依赖性,首先是对经过战争并没有变得贫困而是大大发财致富因而也没有革命化的美国的依赖性。

我们贸易平衡表的逆差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要消费美国的粮食和美国的橡胶等等,也就是说,要消费美国工人的劳动产品,而不能为此向美国工人提供我们的劳动产品。但是,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世

界经济组织内部,美国工人也不会无偿地将他们的劳动产品交给我们,因为这就会意味着美国工人受我们剥削。即使在一个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组织内部,如果我们不能用我们目前的劳动产品交换美国工人的劳动产品,那我们也必须用我们过去的劳动产品即转让我们的一部分生产机构,或者用我们未来的劳动产品即提供我们将来的一部分劳动收益来偿付。把我们的工业股票卖给外国资本家,接受外国资本的有息贷款,将我们的生产力交给外国资本家去利用,——这些仅仅是使目前的外国劳动产品同过去的和未来的国内劳动产品的交换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形式。这种交换本身是中欧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只要掌握粮食和原料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就只能通过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形式来实现这种交换。然而,正如摧毁各种资本主义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它同时使资本主义的这种商品交换形式的运用连同这种交换本身成为不可能了。这样,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就遇到了一个极度地限制自己行动自由的框框。这种框框不是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框框,而大概是民族规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框框。由于大战一方面使欧洲大陆遭到蹂躏,从而在这里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心理前提,另一方面却使美国发财致富,从而在那里加强了资本主义,因此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

由此可见,西欧和中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前提和俄国完全不同。因而这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和那里也必然完全不同。

无产阶级革命在这里首先必须保证社会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连续性,防止社会物资交流的任何中断。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既不应把工商业交给无政府主义的“工人监督”,也不应一下子收归国有。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步一步前进:首先只是将那些从资本主义组织向社会主义组织过渡时不会引起生产和经营中断的生产部门和商业部门收归国有。而且无产阶级革命不应当按照同一个计划将所有的生产部门社会

化,而必须使社会化的形式适应各个生产部门的特殊条件。如果说,在一些生产部门可以将资本家完全排除的话,那么在企业主的组织工作还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些生产部门中,首先必须只限于使企业主服从有效的社会监督,并且在不致消除他对营业效果的关心和扼杀他的主动性的情况下,把他变为社会的一个器官。无产阶级革命尤其不应当听任自发的群众运动去进行农村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改革,而必须把这一改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无产阶级革命对社会化的形式、规模、特别是时机的确定,归根到底必须使外国贷款的取得和为了满足粮食和原料的需要所不可缺少的外国资本的输入不致无法进行。

基于同样的理由,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这样进行:要使有产阶级中的那些其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阶层不致中断劳动,而是继续劳动。这些人就是知识分子(整个说来,他们的劳动对管理国家和生产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农民阶级和小工业的企业主阶级。在西欧和中欧不能像在俄国那样使这些阶层成为附庸。但也不能简单地剥夺他们的权利,因为这样做就需要对他们实行暴力镇压和暴力摧残,从而会引起他们破坏整个物资交流的怠工。因此,必须让他们对社会总机体,对国家也发生影响,哪怕只是处于一种监督性的反对派的地位也好。

根据这一切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将多种多样的剩余价值名目(国债券、动产抵押契约、不动产抵押券、银行存款等等)一笔勾销,而且不能无偿地剥夺工业资本和地产。如果可以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同时实行剥夺,那么无偿剥夺是可以允许的。如果只是逐步地实行社会化,即将某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的财产简单地加以没收,而允许另外某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保留他们的财产,那么无偿剥夺就会产生不堪忍受的社会后果。简单地取消各种剩余价值名目,不仅会促使资本,而且也会促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的广大阶层起来进行激烈的反抗。简单地取消各种剩余价值名目也会同时使所有那些其产品体现剩余价值的工业部门和行业——奢侈品工

业等等——一下子归于消灭,使那些由资本家从他们的剩余价值中付薪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没有饭吃,从而不仅会把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大军,也会把工人大军推向反革命阵营。这样做就会最终地取消输入外国资本和获得外国贷款的任何可能性,从而中断任何粮食和原料的输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在这里首先只能以完全赔偿为条件实行剥夺,它首先必须保留一切剩余价值名目。剥夺剥夺者、收回赔偿金和废除剩余价值名目,在这里只能逐渐地、有步骤地、通过有计划地实行税收立法来实现。

因此,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政策必须和俄国完全不同。在那里,无产阶级面对着经济上和政治上无比强大的、对保存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名目的兴趣无比强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在那里,劳动人民的广大阶层(他们的劳动对社会是不可缺少的)同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利害关系;在那里,由于国民经济结构日益完善和精细划分,社会物资交流的任何中断都会引起饥荒,而饥荒又必将直接引起反革命;在那里,如果没有外国的贷款和资本输入,国民的食物和原料供应就不能得到保证,那里不能模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在西欧和中欧,不能像俄国那样,在半年长的时间内,先把社会组织交给自发的群众运动的破坏性暴力去摆布,然后通过少数人统治的国家政权专横地强迫人民群众接受一个崭新的制度。我们如果在这里这样做,在这个破坏阶段就会挨饿。我们如果在这里这样做,在专制的新制度阶段就会遭到在社会劳动分工范围内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失败。在这里,国民经济从资本主义形式到社会主义形式的过渡不能首先把一切现存的东西都破坏掉,然后才在废墟上进行新的建设。在这里,这种过渡不应当中断国家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的连续性,这种过渡必须通过逐渐地、有计划地、系统地改造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来完成。

但是,如果中欧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政策必须和俄国完全不同,那么这里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形式也必须完全不同。因为在统

治形式和实行统治的社会内容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把一切权力集中于无产阶级手中并完全剥夺了一切有产阶级的权利的苏维埃专政,立即把每一个企业中的力量对比颠倒过来。在建立了苏维埃专政之后,一切企业就不可能由资本家来领导,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成为不可能了。因此苏维埃专政强迫社会立即实行普遍的企业社会化,它强迫社会在还没有掌握行政机构去领导社会化企业的地方也实行社会化,而且它也使那些不可能实行社会化的企业中的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于苏维埃专政使资本主义的企业领导一下子成为不可能,它首先使整个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随后必须通过一个成为权力无限的国家政权才能逐步得到克服。相反,在无产阶级在民主制基础上并用民主手段取得政权的地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首先不会被摧毁,只不过由无产阶级的代表机构把它的领导接受过来,因此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连续性不会中断。毫无疑问,这种连续性会延缓社会改造过程,因为被接受过来的机构只有逐渐地,只有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适应它的新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这种连续性保证了对现存事物进行有计划的、系统的改造,而这种改造总是只着手进行已经可以解决的那些任务,只有通过这种改造,在中欧和西欧社会目前发展阶段的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才能实现。在这里,民主制是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统治和实行统治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不必用暴力剥夺劳动人民中同无产阶级对立的、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那些阶级的权利,不必排斥它们的合作,至少是通过监督性的反对派形式进行的合作,在这种形式下不会失掉不可缺少的外国贷款,不会因为用暴力使社会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断而引起必然使无产阶级的统治垮台的经济灾难。俄国粗糙的、原始的经济机体只许可采取布尔什维主义的形式来实行经济变革,这就是说,在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是无政府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第二阶段必然是专制主义的。为了完成这一经济任务,苏维埃专政是一种适宜的国家形式。而西欧和中欧社会的阶级划分、它们敏感的经济机构和它们对国际经济关系



的依赖性,要求经济变革采取逐步的、有计划的改造的形式来完成;与这项任务相适应的国家形式是民主制。

但是,广大工人阶层的急躁情绪是与这种认识对立的。他们看到,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选民中占少数,他们的代表在民主议会中也占少数。因此他们不相信用民主手段可以夺取政权。他们相信,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对有产阶级横施暴力,通过建立少数人的专政来取得国家政权。但是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实现社会制度变革除了单纯的暴力以外还要有更多的前提。

只要工业无产阶级没有把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农业工人阶层争取过来,它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俄国的经验恰恰表明“专门人才”、“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当我们不得不估计到农民的敌对情绪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不能缺少农业工人的支持。如果知识分子在选举中根本不投我们的票,那么,在一场暴力革命之后他们会受我们支配吗?因为俄国的经验表明,甚至曾经受过社会主义训练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事实面前被吓跑了的。如果农业工人群众在选举中根本不受他们的阶级意识的领导,那我们在革命中能领导他们的运动吗?因为土地运动的领导如果脱离了无产阶级总的组织的监督,革命就真正会导致在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反动。如果脑力劳动者和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业无产阶级,那么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工业国都将占国民的多数。那时无产阶级就能用民主手段取得政权和行使政权。如果在选民和民主制的代表机构中我们还是少数,那就表明,还有极为广泛的脑力劳动者和农业工人群众站在我们的行列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社会前提就没有具备。而单纯的暴力是不能代替这种前提的。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但是,在新社会还没有在旧社会的怀抱中成熟以前,暴力是不能促使新社会诞生的。

## 12. 工业民主制

如果说俄国是文明人类的一极,英国就是另一极。在俄国,封建的

劳动制度被破坏以后才在乡村中建立起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英国,徭役在 14 世纪就已经为货币租税所代替,而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还是半封建的根据官册享有的不动产权也已经为纯粹资产阶级的租借权所代替,在 17 世纪,封建劳动制度的最后残余和痕迹就已经消失了。俄国经过两次暴力革命才推翻了专制制度;英国仅仅是在 16 世纪都铎王朝时期经历了短期的专制制度发展阶段;自 17 世纪革命以来,英国不断发展和完善了议会制的政体,在 19 世纪,它的旧的寡头议会制度未经暴力革命而通过一系列和平改良变成了民主议会制度。俄国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从外国输入的新现象;英国的资本主义是从 14 世纪即资本主义羊毛贸易和资本主义养羊业开始发展以来不断地有机地发展起来的。俄国目前还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英国是一个工业国,工业无产阶级代表国民大众,而且它的农业也不是由农民而是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经营的。俄国向我们展示了在一个农业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图景,这个农业国现在才从封建的土地制度和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中解放出来,在这个国家里,年青的、从外国输入的资本同刚刚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处于大量农民包围之中的年青的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着斗争;英国向我们展示了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顶点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基础上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图景,而这种资本几个世纪以来早就使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适应了它们的生存条件。

在俄国,资本主义同社会是对立的。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是在革命社会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对资本也是敌视的。相反地,在英国,资本主义不仅把一切有产阶级争取过去了,它甚至在思想上统治了无产阶级达半个世纪之久,甚至使工人群众同它和解了。英国无产阶级固然也经历了它的革命时代;它在英国的工厂制度像俄国今天的工厂制度那样年青的时期即宪章运动时期经历了这个时代。但是,自从宪章运动失败以来——从 1848 年到 19 世纪末——,资本不仅统治了劳动力,而且也统治了工人的灵魂。工人同

资本主义妥协了。工人运动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去建立严格按职业划分的、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相联结的工会,和平地订立集体劳动合同,发展互助储金会和合作社。各个工人阶层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冲击。

布尔战争<sup>①</sup>以来,英国工人阶级才从资本主义的催眠中觉醒过来。此后,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高涨,同时企业主们的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以及德国和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日益尖锐的竞争又增加了实现提高工资的困难,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日益增长的不满唤醒了昏昏沉沉的阶级意识。对工会的成就的不满迫切要求采取对策。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建立(1900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组成一个独立政党(1903年)、1906年工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第一次巨大的胜利——这些都是转折的最初标志。人们曾经怀着过多的希望祝贺过这一转折。“工党日益增长的影响使有产阶级惊恐万状,罢工的恐怖与这一点相比已不再成为工业生活中的一种威力了”。<sup>②</sup>

失望必然到来。在保护关税派和自由贸易派之间的斗争占支配地位的议会中,工党只不过是巨大的自由党的附庸。工党的社会政策方面的成就不管本身有多大,在物价急剧高涨、实际工资迅速下降的时期都不可能使群众满意。它的眼光短浅的改良主义根本不能激发群众的热情。“恰恰是在统治阶级互相祝贺已经顺利地吸收了主张议会制的工党的时刻,全国戏剧性地、富有爆炸力地爆发了工人骚动。”<sup>③</sup>

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发起来了。罢工浪潮席卷全国。罢工汇集和发展成大规模的斗争,例如1911年和1912年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和矿工

---

① 亦称英布战争,是1899—1902年英国同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17世纪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19世纪时布尔人在南非建立了两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英国为吞并这两个国家,于1899年10月发动了这次战争。布尔人被打败。1902年英国吞并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1910年又将两地并入南非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编者注

② 弗兰克·罗斯:《正在兴起的力量》,1909年曼彻斯特版,第116页。

③ 韩德逊:《工人骚动》,伦敦版,无出版年代,第131页。

的罢工就是这样。运动的主动权从领袖转向群众：群众起来反对工会领导，他们作出罢工决议来对抗工会条例。同时，群众的聪明才智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了。如果说工党的建立和发展使英国工人运动破天荒第一次置于社会主义者领导之下，那么对工党的失望就使群众容易接受法国工团主义和美国工联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都在从思想上争夺工人。渴望改组工会，渴望使工会组织民主化，渴望使工会斗争方法激进化，渴望通过把职业工会联合为产业工会并接受非熟练工人参加这种工会来克服“宗派主义”，要求用那些在德国社会主义和法国工团主义强烈影响下训练出来的年青的后起之辈来代替老一代的工会领导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工人群众中的骚动。<sup>①</sup>

对工党的失望使群众转向工会活动。而群众的革命情绪又使工会活动充满了新的精神。群众现在认为罢工不再单纯是为改善集体劳动合同某个条文的斗争，而是反对资本统治本身的战争的一个战役。矿工联合会书记霍季斯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从事工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和他们以前的父辈们一生中从来没有对工业的管理发生过影响”<sup>②</sup>。在群众看来，工会活动的最终目的不再是改善劳动条件，而是由工会对工业本身实行“监督”。

在这一发展阶段爆发了战争。英国政府不得不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并使整个工业为战争服务。熟练工人必须允许妇女和非熟练工人走上在这以前一直为熟练工人保留的劳动岗位，他们必须取消妨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许多工会条例。军事企业中的工人必须放弃他们的迁徙自由权和罢工权。英国政府不敢把这一切强加给工人。它在贯彻战时立法的每一步骤之前，都必须同工会谈判，同工会取得协议。议会只能就同工会取得一致意见的事情作出决议。在整个战争期间天天采取这种做法，大大加强了工人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战争完全改变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结构。国家接收了对军事工业以及铁路、矿山的监督权，对

---

① 麦克唐纳《社会骚动》1913年伦敦版；柯尔《工人的世界》，1913年伦敦版。

② 霍季斯《煤炭工业中的工人监督》，1919年伦敦版，第2页。

金融业和商品贸易作出了规定,组织生活资料和原料的销售;国家资本主义代替了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国民经济这一事实,激起了工人群众统治国家的需要,也就是说,引导群众去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同时,战时经济的各种经验表明,国家官僚多么没有能力组织国民经济,这种经验使群众对权力无限的、给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规定的、限制一切个人自由的国家充满了仇恨。这样就使工人运动中的工团主义潮流日益加强。

“工人骚动”甚至在战争期间也一再发生。战争一结束,它就发挥更强大的作用。不过目前的运动带有和先前不同的性质。在群众的感情上,工党的政治活动和充满了革命斗争热情的工会活动,现在根本不再被看作是对立的了。工党的壮大、工会在政治上直接的强大作用、直接的罢工行动,所有这一切现在只不过是同一发展的不同方面罢了。而且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联合也表现在运动的意识形态方面,因为这种运动把工党改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同各种工会中的革命分子的工团主义高度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了。两者的综合就是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从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中产生出来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在最近十年来得到了发展,这一发展使它逐渐变成英国工人运动内部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向我们描绘了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劳动资料应成为国家的财产。但国家不应通过它的官僚管理劳动资料,而应交给劳动者自己去管理。将每一种工会都变成一个“全国基尔特”,也就是说,变成一个囊括全国各地区的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接管它的那一个工业部门。在对其工业部门的内部管理上,全国基尔特不受国家的影响。但是,在个别工业同社会发生对立的地方,国家、地方自治团体或消费合作社就要作为消费者的保护人同它对立;由基尔特和受委托代表全体消费者利益的团体组成的混合委员会规定需要生产的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国家将每个工业部门的内部事务交给它们的工人自己进行管理,涉及消费者的事务,由工人和消费者共同管理。但

是国家本身使所有劳动者在社会劳动收入中的份额彼此相等,因为国家作为劳动资料的所有者从每个全国基尔特抽取一种利息,并通过划分利息等级使劳动收入之间的差别趋于均等。

这种理想现在直接变成了动力。矿工在全体工人阶级支持下首先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震撼全国的战役,在这一战役中,他们试图实现采矿业的国有化和由国家 and 矿工共同来组织对采矿业的管理。铁路工作人员和邮电公务人员也给自己规定了同样的目标。

在这期间,基尔特社会主义预计不久的将来首先只能实现采矿业和铁路的社会化。它相信其他工业的社会化会出现别的途径。它认为被“工人骚动”弄得越来越伤脑筋的企业主最后将不得不请求工人参与工业的管理。正像单个的资本家会把“小伙伴”、小合伙人接收到自己公司里一样,企业主阶级将乐意赋予工人们一种“小伙伴关系”即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上参与工业管理的一种方式。人们可以组织工业自治团体和组织由企业主与工人组成的“混合委员会”,以便让工人参加管理和担负责任。但工人阶级不应当满足于这一点。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工会强有力的手段不断扩大对工业的监督,将企业主的职能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直到最后企业主阶级在工业中不再执行任何职能而工人阶级业已成熟到实现对工业的管理为止。此后就可能将已经变得不起作用的资本家从工业中全部排挤出去。因为任何一个不再执行任何社会职能的阶级都会逐渐消亡的。<sup>①</sup>

基尔特社会主义并不缺乏革命精神。它毕竟是在革命工团主义的强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的发言人也一再强调说,把资本家从工业中最后全部排挤出去大概只能通过革命道路。但它不是把革命安排在开头,而是安排在末尾:在工人阶级能够把工业管理接收过来之前,首先必须通过不断扩大对工业的监督实际学会这种监督,获得管理工业的能力。<sup>②</sup>

---

① 柯尔《工业自治》1920年伦敦版,第85—86、97、281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基尔特社会主义论证它的实际建议和对未来的理论观念的思路来源于民主制的特殊的盎格鲁-撒克逊变种。民主制在英国的发展和大陆完全不同。在大陆国家,专制制度早就摧毁了个人的、城市的和外省的封建“自由”并使全国屈服于它的官僚统治机关。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使这一过程倒退回去,而是完成了这一过程。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国家仍然由中央政权领导下的官僚机器统治着,所改变的只是,这个中央政权本身不再由独裁者,而是由经过人民普选产生的议会任命和监督。英国的情况则不同。英国的专制制度从来没有得到发展。它从来没有能够建立官僚统治机关。个人、城市和郡的封建“自由”从来没有被摧毁。相反,这里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在于把男爵、绅士和城市贵族阶级从普兰塔日奈王朝、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sup>①</sup>那里夺得的“自由”,首先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遗产,最后变成了全体人民的遗产。1882年、1888年和1894年的改革法规定在郡、区和教区设置民主自治团体以代替“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议员、凶暴的济贫所监护员……实际上是世袭的治安法官”<sup>②</sup>。英国的民主制由于起源和大陆根本不同,特点也和大陆完全不同。法国是由全体人民选举议会,由议会组织政府,这个政府通过它的官僚管理和统治全国;每个公民、每个居民集团只能间接地、只能通过参加议会选举对行政机构施加影响。相反地,英国是人民在教区、区和郡内管理自己的各种事务;人民在地方自治团体中实行“自治”(selfgovernment)。国家只不过是最高的自治团体,它应当管理全国的共同事务,但不应当限制各郡、区和教区的自治。在国家范围内实行的各地方团体的“自治”是英国民主制的基础。

基尔特社会主义现在将英国民主制的各种原则由政治领域转到了经济领域。如果说,政治民主制意味着人民不再容许由国王或寡头来

---

<sup>①</sup> 普兰塔日奈王朝(1154—1399年)、都铎王朝(1485—1603年)是英国的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是苏格兰(1371年起)和英格兰(1603—1714年,有间断)的王朝。——编者注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编者注

管理自己,而是自己管理自己,那么在经济生活中今后也不应当再让资本家阶级来管理,而应当自己管理自己。社会主义无非是“工业民主制”,经济民主制。而且民主制现在要按英国的含义来理解:正如政治民主制以城市和郡的“自治”为基础一样,经济民主制也必须以各个工业部门和企业的“自治”为基础。正如英国民主制否定中央政府指派的官吏管理地方行政区一样,它也必然否定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将经济领域的管理交给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吏去领导。正如国家的政治权力受到地方行政区的自治权的限制一样,国家的经济权力也必然受到各个工业部门的自治权的限制。所以基尔特社会主义规定的目标是“工业自治”,经济自治。

当基尔特社会主义采取了英国民主制的原则并把它运用到经济领域的时候,它也接受了这种原则以之为基础的整个古代英国的个人主义。它以反对国家政权、维护各个工人和各个工人集团的自由的面目出现。它否定国家社会主义,因为由国家管理工业无非是意味着使各个工人集团服从权力无限的官僚。它宣布,工人的自由既不能同资本主义企业主统治工业相容,也不能同国家任命官吏领导工业相容,哪怕这种官吏是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任命的。最后,它甚至认为,为了维护各个工人和各个工人集团的自由,与其由国家对工业实行单独统治,不如由工人和企业主分享对工业的监督。<sup>①</sup> 而它对社会革命所采取的态度恰恰产生于这一思想。国家社会主义将企业交给由统治国家的少数先进工人指派的工厂官僚领导;它要求工人对国家指派领导生产过程的人“绝对服从”(列宁);为了实现这种服从,使这些领导人拥有“广泛的纪律惩处权”(托洛茨基)。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不管工人阶级达到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的确总是可以实现的。而应该建立在“自治工厂”、自治企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则相反,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工人阶级通过逐渐扩大对工业的监督而获得了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能力(这是

---

<sup>①</sup> 柯尔《工业自治》,1920年伦敦版,第93页。



实行工业自治的前提)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利用它在工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斗争手段,以便越来越广泛地扩大它对工业的监督,在这以后,它才能在实行这一监督的实践中不仅把资本家从工业中驱逐出去,而且把工业本身的管理接收过来。

布尔什维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在围绕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形式的争论中产生的。孟什维克希望把党建设成一个由工人自己组成的一些民主组织的联合会。布尔什维克担心没有经过训练的、只考虑眼前经济利益的工人参加组织会削弱党的革命性质。依照列宁 1902 年和 1903 年的组织计划,党只应当由一个中央委员会统一领导的一些“职业革命家”的小委员会组成,并且要它们所组织和领导的工人服从自己。“革命组织对群众运动专政”的思想,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道扬镳了。<sup>①</sup>今天布尔什维克将这种严格集中的革命组织对群众运动的专政,不再是在一个小小党组织的狭小范围内付诸实现,而是在整个幅员广大的俄国付诸实现了。一个严格集中的、由“职业革命家”统治的国家政权对一切劳动力和劳动场所的专政——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工人运动中的思想家的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无非是实现一种理想的工具。正像他们自己在革命斗争中不怕任何牺牲一样,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他们的理想,为了到达天国,哪怕群众先得忍饥挨冻,遭受政治奴役和战争蹂躏,也在所不惜。

相反,工业民主思想是从进行斗争的工人群众自身中成长起来的。当工人阶级在工会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加强它对工业的影响的时候,不断扩大它对工业监督直到自己能够把工业完全接收过来的这一思想,也就在工人阶级中发展起来了。既然工人阶级通过党的政治活动加强了它的工会活动(各工会是在充分保证自己在工业事务中的自治的条件下联合成为政党的),那么它也就可以把未来的社会国家设想为实行自治的各个“全国基尔特”的联合会。还不是那些仅仅把无产阶级当作

---

<sup>①</sup> 叶哥罗夫《政党的萌芽》,载于《俄国的社会运动》,马尔托夫主编,1909年彼得堡版第1卷,第406页。

思想工具的思想家的社会主义,而是工人运动自身的社会主义,这种工人运动是在车间里的日常斗争实践中和从这一斗争实践中形成它们自己的思想的。

尽管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和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反驳代议制国家社会主义时思路常常彼此接近,但二者在社会主义思想界中却是截然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是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推翻了权力无限的沙皇国家政权,而代之以同样权力无限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它的社会主义取消了资本家在企业中的无限统治,而代之以国家政权特派员的同样的无限统治,而这个国家政权本身只不过是工人阶级革命先锋队的统治工具而已。相反,英国无产阶级是在民主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民主制小心翼翼维护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市镇的自治,防止国家政权的任何干涉,而不管这个国家政权是采用多么民主的方式建立的。因此,它的社会主义首先考虑的是,保护工人的自由和各个工业部门的自治,抵制国家政权的任何干预,哪怕这个国家政权本身是由工人阶级统治的。而这种对比所说明的似乎不只是俄国工人阶级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凝结着不同历史、不同传统和继承着不同思想体系的民族差别。我们通过这种对比不如说认识到了一般无产阶级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思维方式的不同。

社会主义最原始最强大的动力就是反对经济上的不平等。工人拿自己的贫困同资本家的财富作比较。他们希望把政权夺取过来,以便能够“抢夺赃物”,强使人人在经济上获得平等。15世纪到18世纪的专制君主政体的专制制度之所以需要,是为了使封建时代在“权利”和“自由”方面的千差万别趋于均等,为了首先在专制邦君政权的暴政面前人人处于同样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建立普遍的平等权利,这样才能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能够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因此,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需要,也是为了在短期内毫不留情地打击享有特权者的种种反抗,使人人在财产和收入方面彼此趋于均等。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在无产阶级已经经历了较长的政治民主和无产阶级组织时期的地方,产生社会主义的根源就不同了。国民教育的提高,对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的积极参加,工人组织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人阶级借助于劳动保护法和工会斗争而获得的较充分的闲暇,——这一切使得过去的劳动奴隶逐渐成为自由的、自觉的、有个性的人。而随着工人成为有个性的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就成了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最强大的动力。“导致工人走向集体主义的因素,与其说只是财富的不平均和分配方面的悬殊,不如说是对利己主义的企业主阶级的专横行为的抗议和对自由劳动场所的理想追求”<sup>①</sup>。正如国家中的自由人不再愿意服从由于继承权的偶然机会而成为他的主人的国王一样,哪怕这个国王的权力已由宪法严格加以约束了也罢,他在企业中也不再愿意服从由于继承权的恩惠而上台的主人,哪怕这位主人的权力已由工会大大限制了也罢。对自由的渴望现在正引导成熟为有个性的人的工人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并没有在使一个权力无限的中央政权(哪怕它是由工人阶级任命的)成为每一企业和每个工人的主宰的专制的社会主义中得到满足,而只有在能够保证每个人有广泛的自由活动范围,保证每个劳动集体有广泛自治的社会制度中得到满足。从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对自由的渴望中产生了工业民主制的理想,即工业自治(industrial selfgovernment)。

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促进了无产阶级理想的这一转变。在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把社会主义作为经济生活中有计划的国家秩序的原则来对抗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在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则作为工业自治的原则对抗国家政权的无限权力和对抗经济生活的官僚统治。歌德说:“从一个人想些什么,就可以看出他缺乏什么”。

即使在俄国,无产阶级一开始试图组织国有化工业的形式同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组织计划也并不是有什么两样。但是,在那里这一

---

<sup>①</sup> 列文《法国的工人运动》,1912年伦敦版,第187页。

点并没有办到,因为一个还很落后的、几乎是刚刚组织起来的、根本没有对工业实行过监督的无产阶级要一下子管理全部工业。企业中的无政府状态迫使苏维埃政权走上了采取特征最明显的、最残忍的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在中欧和西欧,社会革命遇到的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的、组织得较好的无产阶级;在这里,工人直接参加管理工业的条件有利得多。尽管如此,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也不会导致工业自治。因为这里和俄国相比,无产阶级专政在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遇到的反抗会强烈得多,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克服无比困难的经济危机,解决无比重大的经济问题。这里和俄国相比,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更多地依靠暴力。这里和俄国相比,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更快地建立强有力的统治机关,以便粉碎各个反抗阶级的怠工,强迫人民群众实行必要的职业上的变更。在这里,要解决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完成的巨大任务(在下一节我们分析经济社会化过程时将更明确地说到这一点),除了由中央国家政权对一切劳动力和劳动场所实行恐怖的暴力统治,没有别的办法。专政的暴力统治和自治是截然对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对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专政,因为无产阶级必须在阶级内部以放弃个人和集团的自由来换取本阶级的统治。任何追求个性自由的阶级,任何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都无法长期忍受国家和劳动场所中的专政;专政在现代工业国中至多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导致建立工业自治的不是专政,而只能是将民主制有计划地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国民经济领域。

### 13. 财产的社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

社会主义希望废除剩余价值名目,停止向资本家阶级交纳剩余价值贡税,从而获得扩大劳动人民群众实际收入的手段。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是以企业主利润、资本利息和地租形式即货币收入形式出现的。这种剩余价值形态引起了一种流行的幻想,似乎只要没收有产阶级的货币收入并把它分配给工人,就可以使群众的生活水平一

下子得到改善。但是实际上,将剩余价值从有产阶级转交给工人阶级是一个困难得多、复杂得多的过程。

货币只不过是商品的票据。既然工人消费的商品和有产阶级不同,如果不同时扩大工人阶级消费的那种商品的生产,靠牺牲有产阶级来扩大工人阶级货币收入的任何办法都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我们想提高工人的货币工资而又不同时扩大工人想要消费的食品、住宅等等的生产,那么工人并不能用提高了的货币工资买到比过去低工资时更多的食品、住宅等等,货币工资的提高将为工人需求集中的那些商品的价格高涨所抵消,实际工资依然如故。因此,如果我们将剩余价值没收过来分配给工人,并且要用这种办法真的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那么我们就必须停止生产资本家通常消费的那些商品,扩大生产工人消费的那些商品。例如,假如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占社会劳动中价值产品的 $\frac{1}{6}$ ,那就有全部工人的 $\frac{1}{6}$ 从事为资本家生产消费品的奢侈品工业。如果现在把剩余价值加以没收并把资本家过去一直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工人,那么奢侈品工业就必须停产,从事奢侈品工业的那些工人就必须转移到生产工人所需要的食品和住宅的生产部门去。这样一来,全部工人的 $\frac{1}{6}$ 就必须输送到新的职业岗位。职业的变更往往也要求居住地的变动,这就需要建筑新的住房。但是,实行这种职业变更的首要条件是供给被输送到新的职业岗位上的大批工人群众以必需的生产资料;这就需要建设新工厂和辅助建筑,生产无数的机器以及工具等等。<sup>①</sup>显然,人们的职业和居住地的这种大规模变更过程和同时进行的社会生产机构的改组过程,无论如何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靠没收剩余价值的办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立刻增加工人的实际收入,首先只能增加工人的货币收入,但不能与此同时提高工人的实际

---

<sup>①</sup> 从理论上考察,这里指的是停止马克思所划分的社会生产中第Ⅱa部类的生产,扩大第Ⅱb部类的生产(参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页以下——编者注)。然而,正像马克思的阐述所明确证明的那样,这要以第Ⅰ部类的重新配置,从而以整个社会生产机构的改组和重新部署为前提。

收入,只有随着大规模的变更过程和改组过程的实现,他们的实际收入才会逐步提高。然而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变更过程和改组过程比通常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在缺乏煤炭和原料的时期,建设新住房、工厂等等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

因此,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前提是以下两个不同的进程:首先是没收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名目的法律行动,其次是改组生产,将劳动力和劳动资料从满足资本家需要的奢侈品工业生产转移到满足工人需要的食品生产的经济行动。

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在改组生产事实上完成的条件下才能提高。单纯通过实行没收的法律行动,它还不能得到明显的提高。如果改组生产只能是逐步的,只能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付诸实现,那么一下子宣布实行没收的法律行动,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毫无益处的。突然的没收不可能提高全体工人的实际收入,而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即从事奢侈品工业的工人立即失业和没有饭吃,因为毕竟不能够把他们立即输送到其他生产部门去。

然而,即使没收剩余价值名目和与之相适应的改组生产完成了,工人阶级实际收入的增加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知道,大部分剩余价值不是被资本家消费掉,而是积累起来了,也就是说,转化为资本和用于扩大和完善他们的生产机构了。不过即使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把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迅速增长的这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工人,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放弃不断扩大和完善社会生产机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把资本家阶级不是积累起来而是用于消费的那一小部分剩余价值拿来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然而工人的人数比资本家的人数多得多。将能够满足数千个资本家穷奢极欲生活的剩余价值额分配给数百万工人,根本不能大大提高各个工人的生活水平。所以社会主义单纯通过改变社会劳动收益的分配的办法不能大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社会主义只有做到大大增加社会劳动收益本身,也就是说,能使生产扩大,使之合理化和集约化,才能明显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卡尔·考茨基在1902年估计,如果能将剩余价值分配给工人的话,没收剩余价值将会使工人的收入增加一倍。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大部分剩余价值即使在“剥夺剥夺者”以后也必须用于扩大和完善社会生产机构。“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我们将资本一下子加以没收,从资本家目前的收入中也不会剩下太多来提高工资。所以,要能够提高工人的工资,绝对必须使生产超出迄今为止的规模”<sup>①</sup>。如果这在1902年就是正确的,那么今天还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现在能够分配给工人群众的剩余价值比战前少得多了。

一个社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首先取决于一个社会所完成的生产劳动量,其次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剩余价值率本身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sup>②</sup>。今天,一方面由于原料和煤炭缺乏,完成的劳动量比战前少得多,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期间对农业和采矿业的掠夺和劳动力身体衰弱,劳动生产率比战前要低得多。因此,今天的剩余价值量必然比战前要少。

另一方面,今天的社会和过去相比也必然将更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积累起来。因为既然战争不仅中断了社会生产机构的扩大和完善,而且也破坏了消费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再加上又毁灭了大量的生产资料,所以现在和过去相比必然把大得多的一部分社会劳动用于再生产和社会生产机构的扩大。但是如果剩余价值比过去少得多,而同时又必须把比过去多得多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积累起来,那就很清楚,即使社会将剩余价值全部没收,工人收入的增加也只能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今天更加证实,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不能靠单纯改变社会劳动收入分配,而只能通过提高生产。

因此,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改变生产的部署,用满足工人需要的食品生产代替满足资本家需要的奢侈品生产,而且它还必须并且首先要扩大整个生产并使之合理化。社会主义通过克服资本主义(哪怕是有组

① 考茨基《社会革命》第2编《社会革命后的次日》,1902年柏林版,第21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编者注

织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有计划地组织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取消竞争和贸易,使部分直接从事竞争、部分从事竞争所需要的生产的大批群众转入生产劳动,从而扩大生产。社会主义通过使生产集中于在技术方面最完善的工厂并且为生产提供最充分的流动资金,从而使生产合理化。但是,不论是使广大群众从竞争的工具变成生产的工具还是使生产集中化和合理化,这两个过程都需要使大批群众实行职业上的变更和居住地的变迁,都需要建设许多新的生产场所和住宅,因而无论如何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两个过程无论如何只能逐步完成,在目前缺乏煤炭和原料的情况下,只能特别缓慢地完成。而且只有随着上述两个过程的完成,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因此,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不仅要以剥夺剥夺者的法律行动为前提,而且也要以社会生产机构和分配机构合理化的经济过程为前提。如果说,经济过程只能逐步实现,那么群众生活水平也就只能逐步提高,即使一下子宣布实现剥夺的法律行动也是如此。

民主社会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的区别首先在于,实现剥夺生产资料的**法律行动**和没收剩余价值名目的方式不同。如果想一下子完成剥夺和没收,那就需要采取专政和恐怖手段。民主制只能逐渐地、有步骤地采取按部就班地改造现有的法律制度的办法来完成剥夺和没收。因此毫无疑问,专政是大大加速社会化**法律行动**的手段。但是,专政是否也能加速社会化的**经济过程**,是否也能加速生产的改组和合理化,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而只有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才真正是加速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一种手段。

现在很容易了解到,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的改组和合理化是以社会主义所遇到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当时的结构为转移的,因此这种改组和合理化在各种国民经济中也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俄国很大一部分工业曾经属于外国资本家。那里实现剩余价值占有的方式是这样的:俄国工业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或卖给农民,或卖给国家,而国家用农民交纳的赋税来付款。为了能买到工业品和交纳赋税,



农民就必须出售谷物。农民把谷物卖给商人，商人又将谷物输送到国外，从而换到外国的支付手段并将这种支付手段卖给工业企业。工业企业利用这种支付手段来向外国股东支付股息。从根本上来说，整个这一流通过程归结起来就是：工业企业用自己的产品换取谷物，并以谷物形式将剩余价值付给它们的外国股东，让他们以自己本国的奢侈工业品来换取这些谷物。现在要是取消剩余价值名目，也就是说，不再把股息付给股东，而是分配给工人，那么改变的只是，农民为了能购买工业品而出售的谷物不再输送到国外，而是被俄国工人买去并消费掉。用工业企业的利润购买的大批谷物，现在仅仅不再落入外国股东之手，而是落入俄国工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生产的改组根本不会实现，只是产品的分配改变了。

比方说，要是英国取消了剩余价值名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变换成英国奢侈工业品。现在如果资本家被剥夺，剩余价值归工人占有，那么一方面，奢侈品工业必须停止生产，另一方面，生产英国工人所需要的食品的那些生产部门和为了交换英国工人所需要的外国食品而从事生产出口商品的那些生产部门，就必须扩大。所以取消剩余价值名目在这里需要经过一个真正的改组过程，需要把劳动力和劳动资料从生产资本家所需要的产品的工业部门转到其他生产部门去。

因为俄国大部分工业是由外国资本支配而在西欧和中欧则是本国资本占优势，所以很明显，取消资本主义剥削所需要的生产改组的规模在西欧和中欧必然要比俄国大得多。

俄国的工业很年青。现代技术的一切成就是完全现成地被输入俄国的。因此，俄国的工业集中于比较少数的、技术上高度完善的企业。所以社会主义可以把工业接收过来，而用不着根本改造生产机构。比方说，英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工厂工业是一个世纪以来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因而每一个工业部门都有规模极不相同、技术完善程度也极不相同的许多企业同时并存。在这里，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必须着手

将落后企业关闭,把生产集中于技术上最完善的企业。因此,在一些老牌工业国,社会生产机构合理化的任务的规模要比俄国大得多。

俄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产品没有出售,而是被农民家庭自己消费掉了。因此,俄国国民的大部分劳动产品不是为供应市场的商品,而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生产的物品。比方说,英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那里农业只占全国生产的比较小的一部分,而且农业主要是为市场而不是为满足自己需要生产的。所以在各工业国中,全国劳动产品的商品部分比俄国大得多。因此各工业国中,从事商品贸易、从事竞争和用于生产竞争资料的人数比俄国多得多。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社会主义必须使社会分配组织合理化,而且必须将资本主义用于从事竞争和竞争所需要的生产的一大批人转到从事生产劳动。这种情况证明,西欧和中欧的这种合理化过程的规模也必然比俄国大得多。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构成社会化的经济内容的所有这三个过程的规模在西欧和中欧比在俄国原始的国民经济中要大得多。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能够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促进和加速这三个过程的实现。实际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专政不仅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对大规模的改组过程和合理化过程可能进行的一切反抗,它也比民主社会主义更容易粉碎这一改组过程在工人阶级本身中所遇到的反抗。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大批工人就必须由他们以前的职业岗位和居住地转到别的职业岗位和居住地。各个工人阶层职业和地区的特殊利益同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发生了冲突。民主制只能通过教育工作,只能诉诸工人的理智和团结,也就是说,只能逐渐地克服各个工人阶层对这一改组过程的反抗。专政是采取种种军事强制和恐怖手段来粉碎这种反抗的,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采用这种手段来反对各个工人阶层的。正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且一旦它变成这样,它对整个生产和分配实行大改组(这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就会比民主制快得多。

然而到处都能用专政手段强制实行大改组过程吗?俄国必须进行

的改组过程和合理化过程只是比较小规模的。而且俄国工人可以忍受苏维埃政权把他们编成劳动大军和派往苏维埃政权所需要的地方。英国的改组过程和合理化过程对群众生活习惯的干预必然要深得多。那里必须把数百万工人输送到新的职业岗位和迁往新的住地。在英国工人的“工业民主制”的理想中,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强烈的个人主义、坚持单个企业和单个工业部门实行自治的思想。如果某个专制主义的政权,哪怕是由工人阶级任命的政权,打算关闭他们的企业,命令他们转到其他职业岗位和迁移到其他城市,他们会容忍吗?在俄国的文化水平基础上,生产的大改组过程可以采取专政的强制办法来实现,因而也可以加速实现。在一个拥有带着个人主义感情的、受过自治的思想意识陶冶的工人阶级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国,任何这类尝试都将遇到工人群众自己的反对而失败。在这里,大改组过程只能在与各个职业集团和工业集团经常取得协调一致,在细心保护他们特殊利益的条件下逐步实现。在高度文明的环境里,实现改组过程和合理化过程不能用强制方式将成年工人输送到新的职业岗位,而只能有计划地对职业选择施加影响,不能用强制方式将他们转移到新的工厂和新的住地,而只能有计划地进行移民工作,这种工作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而只能以较有利的生活条件为诱饵。不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将是很长很长的,只能逐步实现。

如果说,社会化的经济过程只能逐步完成,只有经过几代才能完成,那么一下子实现剥夺和没收的法律行动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只能产生如下后果:从事奢侈品工业的广大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商人、商业职员等等将会没有饭吃,而不可能首先把他们输送到新的职业岗位,从而广大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将大大降低,而不可能同时使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稍微有所提高。较适当的做法是,社会化的法律行动也只能逐步进行,而且也只能同能够实现社会化的经济过程的速度相适应。这也就是说,取消剩余价值名目只能逐步地进行,同能够把奢侈品工业中的失业工人(由于限制资本主义需求而造成的)转到其

他生产部门的速度相适应；对工商业实行剥夺的速度只能同能够把从事竞争的经理商转到生产领域的速度、同能够使生产合理化的速度相适应。经济改造只能逐步完成这一事实要求，实行法律行动也将不采取突然地、粗暴地同过去一刀两断的做法，而将采取有计划地改造现存东西的做法，即不是用专政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

然而这种情况的确也是可能的，即只有用专政手段才能粉碎对社会化法律行动的种种反抗。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专政也只能是发布采取法律行动的命令的一个过渡阶段；随之而来的经济过程只能逐步实现，只能通过劳动群众自己发挥首创精神，也就是说只能在民主制基础上实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强迫人民接受一个新制度的专制制度行动起来总是要比民主制快些，因为民主制只有当新制度在群众自己心目中已经成熟的时候才能建立新制度。然而恰恰是缓慢的民主改造过程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较之专政的强制办法要有效得多。

俄国的专政最初没有使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而是使它惊人地恶化了。这种恶化是内战、外国资本主义的封锁和暂时的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如果革命的这种直接后果被消除，群众的生活水平自然就会大大改善。但是我们不应该对俄国工业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化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所能做到的事情作过高的估计。因为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社会主义要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依靠没收剩余价值，在更大的程度上只能依靠生产的扩大和合理化。然而社会主义恰恰在俄国在这方面所能做的事情比较少：它对生产的扩大只能是比较小的，因为在那里由竞争领域转入生产领域的人相对地说只占国民的一小部分，而且对工业生产的合理化来说，资本主义留给它所做的事比较少，因为资本主义移交给俄国的工业已经具有高度集中的、技术上高度完善的形式。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只要把俄国工业恢复到革命前已经达到的技术上那样合理化的生产就已经足够了，超越这一阶段的合理化对它来说一时还办不到。

提高俄国人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也提高俄国城乡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最重要的手段不是工业的社会化,而是农业的合理化。但是农业合理化的前提是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因为只有达到具有较高文化的阶段,农民才能从传统的劳动方法前进到更完善的劳动方法。然而一旦农民在文化上成熟到可以实行集约化经济,那他们就不会容忍工业无产阶级的专政了。俄国的专政不能通过加快工业的社会化,而只能随着它致力于提高农民文化的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恰恰这样一来它也就同时毁坏了自身生存的基础,因为如果它把农民阶级提高到较高的文化水平,那它自己也就造成了未来的民主制的基础。

相反地,在西欧和中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占的比重大得多,需要在高得多的程度上实行合理化,需要把国民中多得得多的一批人从竞争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这里可以而且必须采取更大得多的规模实现社会合理化过程。正因为如此,这里的生产合理化和分配合理化是一个规模大得多而又只能缓慢得多地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不能用专制方法强迫实行而只能用民主方法实行的过程;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通过这一合理化过程(这是这里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经济任务),劳动生产率就能获得大幅度的提高,因而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就能获得大幅度的提高。

只有对社会主义持一种难以形容的肤浅观念的人才认为,实现财产的社会化即实现剥夺和没收的法律行动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其实,财产社会化不过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生产社会化,即改组生产的经济任务、在生产部门中重新分配人员和劳动力、生产和分配的合理化。财产的社会化用暴力一下子就可以强行实现。生产社会化只能是数十年之久有计划进行工作的结果。当然,实现财产社会化只要专政发布命令就行了,然而通过这种办法却不能引导人们走向更高的生活方式。生产社会化才给予人类对自然更完善的统治,但它并不是暴力的产物,而只能是所有劳动者的民主首创精神结出的果实。

#### 14. 专政和民主

一个阶级的力量首先是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其次是由这个阶级所掌握的物质暴力手段决定的。

决定一个阶级的力量的社会力量因素主要是:第一,阶级成员的数量;第二,它的组织的性质、规模、效能;第三,它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着它所掌握的经济的实力手段;第四,它的政治兴趣、它的灵活性、积极性和牺牲能力的大小;第五,它的教育水平,它用精神手段影响本阶级成员和其他阶级的能力的程度,它的思想体系的吸引力。

一个阶级所掌握的物质暴力手段是,它所指挥的武装部队的数量,它可以用来装备这些军队的武器的数量和完善程度,它能够给予它的武装力量的领导和组织的质量。

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国家内的权力分配仅仅是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不会由于运用物质暴力手段而朝着有利于某一阶级的方向转移。

所有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着民主国家内的权力分配。首先是数量:一个阶级的人数越多,它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就越大,它在国民军中的代表就越多。其次是组织:比方说,无产阶级组织得越好,它对民主议会的组成和活动的的影响就越大。再次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资产阶级的财富许可它在选举中运用自己的报刊和花费大量金钱来影响选民;集中在工厂中的工业无产阶级比分散在庄园和农户中的农村无产阶级可以更好地组织选举;无产阶级通过对社会不可缺少的工作实行罢工可以有效地影响立法。政治活跃性和文化水平也是一样:知识分子不管人数多少,作为“舆论”的制造者发挥强大的影响;农民阶级起先总是简单的“投票的牲口”,其他阶级利用它的选票为自己服务,只有经过数十年之久的训练后,它才学会运用选举权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

民主国家的“共同意志”仅仅是各社会力量因素的合力。比方说,

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无产者的数量,促使他们组织起来,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那么民主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就会在同样程度上获得发展。

凡是工人的数量如此之少或者工人的阶级意识如此之弱,以致有产阶级掌握了多数选票的地方,那里的民主国家是有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有产阶级的领导通常落入资产阶级之手:民主制这时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然而在一定情况下,给民主国家的立法和管理打上烙印的也可能是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民主国家就成为农民共和国。如果工人阶级已经构成选民的大多数,城乡工人的阶级意识已经如此强烈,以致工人不再让资本主义报刊和资本家的选举骗局来影响自己,那时工人阶级就将夺取民主国家的权力,民主国家将成为工人阶级的统治工具,民主制将成为无产阶级民主制。民主制只不过是形式;这种形式是具有资本主义的、农民的内容,还是具有无产阶级的内容,这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民主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不过这一工具按照社会力量因素的发展程度,可以落入不同的阶级之手:落入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之手。如果民主制通常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在社会力量因素的一定发展阶段将成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形式。

当然,民主制国家和一切国家一样,也是以暴力为基础的。但是,民主制国家利用武力仅仅是为了保证贯彻它的法律、命令和规定以反对少数违抗者。但是这种法律、命令、规定的内容不是由某个阶级的暴力决定的,而是仅仅由各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

相反地,在其他一切国家形式中,暴力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比方说,我们来看看十一月革命以前的德意志帝国吧!要是1918年以前德国是民主制的话,那么霍亨索伦家族、将军、容克、重工业界、官僚的影响就会比他们实际上拥有的要小得多,工人阶级的影响就会比它实际上拥有的大得多。德国的宪法通过设立君主制、联邦议会、三级选举权、上议院、官僚行政组织和军官特权等等而赋予容克和资本家的权力比他们在民主制宪法下能拥有的要大,赋予工人的权力比他们在民主

制宪法下能拥有的要小,也就是说,这部宪法赋予容克、资本家、官僚的权力比与社会力量因素相适应的要大,赋予工人的权力比与社会力量因素相适应的要小。但是这部宪法之所以能够实行和维持是由于统治阶级掌握了物质暴力,掌握了军队。一切非民主制的国家形式的基础是,一个阶级依靠暴力制定和维持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赋予它的权力比与社会力量因素相适应的要大,赋予其他阶级的权力比与社会力量因素相适应的要小。因此一切非民主制的宪法的基础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在任何非民主制的宪法中都存在着一个矛盾,由暴力维持的法律的权力分配同由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社会的权力分配之间的矛盾——民主制的国家形式是没有这种矛盾的。

但是,如果暴力可以建立和维持与社会力量因素不相适应的权力分配,那么暴力本身终究要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一个阶级能否影响、渗入、从内部摧毁被用来对它横施暴力的军队,或者剥夺这个军队的物质生存手段,或者用敌对的军队来与之对抗,这都要取决于社会力量因素的发展。因此,总是只有在法律的权力分配和社会的权力分配之间的矛盾不太大的时候,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才会维持下去。如果它们之间的冲突太大,就会出现革命,这个革命将摧毁与社会力量因素相抵触的国家形式,并使法律的权力分配和社会的权力分配趋于一致。当第三等级在法律的权力分配上还是一无所有,在社会的权力分配上已经有了一切的时候,专制的国家制度就将为革命所摧毁。

和其他一切非民主制的制度一样,苏维埃专政的基础也是由一个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用武力强迫社会接受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保证统治阶级所拥有的权力比它在民主制的制度下,即在社会力量因素自由发生作用的条件下所拥有的权力要强大。和其他一切非民主制的制度一样,苏维埃专政也只有在这个专政中所包含的法律的权力分配和社会的权力分配之间的矛盾不太大的时候才能保持下去。

和一切非民主制的制度一样,苏维埃专政也只有通过暴力镇压被统治阶级,即通过内战才能建立起来。在俄国,苏维埃专政也只有通过



反对卡列金、杜托夫、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两年半内战才能得到巩固。在那里,内战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造成了整个生产系统和运输系统的毁坏和城市工人群众的贫困。尽管如此,俄国的苏维埃专政还是能够坚持下来。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由于农民阶级没有文化,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才能够维持他们的独占统治。法律的权力分配和社会的权力分配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大到使苏维埃专政必然被推翻的程度。在农民阶级文化的提高根本改变社会的权力分配从而也使目前法律的权力分配不能维持以前,俄国无产阶级的独占统治将继续坚持下去。

西欧和中欧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这里,无产阶级面临着无比强大的资产阶级和怀着无比敌意的知识分子,而首先是面临着具有完全不同特点的农民阶级。因此同俄国相比,这里只有采取更可怕的暴力手段,只有通过更可怕的内战,才能取得和坚持苏维埃专政。同俄国相比,这里实现生产社会化需要对人民群众实行规模大得多的职业变更和居住地迁移,因而需要克服各个工人阶层为维护特殊利益而进行的强烈得多的反抗。在这里,切断同外国的贸易关系就会造成无比严重的后果。在这里,无产阶级自己也将难以容忍中央政权的无限权力,甚至不久就会反对这个专政,因为专政首先给他们带来的无非是内战、饥饿、强迫他们转到新的职业岗位和迁到新的居住地。在这里,专政在经济混乱和社会混乱中将迅速垮台。

如果说,在这里长期实行苏维埃专政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无产阶级在这里为了取得政权,也不需要苏维埃专政。俄国的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而任何一个现代工业国的无产阶级都占人口的多数。因此这里的无产阶级和俄国不同,它可以在民主制基础上采用民主手段取得国家政权。它目前之所以没有取得这种政权,仅仅是因为它思想上还处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因为广大的工人阶层还没有摆脱资本主义报刊、资本主义选举骗局和资本主义教育的影响。然而谁一旦了解到在一个现代工业国中实行经济上的社会化过程的整个规模和全

部巨大困难,他就不可能相信,在思想上甚至还没有成熟到足以使自己不受资本主义报纸和资本主义选举骗局影响的无产阶级能够完成这一巨大任务。

当然,即使无产阶级采用民主手段取得了政权,资产阶级也将反对它的统治。一旦民主制变成无产阶级民主制,资产阶级就将反对民主制国家,它将拒绝服从它的法律,对它的管理实行抵制。一旦一个民主议会成为工人阶级的统治工具,这个议会也必将采取专政的实力手段,它将采取专政手段,或许是采取恐怖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怠工行为,或许是资产阶级的积极反抗。人们也可以把这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和布尔什维主义专政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专政。这不是反对民主制的专政,而是民主制的专政。在这里,暴力并不企图强迫实行与社会的权力分配相矛盾的法律的权力分配,而仅仅是保障由社会力量因素本身所决定的权力分配以反对少数人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暴力并不是对社会力量因素横施暴力,而是针对少数人反抗社会力量因素的暴力而发挥它的作用。即使这样的斗争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经济动荡和社会动荡。但是在暴力仅仅是为了维护与社会力量因素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法律的权力分配的地方,这种经济动荡和社会动荡毕竟要比打算使用暴力来强迫实行与社会的权力分配相矛盾的法律的权力分配的地方小得多。

当然,决不能肯定地说,历史只许可无产阶级在用民主手段即以民主制议会和地方民主自治团体专政的形式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建立自己的专政。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无产阶级还不能够用民主手段进行统治的阶段,阶级斗争的发展就迫使无产阶级实行暂时的专政。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力量决战的时期,阶级对立将会极度激化。阶级对立的尖锐可能摧毁民主制。这时可能出现如下状况,即资产阶级已不再强大到足以采取民主手段来统治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采取民主手段来统治资产阶级,在这一情况下,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权力分配——例如,像德意志奥地利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党

和无产阶级政党实行联合的形式,或者像意大利那样的无产阶级自愿忍受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也由于阶级对立的尖锐而终究垮台。如果民主制的机构已不再能发挥作用,无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都必然用暴力手段来建立本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成为阻止资产阶级粗暴的反革命专政的唯一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形式同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民主制立法机关的地方必然不同。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采取民主制专政的形式,而只能采取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专政的形式。这种阶级组织可能是像俄国那样的工人苏维埃,可能是像 1871 年巴黎那样的已经被无产阶级掌握了的地方自治团体,然而也可能是工会。在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是一个刚刚开始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只有工人苏维埃能够成为它的统治机关;在中欧和西欧,工会早就是无产阶级日常行动的真正体现者,工会(它掌握的经济方面的经验比苏维埃要多得多,掌握的有组织的行政机构比苏维埃要好得多)在一定情况下也就能够把这一职能接受过来,尤其是工会的集中化的组织将会大大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政权迅速联合成为中央政权。

但是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而在于它的社会内容。如果无产阶级把专政宣布为自己实行阶级统治的长期形式,宣布为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政治工具,那么专政就会破坏经济过程和社会管理的整个连续性,而且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动荡,在这种动荡中,西欧和中欧的专政就必然垮台。相反地,如果无产阶级把专政仅仅看作和仅仅宣布为从反民主的反革命的直接危险中拯救民主制或解决破坏民主制的冲突的一种手段,而在完成了这次任务之后使国家恢复民主制的形式,那么这种危险在一定情况下就可以避免。在西欧和中欧,改组生产、使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合理化、变更工人群众的职业和居住地这样一些巨大的任务,只有在地方自治和职业自治的基础上,只有在所有那些在社会劳动过程中仍起着重要作用的居民阶层同心协力和共同监督下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

制基础上才能完成。在这里,专政只能是在反对反革命的危險中保障民主制,或者说,在反对少数人的反抗中维护民主制,但专政本身不可能设想解决只有民主制才能解决的任务。

托洛茨基还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之后就写道:“考茨基证明,保存民主建筑的基础对劳动阶级归根结蒂总是有益的。整个说来,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制设施的框框内进行它的阶级斗争,甚至实行它的专政,归根结蒂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那么这还决不意味着历史经常能够给无产阶级提供这种局势。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根本没有证明,历史总会创造这种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条件。”<sup>①</sup> 托洛茨基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从这一观点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无产阶级似乎并不是始终和到处都把专政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而只不过是应该和必须在历史本身迫使它这样做的地方决心实行专政;第二,无产阶级只有在历史条件迫使它实行专政的情况下才必须坚持专政,而一旦“历史能够给它提供这种局势”,它就必须努力“在民主设施的框框内进行它的阶级斗争,甚至实行它的专政”。不过,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并没有得出这些结论。它把迫使俄国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特殊历史条件看作是一般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普遍条件,它认为民主制只能是,或者只能成为“隐蔽的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只能通过苏维埃专政,而且这种苏维埃专政必须延续到“国家消亡和与之伴随的阶级本身消亡”<sup>②</sup> 为止。托洛茨基的见解在这里一点不剩了。

国家固然总是一个阶级的统治机关。但是,阶级统治的形式是随着发展而变化的。早在大战前的最后一个世代,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统治就不再是以公开地、粗暴地剥夺无产阶级的权利为基础了。资产阶级行使自己的阶级统治已经只能采取民主制的形式了。在一个所

---

① 托洛茨基《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1919年柏林版,第95页。

② 1919年3月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参看《第三国际的建立》1919年维也纳版。

有各阶级都活跃地参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里,除了这样一种阶级统治之外,不可能长久地有其他的阶级统治,这种阶级统治也准许被统治阶级在“舆论”方面有进行竞争的自由,准许它们参与形成国家的共同意志和对这一意志的实现进行监督,因此,这种阶级统治的存在是以统治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它的机械的暴力手段为基础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从长久来说也只有采取同样的形式和在同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以专政在这里将不过是一种夺取、保障或者巩固民主制的暂时的手段。但是,改革全部国民经济组织的伟大任务(这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在这里是不能通过短期的专政来完成的;专政在这里只能保障和巩固这样一个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经济任务将通过数十年之久的民主劳动得到完成。

## 15. 德国革命

在俄国和英国之间,德国处于中间状态。德国人民不像俄国人民那样现在刚刚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但也不像英国人民那样经历了那么长的个人自由、议会制和民主制的时代。德国社会主义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一方面不同于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同于英国的“工业民主制”的特征。现在,由于战争和被战败的状况已经完全改变了德意志民族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生存条件,德国社会主义的特征也和 1863—1918 年不同了。

有一些民族,它们的命运注定它们充当革命角色。例如波兰在一个多世纪之久就是这样的民族。因为波兰人民除了彻底摧毁 1815 年的代表会议<sup>①</sup>决议确立的欧洲统治制度外,没有别的办法获得解放和统一。因此,它必然把所有反对这一统治制度的民族都看作自己的同盟者。所以,不管是在哪里,即不管是在维也纳还是在柏林,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那不勒斯,只要那里的人民起来反抗神圣同盟的统治制度,

---

<sup>①</sup> 指 1814—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编者注

波兰人都参加了战斗。

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分派它扮演了相反的角色。三月以前<sup>①</sup>的德国民主派固然希望能够在革命斗争中通过在各个单独的君主国的废墟上建立全德共和国,通过同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的自由战士、同法国的共和派和英国的激进派结成联盟来取得德国的统一。但是这一尝试失败了。德国的统一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战争,不是通过民主派的街垒战士而是通过普鲁士国王的士兵,不是通过同法国共和派结成联盟而是在沙皇制度的保护下建立的。而且这样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是以在东方瓜分波兰、在西方兼并亚尔萨斯-洛林、在南方建立德意志奥地利人对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统治为前提的(把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刺刀置于德意志人的指挥下是这个民族的奥地利分支所追求的目标)。这个民族的幸福是建立在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之上的,这种幸福只能通过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才能维持,而且只能以对所有邻近民族横施暴力为基础。如果这个民族的生存建立在反革命的统治制度之上,那么这个民族的领导必然落入它的反革命阶级之手,这个民族本身必然是世界上反革命的领导力量。

德意志民族的意识是和它的这种存在相一致的。因为民族幸福所系的统治只能通过战争才能建立起来,所以它相信暴力具有创造性的全能。因为民族统治以及同这一统治相联系的民族幸福只有通过穷兵黩武的军事国家才能维持,所以它承认国家对国民经济、对个人和团体具有无限的权利。因为只有王朝、容克和将军才能完成国家的统一(这是巨大的经济高涨的基础),所以它在思想上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行政当局。

然而战争破坏了整个这一统治制度。德国已不再统治自己的邻近民族,而是把德国的国土输给了所有邻近的民族。德国的幸福已不再建立在自己的统治制度之上,它已经被凡尔赛统治制度毁灭了。由于法、英帝国主义给它造成的软弱、分裂和贫困状态,它已不再有可能通

---

<sup>①</sup> 指德国 1848 年 3 月革命以前。——编者注

过任何战争来解放自己了。它已经失去技术上进行战争准备的一切可能性。德国目前面临着 1919 年的和约,就像波兰曾经面临 1815 年的和约一样:它只有寄希望于破坏帝国主义统治制度的国际革命。因为这个民族的未来还只有通过国际革命才能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民族的领导就落入它的唯一的革命阶级之手,落入无产阶级之手,而这个民族自己就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这就是这个民族自身还没有意识到的德国革命的历史意义。

这个民族还要为认识自己革命的意义和目的而奋斗。而由于把过去的传统同当前的思想混淆起来,它还错误地追求灾难性的,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于是有一些人梦想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鲁登道夫和列宁结成联盟同协约国打仗。但是,这种疯狂性(就算这不是不可设想的疯狂性)意味着德国成为俄国人和法国人的战场,意味着德国的最后一点点幸福被毁灭掉。

于是还有一些人梦想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反对协约国的军事联盟。但是德国不像俄国那样靠本国的收获物为生,不像俄国那样由于地势有利和幅员广大可以防止外国军队的侵犯。布尔什维主义将会破坏德国的生产体系,将使德国遭受饥饿、内战和侵略,它会使德国即使同俄国结成同盟也没有对抗西方的防卫能力。

否,任务不可能是把在黑白红三色旗下输掉的战争在红旗下重新进行下去。德国革命负有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

完成它的任务的首要条件是同俾斯麦时代的传统和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然而,社会主义在它还没有把自己从过去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以前,不可能把民族从过去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这里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摆脱思想上向过去的德国统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投降(这是“8月4日政策”<sup>①</sup>的真正内容)的一切后果。这里要求的更多!

---

<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 1914 年 8 月 4 日召开的国会上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和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编者注

如果我们想摆脱德国历史上易北河之东的时代<sup>①</sup>遗留下来的观念的束缚,我们就必须把自己从迷信暴力的万能和国家的全能中解放出来。布尔什维主义是目前获得这一解放的障碍。因为在连施、普伦格、施本格勒的普鲁士社会主义(他们把普鲁士国家标榜为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把社会主义标榜为普鲁士国家观念的实现)和俄国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亲属关系。两者都同样迷信产生奇迹的暴力的独立创造力,两者都同样寄希望于权力无限的、支配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国家,两者都同样幻想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无限权力可以并且应当强迫俯首听命的群众采取更高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只是把普鲁士的国家观念翻译成其他语言,只是用其他色彩装饰起来,只是用它为另一个阶级服务,那我们就不能从普鲁士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拿另一种真正激进的截然相反的国家观念来同普鲁士主义相对抗,即必须采取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的根源是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它的源泉是群众的首创精神,它的目标是全体劳动者的自治。德国还没有一个工人政党看到这项任务:未曾摆脱旧普鲁士主义的右派社会党人没有看到,屈服于新俄罗斯精神诱惑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也没有看到。德国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无非是实行真正的、由个人主义根源产生的民主制,而这种民主制寻求在英国的工业自治思想和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自我教育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中得到体现。

只有当这种社会主义使德国人民的思想界得到彻底改造,使德国的精神为之一新时,当摆脱过去的制度的革命解放带来摆脱这些制度的观念的更加革命的解放时,只有当产生这样的另一个崭新的德国时,德国才会摆脱它历史上的反革命时代留给它的为各国人民憎恨的遗产。而只有随着这种德国社会主义在建设性劳动中付诸实现,并且给西方各国人民树立符合他们自己精神的榜样,德国人民才会赢得西方工人阶级对自己的热烈同情,他们才会通过创造性行动的宣传给西方

---

<sup>①</sup> 指位于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的容克地主的统治制度。——编者注



无产阶级革命以强有力的推动,他们才会获得同盟者,而他们只有和这些同盟者一道行动才能打碎西方帝国主义的锁链。

的确,命运的共同性把德国和俄国联结在一起。两国都需要互相利用来建设自己的经济。两国都是西方帝国主义统治制度的牺牲品。这种命运的共同性要求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结成同盟,这种同盟不是为了同西方打仗,而是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互相支持。但是这种同盟不能建立在斗争方法和统治方法一致的基础之上,而只能建立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勇气、献身精神和热情一致的基础之上。

译自 1920 年维也纳德文版。三联书店  
1978 年版。李宗禹、洪善楠译

# 苏俄的新方针

(1921 年)

## 序 言

我在以笔名亨利希·维贝尔发表的小册子《俄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1917 年维也纳人民书店版)中描述过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这本小册子是 1917 年 10 月 10 日即十月革命前一个月脱稿的。早在这本小册子中,我就说过,我深信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只可能是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由资产阶级建立,只能由工人和农民建立,而工农为了打退反革命和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首先必须取得统治,只有在进行了土地革命并巩固了它的成果之后,农民群众才会重新推戴资产阶级,从而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见,那时候我已经把同农民阶级结成联盟的无产阶级的暂时统治,看作是俄国走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个必要的发展阶段。

一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了。那时工人和农民的统治采取了苏维埃专政的形式。我在 1920 年 4 月 12 日完稿的小册子《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1920 年维也纳人民书店版)中描述了俄国革命的这个第二阶段。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也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作

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本身必然会通过土地革命创造前提，使农民阶级上升，从而使俄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制。

布尔什维克狂热地反对我对俄国革命的意见。我让历史本身来做出反批评。历史迅速而彻底地做到了这一点。苏维埃政府在农民群众的压力下从1921年春天不得不实行的“新方针”，证实了我的预见。

我曾经预言，农民的私有制会摧毁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拉狄克对我的答复是，粮食垄断制将把农民经济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sup>①</sup>

1921年3月21日苏维埃政府却不得不取消粮食垄断制而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粮食贸易制。

我曾经预言，俄国将发展到采取独特的混合的经济形态。“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中的国家社会主义，销售商品的合作社组织，农民的个体经营，趁城市缺粮而增长起来的农民财产，依靠黑市（这在农民的私有经济基础上是不能根除的）并同它一起发展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在特殊的租让权基础上产生的、由外国资本建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俄国的新经济将由以上这些因素组成。”（第70页）<sup>②</sup>拉狄克辛辣地嘲笑了这个“新的孟什维主义哲学”。<sup>③</sup>但是，列宁在几个星期以后写道：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 (1) 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 (2) 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 (3) 私人资本主义；
- (4) 国家资本主义；

---

① 拉狄克《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和实践》，1921年汉堡版，第9页。

② 参看本书第247—248页。——编者注

③ 拉狄克《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和实践》，1921年汉堡版，第6页。

(5)社会主义。”<sup>①</sup>

可见列宁也认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不是要堵塞或禁止资本主义的发展”<sup>②</sup>,而是要加强俄国过渡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来反对自然经济的和小生产的成分;其途径必定是,对外国资本实行租让制,鼓励合作社,吸引代购代销商人来推销国家货物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最后把国有的企业租给资本家。<sup>③</sup>现在有没有人能够比这更加透彻地证明我的“孟什维主义哲学”——不久前拉狄克还认为这是十分可笑的——是正确的呢?

布尔什维主义的“新方针”就这样全面地证实了我的关于俄国革命种种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还有争论的只是一个问题,即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上的变革将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影响。我在11月初发表于维也纳《工人日报》上的四篇文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我把这四篇文章不加改动地在这里发表。

不言而喻,俄国布尔什维克将首先把我对他们的“新方针”的分析误解为对俄国革命的“诬蔑”,看作是对它的“背叛”。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处在反对最强大的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之中。谁处在这样的斗争之中,谁就需要幻想。无论在阶级斗争还是在民族战争中,可能彻底胜利的幻想是唯一使战士产生空前勇气和最大毅力的力量源泉。这种力量源泉是在斗争中“坚持到底”的精神上的先决条件。如果远离炮火的我们去嘲笑火线上的人的那种为生存所必需的幻想,那是要不得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陷入只有火热的斗争才能为之辩解的幻想之中,也同样是不适当的。如果说,马克思教给我们的历史观,跟斗争者自己从战斗的激情中培育出来的那些意识、幻想相比,不能有所不同地、不能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代最巨大的阶级斗争,那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编者注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页。列宁的原话是“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编者注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4—509页。——编者注

么这种历史观对我们是没有用的。

但是,如果说,当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坚持”斗争的时候幻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力量源泉,那么一旦必须停止那种为取得无法取得的东西而进行的斗争,以防彻底失败的时候,幻想对于斗争者本身来说就成为最大的危险了。苏维埃政府及时地同它的经济上的种种幻想实行决裂,这是它的巨大功绩。但是,如果在经济上实行新方针以后不跟着在政治上也及时地实行新方针,那么实行“新方针”这个大胆的行动将是没有什么成效的。正因为我们深信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同俄国革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有权利和有义务来证明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变革,唯有这种变革才会使俄国革命、同时也使国际无产阶级免遭最严重的灾难。

奥托·鲍威尔

1921年11月12日于维也纳

## 1. 苏维埃共和国的第四年

彼得堡的士兵和工人推翻克伦斯基政府而使苏维埃政府执政的四周年的日子,前几天到来了。俄国这四年的历史是史无前例的英勇斗争的历史,是充满令人鼓舞的胜利和骇人听闻的失败的历史。西欧和中欧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斗争条件尽管与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发展条件不同,但是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仍旧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利用从这四年的经验中得到的认识促进他们本身的斗争。因此,现在正是回顾一下俄国革命在苏维埃共和国四年中的发展的时候了。

苏维埃共和国的头三年是国内战争的三年。在这期间,俄国的农民和工人经过无数次流血战斗战胜了高尔察克、都托夫、邓尼金、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打退了协约国及其仆从的武装进攻,为苏维埃政府征服了整个俄国。这战争的三年,是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官

僚统治机器、红军和万能的警察组织“契卡”的时期。这三年同时是俄国国民经济完全听命于革命的国家政权的时期。在这三年,俄国的全部工业国有化了,农户的一切剩余被国家征用了,商业完全被压制了。国家征用农户的产品,把这些产品分配给城市居民。国家把其工厂生产的工业品运往农村,把它们分配给农民。资本主义看来完全铲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现了。

但是,这三年的国内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农民知道,他们经营出来的任何剩余都将被征用,所以他们自己食用需要多少就只耕种多少。在1920年,粮食播种面积比战前减少18.5%,马铃薯播种面积减少27%。同时,由于缺少牲畜、肥料、农具,每公顷的收获量也大大地下降了。根据斯特鲁米林的数字,1920年谷物收成的纯收获量只有18亿普特,而1913年为30亿普特。<sup>①</sup>但是,工业比农业还糟得多。由于工人营养不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由于工业的官僚主义领导的缺点,工业生产严重地下降了。克鲁敏把1920年的工业生产同1913年的生产作了对比。根据他的计算,1920年的情况如下:

铁矿石产量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25%
盐产量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17%
原油产量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40%
煤产量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0%
生铁产量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12%
机器产量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5%
棉纱产量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5.6%
亚麻线产量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25%
糖产量 <sup>②</sup>	等于和平时期生产的	6%

当战争和国内战争在苏维埃制度的第三年末终于结束,当苏维埃共和国终于赢得和平的时候,人们就必须着手重建遭到破坏的国民经

① 1921年3月31日《经济生活报》。

② 1921年5月27日和28日《经济生活报》。

济。但是,苏维埃政府起初认为,可以通过变本加厉地使用它在战争期间使用过的那些办法来实行重建。托洛茨基起草了他的使工作军事化的纲领。工厂应当军事化,工人应当置于严格的军事纪律之下。他们指望借此提高劳动强度。小资产者、农民、被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家属应当被征入劳动大军,并在军事强制下进行劳动;他们指望由此为巨大的公共工程获得劳动力。他们甚至认为可以使数百万农户服从官僚主义的领导;国家应当规定它们耕种什么和怎样经营土地。<sup>①</sup> 卡尔·考茨基在他的卓越的近著《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sup>②</sup> 中激烈地批驳了这一军事官僚社会主义的空想;但是,早在考茨基的批判发表以前,历史本身就已经使那一切计划遭到了更加无情得多的批判。

1921年春,俄国各个城市笼罩着一片可怕的粮荒和油荒。忍饥受冻的工人开始骚动起来。他们的愤怒首先指向工业劳动的军事化。在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把工人束缚在企业中;工人不许离开自己的企业而在另一个企业中就业。现在工人强烈要求恢复他们的迁徙自由。但是工人同时也反对由国家管理粮食供应。如果国家无法分配给他们规定的粮食定量,那它就必须给予他们为自己在农村弄到粮食的自由。比工人的这种动荡还要危险的是同时也在加强的农民的动荡。农民起来反对以军事手段征用他们的产品。他们要求有权自由支配他们经营出来的剩余产品,要求恢复自由贸易。在这以前农村已经一再有人集成匪帮来反抗武装的征收分队,袭击小城市中的行政机关,破坏铁路;1921年春这种匪徒骚动在唐波夫、沃龙涅什和萨拉托夫三省、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具有很大的规模。西伯利亚的暴乱使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交通完全断绝达两个星期之久。这种骚动终于也波及红军的个别部队,首先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农村度过他们假期的水

---

① 参见1920年12月《俄国新闻简报》上拉林、奥新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文章。

② 考茨基《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同托洛茨基的辩论》,1921年柏林《自由》出版社版。

兵,沾染上农民中间流行的那种不满情绪而返回了舰队。”<sup>①</sup>这样,喀琅施塔得暴乱时骚动达到了顶点。

苏维埃政府把所有这些暴乱都顺利地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些暴乱向它证明,它不能沿着迄今走过的老路继续走下去。由于工人、农民、士兵的反抗日益增长,通过发展军事共产主义即以军事化强迫劳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实现重建的一切计划破产了。在1921年春天那些骚动的压力下,苏维埃政府放弃了所有那些计划,并且下决心尝试以完全相反的办法着手重建。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开始了。

“新方针”只对工人作了小小的让步。一般说来,工人仍旧被束缚在工厂里。只有当一个工人一直被迫干着非本行的工作或者在自己住地以外工作时,他才被允许在自己的住地找个本行工作做。对农民作出的让步要大得多。军事征用制取消了。完全像在奥国那样,农民仅仅必须向国家交纳一个份额——在俄国称之为“实物税”;他们收获的剩余部分可以由他们自由支配。这样一来,粮食的“自由贸易”首先恢复了。但是,最大的让步是对被认为在三年战争中已经克服了的资本主义作出的。苏维埃政府对用官僚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克服经济混乱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它认为,只有通过发挥“个人首创精神”才能克服这种混乱。列宁本人现在教导说,应当“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sup>②</sup>。因此,苏维埃政府不仅开放了资本主义贸易,而且还把战争期间已经社会化的工厂、矿山、森林拿出来租给国内和国外的资本家。同时,它竭力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它完全改变了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它恢复了银行业务,它修改了有关民法的法令,它向外国资本表示准备偿还沙皇政府的对外债务……春季在暴乱的压力下采取的“新方针”,到了夏季和秋季在歉收和饥荒的压力下愈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个新的时期》,1921年6月《俄国新闻简报》第41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编者注



来愈确定下来了。

列宁于 10 月 17 日在“政治教育局”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维埃政策这一惊人的转变作了如下的论证：

“同志们，你们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虽然有些人还非常年轻，但都是在我们革命初期，在我们一般政治工作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你们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所以你们不能不看到，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已经实行了多么急速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被叫作‘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有着更多的旧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曾经假定过，旧的俄罗斯经济将直接过渡到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的国家生产和分配。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我们过去的国家经济文献，回忆一下共产党人在俄国夺得政权以前和刚刚夺得政权以后，例如在 1918 年初所写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刚刚完成了建设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件事情时，我们对于经济建设任务的谈论，比 1918 年下半年以及整个 1919 年和 1920 年要小心谨慎得多。当时我们多少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在我们肩上，由于我国似乎已经陷入绝境，由于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情况而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不能说我们就是这样明确地给自己拟定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当时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动的。不幸这是一个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时期终于使我们相信，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所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言论相抵触的，那时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自 1918 年提出接受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向全体人民作了说明以来，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即使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道路，也必须经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过渡时期，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当我们在国内战争剧烈而不得不在建设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像把这一点遗忘了。

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方面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上的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的时候，让我们实行退却，重新安排一切并安排得更牢靠一些吧。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那么对我们在经济战线上遭受惨败这一事实，就不能有丝毫怀疑！”<sup>①</sup>

列宁所说的“急遽转变”，苏维埃政府现在采取的“新经济政策”，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第四年的结论。我们将在一系列文章中描述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个“新方针”；因为各国工人阶级如果要学习和利用伟大的俄国革命的经验，它就必须首先弄清布尔什维主义的这种彻底转变的原因，并且认识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 2. 资本主义贸易和苏维埃资产阶级

苏维埃共和国国内的历史，是城乡之间为粮食进行顽强的和严酷的斗争的历史。革命前，农民必须把他收获的一部分出售，以便能够向国家交纳捐税，向地主交纳地租。1917年的土地革命取消了农民的捐税和地租；农民不再被迫把他收获的一部分东西卖给城市。革命前，农民还必须把他收获的另一部分卖给城市，以使用得到的钱购买工业品；但是，从1917年起，由于封锁和本国工业遭到破坏，城市不再能向农村出售工业品，而农民不会为了不能拿来交换工业品的贬值的纸卢布而出让他的辛勤劳动的果实。这样，城市遭到农村的封锁：它再不能取得必需的粮食了。于是它试图用暴力把农民不愿意交给它的东西据为己有。十月革命以后，武装的工人队伍开到了农村，并且用暴力从农民那里夺走了粮食。饥饿的工人这种自发的征用发展成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征用制。全部收获遭到没收。军事征收队伍收割了庄稼。迫于军队和城市的痛切需要，征收队伍给农民留下的东西往往甚至不够满足他

---

<sup>①</sup> 引自苏俄半官方的“俄罗斯电讯社维也纳分社”1921年11月1日的报道（参看《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82—183页。着重号是鲍威尔加的——编者注）。

们本身的口粮以及种子和饲料的需要。农民通过缩减播种面积、隐藏储备粮、武装抵抗征收队伍,通过暴乱来反对这种征用制;他们要求取消征用制,恢复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当农民的暴乱在1921年春天广泛地蔓延开来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进行了三年斗争后投降。1921年3月21日的法令取消了强迫交付和恢复了粮食的自由贸易,这标志苏维埃政府向农民、城市向农村、无产阶级向农民的私有制投降了。农民的经济实力战胜了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军事暴力。亿万农民群众的顽强抵抗被证明为比契卡的恐怖手段、革命法庭的死刑判决、红军的刺刀更加强大。

但是农民的胜利同时意味资本的胜利。唐波夫或萨拉托夫的农民不能直接地把他们的产品同彼得堡或莫斯科的工业企业进行交换。资本主义商人插进农民生产者 and 城市消费者之间。资本主义贸易代替共产主义的征收机构和分配机构来组织粮食供应。一旦商业资本重新支配了这个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那么,它同其他部门就不再会离得很远了。在粮食的自由贸易恢复以后,其他的贸易限制也取消了;只有对外贸易仍由国家掌握,但是这一贸易垄断实际上也被广泛的黑市贸易打破了。商业资本的复活明显地表现在俄国大城市面貌的改变上。当十月革命以后贸易遭到扼杀、商店被禁止开业的时候,涅瓦大街这个举世闻名的彼得堡通衢大道是荒凉的。现在它又活跃起来了。商贩充斥街头,商店又开业了,橱窗里面“又是一应俱全”,但橱窗前面站着的是饥饿的人们,他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盯着所有这些按高不可攀的价格出售的华丽商品。资本主义商业城市常见的景象又在俄国出现了。

但是,商业资本的复活同时意味着一个新阶级的兴起,这个阶级现在在俄国被称作苏维埃资产阶级。在中欧和西欧,战争的经济后果也使老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即食利者、房主、官吏贫困化了,但是同时一个新资产阶级却崭露了头角,它在我们这里被称作发战争财者和投机者,在西欧被称作“暴发户”。同样的过程在俄国也发生了。俄国的老资产阶级受到剥夺并且贫穷了。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四年里,一个新

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尽管契卡可以作出死刑的判决，黑市还是制止不住，这就提供很多机会使人发财致富。很多人就是在封锁期间靠走私发财的。在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向私人订购它本身筹措不到的军需品，并且允许在非社会主义的小企业中进行生产；甚至国内战争也有它的发战争财者。<sup>①</sup> 最后，很多卑鄙分子钻进了苏维埃官僚队伍，特别是钻进了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机构，他们靠行贿和盗窃国家财产聚集起大量财富。<sup>②</sup> 这样，“暴发户”这个阶级在苏维埃俄国也产生了。这个阶级迄今可以说是非法地存在的，一直受着契卡那只惩罚手臂的威胁。但是“新方针”使这个阶级合法化了。现在它在重新开放的自由贸易中可以合法地使它的资本增值了。

被苏维埃政府剥夺的老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因为只有反革命才能发还它失去的财产。新的资产阶级即苏维埃资产阶级则不一样。像英国宗教改革中夺得世俗化的教会财产的新统治阶级反对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一样，像法国革命中把流亡贵族的财产据为己有的新资产阶级必须防止保皇派的反革命一样，俄国革命中的新资产阶级也必须反对反革命，因为反革命会重新夺取它从老资产阶级的遗产中所夺取的一切东西。因此，新资产阶级的目的不是推翻苏维埃政权。但是，它确实迫使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会使它的新财产合法化，并且打破对它的资本增值的一切限制。<sup>③</sup>

但苏维埃政府是由于经济必然性本身才被迫满足这个新资产阶级

---

① 布尔什维克经济管理机构的领导人之一拉林一年前描述过这种发战争财者，他写道：“有一批提供军用铁路、建筑物、燃料的企业家。他们是投机市场上的主要消费者。他们是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资助者。他们是一部分苏维埃行政机构内部发生腐化现象的主要媒介。现代的企业家取得预付款而不冒任何危险。如果半年以后他说他无法完成订货任务，并且把交给他的预付款退回，那么，这笔卢布的价值在半年后已完全不同，大大减少了，他就从差额捞到了好处，而全部预付款还充当过他的投机事业的基金。”1920年12月《俄国新闻简报》第1177页。

② 俄国共产党建立了定期“清洗”党的专门机构，其目的是查明腐化的党员，并且把他们开除出党。在最近这次清洗中，全党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党员被开除。

③ 参见《社会主义通报》十月号达林的文章和十一月号舒姆斯基的文章。

的要求和愿望的。因为,一旦国家本身不再组织粮食供应,而把这种组织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交给商业资本时,它就被迫排除妨害商业资本活动的障碍,使商业有可能供应粮食。这样,苏维埃政府就修改它的民事立法,以便重建资本主义商业的法律基础。这样,它就建立银行,因为资本主义商业离开银行业便无法维持。这样,“新方针”就首先引起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决定性变革。

十月革命期间,俄国的纸币流通额总共为 300 亿卢布。此后投入流通的是<sup>①</sup>:

	百万卢布
1918 .....	33.952
1919 .....	163.751
1920 .....	955.223

在 1921 年,流通额已经大大超过 10 000 亿卢布。这种空前的增发纸币是困难的产物。但是共产主义理论却认为困难可以转变成好事。不断增发纸币是达到“取消货币”的正确手段:通过不断增发纸币,最后货币就会完全丧失价值,从而共产主义的自然经济就会代替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苏维埃政府从 1919 年 4 月起就企图通过“工资的实物化”准备向自然经济过渡。一部分货币工资已由实物工资代替。货币工资保持很低,而各种食品和用品却免费发给工人。<sup>②</sup> 任何人可以免费乘电车和火车,煤气和电灯免费供给,邮费取消了。

“新方针”必须同“取消货币”这一整个政策决裂。如果国家不掌握粮食,而把它交给商业资本,那么就不可能实行实物报酬;因此,只要恢复自由贸易,就必须从实物工资回到货币工资。如果粮食供应交给商业,那么货币贬值就会危及粮食供应;因为如果纸卢布有失去一切购买力的危险,农民就不会出售他们的产品来换取纸卢布。因此,苏维埃政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纸币和经济统制》,1921 年 6 月《俄国新闻简报》。

② 拉林-克里茨曼《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建设》,1921 年柏林版,第 57 页以下。

府一旦决定恢复自由贸易,它就必须放弃“取消货币”的政策,转而采取相反的政策。现在它必须使用一切力量来防止卢布进一步贬值,使其价值稳定下来。但是,只有限制纸币的发行额,它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了能够限制纸币的发行额,它必须大大增加国家的收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新方针”首先企图在国营经济中贯彻“成本原则”:任何企业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交付它的产品。免费使用火车和电车、邮政、电力照明和煤气照明又被取消了;这些方面的使用费由于卢布严重贬值不得不规定得非常高。这样,现在乘电车要花 1500 到 2000 卢布,乘火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要 20 万卢布,到托姆斯克要 100 万卢布。<sup>①</sup> 同时苏维埃政府还企图通过征收新税来增加它的收入。因为直接税带来的收益太小,所以考虑恢复间接税和金融垄断。<sup>②</sup> 这样,苏维埃政府一旦开放资本主义贸易,它就必然被迫走上资本主义财政政策的轨道。

这是我们看到这样复活起来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被新资产阶级所操纵,它依靠数百万的农户,而国家的立法和行政不得被迫与之相适应。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曾经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在俄国人民中只占很小的少数,但是只要它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并通过自己的恐怖手段把居民的大多数镇压下去,它就能够把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亿万农民群众。经验教给它的却不一样。不可能在成百万落后的、刚刚通过革命摆脱封建主义羁绊的农户(俄国的少数城市和工业地区只是分布在其中的小岛)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一旦农民群众的反抗迫使苏维埃政府回到自由贸易,那么全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就会通过贸易本身的内在逻辑而恢复起来。在这个重大的历史经验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得到了证实: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它的社会制度;任何专政、任何恐怖、任何暴力都不能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的那

---

① 战前 1 卢布等于 2.50 克朗,现在 1 克朗等于 55—65 卢布。

② 据共产党作家斯彼克塔托尔《苏维埃俄国经济政策中的新方针》,1921 年柏林版,第 59、62、66 页。

种社会制度强加给一个国家。

### 3. 工业和租让

劳动和资本之间为了工业的生产资料的斗争,是同城市和农村之间为了粮食的斗争并肩进行的。在1918年到1920年,苏维埃政府从资本家那里剥夺了工业的工作场所,把工厂、作坊和矿山国有化了。但是,这种国有化是在国内战争的风暴中实行的,因此,它是无计划地、无秩序地、暴力地、用血和铁实行的。它不仅从企业中赶走了无所事事的股东,而且还赶走了经理、厂长、工程师、一大部分技术人员和营业人员。一大部分管理生产的知识分子就这样从俄国工业中被排除了。他们流入黑市贸易,流入反革命阴谋集团,流入国外。有一部分被赶走的厂长被有才能的工人代替了。<sup>①</sup> 尽管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的阵痛中从它的队伍里产生了这样多有才能的人,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一下子就被提升到大工业企业领导职位的工人都能够十分迅速地取得知识和本领,使他们有可能代替被赶走的有经验和受过训练的专家。因此,苏维埃政府必须重新把被赶走的人招收回来。其中很多人由于饥饿所迫回到企业。昨天他们作为企业主被赶走,今天作为经理回到企业了。但是他们现在做工作是不痛快的,内心充满仇恨,倾向于怠工。这样,苏维埃政府就必须同其企业管理上的缺陷作斗争。

早在1920年12月,苏维埃政府就规定,有五个以上工人的小企业要实行国有化。几个星期以后来了一个大转弯。农民强迫恢复了自由贸易。商业资本的复活也迫使工业政策作出改变。农民如果用纸卢布换不回来工业品,他就不会出售他的农产品来换纸卢布。如果再不能用暴力的方式征用农民阶级的剩余物,那么就必须尽可能提供许多工

---

<sup>①</sup> 根据李可夫的数字,在1920年,在纺织厂管理机构中有64%的管理职位,在冶金厂管理机构中有60%的管理职位,在造纸厂管理机构中有56%的管理职位,在皮革厂管理机构中有53%的管理职位,在化学工业管理机构中有50%的管理职位由工人担任。1921年3月《俄国新闻简报》,第275页。

业品来换取农产品。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业生产,现在成了迫切的需要。如果苏维埃国家的企业管理机构无法把生产提高上去,那么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资本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的手段去提高。李可夫现在这样写道:“如果某一个工厂,在我们这里处于停顿状态,在私有者手中却会开起工来,那么不把工厂交给私有者就会是一种罪过。”<sup>①</sup>米柳亭同样写道:“把我们无法利用的企业租给劳动组合或者个人企业家,那将是有益的。我们受到大量缺乏鞋子之苦就是一例。在现有 1700 家企业中,只有 800 家开工,其余全部停工了。但是停工的企业也有机器和其他设备。那么为什么不应当把这些企业交给合作社或者私人企业家呢?”<sup>②</sup>苏维埃官僚认为,虽然原料困难、燃料发生危机、劳力缺乏,但是私人资本还是能够使共产党工业管理机构无法使之维持生产的一些企业进行生产,于是苏维埃官僚便决定把这样的企业租给资本家。这是苏维埃政权向工业资本投降。这个投降也是农民战胜苏维埃暴力的结果。在农民迫使实行自由贸易时,他们也就使工业资本同商业资本一起抬头了。

关于把国营企业租给资本家的法令,是 1921 年 7 月 10 日颁布的。它企图使租让制尽可能容易地和迅速地实行。省经济委员会可以出租中小企业,而不必取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如果它们打算出租大企业,它们必须就此报告最高经济委员会。如果它在一个月內不提出异议,它们就可以着手租出去,而不必等候答复。这个法令甚至未对租让的最长期限作出规定。<sup>③</sup>但是不管怎样,这项法令的成果是很小的。真正租出去的大企业不多。由于苏维埃卢布贬值,要经营一个工业企业需要雄厚的资本;在俄国新的资产阶级中,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有可能筹集这样一笔资本。这样,苏维埃政府便必须努力寻找承租俄国国营企业的外国资本家。

---

① 1921 年 6 月《俄国新闻简报》,第 460 页。

② 斯彼克塔托尔《苏维埃俄国经济政策中的新方针》,1921 年柏林版,第 18 页。

③ 斯彼克塔托尔《苏维埃俄国经济政策中的新方针》,1921 年柏林版,第 19 页。



而且还有另外的更加迫切的考虑迫使它那样做。俄国不从国外大量进口机车和火车车厢、机器、工具和仪器,就不能重建铁路、工业、农业。此外由于歉收,它现在也还必须进口外国的粮食。但是它应当用什么来支付这样大量的外国商品呢?黄金储备是紧张的。俄国只能小规模地出口自己的产品并用出口所得的钱来支付外国的商品,因为遭到破坏的生产只能提供少量的出口产品。苏维埃政府不接受不加掩饰的外国贷款。因此唯一的办法是:把俄国的国家财产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使用获得的租金来支付必须从外国进口的商品。这样,苏维埃政府便要把库兹涅茨克、厄基巴斯土兹、伊塞克和切尔诺哥尔斯克的煤矿,把帖利别斯、里杰罗夫、伊尔宾和阿巴卡诺夫的矿藏,把高加索的石油资源,把西伯利亚西部和俄罗斯北部的森林,把顿涅次地区和库班地区的地产,把很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造纸工业、火柴工业的企业,都租让给外国资本家。<sup>①</sup> 这些租让的项目就是苏维埃俄国打算提供给欧洲资本和美国资本的那些多次提到的“租让项目”。但是资本表现冷淡。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微不足道的租让项目做成了交易。

这里我们接触到苏维埃政权真正的生死存亡问题。在战前,俄国也必须通过国外进口来满足它对机器、工具、仪器的需要。要重建俄国的运输业、俄国的工业、俄国的农业,不进口大量的外国生产资料是不行的。由于俄国无法通过它的出口为自己弄到支付这种进口的支付手段,因此,在苏维埃政府未能从外国资本取得大量贷款或者把俄国的一大部分生产机构租给外国资本家的时候,俄国的国民经济就一定会毫无希望地衰落下去。支付逆差始终只能通过输入资本来达到平衡;如果外国资本家不下决心向俄国投放大量资本,那么俄国国民经济的混乱就将继续下去,这种混乱除了导致一场可怕的经济灾难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而苏维埃政权将会在这场灾难中崩溃。

目前苏维埃政府和外国资本之间的账目还没有结清。在十月革命

---

<sup>①</sup> 1921年3月《俄国新闻简报》,第255页以下。

以后,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沙皇政府的债务。只要苏维埃政府拒绝偿还旧的债务,外国资产阶级就不愿向俄国投放新的资本。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以后,苏维埃政府现在终于决定承认沙皇政府的对外债务。但是,法国资产阶级报刊以嘲笑的口吻来回答苏维埃政府究竟想用什么来偿还那笔债务这个问题。很明显,这一让步也不足以推动外国资产阶级向俄国投放大量资本。

老亚当·斯密已经懂得,资本输入的首要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法律保障。1917年和1918年,苏维埃政府无偿地没收了投入俄国工业的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德国的资本。难道人们可以期望,外国资本家会在只有一个单纯的诺言而无其他保证防止这些资本又被无偿地没收的情况下再一次向俄国投入大量资本吗?在俄国没有独立于政府的法庭。难道人们可以期望,在要由依附于政府的法庭去判决这类交易中的纠纷的时候,外国资本会同俄国政府去做生意吗?苏维埃俄国的契卡、警察局还是可以不经诉讼就把苏维埃政权的政敌枪杀、下狱、拘禁的。难道人们可以期望,外国的资本家和经理会冒这样的风险去到俄国定居吗?因此人们懂得,法国和美国为什么宣称它们的资本只能去帮助一个民主的俄国。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是要把普选权、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重新给予俄国人民或者甚至把联合权重新给予俄国工人。它们要做的是,恢复使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律保障,否则西方资产阶级就不敢把他们的资本投入俄国。

苏维埃政府不久前建立了国家银行。但是,既然资本家知道苏维埃政府在1917年没收了银行存款,那么他们会把款项存进这个政府的银行吗?资本主义贸易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复活的确也要求恢复银行业务。但是,恢复银行业务要求的前提条件不仅是建立国家银行;它要求法律保障作为前提条件,没有这种法律保障任何信贷组织都不能维持。在资本主义前期,英国也曾经由国家垄断银行业务。1640年查理一世曾经没收银行存款。英国的资产阶级以革命来回答。查理的首级落到了刽子手的刀斧之下。革命的成果是人身和财产不可侵犯得到了法律

保障,而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因此,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在反对专制独断的斗争中都必须取得法律保障,没有这种法律保障资本主义是不能维持的。

布尔什维克也认识到,不把必要的法律保障恢复起来,俄国是无法把外国资本吸引进来的。斯切克洛夫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开始了一场战斗,争取建立必然会代替目前盛行的独断专横的那种“革命法制”。但是这种“革命法制”恰恰是意味着共产党的专政自行取消。列宁本人曾经给专政下定义说,专政是统治阶级的无限制的、不受其本身的法律约束、限制的权力。如果吸引外国资本的经济必然性将迫使专政为了一种与资本的需要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来限制它自己的无限权力,那么,它恰好将以此取消专政。布尔什维克仍旧相信,对他们的政治法律统治制度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变,就可以支配他们为了使俄国的经济不致在可怕的灾难中崩溃而必须引诱到俄国来的那一资本。他们仍旧相信,他们用资本主义手段进行重建的新政策是可以同继续实行恐怖主义的专政并行不悖的。他们仍旧相信,重建资本主义是可以在共产党的专政下进行的。但是,通过还是那么迷人的租让办法来引诱外国资本到俄国的一切计划的破产,证明这一信念是一种幻想。这再一次证实马克思的学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会发生整个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只有苏维埃政府本身逐步地废除恐怖主义的党专政,逐步地使俄国转而采用民主的法制国家的法律形式,它才能得到必须吸引来的外国资本,即得到俄国重新加入世界市场的前提。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它坚持专政和恐怖,那么,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在将来也会把外国资本拒之门外,俄国就无法找到进口外国生产资料的必要的支付手段,因此,俄国的国民经济就会毫无希望地继续衰落下去,直到苏维埃制度在一场经济灾难中遭到彻底崩溃。恐怖主义的专政已经成为俄国重新加入世界经济的障碍;这种重新加入的必要性将迫使苏维埃俄国废除专政。

#### 4. 专政的历史意义

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从资产阶级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开始的。然而资产阶级的反抗却释放了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即城市平民和乡村农民的力量。阶级对立的展开和整个社会机体的解体最终导致了最坚定、最果敢、最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的专政:在17世纪的英国大革命中,实行专政的是革命军队,即在克伦威尔军队中联合起来的武装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把国王押上了断头台,并且解散了资产阶级国会;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实行专政的是长裤汉,即武装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他们把国王和资产阶级各派一个接一个地押上了断头台。这种专政依靠平民大众提出了种种空想的、幻想的目标,远远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克伦威尔的铁骑军打算建立“人间基督天国”、“圣徒公社”。法国的雅各宾派打算为一切人争取到“自由、平等和博爱”。远远超出一切当时可以达到的目标的这些思想意识,使革命战士具有把他们引向胜利的激情。但是,他们的胜利的客观后果却总是与他们的主观目的完全不同。这种专政作为一把铁扫帚有效地扫除了封建社会制度、专制国家制度的一切残余,从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但是,一旦这种专政除此之外还想有所作为,一旦它想实现它的种种幻想的目标——像英国的“圣徒公社”,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它就会碰到无情的经济事实而遭到失败。专政垮台了。专政的遗产由资产阶级继承了,专政摧毁了封建制度,从而替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描述过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这个发展进程。他在描述1649年的英国革命时写道:“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只待采摘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就像法国在1793年和德国在1848年那样。显然,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sup>①</sup>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页。马克思的原话为“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编者注

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条发展规律也支配着俄国大革命。1917年3月,这个革命也就是从资产阶级起来反抗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开始的。在俄国,也是资产阶级的反抗唤起了平民大众、工人和农民走上斗争舞台。在这里,也是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妄图加以调和的那种阶级对立的展开,最终导致了最果敢的革命政党的专政。这个专政也是一把扫除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铁扫帚。它打碎了沙皇专制的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统治机器。它废除了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在农村建立了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基础。

而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必须“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这个专政是以士兵起来反对战争和农民起来反对封建土地制度为起点的。工业无产阶级站到了士兵和农民的这种革命的前列,利用这种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统治。但是,既然建立了专政的是无产阶级政党,那么这个专政的目标必然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鼓舞人心的宏伟目标首先是革命的巨大力量源泉。这个力量源泉使工人有了为革命忍饥挨饿、历尽艰辛、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的毅力。这个力量源泉使红军士兵有了打退反革命军队的热情。但是,当专政的第四年同波兰恢复了和平、打退了弗兰格尔的反革命军队,当战争结束、专政面临重建经济这一问题时,专政者的主观目的立刻同专政的客观后果发生了矛盾。

专政者的主观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专政的客观后果却是:地主的土地被分配了,几百万农户建立、扩大和巩固了。专政者的主观目的是要实行共产主义的粮食管理办法。农民群众的现实的阶级利益却要求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在专政受到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的威胁期间,农民使自己的阶级利益服从了专政者的目的;因为在反对反革命的战争中,专政反对地主而保卫了农民的土地,这些地主打算卷土重来,重新从农民那里夺回土地。但是,反革命一被战胜,农民的客观的阶级利益就胜过了专政者的主观目的。农民迫使专政恢复了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

复活,即资本主义的复辟。用恩格斯的话说,俄国革命必须暂时地“超出这一目的”,而现在它又重新回到它的目的了。这是“新方针”的历史意义。

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其平民专政阶段往往陷入的那种热情的、幻想的、空想的意识形态之一。这种意识形态在俄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意义完全等同于“以色列帝国”的意识形态在英国革命中的意义、雅各宾派的平等意识形态在法国革命中的意义。俄国的共产主义不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训练、成熟起来的那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那种无产阶级能够进行现实的斗争,来实行产品生产和产品交换的社会化,而这一社会化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早已预示的,是客观上已经有可能实现的。俄国的共产主义不如说是刚刚摆脱封建制度桎梏的国家的平民大众的幻想,他们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暂时推上执政地位之后,企图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没有成功,最后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过低而遭到失败。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统治并不能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只是一个历史工具,借此可以消除封建制度的一切残余,从而在新的广泛的基础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提。“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sup>①</sup>俄国专政所设想的是共产主义。它的真实本质却是俄国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农民基础的扩大和巩固。

列宁现在异常明确地指出,俄国还缺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切前提,首先缺少它的第一个前提,即一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存在。列宁在“政治教育局”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

“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编者注

成长。资本家将得益于我们的政策，并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严重的经济破坏，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就是说，它已经失去本阶级生活常态，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

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使他们在**大机器工厂里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不去做投机生意，不去制造打火机出卖，不去干其他一些不太有益但在我国工业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的‘活计’。**”<sup>①</sup>

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

“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承租者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从你们那里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sup>②</sup>

这是一个自供：俄国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前提，发展出一个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无产阶级。这是一个自供：俄国革命的客观结果不可能是别的，它只能是俄国资本主义在农民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础是由于革命而扩大了、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由此可见，这个专政本身认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毁灭了。那些“言辞和幻想”破灭了。俄国革命的真实本质在其“新方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新方针”的现实的实践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但是它认为，重建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是可能的。这仍然是幻想，仍然是空

---

①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2 版，第 186 页。黑体是鲍威尔加的。——编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2 版，第 193 页。黑体是鲍威尔加的。——编者注

想。1917年秋,实际上是无产者大众推翻了联合政府,从企业赶走了资本家,用武力征用了农村的收获。但是,在苏维埃统治的四年中,无产阶级瓦解了。无产阶级的最优秀人物或者在内战中阵亡了,或者成了苏维埃机关的官员、红军的战士。其他的人则像列宁所描述的,在贫困的压力下当了黑市商贩和街头小贩,或者回到农村,在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上重新当了农民。留在工厂的早已不再是社会力量了。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工业无产阶级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的地方,又正如他所说的,在“无产阶级消失了”<sup>①</sup>的地方,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那真是幻想!共产党的专政在1917年秋确实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表现形式,而在无产阶级已经瓦解的今天,已不再是依存于充满力量的社会阶级了。尽管如此,专政还存在着。但是,专政的存在现在变成了完成历史任务的障碍,而专政坚信,这个任务是俄国目前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在1917年秋,专政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实行伟大的土地革命,打碎束缚俄国农民的封建枷锁;在1918年至1920年间,专政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集中俄国人民的力量同反革命作斗争,只有它才能胜利地将内战进行到底,从而保卫土地革命的一切成果。但是,现在俄国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任务。重建资本主义经济在共产党的专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国民经济中的“新方针”要求政治上有一个新方针。

俄国农民需要工具,俄国工业需要机器,俄国铁路需要机车。重新加入世界市场,现在是极其迫切的需要。但是,加入世界市场是以资本输入为前提的,资本输入又是以法律保障为前提的,而专政是保证不了后面这一点的。所以,这个专政在完成它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后,就成了发展俄国的劳动生产力和土地生产力的障碍。取消专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取消的方式。

我们可以设想,统治俄国的政党本身由于认识到历史的必然性而

---

<sup>①</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86页。——编者注



逐步地和平地废除它的专政,为此这个政党把俄国社会的日益广泛的阶层吸引到政权中来,放松恐怖给社会带来的羁绊,重新确立人身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项法律保障(没有这种保障,任何资产阶级国家、任何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毕竟有一大部分俄国工业会实现国有化,无产阶级会保持革命的重大社会成果,苏维埃制度的重大成分会过渡到由上述变革而产生的民主制。俄国的民主制将包含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生机勃勃的成分。俄国会保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民主制发展的一根支柱。

但是,如果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抱住它的独占统治不放,如果它不及时下决心对苏维埃制度进行和平改造,那么它的“新方针”也会在专政对资本输入所设置的围墙面前遭到失败。那时俄国就会走向经济灾难,在这种灾难中饥饿的、失望的人民群众就会推翻专政。专政将遗留下一片混乱,随后流血的反革命就会由此发生,而这种反革命不仅会夺去俄国工人的一切革命成果,而且还会给予国际反革命以强大的推动力和巨大的支持。

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是:要通过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改造,而不要通过对它的暴力颠覆来取消这个非取消不可的专政。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去反对一切反革命的威胁。因此,维也纳工人苏维埃社会民主党监督委员会进行艰苦的、不屈的、有效的斗争来反对向波兰和罗马尼亚偷运武器。因此,整个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组织从它的菲薄工资中献出那么多的款项来制止俄国的饥荒。的确,德意志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组织比各国共产党都更好地履行了给予俄国革命以国际声援的义务。

但是,我们要想声援伟大的俄国革命,还必须担负另外一项义务,这就是:用我们掌握的一切精神武器去支持俄国革命内部的那些迫使苏维埃政府及时地自愿地取消专政的力量,唯有这样地取消专政,才能防止政府被暴力所推翻。让共产党人把每一个致力于把马克思的历史

分析作为武器去探讨俄国悲剧的意义的人骂为叛徒吧！让共产党人现在仍旧幼稚地虔诚地抱住那些已被俄国革命的现实打破的“言辞和幻想”不放吧！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竭尽所能，恳切地向俄国革命建议如何解决“新方针”所固有的现实同幻想的矛盾、经济必然性同政治统治形式的矛盾，使一切革命成果不致由于矛盾的可怕爆发而化为乌有，这便是我们对俄国革命的较好的效劳。

可见，我们同时也在履行我们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义务。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各国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掩盖了这次革命的真正经济内容和社会内容，即掩盖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这种错觉在各国分裂了无产阶级，在很多国家把广大的无产者阶层诱引上危险的歧途。我们要透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表面现象来揭示资产阶级革命的真实本质，使无产阶级摆脱这一令人迷惑的误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平民专政发展阶段所采取的种种方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

译自 1921 年维也纳德文版。三联书店 1977 年版。唐春华译

# 取得政权的斗争(摘录)

(1924年)

## 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一个世代以前,很大一部分工人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或农民的出身、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或农民的环境的影响,学校、教会和资产阶级报纸的影响使许多工人还受资产阶级党派迷惑。社会民主党那时的任务是首先唤起工人的阶级觉悟,首先把他们引向他们自己的阶级,并使他们从对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或农民的环境的精神依附中解脱出来。

这是小资产阶级党派兴起的时代,是它们进行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时代。在这些斗争中,小资产阶级党派表现为“全体劳动人民”的代言人、“一切诚实地劳动的等级”的代表。为了使工人从资产阶级党派的影响下解脱出来,社会民主党那时必须使工人懂得:劳动人民分成几个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党派不代表整个劳动人民,只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不代表工人阶级。

社会民主党同小资产阶级党派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工人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党派的政治领导之下解放

出来,工人联合成一些强大的组织,工人阶级展开独立的阶级斗争。

在农村,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的过程还有待完成:在那里仍旧有数万无产阶级受着资产阶级党派的影响。相反,在城市和工业地区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里的工人大多数已经在社会民主党里联合起来。社会民主党在这里早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任务。如果说迄今的问题在于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影响,摆脱资产阶级的领导,那么目前的问题在于把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中尽可能广泛的阶层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使他们集合在已经组织成为阶级的无产阶级周围,争取他们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已经组织成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反对大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如果说迄今的问题在于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的影响,那么目前的问题在于使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尽可能广泛的阶层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的影响,争取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政党不能够把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取得胜利。因为在这些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的由于自己的企业主地位而同工人阶级相对立的分子是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一旦使所有的企业主不论大小都感到震惊时,这些政党总是投入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它们在 80 和 90 年代反抗过大资产阶级的领导,但是它们在 1908 年就已经服从受大资产阶级影响和控制的官僚的领导,而现在由于官僚制的挡风墙倒了,它们就完全公开地回到大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只有工人阶级处于与大资产阶级的全面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只有它能够把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取得胜利。在利益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所有劳动人民阶级中,它是人数最多、最有战斗力和最积极的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中所有的基本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一致而同大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相对立的分子最终

必须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从而在实际上将自己置于工人阶级这个在为反对大资产阶级而联合起来的各阶级中最强大、最积极的阶级的领导之下。

因此目前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影响扩大到工人阶级以外,扩大到劳动人民的其他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行列中去,并像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所做过的那样,把团结劳动人民、团结劳动人民的各个阶级来进行共同的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作我们的目标。但是小资产阶级政党那时力图把“一切诚实地劳动的等级”联合在城市的大、中业主和农村的富农的领导下,即在那些业主阶层的领导下,这些业主阶层的利益是同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并且最后一定会使业主阶层同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使业主阶层回到大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相反,我们目前力图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把劳动人民联合起来,也就是使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反对大资产阶级的各劳动阶层同工人联合起来。

只要问题还是在于使无产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社会民主党征集小资产阶级分子或农民分子就会是危险的,这样做会使还决没有把全部工人团结在自己的队伍里的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遭到削弱,从而会使还未被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工人阶层难以觉醒,使社会民主党难以争取这些阶层。今天这种危险已经消失了。工人阶级已经在我们的行列里。我们的党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工人,因此他们决定我们党的政策。特别是大企业的工人由于集中在生产场所,比起劳动人民的一切其他阶层更积极,更有威信,他们对于我们党的政策的影响最强大。我们现在把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小农分子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就不再有削弱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危险了;如果他们来到我们这一边,他们恰好因此就会处于工人的思想影响和政治领导之下,并且作为工人的同盟者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

我们必须保持我们原来的性质: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为了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集合在工人阶级领导

下的劳动人民的政党。

工人阶级是整个劳动人民的，因此也是小农和小资产者的天然领导者和天然先锋队，它负有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把整个劳动人民集合在自己的领导下的使命，这一思想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表述了。

最近几年，特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援引了这一思想。季诺维也夫在他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中把这一思想说成是“列宁的真正的发现”，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对国际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新的教导。

在俄国占劳动人民大多数的农民是一批不识字的、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的群众。在沙皇统治下（一直到1917年），他们不参与俄国的任何公共活动和政治斗争，不受任何党派的影响，不由任何组织掌握，不接触任何报纸。1917年的城市革命在这些农民群众中掀起一个要求把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运动。布尔什维克利用了这一运动，他们通过政变夺得国家权力，并且立刻颁布法令，把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的这一要求一旦得到满足，他们立刻重新回到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状态。他们是不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因为他们从它手里获得了地主的土地。但是只要政府不侵犯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对谁在莫斯科进行统治和怎样进行统治就不去进一步操心，并且作为忠顺的臣民完全像服从沙皇的敕令一样服从布尔什维克的法令。只是由于占俄国人民大多数的这些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为数很少的布尔什维克才能统治这个大帝国。在俄国，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意味着一个小小的积极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广大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劳动人民群众的专政。

在我们这里则完全不同。在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小农早已不是一批政治上漠不关心的群众。他们在80和90年代就已被上升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的运动吸引到政治斗争中来，他们今天还属于这些党派，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和报纸。他们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群众：那种人在某一天起来造反，在愿望得到满足之后就又漠不关心了；他们对政治的兴趣早就被唤醒，甚至在最偏僻的村庄里，他们依靠牧师和教员还保持着这

种兴趣。在我们这里,多数小农和小资产者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同志,这种状况就会继续存在下去。他们的敌对态度是我们取得政权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夺得了政权,这将是我们保持政权的最大障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95年写道:“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sup>①</sup>在俄国,农民仍是“不自觉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群众,因此这一时代并没有过去;它在中欧和西欧已经过去了,那里的小资产者和农民不再是“不自觉的”群众,而是在政治上十分积极的阶级,他们不再回到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状态,而是或者会阻碍我们夺取政权,或者有可能在我们争取政权的斗争中作为同盟者支持我们。因此在这里,为了夺取政权,我们必须把这些阶级的尽可能广泛的阶层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政党并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因此在这里,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领导,不能通过无产阶级对“不自觉的”农民群众的专政来实现,相反,只有在我们争取到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支持无产阶级政党、从而使他们积极地同无产阶级合作、同无产阶级一起参加共同斗争的时候才能实现。在这里,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领导只能通过使劳动人民中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处于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领导之下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在这里,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领导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的专政,而只能是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些群众的思想领导。

把这些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这就是现在的任务。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利用民主制基础上的斗争,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小资产阶级拥护者和小农拥护者面前揭露这些政党是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并且同时向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证明,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能毫无顾虑地为他们的利益而同大资本和大地产进行战斗。随着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将会分裂,裂痕会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编者注

遍及社会上的一切中等阶层。

广大知识分子也将分裂。参加工业公司的理事会并负责公司的法律事务的有钱的律师将站在那一边，站在资产阶级政党阵营一边；我们应该把因货币贬值而赤贫化的知识分子群众争取到这一边来，到我们阵营中来，他们仇恨靠货币贬值发财的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文化上的利益使他们同为大资产阶级效劳的教权主义相对立。我们必须争取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医生、工程师、学者、艺术家的合作，特别是没有教师的合作，我们将不能够建设未来的社会！

广大公务员和职员将会分裂。枢密顾问和经理反对公务员和职员群众以维护自己的“权威”，他们将留在那一边；中小公务员和职员群众一定会到我们这一边来。只有把公务员群众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才能完全掌握公共行政。只有把职员的知识与工人的力量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工业实行有效的监督。

广大小业主也将分裂。在城市中心地区富丽堂皇的店铺里为有钱主顾干活的裁缝和木匠师傅将留在那一边；我们必须把那些被排挤到市郊贫民区、不再能接触到顾客而只能为大裁缝老板和资本主义家具商人劳动的小裁缝和小木匠争取到这一边来。小业主由于自己剥削几个工人，因此把自己看成大剥削者的同盟者，他们将留在那一边；小手师傅已经降低到资本主义企业的家庭工人的地位，他们只有与他们的少数帮工合作才能与同时剥削师傅和帮工的资本进行工资斗争，我们必须把他们争取到这一边来。富裕商人将留在那一边；我们必须把指望工人顾客的小商人争取过来。在每次不景气的时候，这些小商人都体会到他们的生意完全依赖于工人的工资。

最后，广大农民也将分裂。富农剥削一大群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他们将留在那一边；我们必须把那些全家在地里劳动、靠自己小块土地上的产品不能维持生活而自己不得不一再给大地主当雇佣工人的小农争取到这一边来。为市场生产粮食并与大地主勾结起来反对消费者的富农将留在那一边；我们必须把那些由于自己的小块土地



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全家和饲养家畜而自己不得不购买面包和饲料的小农争取到这一边来。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富农将留在那一边；我们必须把在不属于自己的租来的土地上劳动、没有牲畜而靠租赁大地主的牲畜来耕地、没有森林和牧场而同把从前的公社森林和公社牧场据为己有的大地主进行斗争的小农和“贫农”争取到这一边来。只要我们还仅仅是在城市和工业区才有力量，我们就决不能统治国家；我们必须也在农村中也获得我们政权的支点。

我们只能逐步地使所有这些中等阶层脱离资产阶级政党，只能逐步地争取他们。但是即使我们仅仅争取到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我们就会在人民和议会中成为**多数**！

## 民主和武装力量

一方面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广大群众的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各资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中各个接近它的阶层开始集合在它的周围——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民就这样分成两个阵营。

两个阵营的力量在 1923 年 10 月选举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在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 1311882 票。基督教社会党获得 1494298 票，大德意志党和农村同盟共获得 419274 票。

基督教社会党比我们多得 182416 票。如果我们能够使十万个选民抛弃基督教社会党并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将成为最强大的党。那时就不再可能有不要我们和反对我们的政府了！

三个资产阶级政党一共比我们多得 601688 张选票。如果我们能够使 32 万个选民抛弃资产阶级政党并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将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那时我们就能统治奥地利！

我们在 1920 年选举中获得 1072709 票，在 1923 年获得 1311882 票，可见我们在三年中增加了 239173 票。难道我们在不多几年之后不能

争取到我们党为了成为最强大的党所需要的 10 万张选票吗？难道我们再过不多几年不会争取到其余的 22 万张选票，从而成为人民和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吗？

**数字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能够依靠选票在不多几年之后获得多数，从而获得共和国的政权，共和国的统治权！**

如果我们把还在我们队伍之外的工人——主要是农业劳动者和女工——争取过来，把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中接近我们的阶层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能够用民主制给予我们的和平手段、用选票为武器夺得政权！

但是，难道大资产阶级会消极地看着我们和平地壮大起来并摧毁他们的统治吗？他们不会在选票还没有把国家权力交给我们之前就力图用暴力来夺走我们的选票吗？他们不会在民主共和国落到我们手中之前就试图推翻它吗？

1918 年 11 月，工人阶级强迫资产阶级接受了共和国。资产阶级不得不“适应”共和国。它现在利用它的资本的力量来使依赖于资本家贷款的共和国历届政府为它效劳，用选举津贴收买统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借助它的报纸来怂恿选民投票赞成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它就这样把民主共和国变成它的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当资产阶级发觉它不再能做到这一点，发觉共和国使无产阶级能够通过选票这一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手段推翻它的统治并且夺取共和国的统治权时，它不会力图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挽救它的阶级统治吗？

这的确就是保皇派今天的思想：在共和国内，政权最终是要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只有以武力压迫劳动者的君主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大地产和大资本来反对工人群众。充满这种思想的保皇派运动深入到共和国的执政党中：从上次选举以来，在基督教社会党中，除了联邦总理扎伊佩尔，大工业的代表施特雷鲁维茨、魏丹霍费尔和赖内尔外，还有保皇派头子文塞。

大工业和大银行公然在政府眼前用资金武装黄黑色旗的“前线战

士”，黑、白、红三色旗的“卍字团”，农民的护国团和自卫同盟。如果资产阶级看到会发生无产阶级通过选票这一符合宪法的手段获得共和国政权的危险，它就会企图利用它的这些武装党徒来推翻共和国宪法。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通过选票这一符合宪法的手段夺取议会中的多数，从而夺取共和国的政权，我们就必须注意保护共和国宪法使之不受资本家和保皇派扶植起来的一切武装党徒的破坏。

保卫共和国宪法不受任何暴力的攻击，是军队的义务。当然，如果军队由反动军官指挥，如果士兵仅仅是军官的盲目和缺乏意志的工具，那么恰恰是军队可能成为反动派的工具，恰恰是军队可能被用来推翻共和国宪法和镇压工人阶级。我们应当防止这种危险。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使我们军队的士兵不致成为指挥官的盲目工具，而应该成为有思想的和自由的共和国公民。所以，我们必须使军人与工人之间在思想上保持密切的联系，注意在每一次征兵时用信仰坚定和热情的共和主义者来补充士兵的队伍，为争取用拥护共和国的士兵补充军官队伍而斗争。这样，我们将有顺从地、忠实地、勇敢地为共和国服务的士兵，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让人利用来进行反对共和国宪法的政变。但是单单阻止军队本身进行反对共和国宪法的叛乱是不够的。军队应当能够迅速地轻而易举地镇压非法武装党徒的任何反对共和国的暴乱，镇压任何保皇派的或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叛乱。所以我们必须为争取以共和国精神教育军队而斗争，使军队作好为共和国献身的准备。所以，我们必须注意使军队保持充分强大的数量，配备足够的武器和军需品。

我们不能利用我们士兵的武器来夺取政权。不，我们必须用选票来夺取政权。但是，我们士兵的武器应该防止一次反革命在选票能够使我们得到政权的时刻夺取我们手中的选票。

我们不愿利用我们士兵的武器反对共和国宪法，而只是愿意用它来保护共和国宪法。在工人阶级通过合法地使用宪法权利将要得到政权的时刻，如果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共和国宪法，我们士兵的武器就应该

为我们保护共和国宪法。

如果我们争取士兵,资产阶级就会愤怒地喊叫:军队不应该是一个党的机关,而应该是共和国的机关。不错!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只有在它能够统治共和国时才“适应”共和国。一旦共和国的政权有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危险时,资产阶级就将起来反对共和国。正是因为我们希望军队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共和国的情况下保持为共和国的一个机关,我们才必须争取士兵支持唯一的、必然会始终无条件地拥护共和主义的党:支持工人阶级的党。

我们必须像注意军队一样地注意**警察和宪兵**。这些武装团体也不应该成为反革命的工具。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公安人员和宪兵当作工人阶级的敌人对待,不应该排斥他们,不应该把他们推向敌人的阵营,相反,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争取他们,使他们中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共和主义信念并且在思想上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

但是,当法西斯分子和保皇派起来反对共和国的自由时,工人本身也必须作好防御斗争的准备。使工人做好并且保持防御斗争的准备,这是我们的**共和国保卫同盟**<sup>①</sup>的任务。

如果士兵留在我们阵营,如果我们哪怕只把一部分公安人员和宪兵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共和国保卫同盟保持强大并且不放松警惕,那么反动势力就不敢起来反对共和国宪法。那时我们将不必使用暴力,不必经过内战,只要利用选举权就可以夺得政权。

1918年革命还没有把工人阶级从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它给了工人阶级从这一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手段。这次革命推翻了王朝、老的军国主义和官僚专制制度,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议会,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取得议会中的多数获得政权。革命使士兵、公安人员

---

<sup>①</sup> 1923年奥地利法西斯组织加紧对工人进行挑衅,制造流血事件,工人群众坚决要求起来斗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为了更好地控制工人运动,于1923年建立“共和国保卫同盟”(简称“保卫同盟”)。它是一支由工人组成的半军事化组织,领导人是尤利乌斯·多伊奇。——编者注

和宪兵同样享有一切公民权,因而使我们有可能在军队的成员中进行鼓动,争取他们支持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从而建立一支力量,它将阻止反动势力在工人阶级有可能掌握或已经掌握了议会中多数的时候破坏议会权力。现在的问题是要利用这两种可能性。只要我们能从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与工人阶级接近的阶层中争取到一部分人,我们就能够在不多几年内依靠选票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并从而夺取政权。如果士兵、公安人员和宪兵保卫共和国宪法,如果保卫同盟对我们的安全保持警惕,资产阶级将不能起来反对我们根据宪法夺取政权和行使政权。这样,用不了几年,大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就可能被摧毁,共和国的政权就可能落到工人阶级的手中!

## 选票还是内战?

1815年以后,几乎在欧洲的所有国家里都是封建贵族在王朝领导下进行统治。一个世纪之后,几乎在欧洲的所有国家里都是资产阶级在大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统治。19世纪的历史是资产阶级战胜王朝和封建贵族的历史。20世纪的历史将是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历史。

如果说在19世纪,资产阶级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战胜了封建贵族,那么这个胜利在不同的国家毕竟是以不同的形式实现的。在法国曾经需要一系列暴力的流血革命,经过1789年至1795年的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至1871年的革命,资产阶级才能够掌握国家政权。在英国则相反,资产阶级用议会手段取得了政权,没有经过暴力革命;议会逐步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最后把国王的职务缩小到在国家庆典时履行礼仪,而在议会内部土地贵族的代表逐步被资产阶级的代表排挤。但在英国同法国一样,结果都是使政权从土地贵族手中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如果说资产阶级在19世纪战胜贵族时采取了种种不同的形式,那么无产阶级在20世纪战胜资产阶级时也将采用种种不同

的形式。在不同的国家里,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取得胜利。

在多数国家里,武装力量都在反动派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会容许工人阶级通过选票这一和平手段夺取政权。如同 1922 年在意大利发生过的那样,在议会成为无产阶级的权力工具之前,资产阶级就会以残暴的暴力统治代替民主的议会政治。在资产阶级用自己的暴力统治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地方,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在经过流血战斗取得胜利后,起初也只能在专政的形式下行使自己的政权,因此这同样是暴力统治。

相反,在有些国家,反动派不是如此独占地和如此不受限制地掌握着武装力量,因而不能在工人阶级正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时摧毁议会统治;在有些国家,在议会中的多数派成为无产阶级多数派时,武装力量也会听命于议会多数派;在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能够用选票这一民主手段取得政权并且以议会制的民主形式行使政权。

在奥地利,无产阶级没有通过内战以暴力建立自己的专政的希望。奥地利在军事上比自己的反动邻国要软弱得多,奥地利无产阶级势力的主要中心离没有军队保护的边界太近。奥地利的任何内战都会引起武装干涉。内战不会以无产阶级专政告终,而会以外国占领军的专政告终。

相反,同中欧和西欧的所有其他国家相比,奥地利反动派远不是那样完全地掌握着武装力量,工人阶级在这里通过民主手段夺取国家政权的希望比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更大。只要这里的无产阶级懂得利用合法的可能性,那么资产阶级不久就会像奥迪隆·巴罗在 1849 年那样惊呼:“合法性害死我们”<sup>①</sup>;但是,如果同时我们的士兵、公安人员、宪兵和我们的保卫同盟注意保持共和国的合法性,这里的资产阶级就不能在一旦选票这一合法手段把合法政权转到我们手中时破坏这种合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4 页。——编者注

法性。

受到俄国革命鼓舞的共产党人相信,工人阶级到处只能采取在俄国使用过的同样手段来夺取和保持政权,只能通过内战夺取政权,只能依靠专政和恐怖保持政权。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向共产党人承认,在资产阶级用自己的暴力反对无产阶级的许多国家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能用暴力来摧毁。我们承认,甚至在奥地利,非常事件特别是战争可能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暴力手段。<sup>①</sup>但是,如果没有发生极其非常的事件来打断国家的和平发展,奥地利的工人阶级将在不多几年内以民主制的合法手段夺取政权并将在民主制的合法形式下行使政权。这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最有利的情况。因为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权不是仅仅由于不自觉的群众对政治漠不关心才能够统治国家的少数人的政权,而是依靠多数人民的积极意志和积极支持的政权,它就会是更加巩固的。

## 干 吧 ！

从1848年到1918年,工人阶级为民主制进行了斗争。现在民主制已经争取到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利用民主制给予我们的权利为工人阶级夺取国家中的统治地位和共和国的政权。

从1868年到1918年,社会民主党曾经努力为使工人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为使他们在工人阶级政党中团结起来而进行了战斗。现在,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独立政党的过程已接近完成。现在的问题是要使接近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小农分子集合在工人阶级周围,使我们可以依靠他们的帮助取得政权。

---

<sup>①</sup> 例如,可以设想,哈布斯堡王国已在匈牙利复辟,然后匈牙利的军队越过我们的边境,企图使我们服从他们的国王,建立一个新的奥匈君主国,而奥地利的保皇派支持入侵的敌人。在这种形势下,奥地利无产阶级有可能不得不以暴力夺取政权并且以专政手段行使政权,以便依靠国家的一切共和主义分子,并且联合反对哈布斯堡复辟的各邻国,来组织国防和镇压保皇派的背叛。

数十年来,我们同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同皇帝的军国主义进行了斗争。现在的问题是要使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保持共和主义精神并用这种精神教育它,以便使它为我们保护民主制度,抵抗反革命的进攻,而我们利用这些制度将能够取得政权。

数十年来,我们能够利用有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即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小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议会和官僚之间、德意志党和斯拉夫党之间的矛盾,为工人阶级争取到个别的让步、个别的改良、个别的措施。例如,我们在 1870 年争得了联合权,在 80 年代争得了第一批保护工人的法律,在 1896 年争得了普遍选举权,在 1906 年争得了平等选举权。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我们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致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一切资产阶级分子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了。现在我们已经再也不能利用有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来贯彻小的让步了。现在的斗争不再涉及个别的措施,个别的改良,现在的斗争涉及整体,涉及政权。

现在政权是近在咫尺。在最近几次选举中我们作了很大的跃进。再来一次这样的跃进,我们就会成为最强大的党!再来另一次这样的跃进,我们就会成为人民和议会中的多数!

工人阶级第一次有可能夺取国家政权了。这确实是可能的!

这一事实必然会使我们的工作热忱、我们的战斗渴望、我们的热情上升到顶点!

干吧,男女同志们!让我们中间的每个人一天一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那么不多几年之后红旗就将在奥地利上空飘扬!

1924 年发表。译自《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丛书》,  
1924 年维也纳德文版第 18—32 页



# 尤利·马尔托夫

(1924年)

国际社会主义失去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极其不幸的人物。尤利·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由于长期患喉头病而受尽折磨，在黑林山的一个医院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享年仅 50 岁。一个同伟大的俄国革命的伟大历史紧密相联的生命结束了；这位新的、革命的俄国的创建人，由于遭到俄国革命的放逐而不得不在远离祖国的地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事实反映了俄国革命的大悲剧。

在 90 年代开始的彼得堡大学的革命学生运动中，肩并肩地出现了两个青年革命家：列宁和马尔托夫。1898 年学生游行示威的风暴第一次把广大工人群众也吸引住了，这时沙皇的警察逮捕了这两个青年领袖。列宁和马尔托夫当时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0 年他们一起到了国外，在国外他们共同创办了《火星报》。

这是俄国革命发展史中决定性的一步。俄国工业还很年轻，俄国工人完全没有受过训练。90 年代，没有一个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敢于对工人谈论政治目标。组织和领导工资斗争是一小群混杂在工人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唯一的活动范围。《火星报》首先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训练和领导工人群众去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的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最初发源于《火星报》的传播组织：把《火星报》秘密运到俄国并在那里组织散发工作的“职业革命家”构成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胚芽。

由马尔托夫和列宁传播的《火星报》的火星燃烧起来了。俄国工人开始觉醒,开始聚集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周围,开始进入革命斗争。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党必须改建为革命工人的政党。

在这一时刻,到那时一直密切合作的这两个人分道扬镳了,分裂成为马尔托夫道路和列宁道路。分歧的起因仅仅是一个组织问题:马尔托夫要把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吸收到目前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中来,通过这种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党变为工人的党;列宁则坚持一个秘密的、严格集中的、仅由“职业革命家”和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党组织的专制,这个党组织领导和控制那些已经具有革命感情,但从来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群众,而不吸收他们入党。

这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个涉及组织形式的争论。实际上这里边已经隐藏着全部的、大规模的、历史性的冲突。马尔托夫要的是无产阶级民主,即按照欧洲的榜样来建立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在这种组织里工人群众民主地自行决定自己的道路。列宁要的则是俄国特有的密谋组织,是“职业革命家”的“开明专制主义”。这些“职业革命家”领导无产阶级,但不让无产阶级实行自决,他们利用未经训练的群众的盲动来达到一个知识分子领导集团的、群众所不知道的、不可理解的革命目的,他们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坚持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围绕组织问题的这场争论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在1903年分裂为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

此后,马尔托夫一生的历史同孟什维主义的历史紧密联结在一起。1905年的革命使他能够回到俄国。革命的失败迫使他再次流亡。他在流亡地同西欧和中欧的同志们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那非凡的知识、卓越的写作能力、对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超群才能,使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中名列前茅。

他在巴黎时,战争爆发了。他的同胞和同志普列汉诺夫激情地偏

袒协约国,与此相反,他却要求对于在这场战争中互相争斗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都采取同样坚决、同样革命的对抗行动。他同法国的五金工人领导人梅尔黑姆<sup>①</sup>、同瑞士的和意大利的同志进行了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社会主义党派的革命分子集合到齐美尔瓦尔得来。

他在瑞士得到伟大的俄国革命爆发的消息。他乘“闷罐车厢”经过德国回到了俄国。但是从革命胜利的这一时刻起,他一生的悲剧就开始了,而这场革命的思想准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他进行的。在俄国,他首先同他自己的党对立起来了,同陷入了克伦斯基的联合政策的孟什维克的策略对立起来了。当由他领导的党的左翼,即“国际主义派”终于能够把党的领导权夺取过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1917年11月,俄国的民主制已被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士兵起义推翻。

布尔什维克在一举夺取政权之后,努力从他们的反对者中争取最重要的、最有威望的、最革命的人物。他们邀请马尔托夫作为外交部的人民委员参加他们的政府。但是马尔托夫一刻也没有被那时布尔什维主义的招致灾难的幻想和乌托邦所迷惑。他拒绝了。他留在苏维埃里。他在那里英勇地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怖作斗争。但每当沙皇的反革命威胁布尔什维主义时,他甚至坚决地号召支持布尔什维主义。他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需要时也同布尔什维克保持革命的团结,就这样完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历史任务。

布尔什维克憎恨和惧怕这个人。他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反对用苏维埃官僚的专制主义代替苏维埃民主制并要求给无产阶级以结社、集会、出版和罢工自由,他在列宁下决心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两年就预言过“战时共产主义”必然要破产。但即使在最黑暗的恐怖时期,布尔什维克也不敢触动这个英勇的革命家。然而,马尔托夫由于喉头结核在内战的饥饿年代恶化,于1920年去国外一个时

---

<sup>①</sup> 阿尔丰斯·梅尔黑姆(1881—1925)——法国工会活动家,工团主义者。法国五金工人联合会和法国劳动总联合会领袖之一。——编者注

期,这时共产党人总算摆脱了他们在社会民主党中最危险的对手;马尔托夫再没有能够回到俄国。

尽管重病缠身,他在流亡期间仍然坚持工作。他在柏林创办了《社会主义通报》。就像从前《火星报》只好被秘密地运进沙俄一样,这一报纸这时也不得不以秘密方式偷运进布尔什维克俄国。在争取俄国无产阶级的自由的阶级运动的同时,他还关注重建国际的斗争。我们在维也纳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sup>①</sup>的成立大会上见到了他。他早在20年前就是《工人报》的撰稿人,他最后一篇用德文写就的关于国际的文章也是在我们的维也纳《斗争》杂志上发表的。

他逝世了,他现在已经属于在战前曾经是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倍倍尔和维克多·阿德勒、饶勒斯和凯尔·哈第<sup>②</sup>、普列汉诺夫和罗莎·卢森堡这批伟大死者的行列。

但是他没有死,他的思想没有死。在萨尔马特大平原上一个几十年前刚刚从农奴制解放出来的、目不识丁的农业民族,正在为争取自己生存的新形式而进行斗争。或许今天在那种野蛮状态中,只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按照它的臆想,只有使无产阶级屈服于“职业革命家”的恐怖主义专政,无产阶级才能得到解放。但是在俄国如同在全世界一样,未来只属于马尔托夫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自己实行民主自决的社会主义。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能是专制暴君走向社会主义的事业,它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思想成熟的结果。一旦无产阶级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自己的统治者时,它就不再忍受这种人骑在自己头上了。

这就是马尔托夫终生坚持的伟大思想,这种思想是不会死亡的。

---

① 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是暂时退出了第二国际的各中派政党和集团于1921年2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又称维也纳国际)。主要领导人为弗·阿德勒、奥·鲍威尔和拉·马尔托夫。1923年,它重新同第二国际合并。——编者注

② 詹姆斯·凯尔·哈第(1856—1915)——英国独立工党领导人,工党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sup>①</sup>。

译自《奥托·鲍威尔选集》1961年维也纳德文版  
第241—244页。选自《鲍威尔言论》第274—294页

---

<sup>①</sup>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从19世纪40年代起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这里的提法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和第2卷第609页。——编者注

## 阶级力量的均势

(1924年)

我在我的奥地利革命史<sup>①</sup>中曾经说过,革命的结果是一种无论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都不能统治国家、不如说双方不得不彼此分享国家政权的状态。因此,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既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机构。

克尔森<sup>②</sup>教授现在想要证明:

1. 确认这一事实就是违背马克思的国家观,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国家从来只能是一个阶级的统治机构;

2. 因为在阶级的力量对比中始终只会发生量的变动,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承认我所确认的事实就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国家在革命之前也决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构,在将来也决不是一定会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

我现在要对克尔森的这两个论断进行详细的批判,而只是附带谈到克尔森对于我的《奥地利革命》的所有其他指责。因为,对这两个论断的讨论给我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来阐明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即使完全撇开克尔森的批评不谈,理解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自己就工人阶级在

---

① 指《奥地利革命》一书,1923年维也纳德文版。——编者注

② 汉斯·克尔森(1881—?)——奥地利资产阶级法学家,1920年奥地利宪法的起草人。——编者注

当前历史时代的任务和前景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中世纪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机构,这个阶级是以骑士出身的标志为基础作为等级组织起来的,是用封建纽带联结起来的。

在这种封建国家的内部产生了市民。只有经过几世纪之久的发展,市民才强大到使自己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同地主阶级的力量保持均势。随着阶级力量的这种均势状态的到来,封建国家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1. 马克思在 1847 年就已经写道:“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sup>①</sup>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社会制度的斗争的那一发展阶段,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而两个阶级的力量相互保持均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发展阶段导致产生君主专制。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下列事实:随着市民以及它的工业、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自然经济就被货币经济代替。只是由于货币经济的这一发展,才使货币税和国债制度能够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只是由于这样,才能够用雇佣军队来代替以臣属关系为基础召集起来的骑士军队,用由领薪俸的官吏组成的管理机关代替以采邑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管理机关。君主利用雇佣军和官僚制这一强力手段使封建地主阶级从属于自己,把封建领主变成他们的附庸,从而实行政治集权,这种政治集权是随着货币经济的扩展才成为可能和必要的。君主在反对封建领主的这一斗争中依靠城市的支持;因为君主权力的加强有赖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从而有赖于资产阶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君主就对这种发展加以促进。因此,资产阶级是“等级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9 页。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君主专制”有着重号。——编者注

础”<sup>①</sup>。由此,等级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封建国家是一个阶级,即地主阶级的统治机构,它镇压其他阶级,即市民和农民。与此相反,君主专制产生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均势的基础上,它不是这两个阶级中这一个或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机构。在君主专制中国国家政权宁可说是独立于两个阶级,以便镇压两个阶级。这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王权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sup>②</sup>。这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sup>③</sup>。克尔森抓住恩格斯所说的调停只是“表面上的”这一点不放。事实是,君主专制以在各阶级之间进行“调停”(这就是霍亨索伦家族的“*Suum cuique*”<sup>④</sup>!)为伪装,实际上使两个阶级都从属于自己并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恩格斯不过是把这种在各阶级之间进行所谓调停称为“表面上的”,而不是把一种国家权力的产生称为“表面上的”,这种国家权力由于各阶级的力量彼此保持均势而能够独立于这些阶级,因此它不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统治所有的阶级。

2. 然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均势并不是到处都导致两个阶级从属于一个君主专制,不如说,这种均势也可能导致两个阶级彼此分享国家权力。根据马克思的阐述,英国 1688 年光荣革命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偶尔称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sup>⑤</sup>,但是这次革命的结果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分享国家权力。马克思在 1855 年写道:“不列颠宪法其实只是非正式执政的,但实际上统治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决定性领域的资产阶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4 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07 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8 页。——编者注

④ 拉丁文,意为“各得其所应得的”,是普鲁士王国黑鹰勋章上的格言。——编者注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1 版,第 602 页。——编者注



和正式执政的土地贵族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过时的、陈腐的妥协。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最先参加妥协的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派别——金融贵族。1831年的改革法案使另一派，即英国人称为‘milliocracy’的工业资产阶级巨头也参加了妥协。”<sup>①</sup>统治权继续掌握在土地贵族手里；但是两个彼此斗争着的贵族党中的一个——辉格党扮演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体现者（类似1867年至1897年奥地利的“忠于宪法的大土地占有者”）。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样，也是大不列颠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仅如此，辉格党的核心正是由英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傲慢的土地占有者构成的。他们和托利党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辉格党人是资产阶级的，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一当一个资产阶级运动强大到不可遏止的地步，一当它同时变为把托利党从政府职位赶走的最可靠手段，辉格党便出来利用自己的胜利把政权据为己有。”<sup>②</sup>

马克思把这种在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分享政权的状态也描写成两个阶级的力量均势的结果。马克思在1855年写道：“当英国人从海外请来一位荷兰人做国王的时候，随同新的王朝的建立，开始了新的纪元——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相结合的纪元。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血统特权和金钱特权之间的立宪均势。”<sup>③</sup>这是这样一种均势状态，当时资产阶级虽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把统治机构据为己有，或者还不敢把统治机构据为己有，但是贵族中的当权派也只能作为“资产阶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108页。在马克思的原文中，“非正式执政的”、“统治着”、“正式执政的”、“金融贵族”、“工业”有着重号。——编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384—385页。在马克思的原文中，“贵族代表”、“必然的和急迫的”有着重号。——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106页。——编者注

的贵族代表”来进行统治。国家在这里也不再是纯粹的土地贵族的统治机构,但还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构,它是在两个阶级之间分享政权的结果,这两个阶级争取政权的斗争组成了那一时代历史的内容。

只有当资产阶级壮大到能够单独掌握国家的统治时,才能够摆脱产生在阶级力量均势基础上的国家形式。在大陆上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实现的,这就是说,通过一系列互相衔接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资产阶级战胜了君主专制,并把国家权力据为己有。在英国这是通过从 1846 年以来的发展实现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两个历史上的党逐渐摆脱了贵族的领导,从贵族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最后的结果在英国和在大陆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

由此可见,根据马克思自己的阐述,国家在资产阶级上升的历史时代的发展是这样的:在这一时代的开始国家是纯粹的地主阶级的统治机构,在这一时代的末期国家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构。在封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有一个阶级力量均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两个阶级不是处于一个独立于两个阶级的国家政权的统治之下,就是不得不相互分享统治权。

我们是否可以用类推的方法根据国家在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发展来设想国家在无产阶级上升时代的发展呢?从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和只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机构的那种国家之间,将有一个阶级力量均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不是处于一个独立于两个阶级的国家政权的统治之下,就是不得不相互分享统治权?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是这样阐述法国 1848 年革命的发展的:

2月25日,巴黎无产阶级夺得了决定性的权力。“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

治着巴黎。”<sup>①</sup>无产阶级借助自己武器的威力迫使宣布成立共和国。它迫使共和国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sup>②</sup>。它迫使在共和国的最初几天里宣布“劳动权”，设立卢森堡委员会，由社会主义者担任委员会的领导。马克思说：“无产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sup>③</sup>共和国最初的日子是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日子。

但是当资产阶级从街垒斗争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当它得到被无产阶级的兴起所吓坏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当它能够用新组成的近卫队进攻无产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同无产阶级的力量达到了均势。从3月到5月在巴黎存在着阶级力量均势的状态。它反映在政府的构成成分上。马克思写道：“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产物，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sup>④</sup>从3月到5月这几个星期里的共和国，它不是无产阶级共和国，但也还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的政权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享了。

“法国人民所承认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应该是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sup>⑤</sup>5月4日国民议会开幕。“整个法国在国民议会里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sup>⑥</sup>这样它就挑动无产阶级起来斗争。无产阶级在6月22日举行了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马克思的原文有着重号。——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编者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在马克思的原文中，“临时政府”、“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有着重号。——编者注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编者注

⑥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编者注

起义。它被击败了。无产阶级的流血失败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复辟**。

工人阶级的优势,阶级力量的均势,资产阶级的复辟——这就是我的奥地利革命史中的章节标题。人们可以看到在我对 1918 年至 1922 年的奥地利革命的阐述和马克思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的阐述之间有类似之处。

但是,人们当然也可以看到由于 1918 年的奥地利无产阶级在人数、阶级觉悟、组织、经验方面远远超过 1848 年的法国无产阶级而产生的差别。1848 年在巴黎,工人阶级的优势只维持了很少几天,1918 年和 1919 年在德意志奥地利却维持了整整一年。1848 年在巴黎,阶级力量均势的时期只维持了几个星期,在德意志奥地利却从 1919 年到 1922 年维持了三年。在巴黎,它是没有持久成果的无秩序的混乱时期,在德意志奥地利则是无产阶级取得成就的时期,这些成就在这一时期后还继续保持。在巴黎,它是幻想各敌对阶级“*Fraternité*”即博爱的时期,在奥地利,无产阶级进入这一时期时不抱任何幻想,它充分认识到,各阶级的暂时合作不是长久克服它们之间的矛盾的手段,而只是它们的力量暂时均势的结果,不是克服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只是使阶级斗争的结果暂时稳定下来的手段。在法国,阶级力量均势时期是以用暴力彻底镇压无产阶级告终的,在奥地利这一时期仅仅以经济的和社会的力量变动告终,这些变动不能同样地彻底恢复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但是这些差别丝毫没有改变下面这一点:根据马克思的阐述,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也暂时出现了各阶级力量相互保持均势的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共和国既不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能是无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各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暂时妥协、暂时分享权力的结果。

从六月战斗产生的资产阶级统治是不稳固的。摆脱了无产阶级的威胁的资产阶级分裂成互相斗争的党派。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农民群众开始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且聚集在重新活跃起来的无产阶级周围。阶级力量均势的局面恢复了。“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

那么资产阶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sup>①</sup>但是这种阶级力量均势在六月战斗之后不可能再一次在政治上表现为在各阶级之间分享国家政权,而只能表现为这两个阶级都被作为独立于它们的力量出现的国家行政权力所制服。路易·拿破仑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实现了这样的制服。“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地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sup>②</sup>我在我的《奥地利革命》的最后一章中也试图证明,从日内瓦条约以来在奥地利出现的资产阶级复辟不会长久。事实上无产阶级现在已经重新能够进行斗争,来争取它的“参加决定的权利”,争取“有组织的民主”,这就是说争取废除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争取重新建立阶级力量均势的体系。但是在这里,先前没有用暴力征服无产阶级,因此重新建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均势不需要使两者都屈服于第三种力量,不如说它可能导致在两个阶级之间分享国家政权,导致恢复一种局面,在那时无产阶级虽然还不能统治,但是资产阶级却不再能向无产阶级发号施令并从而不得不同无产阶级妥协。<sup>③</sup>

克尔森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国家观,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我对奥地利共和国直到 1922 年秋天既不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又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这一事实的承认违背了马克思的国家观。实际上马克思自己 1850 年在他的对于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分析中就作出了和我相同的论断。他在那里就已经指出,革命的过程暂时形成了阶级力量的均势。而且他在 1852 年就已经承认,这样一种社会均势状态在政治上可能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 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4 页。——编者注

③ 这种均势关系并不是无条件地要求建立联合政府。不应把阶级力量均势的社会状态同它的政治表现形式混淆起来!在各阶级之间实际分享国家政权可以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例如在奥地利从 1919 年秋季到 1920 年秋季),但是也可以采取资产阶级政府(例如奥地利的迈尔政府和朔贝尔政府)或社会党政府(例如瑞典的布兰亭政府或也许不久会产生的英国工党政府)的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过并不表现实际的阶级力量均势的联合政府,例如德国的第二届斯特莱斯曼政府或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作者注

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暂时分享国家政权(例如 1848 年 3 月和 4 月在法国),或者是两个阶级都被皇权所制服(例如 1851 年 12 月在法国)。我的阐述远没有违背马克思的阐述,不如说是用新的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思的阐述。但是,怎样才能解释,克尔森怎么会这样完全错误地理解马克思的国家观,以致把对于马克思国家观的证实误认为同它不相容的呢?

一切科学都是在思想中摹写事实。但是任何科学都不能完全地摹写事实。它必须把事实简单化、典型化、符号化。因此,每一门科学(包括“精密”自然科学在内)的知识总是只能对事实作近似的阐述。研究者满足于对事实多大程度的接近,这取决于他的研究在当时的实际目的。马赫说:“当我们在思想中摹写事实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是完全地摹写事实,而只是摹写对于我们重要的那一方面。我们在这儿有一个直接地或间接地从实际利益产生的目的。”<sup>①</sup> 马克思的伟大历史观是在他的关于经济和历史的专题研究中得到阐述的。在这些专题研究中,他高度完善地接近了事实。但是,马克思常常把他的专题研究中对于他的实际利益、对于当时的实际目标最重要的结果总结成普遍的原理,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定理”。这些普遍的定理不能像具体的专题研究一样完善地摹写事实。而且这样的定理越是普遍,越是抽象,它对事实的接近就越不完善,越是粗糙。

例如,《共产党宣言》的下述原理就是这样的定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sup>②</sup>这一原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当马克思写这一原理的时候,欧洲还没有一个地方的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的事务的委员会。法国在路易-菲力浦<sup>③</sup>时掌权的并不

---

① 马赫《力学及其发展》,1908 年莱比锡德文版,第 52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4 页。——编者注

③ 路易-菲力浦(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被 1848 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推翻。——编者注

是整个资产阶级,而只是金融贵族,在英国掌权的还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土地贵族,它只是吸引资产阶级的个别阶层来参加统治,在中欧和东欧,统治的还是君主专制。因此马克思的原理描写的不是实际的状态,而是发展的趋势。他总的说来正确地描写了这种发展趋势:此后几十年里大多数国家的国家政权事实上越来越接近这样一种状态,人们可以把那里的国家政权描写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事务的委员会。

但是终究只是接近这种状态。马克思在自己的专题历史研究中不满足于如此不完善地摹写事实。他在这些研究中表明,单个的具体的国家政权怎样远远从本质上偏离了《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法则。他不是把 50 年代的英国国家政权描写成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事务的委员会。不如说,他对英国国家政权的整个结构作了恰恰相反的解释:“在英国执政集团同统治阶级决不是等同的。”<sup>①</sup>同样,马克思不是把拿破仑第三的帝国描写成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事务的委员会,而是描写成得到农民支持的、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实行镇压的、作为独立的力量反对这两个阶级的行政权力;恩格斯把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描写成同金融贵族和重工业联合起来的容克地主的统治机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使容克地主得以维持对于其他两个阶级的群众的统治。<sup>②</sup>人们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定理对所有这些情形都是不适合的,马克思自己在专题阐述中对它作了很重要的修改。它是否因此就是错误的呢?马赫在论证自然科学中类似的方法时说:“整个过程只有一种经济的意义。我们在摹写事实时从较稳定的、经常的、我们所熟悉的复合体开始,然后补充不经常的复合体来加以修正。”<sup>③</sup>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必须在很少的篇幅中阐述几个世纪的世

---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1 版,第 50 页。——编者注

② 克尔森问道:难道“没落的普鲁士容克地主”是第三个阶级?我认为就是这样!只有对马克思学派关于普鲁士德意志专制国家的分析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③ 马赫《力学及其发展》,1908 年莱比锡德文版,第 524 页。

界历史,他不可能阐述个别的变态。在那里他满足于用一个一般原理来阐述国家政权发展的一般趋势。对于这一阐述来说,只有这一点是重要的:那里的问题还刚刚在于唤醒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刚刚在于引导他们投入夺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那里只要首先教会他们懂得“较稳定的、经常的、我们所熟悉的复合体”,也就是教会他们懂得国家政权通常是或者将会是管理他们的直接阶级敌人的事务的委员会就足够了。当人们向群众呼吁的时候,人们可以首先满足于对现实的这种程度的接近,而把更完善的接近,即对这个一般法则的种种变态的阐述留给并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的专题研究去做。

在向群众灌输马克思的定理时,当然会从这种做法发展成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的体系,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所知道的不是具体化了的、作出修改的专题研究,而只是最一般的定理,从而只是最粗糙的接近现实,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定理从其历史的和系统的联系中抽出来,把它们直接地并列起来,并以最一般的表述使它们教条化。<sup>①</sup>流行的马克思批判所知道的和所批判的仅仅是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克尔森的做法对于这种流行的马克思批判来说是典型的。克尔森所仅仅知道的关于马克思的东西,也正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所仅仅知道的:马克思曾经把国家描述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构。至于马克思自己在他的专题研究中对这个一般定理作了种种修改,更完善地接近了事实,克尔森对此毫无所知,或者至少是不重视。而当他在我们这里碰到了这些修改中的一个时,他就认为这是背离马克思,是同马克思不相容的!

但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所唯一知道的和迂腐的马克思批判所唯一批判的那种最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定理,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对于

---

<sup>①</sup> 这也是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中的做法,克尔森是从这本小册子中汲取他关于马克思国家观的概念的。唐恩从马尔托夫的遗著编辑出版的一部著作对于批判列宁的这本在许多方面把人引入歧途的小册子是很有价值的,这一著作是《世界布尔什维主义》(1923年柏林德文版)。我在1907年发表的《一本书的历史》一文(《新时代》第26卷第1册)中第一次用和这里同样的方式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作了描述。



无产阶级刚刚开始阶级斗争的时代来说已经有足够的对事实的接近，现在对于我们的实际利益来说已经不再够了。今天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事件的与当时不同的另一些方面，今天为了实际的利益要求对这些方面作更深入的理论阐述。马克思只是附带指出的若干方面，今天必须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战争所引起的变革在许多国家造成了阶级力量均势的状态。但是这种社会状态有着多种多样的政治表现形式：

1. 在许多国家出现一种状态，使无论工人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能用议会制形式单独管理国家。这种状态有时使工人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组成正式的联合政府，有时使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的政府只有在它的阶级敌人的默认和严格监督下才能实行管理，有时重新使议会丧失作用，它不得不把自己的职权转交给行政机关。传统的议会制度的普遍危机是阶级力量均势的一种表现形式。

2. 在另一些国家阶级力量的均势导致拥有武装的政党夺取国家政权并使所有阶级服从它的专政。这主要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

①在意大利是由法西斯主义执行了这一任务。1922年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1851年法国波拿巴主义的摹本。在两种场合都是一个冒险家能够在一帮武装冒险家的支持下驱散资产阶级议会，从而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他对于所有阶级的专政，因为资产阶级自己把他们的政治代表机构抛开不管，放弃了他们自己的阶级统治，投入了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政权的暴力的怀抱，以便用放弃他们的政治统治来挽救他们的受到无产阶级威胁的财产。<sup>①</sup>

---

① 法西斯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正如波拿巴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政一样。与此相反，人们可以把最近几个月德国的状况描写为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专政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矛盾是马尔克斯政府同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之间的矛盾，贝特伦同霍尔蒂—格姆伯什之间的矛盾。（威廉·马尔克斯是1923—1924年以及1926—1928年的德国总理。埃利希·鲁登道夫是德国反动将军，1923年希特勒暴乱的组织者。伊什特万·贝特伦是1921—1931年匈牙利总理。霍尔蒂·冯·瑙吉巴尼奥是1920—1944年匈牙利的法西斯独裁者。格姆伯什·冯·姚夫考是1932—1936年的匈牙利总理。——编者注）

②在俄国是布尔什维主义,它在开始时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在经济必然性的压力下却变成了完全另一种东西。它现在完全像法西斯主义一样是一个站在各阶级之上的统治阶层的专政,这个专政在自己的实践中不得不使工人、农民和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互平衡;它的统治的稳定性所依靠的是,这三个阶级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取代它,这一稳定性是这三个阶级之间力量均势的表现。

《共产党宣言》关于国家政权只是管理资产阶级的事务的委员会的原理在 1847 年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描写,今天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只不过是对过去的或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描写。但是接着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之后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种阶级力量均势的状态,它在政治上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国家形式。这一经验使下面一点成为可能:在国家曾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机构的时期和国家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机构的时期之间,将有一个各阶级的力量相互保持均势的过渡时期。对这种社会状态及其多种多样的政治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分析,是一个实践上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现在再也不能像马克思那样满足于附带地谈到这种均势状态;我们现在倒是应该深入研究这种状态。在研究时,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于这种状态偶尔的指示出发,我们应当在研究新的经验事实时应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但是我们的成果无疑地将会超过马克思。就这一意义上说,我的奥地利革命史当然也已经试图获得马克思还没有能够获得的认识。

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政治状态,在其中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再能统治其他阶级,因此政权不得不由两个阶级分享,这是国家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阶段。与此相反,克尔森却认为这是国家的正常状态。因此他企图抹杀国家的这一发展阶段同在它之前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阶段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无产阶级即使在 1918 年之前也不是没有权力的,革命只不过使无产阶级的权力有所增加。这只是量的区别,而不是质的区别;既然国家现在不是阶级统治的机关,那么它在以前也不是阶级统治的机关。

在 13 世纪的社会里就已经存在相当多的资本主义成分,尽管如此,我们根据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为封建社会;在 19 世纪的社会里还包含相当多的封建主义残余,尽管如此,我们按照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把 13 世纪的社会和 19 世纪的社会之间的区别说成是一种量的区别,即封建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混合比例的区别;但是这种量的变动是最强大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的革命的原因和结果!这正是量“转变为”质。

我们的情况很相似。确实,无产阶级即使在 1918 年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权力的。但是这种权力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权力相比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可以把这种政权制度描述为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阶级统治,这对于理论的和实践的目的来说已经是充分地接近事实。革命使无产阶级的权力得到增长,因此现在还这样描述力量对比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如果人们不想歪曲事实,现在就应当把革命第一年的政权制度描述为工人阶级的优势,把以后的三年描述为阶级力量的均势。这里的量的变动也意味着国家整个作用的重大的质的变化!

举一个例吧!银行巨头的权力不是依靠他们的人数,而是依靠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职能,首先是提供信贷的职能,这一职能使需要信贷的国家依赖他们。于是少数银行巨头能够凭借自己的经济职能统治国家。这是**职能寡头政治**。革命则导致相反的现象。因为国家不再掌握镇压工人的暴力手段,它不得不就所有重要的政府行动同工人组织达成协议;因为假使它不这样做,它对于罢工,即停止工人在社会中的职能,就毫无抵抗能力。这是**职能民主**的管理方法。从职能寡头政治向职能民主的过渡在 1918 年至 1919 年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优势,反过来说也正是一样:从 1922 年秋天起从职能民主向职能寡头政治的倒退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复辟。职能民主是工人阶级行使权力的特殊形式。克尔森根本错误地理解了我关于这种行使阶级权力的形式的阐述,他认为我的职能民主的学说是一种有机的国家观、同阶级斗争学说不相容

的国家观的产物！

向职能民主的过渡表现在下面这一事实：革命政府不再能够用暴力来镇压群众，而只能用精神手段来领导群众。克尔森用老生常谈来回答这个论断，说什么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精神通过暴力、暴力通过精神起作用。但是，在奥地利革命政府以前、同时或以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像它那样很少采用暴力镇压手段，而主要采用说服教育的手段来领导群众，这一事实难道他能够否认吗？<sup>①</sup>

事实上国家的整个作用在奥地利所以发生如此彻底的变革，还由于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在一个现存的国家制度中实行权力的变动，而实际上在于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制度。克尔森甚至企图缩小革命前的国家同革命后的国家之间的这种距离。为了证明从革命以来我的观点改变了<sup>②</sup>，他引证了战争期间我在同伦纳争论时说过的一些话。但是，这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因为这里涉及的不是我们对待一般国家的态度，而是对待奥匈国家的态度。关于奥匈国家，我们确信它不能被我们夺取，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民主制活动的地盘之前，它就会瓦解！

克尔森的整个批判否认革命前的国家同革命后的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这种批判不想承认过去有这样的本质变化，因为它想动摇对于将来的国家的本质变化的信念。它不承认，国家一直到1918年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机构，因为它不想承认，国家政权在将来必定会成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机构。克尔森认为，既然国家政权由各阶级分享了，那么为什么这种状态不可以延续下去，为什么在这之后国家将变成工人阶级的

---

<sup>①</sup> 我曾经偶尔叙述过，我们是怎样进行工作，“以便防止群众新近获得的自由蜕化成无节制的暴行（由于四年的战争群众变得野蛮了）”。克尔森认为，这就是承认我们防止了一次革命；实际上我指的是防止个别人和小团体的暴行！正如克尔森可以根据那次革命的历史而确信的那样，任何革命都曾经抵制这种过火行为。我所说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能够用纯粹精神手段来防止过火行为，其他的革命却用军法来防止。我留给克尔森去回答，说什么军法归根到底也是通过精神起作用的！

<sup>②</sup> 我当然改变了我的某些观点。只有那些从丰富的新经验，从这种最强有力的“历史的直观教学”一点东西也学不到的人，才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

统治机构呢？

近年来的全部历史作出了回答。无论何时何地，当情况发展到在各阶级之间分享国家政权时，阶级力量的均势是极不稳定的。当资产阶级丧失了它的旧的独占统治时，它感到愤怒，对国家恼怒，对国家敌视；无产阶级不满意，因为它在这种状态下不能变革生产制度（克尔森当然也强调这一点），因此它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它在生产上的从属地位处于矛盾之中。因此两个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总是在等待时机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因此，近几年来各阶级之间分享国家政权的时期到处都像马克思根据法国 1848 年 3 月和 4 月的经验所描述的那样，是“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sup>①</sup>的时期。因为经济过程本身使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一再发生变动，最后不可避免地会来到这样的时刻，那时均势关系将消失，只有在回到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间进行选择。正如资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并使整个法律制度适应资本主义之前必须经过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均势时期一样，无产阶级只有经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均势时期，才能最终夺取国家政权并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译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0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 79—96 页。选自《鲍威尔言论》第 297—314 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9 页。——编者注

# 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马赛 代表大会上关于东方问题的报告

(1925年8月)

我要代表东方委员会向你们提出的这份决议案,是我们连续多少昼夜不断工作的结果,是委员会和小组经过长时间认真讨论,有时甚至经过激烈的争辩而取得的结果。

委员会所要克服的困难,在于问题本身的性质。在东欧我们看到一系列新的国家在已经崩溃的沙皇帝国的废墟上成长起来。在这一系列国家中,我们看到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建立新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对于今天就能够对别人采用那些昨天他们还在身受其害的压迫方法感到洋洋得意。我们看到,在这一系列新的国家中,战争在各地造成的暴力精神如何地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作用。在芬兰和其他几个国家,这种精神生动地体现在资产阶级的组织机构中。我们看到,这种暴力精神如何地扩展到对外关系上,从而在这些国家及其邻国之间如何地发生着足以招致战祸的种种摩擦。

由于和约的签订,欧洲的许多地区已经巴尔干化了。正如1914年的战争起源于巴尔干一样,现在产生的战争危险也是来自这个新的巴尔干化地区。这种危险原来就很大,而我们更不应该看不到这种危险还会大大加深,因为东方和西方的大国正在想把这些区域和新建国家当作棋盘上的棋子加以摆布。其次,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确实已把一切

万里长城拆除得干干净净，生活在这些人口过剩的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开始觉醒了。在 19 世纪，无历史的民族——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南斯拉夫和希腊相继觉醒，最后他们经过一系列的起义而争得了自由，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已在伊斯兰教各国、中国和印度声势浩大地蓬勃展开了。我们知道，欧洲民族解放的过程曾经伴随着一系列的革命和战争，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远东可能爆发的事件对西方是多么危险。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危险了。

我们看到有两大势力在干涉这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过程，并且互相对立。这一方面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另一方面就是苏联。

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东西指导着苏联的政策。布尔什维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正如它相信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在流血的内战中才能达到一样，它相信，被奴役民族的解放也只有在革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流血战争中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迄今统治着东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地由于那些十分相信布尔什维主义的，贫困屈辱的中国苦力展开运动而在发抖。

在这个由于和约而产生的新的巴尔干地区，要激起弱小民族反对苏联的运动，促使波兰或罗马尼亚的农民为列强在东方的统治而流血，是十分容易和十分诱人的。

但是另一方面，苏联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我们确实地知道，如果东方的任何地方由于大量冲突而发生战争，西欧和中欧就有卷入这次战争的巨大危险。我们清楚地知道，德国民族主义者中最反动的人物还没有被彻底打败，他们认为波苏战争会给他们以大好的机会来跟波兰算清老账；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法国有些人认为，一旦发生俄波战争，就可以利用德国作为军队通过的地区。这些人轻率地把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日常讨论的对象：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应该对德国重犯那种德国曾对比利时犯过的罪行。以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种种冲突。关于这一点，委员会应该表示自己的意见。

我不想隐讳委员会所面临的困难。

在委员会中有欧洲各国强大工人政党的代表，他们从 1917 年以来就了解这种以破坏工人运动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阴谋诡计的全部经过，他们看到，工人运动的力量由于分裂活动而明显地削弱了，这种分裂活动不仅分散了工人群众的力量，而且使工人群众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很难要求这些同志以完全历史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布尔什维主义。

但是，另一方面，在委员会中也有英国这样一些对世界政治起决定作用的国家的强大工人政党的代表，这些工人政党负有重大的责任，并且是为人所信赖的。近一年来，英国工党或它的某些党员在讨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时，据我们看来，没有给以必要的批判，这使我们时常感到有些不安。但是，正如我很了解同志们特别是东欧的同志们在委员会中所表现的激昂情绪一样，我同样很了解西欧的同志们特别是英国人的心理，他们担心委员会会作出类似“除了反布尔什维主义之外就别无所有”的片面决议。这些同志怀着完全不同的情绪，他们在英国政府用金钱、武器和人力支持反革命武装干涉的时候反对过英国政府，他们经过严重的斗争达到了承认苏联的要求，他们捍卫着俄国人民和世界和平。委员会内的激烈的争执，可以从东方和西方的工人政党所处的不同地位上，从它们在我们的斗争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上，从它们的不同感受上，从它们的不同的未来发展前途上，得到充分的解释。

我们要向大家提出的决议案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决议案首先是要确定对我刚才说的那个重大问题的态度，即力求确定我们大家对苏俄、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应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各国政府的任何敌视苏联的政策，在我们中间都一定会遇到最顽强、最坚决的抵抗。

可能有过一个时候，没有必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人们没有感觉到有这种危险。有个时期，帝国主义政府在看到武装干涉徒劳无益之后，同苏联建立了实事求是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该欺骗自己，因为近一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党政府的倒台标志着这一发展过程



的转折点,特别是亚洲的发展情况可能对未来产生严重的危险。我完全不想夸大其词。我并不同有些人一样,认为这种危险是今天或明天就会爆发的危险。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危险是从亚洲民族的伟大觉醒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震荡中产生的。我们知道,这种危险是一定要来的,所以“不许干涉苏俄!”的口号应该成为我们整个未来时期而不是今天或明天的、首要的和最高的指导方针。这决不是说,我们想向布尔什维主义投降。我们要用严厉的批判态度来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在俄国进行着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时期,对于实行专政在理论上是是否正确的问题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内战过去之后,我们认为,俄国人民的需要是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的,即需要自主行动的自由,需要政治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

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听到屠拉梯<sup>①</sup>同志的警告,他警告我们不要低估了那些对我们西方来说现在是理所当然的遗产而实际上是用宝贵的鲜血换来的文明成果,这就是人身自由,精神自由,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的自由。我们仍然主张这种自由而反对俄国的专政,正如我们仍然要批判地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对外政策一样。通过革命战争来最终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思想,是我们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界线,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过去革命战争的历史意义,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由于武器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已经与18世纪末叶时完全不同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毒气战争的时代,新的战争,即使是抱着最革命的目的,也不会使人类摆脱贫穷和奴役,却会使人类陷于最可怕的贫困和最可怕的野蛮状态。

总之,我们仍然要毅然决然地毫不妥协地强调指出我们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界线。但是,正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所以我们在同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划清界限时,必须使那些为了维护自己的市场和统治其他

---

① 菲力浦·屠拉梯(1857—1932)——意大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编者注

国家人民而可能与布尔什维主义发生斗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不致产生任何荒谬的想法。这是我们的决议案中的一项内容。我们的决议案对布尔什维主义不惜作任何批评,但是它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对俄国的阴谋、手法和态度却毫无共同之点。

我们的决议案中要提到的第二件事,是与东欧的战争危险联系着的东方民族觉醒的伟大过程。目前在东方,中国的苦力正在进行斗争。这还不是现代的工会斗争。我们知道,这些工人在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上目前正处在欧洲工人阶级早已跨越过了的那个阶段。这些工人还得走一段遥远的、痛苦的、难保没有失败的道路。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这是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有切身重要意义的道路上的第一步。

难道我们大家不知道,难道工业统计和欧洲失业的事实(例如在纺织工业中)没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欧洲资本家觉得这里的工人阶级已经太强大、太自觉、太倔强、要求太高,已经打算跑到拥有廉价的、顺从的、无保护的、中国童工劳动的地方去,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纺织工厂吗?那里工人的觉醒的伟大意义,就在于这样一来就使资本主义失去了最后的避难所。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只是资本主义最后一支庞大的后备军中大动乱的开端。因此,那里发生的斗争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要向那里的工人致敬,并且希望不久他们就会自觉地跟我们合作,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进行斗争。

这个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整个东方的运动,将破坏那里的均势,震动世界列强的统治,产生战争危险和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危险。因为这个过程将会同上一世纪欧洲的无历史民族的觉醒过程一样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如果今后欧洲和美洲的工人阶级不是相当强大,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替这些国家的人民争得他们正在争取的自由,使这种自由无须通过战争而取得,那么,这个过程就会像 1924 年<sup>①</sup>那样燃烧起遍及全世界的大火。

---

<sup>①</sup> 疑为 1914 年之误。——编者注

现在来谈谈近东问题。这里我们首先提出大家都会同意的问题，即少数民族问题。我们知道，在东方实行的由外族统治许多少数民族的办法是多么危险，我们知道，这种办法正是严重的战争危险的根源。作为一个奥地利人，我可以这样说，我很清楚我们的一些属于统治民族的同志们在这些国家内的困难处境。我们曾经处于这种情况的奥地利人知道，在一个民族斗争和沙文主义经常很严重的国家内，本身既属于统治民族，而同时又能捍卫国内被奴役民族的事业，这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但是我们奥地利人还体会到另外一点：当时社会民主党不够强大，它没有能使这些民族的解放得到实现，没有能使这样多的民族聚居的国家内的和平得到巩固，而这种情况正是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就因为我们有了这种体会，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些存在着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旧奥地利相同的民族结构、沙文主义心理和沙文主义斗争方法的多民族国家中，我们的一些属于统治民族的同志们现在是担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要求民族自治，要求给予分别居住在这些国家内的广阔的领土上的少数民族以自治权，要求让他们能够平等和自由地发展文化教育。

我可以十分满意地告诉你们，我们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要求，就是由波兰社会党的代表提出来的。自然，这种要求只有在言而行、行而有效的情况下才是一种进步。我们相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整个东欧以至整个欧洲的一个重大危险就会缓和下来。但是问题不仅如此，这里至少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反动势力在这些国家内的统治，这个地区的一切矛盾都变得复杂化和尖锐化了。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任何专政、任何独裁统治，都包含着战争危险。我们很清楚，对内的权力和对外的权力是同胞姊妹。向来就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因此，在东欧我们反对战争危险及其原因的斗争同我们反对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形式的法西斯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是相联系着的。我们看到对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等权利的忽视。我们看到政治斗争中横施暴力的情况有增无已，为了在政治上消灭反对党而实行

残酷的暴力镇压……我们看到意大利和匈牙利都在采取这种办法，我们怀着恐惧和颤栗的心情读到，波兰几乎每周都要处决一批青年人，似乎波兰国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捍卫自己。但是，这些国家中所发生的一切，比之我们每天从来自保加利亚的报道中读到的那些史无前例的野蛮暴行，却又大为逊色。通过军事法庭来消灭政敌，如果不成，就放火烧他们的房子并把他们活活烧死——这种中世纪的办法，正是索非亚刽子手的血腥政府所采取的办法。我们在这里抗议这些刽子手的做法，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代表无产阶级，而且是代表所有那些多少还有一点唯一可以使人类文明有存在价值的精神的人。

还有一句话对于说明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很重要的：屠拉梯在报告一般政治问题时曾代表参加大会的某些党作了一个声明，德·布鲁克尔<sup>①</sup>听了这个声明之后说，意见分歧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这种声明上签字的是比西方各国党所负责任较少的党。这可能有一部分道理。至于奥地利的党，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不是属于那些在本国负责任最少的党派。我们对于责任是有些了解的，我们甚至敢说，我们现在就担负着责任，虽然我们不在政府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承认，我们所处的地位是与西方的党有些不同的。

我们德意志人把自己列入中欧，并力图按照中欧的精神来生活。但是一位比利时同志却把我们老远地推到东方去。的确，历史曾把我们同东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党的处境之所以有些特别，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但我们毕竟距离西方很近，因此对我们西方同志们的重大困难和全部责任有足够的了解。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孜孜不倦地力求解决安全保障公约和国际联盟方面的困难问题，以便拆除还遗留在各地的战壕铁丝网。他们企图用国际法的手段来作到这一点。他们为此付出自己的劳动、知识和力量。如果说我们距离西方很近，因而能够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距离东方也很近，因而也许能够比较清楚地看

---

<sup>①</sup> 路易·德·布鲁克尔(1870—1951)——比利时工人党领袖之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成员。——编者注

到问题的另一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它不可避免地只能是我们的和平愿望（而和平在今天仍然要靠那些意味着否定许多民族的自由的强制性条约来维持）和我们的自由愿望（而自由又受到我们想维持和平这一点的限制）之间的某种沉重的痛苦的妥协。

我再说一遍，这种经常的妥协的重担是必要的和重要的；铁丝网应该拆除。但是这一工作需要十分冷静，需要很多的智慧，很大的自制力。

同志们，除了这一工作之外，我们还有另一种必要的工作，不管前一种工作多么重要和必要，它都不应该妨害后一种工作。这种必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必须理解整个东方所发生的这个声势浩大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过程，我们应该学会理解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以这种使命的精神来表述群众的思想感情，并把他们发动起来。是的！必须拆除铁丝网！但是我们还需要另一种东西——承认伟大的世界变革和我们在这变革中、在伟大的历史发展前途中的革命任务，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到来的历史关头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成长中的一代和整个工人阶级充满着奋发的热情，而只有这种热情才能为社会主义争得世界。

译自《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192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67—474页。选自《鲍威尔言论》第316—324页。（中译文参见《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67—375页）

# 德意志奥地利社会 民主工党纲领\*（摘录）

（1926年11月3日）

## 三 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

1. 社会民主工党突破了有产阶级的选举特权，推翻了君主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在君主国中实行统治的是王朝、将军和官僚；只有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大地主和金融巨头实际上参与了他们的统治。在民主共和国中整个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

另一方面，民主共和国使工人阶级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和行动自由，大大地发展了他们的精神力量 and 他们的自觉。工人阶级冲击着共和国中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民主共和国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为争取在共和国中的统治权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民主共和国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再依据政治特权，而是依据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经济力量，通过传统的力量，通过报刊、学校和教会使人民中的多数处于他们的精神影响之下。如果社会民主工党能

---

\* 这一纲领是1926年11月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林茨代表大会通过的，鲍威尔为主要起草人。——编者注

够克服这些影响,联合城市和乡村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并把小农、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与工人阶级接近的阶层作为同盟者争取到工人阶级这边来,社会民主工党就争取到了人民的**多数**。它将通过**普遍选举权**的决定来争取国家政权。

因此在民主共和国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在两个阶级争取人民多数的人心的搏斗中决定胜负。

在这一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那时资产阶级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单独统治共和国,而工人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统治共和国。但是这样一种局势强迫造成的**互相敌对的阶级的合作**在很短时期之后将被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消除的阶级矛盾所破坏。工人阶级在每一次这样的插曲之后,如果自己不能夺取共和国的统治权,就将重新遭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这样一种阶级合作只能是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暂时的发展阶段,而不能是这一斗争的目的。

社会民主工党既然已经在其斗争的第一阶段争取到了民主共和国,那么它今后的任务是利用民主的斗争手段,以便把人民的多数集合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使工人阶级获得在民主共和国中的统治权**。

社会民主工党力图获得在民主共和国中的统治权,不是为了取消民主,而是为了使民主为工人阶级服务,使国家机关适应工人阶级的需要,并利用国家机关作为强力手段从大资本和大地产那里夺取被他们集中占有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把它们转变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

2. 资产阶级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掌权地位。只要它还能统治共和国,它会容忍工人阶级强加给它的民主共和国;一旦普遍选举权有把国家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的危险或者已经把国家政权交给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就会企图推翻民主共和国,建立**君主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专政**。

只有在工人阶级有足够的**防御能力**,能够保卫民主共和国不受君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反革命的侵犯的时候,只有在**联邦军**和国家的其他**武装队伍**那时也起来保卫共和国的时候,在共和国的政权通过普遍

选举权的决定落到工人阶级手里的时候,只有在那时资产阶级才有可能不敢起来反对共和国,因此只有在那时工人阶级才能够用民主手段夺取和行使国家政权。

因此社会民主工党必须使工人阶级经常有组织地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准备保卫共和国,注意保持工人阶级和联邦军的士兵之间的最紧密的思想一致,教育他们以及国家的其他武装队伍忠于共和国,从而使工人阶级有可能用民主的手段粉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但是如果不顾社会民主工党的这一切努力,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仍旧能够破坏民主制,那时工人阶级就只能在**国内战争**中夺取国家政权。

3. 社会民主工党将通过民主制的形式和在民主制的一切保障下行使国家政权。民主制的保障保证社会民主党政府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联合起来的人民多数的经常监督下行动并将始终对这一人民的多数负责。民主制的保障将使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设能够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在人民群众自由的最积极的参加下完成。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要通过有计划地阻碍经济生活,通过暴力反抗,通过同国外反革命力量勾结起来阴谋对抗将由工人阶级国家政权当作任务来实行的社会变革,那么工人阶级就会被迫用**专政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4. 工人阶级夺取民主共和国的统治权,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阶级统治,而是为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随着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对资本家和大地主进行剥夺并把为他们集中占有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转变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人民之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将被消灭,从而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也将被消灭;从而民主制才会从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转变成不再分裂为敌对阶级的人民的自我管理,国家将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成联合起来的人民的共同体。

译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383—386页。

选自《鲍威尔言论》第325—328页



##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1927年11月3日)

一些时候以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惯用语中是一个爱用的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在他们嘴里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完全特殊的恶性变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党代表大会<sup>①</sup>上是被彻底埋葬了还是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关于这一点，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现在可以读到形形色色极其滑稽可笑的想法。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到底是什么，难道现在不正是把这一点告诉那些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实质一无所知而且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的时候吗？

战争爆发前几年，我们第一次从一个美国社会主义者路·鲍丁的嘴里听到这个词；后来这个词相当迅速地被采用了。当时人们把一批较年轻的、从事科学工作的奥地利同志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他们中间最著名的有麦克斯·阿德勒、卡尔·伦纳、鲁道夫·希法亭、古斯塔夫·埃克什坦、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使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并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政治方针，而是他们的科学工作的特点。他们都成长在这样的时代，那时像什坦姆列尔、温德尔班德、李凯尔特这些人用哲学的论据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这些同志必须同现代哲学流派展开争论。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黑格尔而来的，后来的马克思

---

<sup>①</sup> 指1926年11月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林茨代表大会。——编者注

主义者是从唯物主义而来的,那么,年轻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部分地来自康德,部分地来自马赫。另一方面,这些年轻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必须在奥地利的高等学校中同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奥地利学派展开争论;这一争论也对他们的思想方法和思想结构发生了影响。最后,他们在古老的、被民族斗争所震荡的奥地利,都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用于复杂的、为一切肤浅地、公式化地应用马克思的方法所无法解决的现象。于是,在奥地利,在马克思学派内部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思想一致的团体,人们正是把它叫做“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以便一方面同老一代的、首先由考茨基、梅林、库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首先是俄国,还有荷兰)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区别开来,这两派基本上是在另一些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大家应该回想一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这个起源,以便懂得,每一个乡巴佬<sup>①</sup>现在都来消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何等的可笑。

战争和革命当然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发生了分化;在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辩论中,属于这一学派的人在国际社会主义内部站到了不同的、往往是敌对的阵营。因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得到了另一种含义。我们的敌人习惯于十分简单地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辱骂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这当然是胡闹,是把一个政党同一个科学流派混淆起来的无知之徒的胡闹。但是正是我们的敌人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使我们许多同志喜爱这一个词;因此我们许多年轻的同志习惯于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用来表示关于战后时期国际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争论问题的那种理论观点,这种理论观点是战后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逐渐形成的,它在林茨纲领中得到了总结和表述。如果人们从这一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那么“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

<sup>①</sup> 原文为“Berglhuber”,指山区有一小块土地的人。鲍威尔用此词影射主要由农民选出的基督教社会党议员。——编者注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时期的一切风暴中能够保持自己的统一,而大多数别的国家的工人党遭到了分裂。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应当感谢有利的特殊环境。奥地利的特别软弱,我们的国民经济对国外的特别的依赖性,使奥地利工人在革命风暴时期特别清楚地认识到,实行专政的尝试在这个国家只会以灾难告终。而且匈牙利的可怕经验<sup>①</sup>已经向奥地利工人表明,共产主义会使他们也陷入什么样的灾难。但是,如果说首先是经济现实和历史教训使奥地利工人阶级免受共产主义分裂意图的感染,那么我们党的精神遗产对于防止共产主义也起了重大的作用。维克多·阿德勒——他在80年代曾把激进派和温和派联合成一个党,他在20年之久的狂暴的民族斗争中懂得把德意志的和捷克的、波兰的和乌克兰的、斯洛文尼亚的和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一个共同的党里——就是他,把统一的意志、甚至是统一的狂热传给了我们,把保持工人阶级各不同阶层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伟大艺术传给了我们。这样,这里始终保持了工人阶级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决定了我们党在国际中的精神特点。

奥托·鲍威尔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了如下的表述:在工人阶级发生分裂的地方,总是一个工人政党代表当前的明智的现实政策,另一个工人政党代表争取最终目的的革命意向。只有在把明智的现实政策和革命热情结合成一个思想的地方,那里才能避免分裂。这两者的综合就是林茨纲领,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这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它是统一的产物:因为,奥地利工人没有容许分裂,仅仅这一点就显示了我党不同于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特点。它同时也是保持统一的精神力量,因为我们在这里能够把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现实地使当前每一项斗争适应地点和时间的特点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坚定的方向,即使一切局部斗争指向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目标,从而指向鼓舞人心的社会主义伟大目标。工人运动的现实主义意识同社会

---

<sup>①</sup> 指1919年3月至8月存在的以贝拉·库恩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编者注

主义的理想主义激情的这种综合使我们免于分裂。作为统一的产物和保持统一的力量,今日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工人运动统一的意识形态!

我们的敌人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因此很愤怒。如果这里的工人运动也被分裂所削弱的话,他们该多高兴啊!资产阶级在这里最乐意资助共产党人!但是,工人们也感觉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统一,是保持统一!因此党代表大会的确没有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决裂。联合? 缩减军队? 这终究是策略问题。党代表大会确认,目前缺乏实现这两者的前提。但是它没有预先涉及将来;没有拒绝在我们的反对者造成一种新的局势时重新审查这些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策略细节问题,是否适当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根据当时的必要性来加以回答。所有这些都涉及本质。但是触动本质是不行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实行把工人阶级的一切阶层联合起来的政策;只有当我们知道把明智的现实主义同革命的热情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保持统一这个最高利益,——这就不止是策略了,这是阶级斗争的原则,林茨的原则,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谁听见党代表大会、整个党代表大会以热烈的掌声决定把统一的必要性置于一切策略的特殊需要之上,谁就知道,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个把我们全体联合在一起的精神纽带,它对于我们始终是不可动摇的,是坚定不移的。

译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49—52页。  
选自《鲍威尔言论》第354—358页

## 给考茨基的信

(1931年10月6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今天才来回复路易莎的信,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忙得不可开交。

在你们动身之前我们不可能再见面了,我自然感到很遗憾。在俄国问题上我们确实没有取得一致。最近几个月来,我有几次机会读到一些现在在俄国做工、而且不是共产党员的奥地利工人的来信,同时还和回到奥地利的这类工人谈过话。这些同志的十分明确的、丝毫不加粉饰的、在许多事情上很有批判力的见解,对于我比一打关于俄国的书宝贵得多。他们只有使我更加坚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从一月份(我在这个月写完了我的书<sup>①</sup>的最后一章)以来俄国人的方针肯定已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我认为是向有利的方面变化。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能取得一致,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我自负的是:我从1917年起就不断努力尽可能谨慎而严肃地去研究俄国的发展,并且只能得出像我在我的书的最后一章中所阐述的结论,而不能是别的。

目前我们自然还有很多迫切的和重大的值得关注的事。德国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都完全令人失望。我担心它现在完全难以避免地走

---

① 指《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编者注

向右派专政。我们这里的经济情况也非常糟糕，我担心这里的经济震动也将重新增加法西斯的危险。此外还有英国的恶劣的状况——如此之糟是战争以来还未曾有过的！

星期天我和本德尔<sup>①</sup>在一起。从他那里知道你们很好，我很高兴。  
致良好的祝愿

你们的

奥托

译自《社会史国际评论》1970年第3期第478页。  
选自《鲍威尔言论》第390—391页。殷叙彝译

---

① 见本书第80页注③——编者注

# 我们布尔什维克\*

——对多尔富斯<sup>①</sup>的回答

(1932年10月23日)

联邦总理星期五对我喊道：“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您从来没有真诚地信仰民主主义！”我未能在议会里回答联邦总理。我不能在发出狞笑的狂暴的无知之徒面前宣布思想信仰，尽管总理企图煽动他们的原始本能来反对我，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我要在这里回答联邦总理。这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成千年轻的工人、职员和大学生，他们对我的话是听从的，我不愿被他们误解。

首先，我认为，把布尔什维克这个词当作骂人的字眼或者像骂人的字眼一样使用的人是可怜的庸人。

在波罗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巨大空间里生活着 16000 万以上的人。他们的数目每年增长 350 万，两年增加的人数就将超过我们奥地利拥有的居民。15 年来在这个地区进行着一场革命，它对经济和国家、个人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所引起的变革，比 17 世纪强大的英国革命和 18 世纪强大的法国革命还要深刻得多。不管这场革命的最终结

---

\* 这篇文章，是鲍威尔对于奥国总理多尔富斯在议会中对他说的“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您从来没有真诚地信仰民主主义！”那句话的答复。

① 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1892—1934)——基督教社会党领袖，1932—1934 年任奥地利总理，实行法西斯统治。——编者注

果怎样,它始终是我们时代的最大事件。50年后叙述我们时代的世界史的历史学家描写俄国革命的篇幅,将会超过描写战后我们奥地利所发生的一切的篇幅。每个有头脑的同时代人都在关心布尔什维主义的种种巨大问题。仅仅对庸人们来说,布尔什维克这个词才只不过是一个骂人的字眼。

我看到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的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15年来我竭力认真地去研究它。但是,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并不是仅仅在于策略上的考虑,即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以俄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为根据的,西欧和中欧不能模仿。我和布尔什维克的差别比一切策略上的考虑重大得多,它是原则性的,是以我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观点为基础的,这就是:我珍视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无可代替的价值。

在人类最优秀的人物献出了自由和生命的几个世纪的斗争中,欧洲各民族从国家和教会那里夺取了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的保证。

没有在争取精神自由的斗争中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伟大胜利,就不会有科学,首先不会有现代的自然科学。而没有现代的自然科学,就不会有现代的技术、医学、卫生,不会有现代的文明。

没有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成果,就不会有现代的公众生活,不会有各种伟大思潮为争取各民族人民的思想而进行的斗争,也就不会有那一伟大的学校,各民族只有在这所学校中才能够成熟到实行自决。

我的信念是:社会主义不应当摧毁个人精神自由的保证,而必须把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最珍贵的遗产保留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精神自由的保证在摆脱了一切资本主义的伪造和一切资本主义的桎梏之后,才会得到充分发展并将显示全部创造力。

每当我读到,俄国的专政排斥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乌格兰诺夫这样的人,不准他们发言,仅仅因为他们在这个或者那个个别问题上持有与独裁者不同的意见,而他们丝毫不可能向俄国人民口头或者书



面宣传他们的反对意见,或者在俄国人民面前为它辩护,每当我看到,俄国各地的一切学者在撤职、逮捕和流放的威胁下如何不得不根据独裁者的示意来放弃或者修改他们的社会学和哲学观点,每当我看到,可以不经法律手续,而用行政方式逮捕任何一个敢于发表不受政府欢迎的意見的俄国工人、农民和职员,并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我就觉得:我不能理解!正是我对个人精神自由的价值的珍视把我和布尔什维克区别开来。

为了个人精神自由的缘故,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民主制,它对我来说并不只是议会制,并不只是法律机关的总和。它对我来说是为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提供最可靠保证的国家制度。它对我来说,就像我曾经在一篇被欧洲所有国家的民主主义者用欧洲的所有语言加以传播的论文中说过的,是精神自由的珍贵容器。

因此,多尔富斯博士先生,我的民主主义信念比那些出于不得已而只好“满足于”民主制的人的民主主义信仰有较深的根源,那些人一旦嗅到行情对专制制度有利,就又开始寻找它。

但是,尽管我珍视精神自由,我也带着不可扑灭的仇恨痛恨资本主义。我痛恨这种社会制度,它的机制不可避免每十年一次地把数百万人抛入最可怕的困境,不是因为缺乏可供给他们的一切必需的商品,而是因为生产这些商品无利可图。我痛恨这种社会制度,它使一切国家和一切政府百倍地依附于黄金大王,为的是使黄金大王成为世界的主人,使各民族的民主自决成为伪造品。我痛恨这种社会制度,它在大国把国家交给发动新战争的势力,而在小国却令人厌恶地让不学无术的庸人统治国家,称王称霸。

多尔富斯先生,您看,如果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专政被暴力推翻,那么人类在长时间内会对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因此资本主义残暴行为的寿命就会延长。与此相反,如果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能够通过行动在波罗的海和日本海之间的广阔大陆上向世界人民证明:一国人民能够在自然

资源和劳动手段不再属于资本而是属于社会全体、生产不再受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支配而是受社会计划支配的社会制度下获得幸福,那么,社会主义思想就会在全世界获得难以抗拒的宣传力。那时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因此,多尔富斯先生,我不把希望寄托在推翻俄国的专政上,而是希望,俄国专政的坚忍不拔的英勇斗争最终能战胜它正在与之战斗的巨大困难。

我会不会相信,如果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其他各国的人民除了模仿俄国的榜样就无事可做了?不,我不相信。只有不学历史或者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思想简单的人才会相信,20世纪的社会革命在一切国家里将以同样的方式,以同样的方法,按照同一个模式进行。

我寄希望于俄国革命,但我会不会忘记,是什么把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的?不会的!但是,我确信,如果苏维埃专政被暴力推翻,那么,在俄国取胜的将不是个人自由,不是精神自由,而只不过是白色专政取代红色专政。与此相反,如果苏维埃专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如果它能够逐渐战胜经济困难,改善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食品和商品供应,从而使危害当前建设工作的危险的紧张状态逐渐消除,如果从社会主义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接替了精神状态还是扎根在资产阶级世界的老一代,那么,专政就会成为多余的并且可以取消。那时,俄国工人阶级会重新掌握个人自由和精神自由(没有这种自由,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专政试图建立的、经济生活中任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东西,也不致遭到危险。

多尔富斯先生,这就是我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我承认,这种态度太微妙,那些为您的那一句“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欣喜若狂、发出狞笑、鼓掌喝彩的无知之徒是不能了解我的态度的。

但是,我的话不是对那些无知之徒讲的,我的话是对数以千计的青年人、职员和大学生讲的,我认为教育他们掌握真正的社会主义信念是

在公众生活中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员最重要的任务。

这种真正的信念坚定地建立在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种伟大的、统一的理解上。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行动强制地要求经常改变策略和经常与现实妥协,因此只有固定不变的、出自原则的、坚定忠实的信念才能使这一切行动成为正确的和高尚的,并把这一切行动作为手段以达到基于这一信念的目标。

因此,我尽力教育我们的青年人理解这种以坚定的世界观为基础的信念的价值。

扎伊佩尔<sup>①</sup>死时,我在《工人报》上力图不用同他进行过千百次斗争的敌人的眼光、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描绘他的人格。我的许多同志因此埋怨我。但是,我决不因为这样做而感到遗憾。因为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教育我们的青年人尊重每一种真正的信念,也尊重我们最刻毒的、充满仇恨的和最危险的敌人的信念,只要他的信念是以人的完整本质和人的完整世界观为基础的。但是,正因为我要教导我们的青年人尊重每一种真正的信念,所以,我教导他们鄙视没有固定信念的人,这种人在无数次谈判中在政敌面前拼命表现出尊敬的样子、友好的姿态和合作的愿望,而在一瞬间,为了博得狞笑的无知之徒的喝彩,却朝着同一个政敌公开叫嚷“您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译自《奥托·鲍威尔选集》1961年维也纳德文版  
第306—310页。选自《鲍威尔言论》第392—397页

---

<sup>①</sup> 伊格纳茨·扎伊佩尔(1876—1932)——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领袖。1922—1924年和1926—1929年两次任奥地利联邦共和国总理。——编者注

# 民主制和社会主义

(1934年)

今天我们常常可以在奥地利工人中听到这样的话：“民主制把我们弄到如此地步了！我们不愿意再听到关于民主制的任何东西了。我们不再为民主制，而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斗争。”

这些话表达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情绪。但是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的情绪。因为，如果我们仅仅听任这种情绪支配，那么社会主义的重要的和基本的思路就会消失在这种情绪之中。

因此有必要借助历史经验，再一次从原则上考察社会主义对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态度和对民主制的态度。

## 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动员了人民群众——小资产者、农民和工人——并且通过他们的革命运动推翻了专制主义，摧毁了封建贵族的特权。随着专制主义的崩溃，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从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

但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形式。

## 1. 自由主义国家

专制主义被推翻以后,资产阶级建立了议会制度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资产阶级的机关负责国家、省和市的立法并监督行政部门。资产阶级在自由主义国家中通过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保证议会的阶级性:只有那些缴纳直接税超过一定最低限额的公民和地主有选举权;工人、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和农民的下层被排斥在选举权之外。选举特权保障了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统治和通过议会对国家的统治。

尽管如此,取代了专制主义的自由主义国家同专制主义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资产阶级是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极权”国家政权的斗争中兴起的,它在胜利的那一天宣布了“人权和公民权”<sup>①</sup>。它保证每一个公民有一个连国家也不得限制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范围,保护公民不受不经诉讼程序的长期监禁,保护住宅不受侵犯权和通信秘密,思想和信仰自由,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法庭的独立性。当然是资产阶级首先享有这种自由权利。首先从出版自由中得到好处的不是工人,而是出版界的资本。但是工人们一开始搞阶级斗争,就利用了资产阶级从专制主义争得的自由权利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自由主义”制度毕竟反对官厅的专横而保护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和个人的尊严,这些制度的丧失就意味着工人在法西斯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受迫害。如果恰恰在这个时刻,一些同志却模仿法西斯主义的时髦词句来嘲笑“自由主义”制度,这是愚蠢的。

## 2. 资产阶级民主制

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的国家是自由主义的、依靠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的国家,在工人阶级开始利用由自由主义争得的自由权

---

<sup>①</sup> 指法国 1789 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编者注

利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时,它的第一次斗争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选举特权,反对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它的第一个斗争目标就是争取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获得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自由主义国家就向民主国家转变。

在自由主义国家里,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阶级性。只要仅仅是富裕的市民和地主有选举权,而工人们被排除在外,那就很清楚,国家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一旦代替了选举特权,国家的阶级性就被掩盖了。看起来,似乎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已经实现了,似乎国家中再也没有哪一个阶级是拥有优先权的,没有哪一个阶级是独占统治的了。

但这仅仅是看起来如此。在选举日,一个工人同一个资产者一样只有一张选票,但是在两个选举日之间的四年内,资产者是工厂的主人,工人是他的每天都在解雇的威胁面前战栗的奴隶。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通过它的经济权力,通过国家对金融寡头、对银行和交易所的依赖,通过国家经济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繁荣的依赖,通过资本家报刊对舆论的权力、资本家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权力,通过永远只是统治阶级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①</sup>的权力,使民主制为自己服务。民主国家也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

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重大的区别。在自由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依靠有资格限制的选举权直接地、单独地实行统治和管理,在民主国家内,它只能借助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群众政党实行统治,这些政党能够为自己赢得拥有普遍选举权的多数选民。因此,资产阶级必须同小资产者和农民分享政权,并且共同考虑他们的利益,使资产阶级能够在选举时获得他们对自己的统治的承认。不仅如此!工人在人民中所占的部分愈大,他们的阶级觉悟愈成熟,资产阶级政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借助它们来统治民主国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52页。——编者注

家)为了保持选民的多数也就愈是被迫向工人阶级作出让步。资产阶级民主制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不受限制的资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今天很多工人抱着怀疑的态度谈论资产阶级民主制,那么毕竟不可以忘记,资产阶级民主制本身是工人阶级数十年之久光荣的阶级斗争的成果。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现代政治运动,即英国的宪章运动把要求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放在它的纲领、它的宪章的首位。法国工人 1848 年在街垒中夺得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在德国,工人运动是从拉萨尔争取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斗争开始的。在奥地利,工人阶级从 1893 年到 1907 年为争取国家中的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而斗争,到 1918 年以前为争取省和市的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而斗争。用民主国家代替自由主义国家,这到处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成果。正是在今天,当法西斯主义摧毁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剥夺了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的成果的时候,我们不应当轻蔑地谈论关于一切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和关于实行自决的民族的最高主权。

事实上,如果说自由主义国家同出现在它以前的专制主义相比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话,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制就又向前发展一步,这一步要大得多。不错,它没有废除资本主义。不错,它也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但是在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党才成为群众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的党才迫使资产阶级作出重大让步,这些让步使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文化上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阶级斗争才逐渐达到最后的成熟。

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制有其固有的内在矛盾。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它的基础是使绝大多数人民听任少数资本家剥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秩序。但是作为民主制,它却把政治上的决定权交给受少数资本家剥削的多数人民。就是由于这一矛盾,资产阶级民主制终于灭亡了。只要还能够借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资产阶级对民主制就是满

意的,一旦人民起来反抗它的统治,资产阶级就诉诸暴力以反对民主制。

从资产阶级民主制中的阶级斗争中,暂时会出现阶级力量均势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单独统治国家,无产阶级还不能单独统治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被迫分享权力。资产阶级政府不能无视社会主义者在议会里的投票,工人政府不能无视资产者在议会中的投票。两个阶级的代表必须联合成立共同的政府。但是,这种阶级合作每一次都是很快就被阶级对立破坏了。资产阶级有了经验,即民主制已再也不能保证它的统治了。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它要给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寻求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这种形式能够更有效和更持久地保证它的统治,反对工人阶级的进攻。

### 3. 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 1848 年的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 2 月共同赢得了民主。他们组织一个共同的政府。这个政府被阶级对立破坏了。阶级对立日趋激化,直至爆发流血的内战即六月屠杀。资产阶级,这个战胜了无产阶级的胜利者,害怕无产阶级再度崛起和进行复仇,于是它投入路易·波拿巴的怀抱。为了在波拿巴的鹰旗下,在波拿巴军队的刺刀下寻求牢靠和持久的保护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抛弃了它自己曾经借以实行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

现在,中欧又经历了完全相似的事情。受到经济危机剧烈震动的资产阶级为了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为了废除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为了破坏工人组织并且用法西斯专政的暴力机器保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和生产秩序,为了反对工人阶级的暴动,利用了由于经济危机而贫困化的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暴乱的法西斯的行动。

如果说,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由阶级斗争中的一种类似的情况产生的,那么它们毕竟不是同一的。直接从反对旧的、历史上的暴力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波拿巴主义表现为革命的继承人。它没有



摧毁普遍选举权、议会制度和自由权利,而是加以利用。法西斯主义是已经不再上升而趋向没落和瓦解的资产阶级的出路,它公开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敌人上台,它消灭了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利、议会制度和普遍选举权,从而使社会回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已经被自由主义克服了的那种“极权的”专制主义的状况,即一个万能的国家政权不受限制的专横的状况。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与法西斯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工人阶级被迫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反对法西斯主义。它因而陷入了一个可悲的境地。它,一个革命的阶级,似乎成了一个保持现状、反对“革命的”变革者的保守力量。它很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民主制仅仅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却被迫保卫这种给予工人阶级自由和斗争可能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另一种形式,即摧毁工人阶级的斗争自由的形式。

共产党人拒绝参加这场保卫战。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吗?那么它本来不也仅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吗?把资产阶级民主制作为“较小的祸害”来保卫,以反对法西斯主义,却不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这难道能够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吗?事实上,自由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制、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前后相继的形式。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足轻重的。例如,工人阶级自己曾经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街垒中为自由主义国家,为反对专制主义而斗争,因为,虽然自由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它同专制主义比起来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它所实现的自由权利才使工人的群众运动成为可能;例如,后来工人阶级在他们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为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即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而斗争,实现了从自由主义国家到民主国家的转变,因为,虽然资产阶级民主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同自由主义国家比起来,它给予工人阶级的发展、斗争和胜利的可能性要大得非常多;因此,

尽管资产阶级民主制也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工人阶级过去必须、现在也必须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以反对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国家就意味着彻底消灭工人的一切自由权利,消灭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一切反抗中心,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强化为不受限制的专政。

但是,如果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如果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用暴力炸毁了它的民主制形式而采取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的”暴力统治的形式,如果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斗争中获得的一切民主的斗争手段都被剥夺,如果发展到资产阶级除了以法西斯暴力统治的形式就再也不能保卫它的社会制度、而工人阶级除了通过暴力革命就不能获得解放的阶段,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制当然就属于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期了。因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目的不能是,并且不会是恢复资产阶级阶级国家的任何一种形式,而是通过工人阶级并且为了工人阶级去夺取国家。

## 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

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最近目的是夺取国家政权。阶级国家仍然不会随着工人阶级夺得国家政权而被取消,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地位而充当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只有在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剥夺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地产和资本并使之转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sup>①</sup>所占有时,只有在社会随着对资本家和大地主进行剥夺,随着对他们过去掌握的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而不再区分为对立的阶级即资本家和无产者时,国家才不再成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阶级国家随着阶级区别的消失才会消失。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编者注

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已经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也完全同样能够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

### 1. 无产阶级的民主制

我们来设想一种民主共和国。我们假设工人阶级用选票夺得民主共和国议会中的多数并由这个多数组成无产阶级政府。民主共和国的宪法保持不变,全体公民仍然拥有民主制从自由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切个人自由权,各州和各市镇的议会和自治机构根据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选出。但是政府权力已通过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决定转入无产阶级手中。

工人现在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但是只要生产资料还属于资本家,他们在工厂中就仍然是资本家的奴仆。无产阶级掌握着立法。但是只要生产资料还是由资本家占有,因而只要还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其他生产方式,无产阶级政府就被迫保护并促进资本主义生产,从而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否则全部生产就会遭到破坏,工人就会失业,国家就会破产。如果工人阶级不是先运用国家权力剥夺资本家,从而结束工人的从属地位,使国家摆脱依附于控制生产的资本家的利益的状况,那么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地位和资产阶级经济统治地位之间的矛盾在短时期内必将导致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灭亡。但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一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制是否能够像我们在这里设想的那样,在不剥夺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政治权利的情况下实现对资本家和大地主的经济剥夺的过程呢?在某种情况下无疑可以这样做。例如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若干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国中取得了胜利,并且在那里正在对资本家进行剥夺,对集中的生产资料进行社会化,那么在那些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不独立的小国中,资产阶级就很可能不再敢于对他们的被剥夺和社会化进行反抗。因此一个通过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决定而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府无需使用暴力去粉碎资产阶级的反

抗,无需在政治上剥夺资产阶级即限制他们享用民主权利,就能够实现剥夺和社会化。而在有决定意义的大国本身,假使例如由于战败,军队被解散,资产阶级被解除武装,人民群众革命化,因而资产阶级就不敢反抗民主的决定,那么类似上述的情况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抛开这类情况不谈,经验告诉我们,一旦资产阶级哪怕只要看到民主制的权力有落入一个下决心要剥夺资本家、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工人政府手里的危险,他们就力图炸毁民主制并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一旦工人政府着手进行剥夺和社会化,资产阶级就会更加对工人政府进行经济的和暴力的反抗。一旦资产阶级这样做,工人政府就被迫使用暴力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并剥夺民主制给予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手段。因此,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民主制就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思想在 1926 年我党的纲领——**林茨纲领**中已经得到了阐明。我们在纲领中声明,我们要用民主手段夺取国家政权,我们要用民主的形式和在民主的保证下行使国家权力。但是我们又补充说,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如果资产阶级试图剥夺我们的民主手段,我们就要用武力自卫;如果资产阶级要使用暴力来反抗一个用民主手段取得政权的工人政府,我们就会被迫使用专政手段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所以我们把**无产阶级民主制**亦即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当作目的,这种民主制产生于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并接受享有全部自由权的人民的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监督。但是我们可以预见,资产阶级的阶级反抗可能迫使这样一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去运用一些手段,使无产阶级民主制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看起来会是怎样的呢?

## 2. 劳动人民的民主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是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依据而确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他们用类推的方法按照 1792 年至 1793 年

的国民公会专政而设想出无产阶级专政。国民公会专政是怎样的呢？国民公会是一个根据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选出来的民主议会。它的权力是建立在郡和市镇的民主的自治机构上的。法国公民享有“人权和公民权”，“人权和公民权”的宣布是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所以法国那时候是民主制。但是它是一种处于革命高涨形势中的民主制。它进行了一次反对联合起来的欧洲君主的革命战争。农民在乡间烧毁了领主的庄园。在长枪雇佣兵、武装起来的巴黎郊区以及由于通货膨胀和饥饿而革命化了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巴黎召开了国民公会。在武装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国民公会把剥削阶级置于它的恐怖之下，把他们的议员逐出公会，把他们的代表送上断头台。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设想。应当这样来理解恩格斯为什么把民主共和国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sup>①</sup>。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中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民主制的消亡，而是一种处于革命形势中的民主制、一种处于武装的无产阶级群众压力之下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不再像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像无产阶级民主制那样在保障全体公民的一切自由权的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是这样一种民主制，它在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劳动群众把民主制变成其意志的工具时用恐怖手段粉碎他们的反抗。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赞美 1871 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也是一种民主制。它是根据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选出来的，是以民主的自治机构和享有自由权为基础的。不过它也是革命形势中的民主制、内战中的民主制、武装工人监督下的民主制。这样的民主制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是为镇压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象中的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 1917 年夏天即十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写成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中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不同的理解。他在那里说无产阶级专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2 页。——编者注

政是“最完全的民主”<sup>①</sup>，当然这是劳动人民的民主，这种民主是镇压剥削阶级的。为了这个目的，它必须排斥剥削阶级，不许他们共同享受政治权利和共同参与政治上的决定。<sup>②</sup>依靠武装的工人群众支持的、自由选出的工农苏维埃，必须实现占人民大多数的劳动者的自由的民主自决，以对抗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剥削阶级。所以最初并没有把苏维埃制度设想成是同民主制对立的，而是把它设想为民主制的“最完全的”实现——当然这是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的劳动群众的民主制的最完全的实现。但是俄国革命事变后来的进程却使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偏离了这种出发点。

### 3. 无产阶级政党的“极权”专政

三年国内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不得不把首先是恢复生产、继而迅速扩大生产所要求作出的牺牲强加给贫穷的饥饿的工农群众，不得不使一切相互矛盾的特殊利益服从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在工人和农民之间“依靠权威”对极其贫乏的粮食储备进行分配——所有这一切迫使无产阶级专政在苏维埃统治的最初年代比原来设想的有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苏维埃在执政党的庞大的官僚机构面前，在由执政党统治的国家机构面前，在国家的经济组织机构面前逐渐失去了意义。国家必须不仅摧毁剥削阶级的反抗，而且粉碎各个工人集团的特殊利益和农民的特殊利益的反抗，并为此目的不仅要剥夺剥削阶级的政治权利，而且要剥夺劳动人民本身的、可能被用来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手段的政治权利。于是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布尔什维克的无限制的专政——或者用流行的语言来说——“极权”的专政，必不可免地取代了原来设想的劳动人民民主制。

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设想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意义的。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编者注

<sup>②</sup> 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191页。——编者注

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①</sup>但是直到1917年,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种专政理解为劳动人民的民主专政,而不是连劳动人民的民主也取消的一个党的专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从罗莎·卢森堡到马尔托夫——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并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本身,而是反对俄国的这种专政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但是在俄国的条件下,发展成这种形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在三年民族战争和三年内战之后,俄国的生产破坏到如此程度,俄国人民群众贫穷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以致劳动人民内部各个阶层的特殊利益互相冲突得非常厉害,他们彼此争夺面包的斗争很激烈,因而劳动人民民主制本来是必然会遭到破坏的。只有“极权”专政能使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并且反对任何的特殊利益,贯彻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措施。

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必须采取哪种形式,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情况。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础上并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形式中取得政权,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制就转变成无产阶级民主制。如果无产阶级民主制在对资本家和大地主实行剥夺时遇到反抗,那么无产阶级民主制就进一步发展成劳动人民的民主专政。如果这种反抗采取公开的国内战争形式或者甚至采取资本主义外国干涉的形式,那么劳动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变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极权”专政。

在法西斯主义还在无产阶级能够用民主手段夺取国家权力之前就已经炸毁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地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地方,无产阶级只能使用暴力,也就是只能在国内战争中夺取国家政权。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很可能一开始就必须采取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极权”专政的形式,以便能够胜利地结束并消除国内战争。只有当剥削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已经消灭,他们的反抗能力已被摧毁,全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马克思原文中“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几个字有着重号。——编者注

体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集合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的“极权”专政才可能逐渐改造成劳动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在阶级对立消失了的时候又继续发展成社会主义民主制。

## 无阶级社会的公团

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这个资产阶级不再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保持人民多数的信任、能够让人民多数定期地确认它的统治。资产阶级用法西斯暴力统治来挽救自己，以便违抗多数人民的意志而维持其阶级统治，从而维持其所有制和生产秩序。因此法西斯专政按照其创建者和保持者的意志来说是一种持久状态。资产阶级一旦建立起法西斯暴力统治，它就不会再自动放弃这种暴力统治，否则就会使它的整个所有制和生产秩序遭到危害。

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同。它的任务是剥夺资本家和大地主，把集中的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转变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这个任务一旦完成，社会就不再区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随着阶级区分的消失，阶级斗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也就消失，从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也就消失了。

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工具。一旦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它的任务，社会不再区分为对立的阶级，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即阶级国家，一定要像恩格斯如此明确地所说的那样“自行消亡”<sup>①</sup>。国家的政治职能、它的统治职能将消失，所剩下的只是它的管理职能。“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所代替。”<sup>②</sup>

在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将不再存在阶级差别，因此也不再存在阶级国家。尽管如此，当然还会有一个社会性的组织——一个公团。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页。恩格斯的原文有着重号。——编者注

<sup>②</sup> 同上。——编者注



正是这种有计划地领导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集中的领导机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公团的制度将是什么样的呢？显然不是阶级专政，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再存在阶级。社会主义公团将是自由和平等的人的公团，是“自由人联合体”<sup>①</sup>（马克思），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②</sup>。社会主义公团的制度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

社会主义民主制是我们的目的，它和我们所知道的资产阶级民主制有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民主制给工人以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却允许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继续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应当使公团中的平等权利建立在经济的平等之上。资产阶级民主制仅仅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虽然相对说来它对无产阶级是最有利的形式；社会主义民主制是在一个不再有阶级因而也不再有机器的社会制度下的组织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斗争基地，社会主义民主制是已经争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同“无产阶级民主制”、同“劳动人民民主专政”也有本质的不同。无产阶级民主制和劳动人民民主专政仍旧是阶级国家，虽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却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所以，无产阶级民主制和劳动人民民主专政注定要在完成了自己的职能即消灭了社会的阶级差别时“自行消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民主制却不再是阶级国家的一种形式，而是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能不能说社会主义民主制也会“自行消亡”呢？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发展到较后较高级的阶段时，每个人自觉自愿地适应团结一致的社会需要，这将成为每个人自然的生活需要，这时社会主义民主制就愈来愈不需要对个人实行强制，愈来愈接近于对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的社会”、一个无政府社会起调节作用的思想。

---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编者注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是目的,也不能是目的。它只是工人阶级在其历史道路上必须用以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创造前提的手段。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过渡时期的制度。这个过渡时期将持续多久呢?

专政在苏联已经维持了 17 年。至今丝毫看不出它开始“自行消亡”,开始转向逐步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但是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延续得像俄国一样长久。

在俄国,工业工人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农民是人口中的大多数。在西欧和中欧的工业国家里,工业工人在人口中是一个远为大得多的部分。他们在这些国家里能够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在短得多的时间内使自己对全体劳动人民的思想领导巩固到这种程度,以致在专政取消后也不会丧失这一领导。

在俄国,使现有的工业社会化是不够的。那里的任务是,首先建立庞大的新型工业,首先把工业的劳动纪律和劳动强度强加给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了工业工人的几百万农民子弟,要全体人民承担迅速工业化所要求的重大牺牲。在西欧和中欧,人口的增长要慢得多而工业机构却大得多,不需要用专政手段去强迫造成那样大规模的阶级变动,去强制作出那么重大的经济牺牲。

在俄国,革命引起一系列极其巨大的农业变革,这些变革的顶峰是农业集体化。在这些农业变革的过程中生活资料的生产远远落后于迅速增长的人口需要。城市和乡村之间为争夺生活资料而进行的激烈斗争需要一个实行专政的仲裁法官。农民经济的集体化只能用专政的暴力强迫进行。在西欧和中欧,由于那里的农业状况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也要在农村进行重大的变革,但这些变革与俄国的决不相同。例如在奥地利,无产阶级专政无疑将要对大森林产业进行剥夺,要对木材、牧场和圈草的使用权作出有利于农民的调整,要把农业大地产分配给农民子弟、小佃农和农业工人,要取消旧有庄园主对使用公共财产的垄断,要为农村仆役建立自由的家园。但是这里的无产阶级专政

绝对不会容许考虑对小农和中农经济强制进行集体化。恩格斯的话今天在这里也还是适用的,他说:社会主义在这样一种尝试中除了搞得头破血流以外,一无所获;胜利的社会主义将必须推动农民自愿地建立合作社,但是将不必触动他们的地产私有制。因此这里的革命也绝不会进行那种会使生活资料的生产陷于混乱,因而要求无产阶级专政长期延续下去的农业变革。

俄国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它必须随时准备抵抗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攻。战备的必要性也延长了专政。西欧和中欧的国际革命不必担心有外来的进攻,因此它也可能在短得多的时间之后就开始取消专政。

因此,可以指望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不必延续得和苏联一样久。它应当延续多久当然是取决于人民群众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中进入专政。一方面,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反抗愈是强烈和残暴,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各个阶层愈是自私地强调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利益,专政就必须保持得愈加长久。一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愈高,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愈快地完成它的职能,因而愈快地“自行消亡”。

这样一种考虑决不是多余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因为我们愈是能使广大群众相信,对于我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一种仅仅暂时地、仅仅在不可避免的时间内采用来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即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创造前提的手段,我们就将能够战胜愈加广大的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反抗。

让·饶勒斯曾经把社会主义描写为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实现。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中实现的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仅仅是第一步。只有当人民的政治自决权扩大到他们的劳动过程中的自决权,只有当公民像不能忍受国家里的世袭君主那样再也不屈服于工厂里的世袭君主时,只有当一切人的政治平等有了一切人的经济平等作为对应物时,大革命的理想即自由和平等的理想才会实现。

饶勒斯相信工人阶级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工人阶级愈来愈用他们

的思想去充实资产阶级民主制,最后终于夺得资产阶级民主制并把它变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因此他想象工人阶级的道路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经过无产阶级民主制到达社会主义民主制的道路。历史表明了这条道路比饶勒斯所设想的要曲折得多。在中欧,法西斯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制之前就已经把它破坏了。在发生了这种情况的地方,工人阶级就不能走从资产阶级民主制经过无产阶级民主制到达社会主义民主制的道路,而是不得不走从法西斯主义专政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到达社会主义民主制这样一条牺牲惨重的道路。

但是,饶勒斯虽然看错了道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他正确地描绘了目标的事实。社会主义反对人对人的任何一种统治,反对人对人的任何一种剥削。如果说,我们只有在以革命手段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法西斯主义专政时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专政,那么对我们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毕竟只是一种手段。资产阶级民主制仅仅在政治领域而没有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因而是在少于一半的意义上实现了个人的思想自由、一切人的平等权、全民族的自决权。我们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使这些东西尽快地完满地得到实现,这也就是自由和平等的理想的完满实现,民主制理想的完满实现。

如果我们所有这些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毁灭一切自由和一切人类尊严的人,想要动员人们进行反对法西斯暴政的斗争,那我们就应当对群众说:“我们不再是民主主义者了。我们只是想用红色专政取代绿白色专政”。我们倒是应当对群众说:“是的,我们是民主主义者。我们愿意要个人的自由。我们愿意要一切人的平等权。我们愿意要全民族的自决权。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制死亡了,它被资产阶级抛弃和出卖,并由于阶级对立而被炸毁了。在资产阶级民主制被法西斯主义炸毁了的地方,除了社会主义民主制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民主制。谁想得到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谁就和我们一起来为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个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暂时必需的手段而斗争,只有在社会主义

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够有“一切人的真正和持久的自由和平等”！

译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97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98—117页。

选自《鲍威尔言论》第399—418页

# 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摘录）\*

——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

（1936年）

## 社会主义的危机

### 革命的和改良的社会主义

自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主义分裂成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二者水火不相容。两个阵营的观点都已僵化成教条主义。但是，过去几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事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苏联经济的迅猛发展、法西斯主义在中欧的胜利以及战争的威胁——动摇了双方15年来僵硬坚持的原则。在世界工人阶级新的经验的基础上，使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相互对立的原则必须重新受到检验。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从这两个社会主义党派的生产历史出发，以使用这一历史的成果来对照我们

---

\* 这是鲍威尔的最后一部著作，内容相当于他准备写的《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二、三、四卷（第一卷已于1931年出版，书名为《合理化和非合理化》）。本书分三章：《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社会主义的危机》。这里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危机》的前四节。鲍威尔在其中论述了他的“整体社会主义”思想。——编者注

时代发生的事情。

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产生于一个这样的时代：经济上处于从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到工厂的过渡时期，政治上经历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

不敷温饱的工资，12小时甚至14小时的工作时间，大批的童工和女工，工人在生病、失业和年老时没有任何保障，禁止组织工会和罢工，工人对工厂企业主的专制无能为力，工人在国家中没有任何权利，住宅和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文盲和酗酒，这就是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没有文化，没有组织，没有权利，工人既不能在企业中反对单个的资本家，又不能在国家中反对资产阶级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他们的绝望有时以猛烈的方式爆发：激烈的罢工，与国家机关的暴力冲突，抢劫，恐怖行动，起义的尝试。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它以全体人民反对统治者的代言人姿态出现。它把工人阶级也拉进他们的斗争。在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有无产者在战斗，都有无产者牺牲。“失去的只是锁链”的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勇敢、最激进、最勇往直前的战斗者。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却让无产阶级大失所望。在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中无产者在街垒中斗争，但是结果只是国家政权从土地贵族手中交到金融贵族手中，无产阶级仍被排除在所有的公民权利之外。工业工人支持英国自由主义争取改革法案和改革国会选举权的斗争，然而1832年的改革法案虽然废除了土地贵族的选举优先权，但这只是为了扩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权利，广大工人仍然没有选举权。有了这些教训，工人阶级发起了独立的斗争——不再是仅仅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是同时把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本身。巴黎七月革命之后发生了里昂纺织工人起义。而英国的改革法案之后产生了宪章主义，这是工业工人阶级要求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斗争。

现代社会主义是与工人阶级第一批大规模的独立的阶级运动同时产生的,却不依靠这一运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到了无产阶级可怕的大饥荒,看到了小市民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他们经历了现代资本主义第一批严重的危机。他们意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奴役来取代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他们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理想景象与他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现实的野蛮状态相对抗。

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拒绝参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同样拒绝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上。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要求政治权力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是毫无意义和毫无用处的,因为问题并不在于要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社会主义相信能够超越斗争着的阶级;他们根本不去参与阶级斗争,而是相信仅仅通过对社会理智的呼吁或者通过小规模试验的宣传作用能够把人类带向一个结束所有阶级斗争的社会制度。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现实运动相对立:在法国,傅立叶的追随者与团结在《改革报》周围、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为了争取普遍选举权而斗争的工人相对立;在英国,欧文的学生们则与宪章派相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后来渐渐消失了。

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法国和英国的要晚半个世纪开始。当法国已经由 1830 年七月革命中产生的资产者王权(Bürgerkönigtum)执政时,当英国年轻的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在 1832 年改革法案的基础上开始掌管国家权力时,在德国仍存在着专制主义、封建贵族特权以及国家分裂状态。德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德国的现实。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摧毁古老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力量。在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sup>①</sup>中他们找到了这种力量,这一阶级被他们非人的生活条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 页。——编者注



件所迫,负有摧毁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使命。德国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

但同时,他们的目标也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七月革命和英国改革法案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并不是他们所渴望的理智的王国,而是资本的统治。在与德国现实的全面对抗中,德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希望,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sup>①</sup>德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贯彻到底,他们从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中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

在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土地贵族的斗争时期,为了证明土地贵族的地租是以占有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为了反过来证明资本家剥削他人劳动所得的利润并不比地主的地租少,英国社会主义者“掌握了这个被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sup>②</sup>。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和平等的大旗;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相信,自由和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德国哲学把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原理普遍化,指出当个人只求一己之私利时,他们之间的对抗会造成任何人都不想要的后果,因为它们实现了一个理性国家的“客观精神”;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借用这一学说,认为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会带来它们不想要的后果,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理性的共同体。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他们看来是粉碎旧社会并由此实现哲学家的理智国家的工具,是一种解放,哲学是它的头脑,无产阶级是它的手臂。“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sup>③</sup>

这样,首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只要无产阶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编者注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Ⅲ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261页。——编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编者注

现实的阶级运动还停留于“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要求改善无产阶级状况的水平上,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就对此毫不感兴趣。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保护工人的健康——这些都是工人的生存问题;革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并不关心这些。只有当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而使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理想得以实现时,并且也只有在这一程度上,它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似乎只是一种工具,用以实现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无产阶级只是哲学的手臂。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跨越了革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这一发展阶段。他们认识到,不能说阶级斗争仅仅是实现哲学的手段,相反,哲学只是阶级斗争的映象,只是斗争着的阶级的武器。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无需实现任何理想”,也就是说,实现社会主义各派创建者的未来规划或关心政治的哲学家的理想并不是它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只为实现它的直接利益:为了多得一小块面包,为了多一点健康,为了多一点自由。但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会遭遇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法则本身会一再摧毁它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并一再将它击退;它的自身利益会一再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利益产生矛盾,因此最终它必将起来反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通过革命斗争试图推翻这个世界,建立自己的世界。只有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阶级运动才能最终推翻和消灭这个社会,这是由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活条件发展出来的,因此,“比其他众多无产者更懂得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的社会主义者,不应脱离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直接经济和政治目的而发起的现实的阶级运动,也不应“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规定”无产阶级现实的阶级运动的“过程”,而应该在这场阶级运动中使从这一运动本身产生的发展成为自觉的,并以此来促进其发展,即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要求改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斗争发展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克服革命的知识分子社

会主义,理解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消除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鸿沟。

与此同时,年轻的革命社会主义据此确定了自己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战略方针。它给无产阶级指明了道路,首先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旧势力的斗争,同时充分利用资产阶级革命动摇社会和国家生活,以便在与资产阶级一起取得对旧制度的胜利后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然后也把它推翻,夺取国家政权,并用以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1848年巴黎工人在二月通过街垒战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六月就试图通过街垒战推翻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870/1871年在色当与资产阶级一起宣告成立共和国后,他们在三月就又一次举行公社起义,企图夺取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是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以便在胜利后使革命超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限制,所以,只要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结束,就不能再使用这一战略。现在必须发展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人运动。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英国。

英国在19世纪30和40年代虽然没有发生过起义,但也经历了暴风雨般的革命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在1832年利用改革法案动摇了土地贵族统治的政治基础,在随后的几年里,通过反对谷物税的激烈斗争摧毁了土地贵族的统治并以此实现了贵族统治的老英国向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英国的转变。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这一阶段,宪章主义在工业资产阶级背后暂时发展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威胁。但是,随着工业资产阶级对乡村贵族的胜利,随着1846年谷物税的取消,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结束了。这样,宪章主义发展的革命氛围也就消失了。它未能从所遭受的总罢工尝试失败中恢复过来。相反,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阶段结束后,英国工人又有了另外一个活动领域。他们把1847年从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战争中得到的十小时法案作为宝贵的战利品带回家——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时间,这是英国工人阶级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大

淘金以及在大陆上的大规模铁路建设的促进,1847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不久就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英国工人利用这种经济繁荣在工会斗争中要求提高工资。英国工人政治性的阶级运动消亡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失去了影响力。英国工人阶级全力专注于其工会、消费合作社和互助储金会的强有力的发展,专注于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的工会斗争,有时也关心影响公众舆论和选民的意见,并以此来影响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使它们承认工人阶级可以改善工会权利和工人保护立法,可以扩大其政治权力。这样,在英国首先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它的斗争目标不是夺取国家政权或是变革社会制度,而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循序渐进地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状况。

显而易见,这一运动的节奏和意识形态一直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的。80年代长期使人们陷入贫困的大萧条使英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贫穷现象,社会主义思想随之又开始影响英国工人阶级。当80年代末这一长期萧条结束后重新出现的经济繁荣为工会斗争提供了新的机会时,非熟练的工人们奋起反抗;“新工联主义”扩大了工会的活动范围,给工会的斗争提供了更大的动力。当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法庭判决和法律措施来限制工会的发展时,工会在本世纪初结成了一个独立的工党;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性的阶级运动在经历了50年的中断后又重新出现了。战前的最后几年,物价上涨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广大群众中出现了“劳动骚乱”;一场大规模工资斗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英国。战争和随后在大陆上发生的几次革命给工党灌输了社会主义思想;从80年代以来逐渐重新进入工人阶级进步阶层的社会主义思路现在决定着工党的纲领。英镑稳定后,一场严重的工业萧条压低了工人的工资,工会再次以强有力的工资斗争进行反抗,这一斗争在1926年的总罢工时达到高潮。总罢工失败后,工人们再次把希望寄托在政治活动上。对前两届工人政府的失望促使工党具体制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改良纲领。这整个发展的结果是,宪章主义消亡后,仅限于工会活动的英国工人阶级最终不得不再

次建立他们强大和独立的工党,不得不以工党的斗争重新开始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这一斗争也重新以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目标。但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英国社会主义已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了。它是一种改良的社会主义,它并不希望夺取并巩固国家政权,而仅仅希望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和权利,逐步地、和平地、合法地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改良和改造,逐步地、和平地、合法地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到社会主义民主。

在欧洲大陆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直到1870—1871年才以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倒台和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告终。巴黎公社被镇压结束了这个革命的时代,中欧和西欧长达半个世纪没有战争和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气氛消失了。现代武器技术的发展加强了国家政权,使任何暴力起义变得毫无希望。无产阶级长达半个世纪没有机会发起革命攻势。

尽管如此,欧洲大陆上的工人政党还是受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法国,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工人运动一直处于国家权力的重压之下。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国家权力试图通过反社会党人法、宣布紧急状态和戒严等警察手段来压制工人运动。在大多数国家工人仍没有选举权,仍在为争取民主平等而激烈斗争。各地的工人阶级仍对暴力镇压工人运动并且拒绝给予工人民主平等的国家权力采取尖锐的敌对态度。因此工人们仍旧处于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迎来革命性的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仍是欧洲大陆上主导的理论,但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却从来未能得到承认。

但是,革命仅仅是对未来的希望。在日常斗争的实践中,欧洲大陆的工人政党别无选择,只能促进工会的发展,现在欧洲大陆的工会也能逐步实现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了;只能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并利用这些权利;只能在选举斗争和国会斗争中争取改善工人保护立法和工人保险,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卫生和文化生活条件。欧洲大陆的社

会主义理论仍是革命性的,只不过在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它的日常实践被迫只能局限于争取法律武器的斗争,依靠法律手段的斗争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改革的斗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那篇著名的前言中研究了这一发展阶段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状况。他的书信说明了为躲避审查在前言中只能暗示的东西。他解释了国家权力怎样通过武器技术的发展得到了加强。只有当部分国家暴力机关和国家军队在内战中拒绝对无产阶级开战,或干脆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无产阶级才能在内战中取胜。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一些重要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发展得很迅速很稳定。这种发展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被中断,即无产阶级被诱骗与国家的刺刀相对抗,从而为国家权力提供了在大屠杀中扼杀工人运动的机会。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停留在合法斗争的层面上,没有被诱骗提前发生暴力纠纷,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会“在世纪末成长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当然它也不会幸免于暴力决战。一旦社会民主党在人民中占大多数或者即将占大多数,国家权力就要通过政变谋求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利、宣传自由以及组织权利。那时,工人阶级当然必须用暴力抵抗统治阶级的暴力政变。但是那时无产阶级在暴力斗争中取胜的前景就要好很多。因为社会民主党已赢得多数或几乎是多数的人民,而且多数或几乎多数的士兵也会出于同情站到人民的一边。然而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仍有可能通过一场战争来寻找出路。那时,战争会创造出一种革命局面,被进行战争的政府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将会夺取政权。由此可见,恩格斯决没有放弃这样一个信念,即要在阶级之间的内战中做出最终的决断。但是他建议工人政党尽可能推迟这一最后的决战,直到他们通过和平和合法的宣传,在运用法律手段争取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日常利益的斗争中,能够将大多数人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样他们就可以期待在决战时刻能够把国家的部分武装力量拉过来并以此制胜。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增长,

“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把这个日益增长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定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 1871 年在巴黎那样流血。”<sup>①</sup>

这样就产生了前几年所谓的“等待主义”，一种等待的理论和政策。人们在日常实践中满足于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斗争。但是人们期望，在工人运动这一日常斗争中的发展会最终促使统治阶级自己采取应对措施，这将创造新的革命局面，给无产阶级在反对统治阶级暴力干涉的暴力斗争中取得胜利带来希望。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把当前的改良主义实践的现状和革命的未来前景结合起来的。

德国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工人阶级的顽强反抗而失败；法国的社会主义重新获得公社失败后失去的运动自由，迅速强大起来；而比利时和奥地利的工人正处于前景广阔的选举斗争中——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写这篇前言的。在前言发表的同一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这使工会有机会在工资斗争中取得较大的胜利，并削弱资产阶级对扩大社会立法的抵制。在这一给工人运动改良主义日常实践带来巨大成功的繁荣时期，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实践试图挣脱革命的未来前景的束缚。如果像恩格斯自己承认的那样，反对国家权力的革命斗争在短时期内是毫无希望的，那么谈论和梦想它还有什么意义？这样只能给统治阶级最反动的阶层提供借口，可以拒绝承认工人的政治平等权利并用暴力的镇压措施控制工人阶级。有必要放弃所有吓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惯用语；从原则上承认——这在实践中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工人愿意只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拿起革命武器进行斗争；这样就能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之间的鸿沟上搭起桥梁；考虑联合这些党派实施政治和社会改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3 页。——编者注

良,与他们组建实施和执行这些改良的联合政府,并以这种方式,从一个改良前进到另一个改良,逐渐“挖空”资本主义,逐渐把社会主义的元素融入当今的社会制度,逐渐使社会制度接近社会主义理想。

改良主义,或是像在德国所说的修正主义,以这些观点与欧洲大陆工人政党传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相对抗,但它却从未放弃社会主义的斗争目标;改良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让·饶勒斯的言论和文章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热情洋溢的和令人振奋的宣传。但是改良主义却放弃了只有通过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它把当时资本主义的现状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将长期维持的状况,一方面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斗争取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给无产阶级提供了较多的机会,使它们可以通过民主基础上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为工人阶级获得重大的让步。

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或社会主义者加入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来取得“积极成效”,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无论如何还是很有限的。只要工人政党在改良主义的领导下做出这样的尝试,无产阶级大众立刻就会对他们失望。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出于失望干脆避开了这种议会政治的斗争,只把希望寄托在工会身上。由于对改良主义的日常工作成果不满意,他们希望工会发展成社会革命变革的工具。既然反对国家权力的武装起义没有希望,那么就该用总罢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革命体操”此起彼伏,日益升级的罢工将引起总罢工。这就是革命工团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出于对改良主义试验的失望,罗曼语国家的部分工人成为这一学说的追随者。但是经验很快就指出,这种“革命体操”只会导致失败,使工人阶级丧失信心,从而削弱工会自身的力量。曾暂时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会很快就不得不使它们的实践与英国工会和欧洲大陆的改良主义工会的实践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的“等待主义”不仅与改良主义而且还与革命工团主义相对立。但它是用什么来与它们对抗的呢?“等待主义”也认为目前有必要避免一切没有胜利希望的革命活动。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



争取工人日常利益的日常斗争中保持运动的持续发展外，它也不能给工人阶级指出其他的道路。但是由于对今后的革命局面怀有希望，它认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摆脱其他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保持对革命灾变的期待和对当今社会的完全否定”<sup>①</sup>。因此，人们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拒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社会主义议员拒绝批准预算。“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革命的”战略那时并不要求社会主义运动积极准备社会革命；它那时只要求——正像西洛内不无道理的嘲讽那样——“拯救自己的贞操”。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数年来关于南德几个小邦的邦议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应该支持还是反对邦预算的争吵无尽无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一发展阶段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卡尔·考茨基；这一阶段虽然没有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出任何革命的任务，但是为了将来革命的前景仍要使工人政党与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政党保持敌对关系，这一阶段在期待未来与革命结婚的时候，打算“拯救自己的贞操”。

当时的工人政党继承了从前的领导阶层，他们虽然也不希望在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再有直接的革命任务，但仍旧满怀着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旧的革命远景设想以及旧的革命热情。（代表人物是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盖德、拉法格和瓦扬）但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几十年的工人斗争的现实实践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导阶层：能干的宣传家，议员，工会职员还有合作社职员。这一新的领导阶层在言语上坚持党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思想遗产，拒绝新出现的改良主义；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策略相联系的保守主义，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并不愿意与心系革命社会主义的老一代领导者的思路以及受老一代领导者教育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传统观念产生矛盾——，是出于对在群众面前承担巨大责任的胆怯，这种责任是它在走改良主义推荐的新的策略路线时所必须承担的。但是这一

---

<sup>①</sup> 西洛内《法西斯主义》，1934年苏黎世德文版，第45页。

领导阶层没有经历过任何革命。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阶级争取日常利益的日常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想不是来自传统的革命财富,而是在争取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他们的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他们与那些明确的改良主义者的区别仅在于,他们不敢从改良的实践中得出最终的思想上和策略上的结论。如果在没有任何大的历史使命的和平时期,他们愿意口头拥护传统的革命社会主义,但每逢紧急的革命危机,即在“拯救自己的贞操”已不再够用,需要积极进行革命时,就会暴露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晚一些,尽管是在不同的道路上,或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外衣下,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也跟英国一样变成改良主义的了。

1914年8月4日揭露了真相。十多年来,革命的社会主义一直盼望着,一场欧洲战争会使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再没有机会进行直接革命活动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战争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以及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革命地夺取国家政权,并以此来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如果社会主义确实坚持革命的未来前景,它在战争开始时就必须宣布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应对战争负责。它必须说明,发起战争的政府没有能力带领民族走向迅速的和持久的和平。它必须准备利用战争过程中或是结束时一定会出现的革命局面,哪怕是它已被迫处于非法状态。但是事实上,社会主义政党被战争吓倒了,停止了对资本主义政府的斗争。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它们加入了进行战争的政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批准了战争拨款,而正是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不久前还把巴登邦议会对邦预算的批准视为背叛革命社会主义的象征。社会主义政党并不寄希望于战争中会出现革命;不如说它们希望,它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能换来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让步。这样,面纱就被撕掉了。事实被揭穿了:尽管在欧洲大陆上,人们嘴上还承认革命的未来前景,但内心早已完全放弃革命了,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也早已变成改良主义的了。

共产主义者认为通常可以把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解释成“工人贵

族”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关于这一点以下的说法是正确的:事实上改良主义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能发展起来,即享有民主权利的工人阶级能够利用相对有利的经济局面,在工会和政治斗争中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果;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人能够在卓有成效的斗争中根本改善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国家 and 时期。属于这种情况的地方在领导层和群众中就会发展起特殊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相信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够取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大的成功,这样,无须革命的爆发就能“挖空”资本主义。由此可见,这种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事实上是在成功的斗争中经济上升的工人。但这不是工人中的少数,不能被称作“工人贵族”,而是西欧和中欧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批工人。

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坚持了革命的性质,这个国家就是俄国。因为俄国还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那里仍存在着专制主义;那里资产阶级仍处于与专制主义国家的尖锐对抗中;那里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农村还没有形成;因此那里的农民还处于与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分配的革命对立中;那里工人还没有权利使他们在法律基础上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因此那里的工人还处在与国家的尖锐的革命对立中;那里仍有革命的氛围,与1848年革命前的德国不无相似。那里的社会主义是革命的,西欧和中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曾经是那样。

在俄国还存在着极端反对俄国现实的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像德国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的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把希望寄托在“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身上,这一阶级将会突破沙皇俄国的现状。他们也希望,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会把他们的国家“不但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也正是他们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带给了工人群众,向工人群众介绍了革命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即《共产主义宣言》<sup>①</sup>的战略思想:首先支

---

<sup>①</sup> 即《共产党宣言》,以下同。——编者注

持反对沙皇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以便在沙皇主义的废墟上,把它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如同德国 19 世纪 40 年代的社会主义一样,俄国的社会主义也是革命的,因为 20 世纪初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德国 19 世纪 40 年代的社会政治状况是相似的。对俄国的社会主义来说,社会革命不仅是一个未来前景——人们承认社会革命,但在日常实践中只能进行争取资本主义改良的斗争,对它而言,革命就是直接的实践任务,因为它在反对沙皇权利的斗争中没有任何合法斗争的可能性,被迫转入非法活动,被追捕和迫害,只能用非法的、革命的手段进行斗争。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裂。但是两个派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与沙皇制度进行斗争。他们在俄国首先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当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西欧和中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进步的欧洲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信号时,它才能进一步发展成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导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孟什维克是俄国社会主义的欧洲变种。它的理想是以西欧和中欧的工人政党为榜样组建一个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党。革命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小团体首先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的,但是一当工人参加运动,他们就愿意接纳工人加入这些组织。它认为,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制度是首要任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则不得不组织成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的、在野的、利用合法斗争途径的群众党,正像西方的无产阶级群众党成为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的,利用一切合法途径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合法的政党一样。而布尔什维克是具有俄国特色的,在俄国的特殊情况中产生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变种。它主张,严格保密的,确保革命行动严格由中央领导的,仅仅由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革命团体不应该接受只参加了工人运动、完全未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加入组织,而应该领导他们。他们不应该把革命行动仅仅局限在争取工

人阶级直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斗争上——这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群众目前所争取的——而应该尝试把它进一步推向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俄国首先要面临的无疑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为了扫除残留的封建主义,在战争和内战中战胜国内外的反革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需要巴黎市郊无产阶级的暂时的恐怖专政;同样,在俄国为了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也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俄国革命保持孤立,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只会是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就像 1793 年一样。但是,如果俄国的革命通过夺取政权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实际行动成功地唤醒了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引起了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了。

可见,当世界大战引起革命时,各社会主义政党在革命进程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在中欧,无产阶级受社会主义政党领导,这些政党在 1871 年到 1914 年的和平时期逐渐变成改良主义的了。这些政党在争取民主和争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改良的斗争中变得强大起来。革命到来时,他们按照自己全部的传统和所有习惯利用了革命,以实现民主并利用民主进一步扩大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改良。这就是说,中欧的社会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刻重新开始了他们十几年来所被迫进行的改良主义实践。卡尔·考茨基,战前“革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代表,现在却反对马克思的这一原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会是其他。他提出这一论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府一般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政府。<sup>①</sup>正是当他这样采纳改良主义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基本观念时,他再一次揭示了,战前 20 年中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是西欧和中欧工人政党在几十年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改良主义

---

<sup>①</sup>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1922 年柏林德文版,第 106 页。

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的传统外壳,只是一个宽松的外壳,只要大革命的震撼不再允许中欧工人政党掩饰其本质,这层外壳就会由于对改良主义主要观点的公开承认而崩裂。俄国则完全不同。在那里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处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改良,它超越资产阶级革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它最初在党组织内实现的组织原则,即不接受参加运动的工人加入组织而是让一个觉悟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组织领导他们,现在被运用于国家。它使革命群众服从一个革命的国家政权的专政,这一政权自觉地把强迫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当作自己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它违背自己原来的期望而认识到,可以“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虽然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它所希望的那样引发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一当法西斯主义在中欧取得了胜利,打败了工人阶级,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摧毁了他们的组织,无产阶级的处境就改变了。因为他们的所有合法的斗争手段都被剥夺了,只能用革命的手段继续斗争。因为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必然要随着法西斯主义反革命而告结束,它们的斗争目标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社会主义民主,而它的前提条件必须通过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因为法西斯主义向他们展示了一个阶级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胜利来完全镇压被战胜的阶级的,当他们自己取得胜利时,他们也会尽力效仿这一做法,以便通过彻底清算资本家阶级来防止反革命的重复发生,并且在无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完全民主制。

这样,在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又重新产生了革命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它是在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社会主义更高的阶段上产生的。它是在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工人阶级通过几十年改良主义斗争显著提高了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俄国大革命的经验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革命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

义。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结束，在整个西欧和中欧就发展起一种尽管披着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外衣、实质却是改良的社会主义，它取代了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直到法西斯主义战胜了中欧的工人阶级，这里才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上重新产生了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俄国的情况不同。那里的社会主义直到 1917 年还是革命的，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它也没有变成改良主义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在几个月后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被无产阶级专政取代。

改良主义不是单纯地误入歧途。它不是像列宁所说的“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sup>①</sup>。它是在一种历史情况下工人阶级自己的策略和意识形态。这种历史情况是：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看起来毫无希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有很大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运用法律手段成功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一阶级斗争的改良主义实践的历史成就是巨大的。我们在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描述中就已经提醒不要低估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文化、组织以及阶级意识的显著提高，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几十年改良主义斗争的结果。但是，改良主义实践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并向工人阶级灌输。改良主义以前是现在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和策略，是通过以前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取得的；正是它的成就招致了法西斯主义反革命，而法西斯反革命的胜利又引起了新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它是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而且硕果累累的发展阶段。

在法西斯国家产生的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着手在工人阶级新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理论和政策。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胜利时期，一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发展出来的年轻的革命社会主义团体用其理

---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7 页。——编者注

论性的宣言和宣传小册子“新开始”给了这项工作最初的强烈刺激。

“新开始”产生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时期,产生于工人阶级最惨重的失败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崩溃的时期。它从工人政党的发展史中探索这一崩溃的根源,得到了重要的认识。它正确地认识到,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西欧和中欧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变成改良主义的了,它在欧洲大陆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只是它的改良主义本质的外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在战后合乎逻辑的出现是由于其改良主义的特性,这是在战前尽管还存在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就已发展起来的。它准确地认识到,战后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以对德国工人群众的觉悟水平作出“主观主义”的自我欺骗的估计为基础的,也是由于这一自我欺骗而失败的。但是“新开始”把这些正确的认识建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最后的、最成熟的阶段的思路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俄国社会主义在俄国革命胜利前发展起来的思路上。

20世纪初俄国工业工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以一系列的大罢工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同时,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的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革命者的小团体也发展起来了。也就是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暂时存在过的局面又重演了:一方面是自然的,“自发的”,但是并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另一方面是主要仍由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承担的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列宁写道:社会民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sup>①</sup>“工联主义意识”停留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局限内;在这

---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编者注



一发展阶段,工人所从事的仅仅是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可以实现的任务。他们因此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只有当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播给他们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学说时,工人阶级才能认清他们的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他们只是因此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阶级意识。

毋庸置疑,科学社会主义不能由工人自己而只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同样,天赋人权的,经济的和哲学的理论,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由资产阶级工厂主和商人,而是由他们中的智者发展起来的。每个阶级在其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都需要知识分子的工作,知识分子在头脑中冲破了这一阶级在历史实践中必须冲破的界限。但是,因为列宁不把改良主义——或者像他当时所称的“工联主义意识”——看作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看作“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它就达到了一个悖论:工人阶级只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只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引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新开始”是以列宁的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在这种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特有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仍在起作用。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被灌输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即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宣战,也仅仅把目标设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实现的范围内。尽管他们结成了大规模的群众党,他们仍旧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仍旧把斗争目标设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大规模的群众党是受“其群众成员的意见和想法控制”的,从而也就是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的。只要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存在仍保持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他们的意识就不可避免地要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只要无产阶级的行动是由民主主义的群众党,即由“其群众成员的平均意见”决定,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把斗争目标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可

实现的范围内。<sup>①</sup> 因此,中欧无产阶级大规模的群众党没有能力使1918年的革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限制,因此他们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不是单个领导者的“背叛”,而是产生这些领导者并且自愿跟随这些领导者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本身宣告了这些大规模的群众党的失败。只有当有觉悟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骨干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并且使群众的行动有意识地 and 有计划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限制(也是群众觉悟本身的限制)时,只有当行动不再由群众的“平均意见”本身决定和限制,而是受积极的少数人(工人阶级中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先锋队)的社会主义目标意识的引导时,只有那时工人阶级自然的、自发的运动才能向前推进,直到冲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限制。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改良主义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每次尝试都毫无希望,另一方面工人能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所承认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大大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影响。当时在工人阶级内部缺少目标明确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骨干吗? 不可能。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盖德,拉法格和瓦扬当时培养了一批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骨干。但是在给定的历史情况下,即工人阶级没有革命行动的机会,但却有着广泛的和成效卓著的改良主义活动的空间,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骨干只能造成用革命的意识形态包装改良主义的实践的后果。另一方面,一批新的领导干部从改良主义实践本身中脱颖而出,他们成为自觉的、坚定的改良主义的承担者。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只要历史情况不给无产阶级提供其他可能性,只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争取改良,任何革命骨干都不能引导群众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限制。只要革命骨干试图“不从阶级运动的现实因素中寻找”无产阶级行动的目标和方法,“而是按照教条的原则规定运动的过程”,他们注定要遭受充当无权的宗派的命运。领导干部不能把与

---

<sup>①</sup> W.M.:《干部组织还是群众组织?》,载于《斗争》1934年11月号,第238、240页。

当时群众运动状况不相符合的方法和目标强加给它;不如说群众行动本身会从群众中造成一批其意识形态与群众当时的行动状况相适应的领导干部。

只要群众没有革命的机会,革命干部就很难把群众行动拉到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去,而一旦事件本身把群众动员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革命,这些干部就很难限制群众自然的、自发的行动。1917和1918年布尔什维克相信,“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夺取政权后还对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和工业企业国有化望而生畏。他们满足于“工人监督”。但是,革命的武装的工人的自发行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无法继续进行,工人把企业主轰出了企业;苏维埃专政不得不事后对工人群众自发完成的剥夺资本家财产予以批准。

“新开始”产生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压力下。群众运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小批坚定勇敢的社会主义者骨干除了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外无事可做。他们变不利为有利,他们教导说:关键时刻仅取决于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精英对社会主义目标的明确意识。群众总是只把目标设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因此大规模的群众党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也冲破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只有在地下活动时期有计划培养的、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标明确的领导干部才能在群众参加运动时推动运动冲破资本主义的框架。

这种思路中肯定蕴藏了一段过去的事实。“共产主义宣言”早就为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比其他众多无产者更懂得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安排了这样的任务,即在工人群众中,作为他们当中“最坚定的,永远进步的部分”发挥作用。但是,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干部与自发行动的群众之间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改变了。有时群众意识会远远地落在受过教育的干部的社会主义目标意识的后面。有时群众意识也会冲到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干部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前面。不管干部受过多好的教育,目标多么明确,还没有一

个干部能把不符合群众当时的生存和斗争条件的斗争目标和斗争方法强加给他们。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发生变化了。在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的同时,在法西斯主义国家刚刚从工人阶级的失败中发展出一种新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同时,改良社会主义在民主国家继续生存。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存在是如此的不同,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发展得也各不相同。只要不同国家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存在、生存条件和斗争条件还存在根本的区别,不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发展的差异就无法消除。但是,尽管不同国家工人的方法和意识形态也不同,仍旧有必要把所有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只要改良主义者还是仅仅把革命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对个人和精神自由的伟大文化财富、对民主自决和对人性的背弃,只要革命者还是仅仅把改良主义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斗争目标的背弃,是沉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尽管这也是工人群众自己的意识形态),是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背叛,他们的联合就不会成功。只有一种观点能实现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方法把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看作是资本主义内部工人阶级各个时期的状况和斗争条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从而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理解成同一个社会主义、同一个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

## 两次革命

1914年8月4日,战前包裹着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实践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外壳破裂了。工人政党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战服务,这一行为遭到了仍然忠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思想家的反对。战争初期,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与充满战争狂热的工人群众的情绪一致,但当战争带来的牺牲和痛苦越来越大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随着战争的进程开始反对战争,因而也反对支持交战的工人政党。

由此他们接受了战争伊始就反对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战争政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领导。社会民主党因此在思想上分裂了，而且在许多国家，首先是在德意志帝国，在组织上也分裂了。如果这一分裂只是由围绕对待战争的态度展开的争论造成的，那么它在战后还能再次消除。但实际上在工人政党围绕战争政策展开的争论中隐藏着更深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战后的革命中公开暴露出来。俄国革命和 1918 年中欧革命相反的过程使国际无产阶级分裂成互相敌对的两派。它先是导致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这一分裂不再是仅仅由围绕对待战争立场的争论引起，它一直持续到战后，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因为俄国和德国革命相反的过程是造成战后工人阶级分裂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为了理解分裂问题，并且由此再来理解消除国际社会主义分裂的问题，就必须先来回忆一下这两次革命过程对立的原因。

俄国革命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它以极其沉重的代价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巨大的、暴力的转变过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德国革命仍旧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德国工人 1918 年争得的共和国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 15 年后屈服于最残暴、最野蛮的法西斯主义。如何来理解这两次革命发展的对立呢？

广为流传的共产主义宣传很快给出了答案：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出色领导下带领俄国工人取得了胜利；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卖了德国工人。恩格斯在阐述 1848 年革命失败的起因时已经对这种愚蠢的解释作了回答。恩格斯写道：“1848 年 2 月和 3 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

让别人来出卖自己。”<sup>①</sup> 广为流传的共产主义论证,例如当人们按照“新开始”的意义把它升华为以下这种理论时,也比这好不了多少:一个大的群众性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它的历史和本质来说,是没有能力带领工人群众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起冲击的,因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从而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控制的群众永远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设定他们的斗争目标;只有那些自觉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中的骨干才有能力领导群众,使群众的行为超越他们自己的、由资本主义环境决定的思想,只有布尔什维克类型的政党中的骨干才能使革命突破资产阶级的框框。再例如,罗森贝格的《德意志共和国史》把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解释为不仅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而且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错误造成的。如果人们满足于这一解释,那么这说明他们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两次革命相反的过程。因为尽管双方的错误都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面对所有这些解释,仍旧必须想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提醒,要去“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sup>②</sup>

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初期发展完全相似。俄国和德国一样,革命的领导权起先落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手里:俄国是掌握在孟什维克和右派革命社会党手里,德国则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里。这两个国家的工人中都有一个共产主义少数派反对这一领导权;它在俄国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革命社会党领导,在德国则由斯巴达克同盟、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和“革命工长”领导。这两个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革命少数派都试图通过暴动来夺取政权:在俄国是1917年7月,德国是1919年1月。暴动失败后,这两个国家的革命运动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反动势力加强,共产主义少数派遭到追捕。但从这时开始,两次革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俄国的七月暴动失败后，布尔什维克也被迫处于不合法的状态，他们的报纸停刊，他们的印刷厂和政党所在地遭到查封。那里的舆论在7月也转向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七月暴动后，特别是连士兵也对布尔什维克持激烈反对的态度。曾在7月3日打着布尔什维克标语在街上游行示威的军团这时要求在一周后对“威廉的走狗”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俄国的这种倒退在几周内就消失了。8月，布尔什维克的洪潮就再次上涌。9月，布尔什维克掌握了绝大多数最重要城市的苏维埃，与之结盟的左派革命社会党人掌握了大部分农民苏维埃。10月，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已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了，布尔什维克没有遭到任何前线军队和两个首都的卫戍部队的抵抗，已经能够夺取国家政权了。

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那里的共产主义从1919年7月的挫折恢复过来要慢得多。那里的立宪国民大会的选举表明，德国工人的绝大多数是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那里的民主制已经赢得稳定下来的时间，因此能够轻而易举地抵御后来共产党人的暴动尝试。布尔什维克在7月的失败只是一个插曲，它的影响在几个星期以后就被消除了，斯巴达克派在1月的失败却是德国革命的马恩河战役。

如何来理解这种差异呢？难道我们应该把它解释成，这是因为诺斯克在一月出于对职业军官专业技能的市侩般的尊重，出于对社会民主党工人武装的市侩般的恐慌而求助于志愿军，把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托付给这些反革命的皇帝的军官？但是如果整个帝国的工人都向共产主义的旗帜靠拢，并在它的带领下展开斗争，就像俄国在7月后的几个月内发生的一样，诺斯克的几千名志愿军就无能为力了。或者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德国和俄国发展的差异：德国不存在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这样老资格的、坚定的、有出色的领导能力的革命政党？但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在1919年像俄国工人在1917年一样，充满了革命激情和革命斗志，那么他们也可能在一个稍逊一筹的政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

起码能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不能这样解释。不管人们对一个自觉的领导层对革命的群众进程的影响看得多重,仍旧不能把两次革命过程的对立仅仅或主要理解成是由于双方革命领导骨干的素质的差异。德国工人阶级在1919年1月后的表现与俄国工人阶级在1917年7月后的表现完全不同,需要另作说明。显然可以这么来解释,即德国革命缺少一种巨大的、以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发生作用的、使群众的思想、行动和意愿革命化的动力,而把俄国革命推进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正是这种动力。

只要想起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表现与在德国革命中的表现是多么的不同,对这一动力的认识就会有很大的进展。1917年,俄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在农村建立起资产阶级所有制。土地公有和半封建性质的租佃关系仍然存在。人们还没有忘记农奴制废除后随之而来的大量土地掠夺。工人革命唤醒了那里的农民群众。农民在沙皇制度倒台后贪婪地抢夺地主的土地。大俄罗斯地区早在3月份就开始出现农民起义,乌克兰在夏末也发生了起义。农民用暴力将地主的土地据为己有。他们赶走为地主干活的战俘,占有了收成。有些地方的农庄被烧毁,地主的农庄建筑物被洗劫一空,牲口和财产都分给了农民。当临时政府在镇压了七月起义后试图镇压农民群众运动时,它恰好使农民投入革命领袖的怀抱。这一伟大的扎克雷起义,这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动摇了国家和社会秩序,使由农民和他们的后代组成的军队革命化。它向城市工人的革命提供了几千万农民的支持。

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德国农民早就不再与大地主保持自觉的、革命的对立了。战争时期的征调越多,战争中心的经济就更加激化了城市与农村的矛盾。德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处发生地主的庄园被烧、土地被农民占有、地主的财产被农民洗劫一空的情况,但是德国农民对战争中心的征调的抵抗却愈来愈坚韧顽强了。对战后时期的德国农民来说,他最主要的斗争目标不是占领地主的土地,而是能再次获得对他的劳动产品的自由支配权。尽管他在战败时期反对领导战争



的旧势力,但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很快就会成为需加防御的敌人,反对社会主义、保卫财产自由的资产阶级则成了他们的天然同盟者。农民在这里为重新兴起的资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群众基础。在俄国,无产阶级能够依靠革命的农民,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复辟却在农民那里取得支持。

但是尽管这个差别十分重要,用它来解释俄国和德国革命发展的相反过程仍然是不够的。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德国,农民的行为影响革命进程的程度毕竟不可能和农业的俄国相同。这两次革命进程的差别其实也应该首先从一个事实来理解:俄国革命是在战争时期爆发和扩大的,而德国革命却发生在战后。

1848年后,欧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革命不是作为战争的后果而取得胜利的;而且人民革命总是在那些战败国而不是在战胜国内取得胜利。1870年至1871年,法国受到了革命冲击,德国没有;1905年至1906年,俄国受到了革命冲击,日本没有;1917年和1918年,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受到了革命冲击,法国和英国没有。1848年以后,总是当战场上的失败使军纪松懈、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的暴力机构瓦解时,人民革命才能发生和取胜。

在世界大战中,首先是奥匈帝国的军队由于老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矛盾而被分裂、削弱和击溃。但是德意志帝国的军团一再对被打败的哈布斯堡军队施以援手并重新夺回他们的失地,德意志国家的这种支援一再成为他们稳固的后盾。沙皇军队在战争中的形势更加不妙。他们软弱的原因在于俄国经济的落后。俄国的工业无法应付现代技术战争的巨大需求。俄国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在一切领域都随着资本主义大工厂的发展而发展的组织技能在俄国太落后了,它无法完成现代战争经济和现代军队后勤的组织任务。学校教育的普及化和民主才使各国人民的心中充满了民族意识;由不识字的俄国农民组成的大部分俄国士兵比西欧和中欧的人民群众更加不易受战争民族主义的思想 and 感情的影响。所以沙皇的军队在1915年遭到了

沉重的失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直到战争结束还继续留在敌国，俄国的军队却在1915年就不得不撤出沙俄帝国的整个西部地区；1916年，他们试图重新占领西部地区的努力落空了。尽管德国军队面临困难和窘境，但一直到1918年8月他们还把自己当作胜利者；自从俄国在1915年遭到失败后，俄国军队就失去了对领导者和进行战争的政府的信任。

1917年的二月革命并不是一个政党的行动，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自发而强有力的反对食品供应不足的游行示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参加后发展成了革命。俄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就已经站在了革命群众的一边，这是俄国战败带来的影响；德国军队直到战争结束仍然牢牢掌握在他们的领导人手里，这是德国胜利的结果。所以俄国革命在战争中间爆发，而德国革命到战争结束时才爆发。但两次革命的整个过程正是由此决定的。

革命爆发后，俄国资产阶级还想站在法国和英国的一边，继续推进战争“直至结束”，直至胜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敢和中欧两强国单独缔结和约；他们害怕俄国退出战争可能会使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主义有机会打败法国和英国，取得对欧洲的统治权。但是俄国人民群众想要和平，——立即能实现的和平，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和平。这促使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向布尔什维克靠拢。

连续几个月来，经济继续遭到破坏，食品供应的困难增加，物价上涨。人民群众愈来愈相信：只要战争还在持续，就无法摆脱日益加剧的困境！工人、职员、小市民、农民——所有的人都强烈呼吁和平，不要别的，只要和平。士兵首先要求和平：后方的守备部队士兵不愿意再上前线，前线的士兵不愿意再战斗。“任何一个苏维埃和部门的会议，任何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以这样的场面开始：要求立即实现和平的前线代表团列队通过；大声朗读来自战壕的士兵们的要求；四处传看那些震撼人心的前线生活的照片，内心痛苦不堪的人们的照片；会场走廊

里人们高声请求和恫吓:还我们和平! 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们和平,那么我们自己来争取!”后方守备部队的士兵发誓:“宁可在这里的街垒中死去,也不要上前线。”前线的士兵要求:“只求结束战争! 其他都是多余的! 政党、政治、革命,——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我们支持任何一个指明和平出路的人。”<sup>①</sup>

人民群众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要求和平的强有力的运动导致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上台。因此布尔什维主义能够如此迅速地走出七月暴动失败的阴影;继续进行战争,经济的持续恶化,人民群众日益加剧的对战争的反抗,这一切月复一月地促使新的追随者向布尔什维主义靠拢。因而布尔什维主义能在8月和9月赢得绝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同时能在士兵中迅速扩大影响。军队不愿再为继续进行战争的政府作战。当彼得格勒的工人为夺取政权而在10月份占领了这个城市时,多数军团宣布“中立”。在政府能够集合起来保卫冬宫的少数军队里,大部分人在第一枪打响前就已经离开了。而要将政府成员逮捕并拘禁,几乎不需要“阿芙乐尔”巡洋舰的开炮。当克伦斯基把军队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时,只要派几个宣传员到军队里,就足以说服他们赞同推翻克伦斯基并参加革命……

正像十月革命只有在战争过程中才有机会获胜一样,要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也只能通过战争的继续进行来实现。俄德战争中俄国的失败成全了二月革命,俄国继续进行毫无希望的反德战争导致了十月革命,而德国在对抗西方强国战争中的失败又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从最危险的干涉,从邻近的,即留在俄国领土上的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干涉中拯救出来,从而保证了它的稳定。

当革命在德国爆发时,战争结束了。德国军队在1918年的圣诞节前就被遣散;这里从一开始就缺少一支在战场上被击溃的,却受到革命动员的军队的革命爆发力,正是这种革命爆发力曾在俄国革命的过程

---

<sup>①</sup> 苏哈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莫斯科1923年俄文版,第39、69、70页。

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俄国,对战争的厌倦和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的愿望把群众推向无产阶级革命;在战后才爆发革命的德国,群众对战争的厌倦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人们已经经历并承受了四年难以形容的痛苦,现在渴求安宁。继续进行革命就意味着发动内战并且导致战胜国的干涉。这意味着刚在黑白红三色旗下失败的战争又在红旗下重新开始。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认为,当人们想让协约国的军队去德国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时,军队会发生暴动,——谁能预见这些呢?群众太累了,他们在四年战争后渴求安宁,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继续流血的极度厌恶,因此不敢去冒这个大险了。正像对战争的厌倦在德国产生了与俄国相反的结果一样,食品匮乏也在德国产生了与俄国相反的结果。在俄国,饥饿促使人们向布尔什维克靠拢;他们希望战争结束能立即解决食品匮乏问题。在德国,食品匮乏加强了人民群众对安宁的渴望。在这个四年前就遭到封锁、来自国外的食物供应被切断的国家,食品匮乏很明显只能通过缔结和平条约和解除封锁得到解决;饥肠辘辘的人们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和平,他们害怕关于第二次革命、内战、最后甚至会是反对战胜国的革命战争的想法,因为内战和革命战争会阻碍和推迟和平条约的缔结以及由此带来的封锁的解除。在俄国,经济随着战争的进行继续遭到破坏并起革命化作用;而在德国,战后几个月内就开始了经济重建。被遣散的士兵和从战争工业中出来的人们再次找到了工作。他们把精力都集中到工厂中的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和为改善工作条件所作的努力上。所以群众的情绪甚至在十一月革命高潮之后就很快出现了低潮。号召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民主的共产主义骨干只能吸引德国工人阶级的极少数人。

革命的过程总是取决于它是不得不在战争中发展起来还是能在和平中向外发展。法国大革命,正如恩格斯所写的那样,“反对同盟的战争对它有重大影响,革命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由这种战争决定。同盟军队入侵法国,这就引起迷走神经占优势,心脏就跳得比较剧烈,革命危机就临近。同盟军队撤退,交感神经就占优势,心脏就跳得比较缓

慢,反动分子又占上风,平民们(未来无产阶级的先驱,只有他们的毅力才拯救了革命)则受到了训诫和压制。”<sup>①</sup> 1848年的法国革命缺少决定法国大革命过程的那种革命战争的动力。马克思关于1848年的法国共和国写道:“共和国面前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起活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sup>②</sup> 1792年至1793年的法国革命与1848年法国革命过程的不同可以解释为:1848年的革命缺少像1792年至1793年革命那样能使革命突破一切资产阶级怯懦的框框的强大动力。这一马克思在1850年就已经达到的认识给出了理解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8年德国革命的相反过程的答案。

马克思密切联系这一点而写道:“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sup>③</sup> 这一认识也向我们给出了理解最近两次大革命不同之处的答案。在战争时期发生革命的俄国,经济的进一步破坏与革命同时进行,而经济的破坏又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在战后爆发革命的德国,很快就开始了经济重建,工业的繁荣不久就平息了革命的浪潮。

如果比较一下1918年至1919年的奥地利革命和匈牙利革命,我们将会证实革命过程对战争的依赖性。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倒台而丧失了对武装力量的支配权。这两个国家的士兵都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命令。但是这两次革命的发展过程完全不同。人们肯定不能这么来解释它们发展过程的差别,即1919年与共产党人联合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要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来得更加革命,并吸收了一批更加革命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3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592、593页。

骨干。

当从老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主义革命中产生的民族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战后夺取历史上属于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时，倒台的匈牙利各个统治阶级主要关心的是：封建领主想在受到威胁的地区挽救他们的大庄园；中上阶层想要挽救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官职和权力地位；资产阶级想要挽救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市场和进行剥削的地盘。对这些统治阶级来说最首要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向那些威胁匈牙利领土主权的、在奥匈帝国分裂后成立的国家开战。但是统治阶级不再能领导这场战争了。战争只能由革命士兵，因此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所以在国家最糟糕的窘迫时刻，在战胜国要求匈牙利撤出有争议的地区并把它转交给新的民族国家时，统治阶级的执政集团亲自把政权交给了无产阶级，让它来领导反对民族国家的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才联合匈牙利共产党，共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与各个民族国家作战。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次尝试，它想使匈牙利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输掉的战争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但这次尝试在几个月内由于战胜国的军事优势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奥地利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迎来了战争的结束。四年战争后，国内没有食品，也没有煤。食品和原材料的匮乏比匈牙利要糟糕得多。战胜国在停战协议中也保留了对奥地利的封锁；奥地利只能通过它们得到食品和煤。当捷克斯洛伐克在边境拦截了几辆本该开往维也纳的运煤火车时，维也纳的电厂和有轨电车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停工了。当南斯拉夫拦截了从的里雅斯特开往奥地利的食品运输车时，奥地利的食品供应站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无法发放城市居民赖以勉强维持生活的面粉和板油。任何一个奥地利人都明白：当我们反抗战胜国时，它们甚至不需要派一个营来对付我们；他们只要切断我们的煤和食品供应，就能在 14 天内迫使我们投降。在这种情形下，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利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矛盾的克恩腾州除外，——不敢

保卫那些被邻近的民族国家占领的地区，不敢采取武装抵抗来反对它们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不敢反对战胜国公开宣告的禁止革命冲破民主制限制的异议。在匈牙利，抵抗国家敌人的尝试促成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奥地利，对国家敌人的极度软弱无能和对他们的依赖使革命保持在民主的范围内。

以农业为主的匈牙利对来自外国的食品供给的依赖程度与以工业为主的奥地利不一样，因而对战胜国的依赖程度也不像奥地利那么深，这决不是一种偶然，——正如下面的事实也不是偶然一样：资本主义落后、以农业为主的俄国要比工业德国更早屈服于战争，更早进入革命，因此在战争中爆发和发展的俄国革命与直到战后才爆发、不是由战争本身推动的德国革命比起来，它的继续向前冲击的能力要大得多。“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的早一些”，<sup>①</sup> 马克思已经作出了预言。

一切根据从事行动的领导人 and 政党的素质，从他们的错误、过失和幻想，从是否存在受过革命训练、有觉悟的社会主义骨干这些方面来解释 1917 年和 1918 年这两次革命过程的差别的尝试，都只是停留在表面。它们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 和 19 世纪的革命经验中得出的宝贵认识。下面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并且为资产阶级民主而进行的数十年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数十年的改革实践使得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他们的头脑，在革命的时刻它只能尝试去完成那些他们在战前几十年和平的发展中已经争夺到的东西，即民主和社会保护立法。但是如果在革命过程中，中欧的无产阶级群众通过事件本身，通过持续的战争和经济的不断毁坏，通过士兵革命和农民起义，像在俄国那样经受革命化的话，那么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就会像孟什维克被布尔什维克压倒一样，或者被斯巴达克派或者被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压倒，要不就是，它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 1 版，第 114 页。

们一定会像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 1919 年 3 月那样使自己去适应群众的革命情绪。中欧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继续掌握对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并把革命保持在民主制的范围内，而因为这种民主制不能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它还是会再次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并替反革命做好准备，这些情况并不能归咎于中欧缺少有能力并愿意带领群众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发起攻击的革命骨干，而是应当归咎于事件本身和社会条件；中欧革命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社会事情使群众的革命行动停留在那同一个范围内，也就是几十年改革实践的习惯使社会民主党的想法和目标设定保持在其中的那个范围之内。

列宁曾经说过，“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这个事实使我们有可能超越其他国家”。托洛茨基也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俄国这么晚才完成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就迫使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sup>①</sup>实际上，沙皇俄国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导致了俄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惨重失败；失败使革命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兴起，并在战争的向前推动的力量下发展。俄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实际上不仅保持了俄国社会内的革命氛围（这种革命氛围使二月革命的胜利在战争时期来得更加容易，并从而使革命处于战争的压力之下），还产生了这样的后果：二月革命激起了农民的暴动，这一暴动使军队革命化，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士兵和农民中奠定了广大的群众基础。人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俄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使那里的社会主义不会发展成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在中欧和西欧，这种发展趋势已经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得到了贯彻），并且强有力地 and 生机勃勃地保持了那种作为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时期的特征的革命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 1917 年做到了带领革命群众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人们由此认识到，以下情况也分别地参与决定俄国革

---

<sup>①</sup>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历史。十月革命》，1933 年柏林德文版，第Ⅸ页。



命的过程:它在那里恰好由于沙皇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落后而遇到了一批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更坚定、更适合领导群众的、自觉的、受过教育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骨干,但是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早就过去了,社会主义已有 40 多年不再能够开展革命斗争了。不过,这批革命骨干毕竟只有在以下的条件下才能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更加发达的国家相比,那里的促使革命发展的社会条件本身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群众投入运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把群众向前推进,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群众追随革命骨干并接受他们的领导的。

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本身就是产生于世界大战的几次革命的相反的发展过程的一个结果,它导致人们把这些革命的相反的发展过程的原因归结为从事行动的政党的功劳与过失。这种对革命过程和结果的解释成了无产阶级内部分裂与不和的持续不断的源头。因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来,即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来解释,而不是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来解释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是从内部,从思想上克服无产阶级分裂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一回归并不排除它其实是要求这两个由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产生的大党能以严格的自我批判来克服那些不恰当的判断、错误和幻想,而这些不恰当的判断、错误和幻想到处都是从革命的相反的发展过程,从革命结果的差别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主义的分裂发展而来的。当我们现在转向研究战后社会主义的分裂历史时,我们将会通过历史本身来了解这些不恰当的判断、幻想和错误以及如何克服它们。

### 社会主义的分裂

由世界大战引发的这些革命恰好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而把它推上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巅峰,使它恰恰能比资本主义更加发达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更早夺取政权,开

始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却反对这种认识。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难道没有说过：“工业发达国家给工业不发达国家指出了它们未来的形势”？难道马克思没有说明，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向公有制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当“资本垄断开始束缚随着它而繁荣发展的生产方式时”，这个前提条件才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熟，社会革命才有可能发生？那么人们能够相信现在社会革命恰恰能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要比西欧、中欧和美国落后得多的国家开始发生吗？工业不发达国家能为工业发达的国家指出它们未来的形势吗？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因此认为试图在落后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一个乌托邦主义的冒险。它认为这一尝试不久就会失败。它认为，与1792年巴黎“早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短暂阶段相似，无产阶级专政顶多只能成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短暂阶段。当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于1921年在农民反抗和城市饥荒前退缩，不得不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并允许国际资本在苏联发展工业时，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现在俄国发生了向资本主义的退化，几年之内将会证明布尔什维克专政只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个暂时阶段。所有这些观点在今天都被历史本身推翻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正在苏联发展起来，它的生产和劳动生产力以闻所未闻的发展速度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活力超出了最大胆的期望。只有那些不能从新的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中学习的人，才会在今天还牢牢抓住那些在1917年到1921年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错误判断不放。

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1918年到1920年间还认为，世界大战、1917年和1918年革命给了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为社会主义开拓了道路。但是它认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专政来强制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不可能的。它认为这种取消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民的民主自决的专政虽然在落后的、从来不知道自由和民主机构的俄国是可行的，但是几十年来一直享受着个人自由权利、能够借助民主

的选举权决定自己事务的各国人民是无法忍受专政的。它相信，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在人民中占的比例要比俄国大得多，这一无产阶级几十年来受到社会教育和文化教育并且已经成熟，在这些国家，为了在民主的基础上用民主的斗争手段逐步扩大无产阶级在民主国家内的权力，从而把社会有机体本身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有机体，他们能够而且必须利用民主机构。马克思难道没有在他的重要著作的序言中说过，“现在的社会不是稳定的晶体了，而是可转变的、一直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有机体”？难道人数众多、几十年来由社会民主党的教育而获得阶级觉悟和对自已的社会主义使命的认识的无产阶级不能并且一定不会利用民主机构逐渐把当今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吗？今天，历史同样推翻了这个错误。由中欧无产阶级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存在的意识形态，几年之内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最终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今天，希特勒德国给全世界上演了一出可怕的戏：一个几十年来一直享受着自由权利、行使着民主选举权的民族，一个有着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主义群众组织的国家，一个工人群众享受着最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国家，在怎样忍受一种专政。

但是当布尔什维克接受权力时，他们也深信，如果短期内社会主义革命无法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胜利，他们就没有能力保持权力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当然他们期望战争能在各处引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革命在战败的俄国取得了胜利，所以他们相信革命也会在战胜国取胜。因为战争把俄国革命推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相信无产阶级也能在那些战后才爆发革命的国家，甚至在那些在战后没有爆发革命的战胜国建立专政。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专政时期，布尔什维克抱着热情洋溢的希望。1919年5月1日，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宣言中，季诺维也夫宣告：“不出一年，整个欧洲都将属于苏维埃。”要断定历史是多么惊人地推翻了这种空想，已是多此一举了。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发展的几个月内就战胜了民主社会主

义的党，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旦他们赢得了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就能夺取国家政权。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必须在一切国家用共产党来对抗社会民主党，战胜社会民主党，为共产党赢得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就能在各地获得专政权力。因此他们到处使想要效仿俄国革命这一伟大榜样的社会主义者，对为民主制展开的斗争结果感到失望的工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在所有的国家引起分裂，在所有的国家挑起激烈的同室操戈。但是这种像在俄国推翻孟什维克一样在西欧和中欧推翻社会民主党的妄想，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幻想。共产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以脱离工人群众的小宗派形式存在。在少数他们有可能聚集并掌握较多的群众的中欧和西欧国家，他们成了与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无产阶级反对党，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愿意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展开一次严肃的大有希望的斗争。在那些缺少曾使俄国得以实行专政的那种历史前提条件的地方，建立共产党既不能创造这种前提条件，也无法替代它。

其实在战后最初几年，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尽管他们走的道路完全不同——就犯了同一个错误；两者根据对战争所引起的社会大动荡的印象，都低估了资本主义的抵抗力量。社会民主党人相信用民主的和平手段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却向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他们是多么懂得将民主转变为他们的统治工具的，而一旦这种统治工具不再让他们满意，他们就能最终消灭民主本身。共产党人相信自己能够在各地利用由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动荡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除俄国外，资本主义在各国都强大到足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当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还在为战后几年的危机是能够 and 应该使用民主的手段还是革命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争论不休时，资本的胜利反攻已经开始了。

1919年1月和3月，德国共产党起义以惨重的失败告终。5月，慕尼黑苏维埃专政瓦解。6月，匈牙利苏维埃专政瓦解。但是工人阶级还没有感到自己被打败了。1920年，即从经济恢复转向第一次战后危

机的这一年，出现了一系列无产阶级起义；它们都以重大的失败告终。3月，德国工人总罢工挽救了受到反革命卡普暴乱威胁的共和国；但是在矿工试图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鲁尔，他们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在巴伐利亚，反革命专政在卡普暴乱时期得到了巩固。5月，法国工人集体罢工以失败告终。8月，红军试图经过波兰架起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之间的桥梁，却在华沙的城下失败。9月，50万意大利工人占领了工厂，其中大部分都是武装工人。但是在意大利军队已经与法西斯主义密切勾结、他们的兵工厂已经为法西斯军队提供武器的时期，在农业劳动者激烈的工会斗争不仅已经促使大部分的大地主而且也促使大部分中小农场主转向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时期，在足足有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工人既不受社会主义也不受共产主义的领导，而是受天主教会领导的时期，在乔利蒂的自由主义政府回避任何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工人的挑衅、不使用它的武装力量来反对他们、并且向工人许诺作出重大让步作为他们撤出工厂的代价的时期，工人方面不敢从占领的工厂进攻国家武装力量，不敢把占领工厂运动发展成围绕国家政权本身的斗争，所以占领工厂运动必然在几个星期后中断，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群众罢工毫无结果地失败了。1921年，工人阶级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展开的工资斗争遭到了沉重的失败，开除不列颠罢工矿工事件是其中最大的一次。德国，共产党的三月暴动失败。苏维埃政府在喀琅施塔得起义之后，用新经济政策（NEP）实行退却，再次在俄国经济中给资本主义让出一席之地。1922年，从不幸的占领工厂运动以来突然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已经在意大利取得了政权。与此同时，货币的急速贬值使陷入绝望的奥地利人民投入国际金融势力控制的怀抱；一方面由于国际金融寡头的控制，另一方面又由于工人阶级在这时开始的稳定危机中遭到削弱，奥地利共和国也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在这些年里，工人阶级一次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他们已经被迫处于守势，无产阶级政党却仍旧像在1918年或1919年那样，继续为此

争论：无产阶级能够和应该用民主的斗争手段还是反对民主的革命手段来夺取政权，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1920年的6月和8月（这一年工人阶级已经遭受了一系列沉重的灾难性失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中派主义”为需要战胜的主要敌人，并且以此着手分裂那些也试图加入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它规定了后果严重的“加入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这些条件是分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雷，1920年10月）和法国社会党（图尔，1920年12月）的手段。德国独立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试图在右派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1921年，它们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领导下联合组成“维也纳协作组”，即“第二半国际”，并在下一年邀请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到柏林举行联席会议；但是这次尝试由于布尔什维克幻想他们只有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斗争中才能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失败了。当然，1922年在无产阶级遭到失败后曾有一小段时间出现过一种假象：似乎莫斯科自身想让在革命进攻时期被摧毁的无产阶级力量再次团结起来进行共同防御；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12月）提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统一战线”的政策很快就只成了号召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党的工具，成了企图分裂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实现统一的工具。这是因为，尽管无产阶级遭遇了失败，但是由战争开始的革命过程仍旧没有结束。在共产主义寄托下一步和最大希望的德国，仍旧面临一场严重的革命危机。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决定性危机中，共产主义还在为争取群众的领导权而斗争。

危机在鲁尔战争后伴随着德国货币的完全贬值来临了。饥饿、绝望和惊恐似乎使德国进入了革命的状态。实际的情况如何呢？巴伐利亚的反革命专政作为与德国政府对立的政府出现。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接受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并宣布不服从德国政府。依靠反革命力量支持的资本主义大企业没有被吓倒，竟在危机时期要求并实行了突破八小时工作日。德国政府不敢与反革命的巴伐利亚反对党斗争。它把整

个国家的行政权委托给国防军，而国防军刚刚合并了种族—法西斯主义的自卫队即“黑色国防军”。它违法取缔了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工人政府。主动权完全落在了反革命手中而不是无产阶级手里。当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工人政府被推翻时，由于工资每个小时都在贬值而陷于绝望、只是为争取每天的面包发愁的、精疲力竭的、气馁的工人阶级没有采取任何反抗。当汉堡几百个共产党人涌向警察局时，工人们无动于衷。危机以德国无产阶级的完全失败告终。

这样，世界大战所引起的严重的社会动荡暂且告一段落。它没有像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向民主的形式注入社会主义的内容。同样没有像共产党人所认为的那样，允许无产阶级在各地争得革命专政。随着鲁尔战争的结束，马克的稳定，道威斯计划的执行和大量美国资本向德国的注入以及经济繁荣的开始，一个崭新的时期拉开了帷幕。共产国际本身就确认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

这一繁荣再次使工人阶级极有可能为提高工资、扩大社会立法和社会管理而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但是，一旦经济繁荣再次为改良主义实践提供有利的时机，社会民主党就再次得到增强，但是他们的改良主义幻想也加强了。虽然人们知道，繁荣之后危机会再次到来，但是人们根据类推法设想这些危机会像战前危机一样是相对轻微和短暂的；我们之中没有人预料到1929年会出现那次如此普遍、沉重和后果严重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因此社会民主党认为民主制度得到了巩固。所以它为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渐进、和平的发展做好了准备。

共产党人也不得不确认，无产阶级直接为政权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从工人阶级的失败中能吸取什么教训呢？“革命胜利的客观前提条件已经存在。只是缺少一个主观因素，缺少一个坚定的、做好斗争准备并且有觉悟的工人政党”。换句话说：缺少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相信用这些可以解释无产阶级的失败。共产党人甚至在俄国也是遇到了一种允许无产阶级建立专政的情

况，——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向前推动着工人群众，工人阶级能够得到农民暴动的支持，军队拒绝给予统治阶级任何援助。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 1919 年 1 月在德国就已经存在，甚至在 1921 年 3 月或 1923 年还存在，或者认为这一前提条件在意大利 1920 年工厂占领时期就已完全像 1917 年 10 月在俄国那样存在或哪怕仅仅与之相似，这些都是自欺欺人！不从决定群众思想状态和行为的革命的社会发展条件，而从缺少“真正的共产党”来解释大的革命群众过程的结果，这是自欺欺人！共产党人从错误的解释中得出结论：现在要做的只是进行不可调和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赢得群众的斗争，这样，群众在以后的革命时期内就能处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了。但是他们同时也已得出结论：他们必须使西欧和中欧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他们从莫斯科下令撤换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班子，给从美国到中国的不同国家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规则，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瓦解、分裂、削弱，把它们已经赢得的大部分群众推向社会民主党，让大多数共产党遭受无能的宗派的命运。他们固然比社会民主党更加正确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 年 7 月至 9 月）还在繁荣时期的中期就准确地预言，“资本主义稳定所包含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极度尖锐化”；但是他们没有预见，危机没有首先引起无产阶级新的革命进攻，反而招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进攻。他们并没有把法西斯主义、而是把资产阶级民主视为工人阶级在新的革命时期将必须战胜的敌人，把社会民主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视为在新的危机将要引起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障碍。

所以在新的时期，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是现在斗争的性质改变了。由于革命的形势暂时已经过去，所以这个原来引起工人阶级分裂的有争议的问题，即工人阶级能用哪种手段夺取政权，就失去了它直接的紧迫性。与此相比，繁荣为争取更高工资、更好的劳动条件、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改革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共产党人把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转移到了改良主义工人政



党的这一最具有它们本身特点的领域。在每一次工资斗争和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中，他们都试图超越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他们试图利用每次机会挑起罢工和街上的流血冲突，而不去权衡成功的希望。每次斗争结束时，不管斗争成就多大，他们总是指责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从他们的表现来看，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进行的经济和文化斗争就像不是由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当时的情况决定，也不是由资本和劳动的力量对比决定，而仅仅是由工会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意志和勇气来决定的。他们指责社会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不再是因为它不敢革命，而是因为它在自己特有的领域，在它取得最大成功的领域，在改良主义斗争的领域每天都在背叛工人。共产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在战后革命时期曾是围绕利用革命形势的方法和目标而进行的严肃的斗争，现在却成了以一切蛊惑人心的手段进行的竞争斗争。但是文化水平最高、判断能力最高而由此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阶层却厌恶这些愚蠢的煽动；它把共产党的影响缩小到最贫困的、根据绝望的情绪行事的无产者阶层之中。不权衡胜利的希望就把工人阶级卷入斗争或者让工人阶级坚持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斗争，这些尝试导致了令人失望的失败：已经相信共产主义的工人阶层再次脱离了它，共产党对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的影响削弱了。

共产党人认为在工业繁荣的时期，仅仅通过蛊惑民心的宣传（这种宣传试图利用陷入极度贫困的无产阶层在冷静评价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对比，理性考虑斗争条件和成功的可能性方面的无能），通过只会导致惨痛失败的“革命体操”策略，就能够赢得工人群众，但这种信念是一种幻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两大工人政党间的竞争斗争中往往失去宝贵的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一方面，它失去了热情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充满了社会主义理想，不愿满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仅仅从事改良主义工作；这些是受到俄国革命变革的榜样吸引的真正的革命者。另一方面，它失去了最贫穷的工人阶层，他们很少能够理智地冷静地权衡斗争条件和成功的可能性，却充满了最强烈的革命情绪，他们一直是工人

运动中向前推进的革命分子。社会民主党因此愈来愈向右发展，——比战前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曾经承认的还要更加右倾得多。

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斗争毁掉了阶级团结的感情。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一起反对共产党的冲击，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它为了在议会的交易中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改良而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合作。社会民主党觉得自己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比与共产党的阶级同志更加贴近。在那些它与资产阶级政党长期共同执政的地区或依靠资产阶级政党的选票而建立起少数派政府的地区，它被迫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工具来镇压共产主义的无产者；在那些地区，它的领导层在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面也接近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风气和陋习。因此，尽管在不同的国家程度不同，但社会民主党愈来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支持者，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个“（拥护）制度的政党”，——当随着工业繁荣的结束，通过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权力地位为工人阶级赢得积极成功的可能性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当法西斯主义开始利用那些在危机中陷入极度贫穷的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时候，上述这种发展的后果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了。

共产党人在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援引俄国苏维埃的榜样作证。他们闭口不谈 1917 年在俄国使无产阶级能够取得专政的特殊混乱的局面，——他们表现得就像，只要无产阶级信任他们的领导，它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间取得专政。他们闭口不谈苏联内部变革过程中需要付出的巨大牺牲，——即使在苏联不得不经历极度贫困的那一时期，他们也把苏维埃俄国说成是“工人的天堂”。他们没有把唯一能在俄国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伟大转变过程的恐怖专政看作是为争取一个实现最完美的自由和人性的社会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没有把对个人自由、对个人的精神自由和对全体人民自主的压制看作是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一种沉重的、但是暂时不可

避免的牺牲,而这是为了获得最完美的个人自由精神和全体人民真正的自主的,他们却诉诸群众的憎恨、暴力和仇恨本能,大肆赞扬专政和恐怖,大肆赞扬对个人自由和集体自主的压制,就像它们不是社会革命暂时的不可避免的手段,不是必须为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一样。当面对法西斯反革命而捍卫自由已经变得很有必要时,他们还讥讽信奉自由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但恰恰因为共产党人每天都在援引苏维埃俄国为证,才把社会民主党置于苏维埃俄国的对立面上。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对俄国伟大的社会革命采取一种完全不理解的态度。因为共产党人把苏维埃俄国称为“工人的天堂”,所以很多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应该只向群众描述恐怖统治的残酷,描述俄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即使在苏联已经度过最艰苦的贫困时期并开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对在苏联发生的世界性历史事件持不理解和敌视的态度。他们自社会民主党成立起就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视为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讨厌这个已经真正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国家。他们几十年来都在从理论上讲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但是当苏维埃俄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能力开始在实践中证明这一优越性时,他们却不去用这些给人深刻印象的历史事实向人民群众指出这种优越性。因为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走上了一条与他们期望和愿望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他们反对这一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开始实现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就完全黯然失色了。

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力就这样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方面,人民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虽然它已经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一个“制度政党”,它的活动仅限于为工资和社会养老金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它认为共产党人的名誉已经败坏;共产党人利用绝望的群众没有判断能力而进行煽动,采取了肆无忌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政变策略,却没有权衡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因而导致了无产者阶层的失

败和巨大的不幸。所以当1929年危机爆发,人们陷入贫困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未能利用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却被法西斯主义钻了空子。

作为危机的后果,当德国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威胁到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民主的合法性。它支持布吕宁政府(它的通货紧缩政策把民众推向民族法西斯主义那一边)的专制。希望布吕宁能阻断民族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它所经历的却是,正是支撑布吕宁政府的那同一个阶级,一夜之间就把政权转交给了希特勒。它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曾给它带来沉重牺牲的普鲁士联合政府身上,希望受它支配的普鲁士保安警察会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捍卫民主;所经历的却是“一个少尉带十个兵”就足以把这一联合政府从这个臆想的权力地位上赶下台。

而共产党人的表现却像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在法西斯主义直接威胁到民主时,他们仍旧把民主视为他们要打倒的敌人,仍旧把社会民主党看作“主要敌人”,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要消灭民主,工人阶级面临被镇压的命运时,他们当时还没有发现法国共产党今天在法国运用的,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联合组成反法西斯主义同盟——“人民战线”,从而强有力地阻止法西斯主义的策略。他们还不准备支持一个为了能阻挡法西斯主义道路而建立的民主政府。在国会中,右边有一个巨大的民族—法西斯阵营,左边有一个巨大的共产党人阵营,这两者都拒绝支持任何一个议会制民主政府,所以一切议会制民主政府在德国都是不可能成立的,立法机构没有执行能力,所有权力都落到了行政机构手里,发展趋势必然会让权力从布吕宁经过巴本和史莱彻尔而转向希特勒。

但是当希特勒上台时,两大工人政党同时丧失了斗争能力。两者都屈服于反革命,甚至不敢尝试反抗。德国的共产党的革命者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一样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丧失了反抗能力和斗争能力。法西斯反革命恐怖使两者遭受同一命运。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

党人之间长达 15 年之久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只剩下共产党的工人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之间的互相憎恶；这种互相憎恶即使在集中营里，在虐待双方的纳粹冲锋队的鞭子面前仍旧可耻地继续存在。

我们对战后时期两大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批判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呢？我们承认，我们也要分担这里确认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只有那种把从极大范围的历史经验中学不到任何东西当作正派行为的人，才害怕这种后悔。我们只希望，从另一方面，即从共产党方面来讲，也不缺少坦率承认和批判自身过去所犯的错误判断和失误的勇气。因为在今天，克服这些失误在双方都已经成为一种可行和必要的任务。德国工人阶级在战前是所有国家的工人的学习榜样；战后也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和最大的共产党，德国工人阶级被镇压给国际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使它陷入严重的危机。在长达 15 年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僵化和教条化的观点在这两个党中都已开始动摇了。为了让社会主义在痛苦的分裂时期以后重新统一和走上新的道路，双方克服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德国的两大工人政党不经过斗争就屈服于民族法西斯主义；德国工人甚至在没有一个工厂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放弃了自己的大工会；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在没有射出一发子弹的情况下就都被摧毁了。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现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反动派都在想：“无须害怕！再也没有人愿意为社会主义献出生命了！人们可以击垮社会主义政党，却不会有工人起来保卫它们！”当时最右倾、最拥护和平主义的、最赞成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也认为：“如果法西斯主义能够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消灭社会主义政党，工人阶级哪怕斗争条件多么糟糕却不起来保卫它们，社会主义就是在全世界失败了。”当时主张和平行动的英国工会成员，最右倾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改良主义者认为：“宁可敢于在如此不利的斗争条件下进行绝望的斗争，也胜过毫无抵抗地屈服于暴力！”

本着这一信念,奥地利工人行动起来了。当多尔富斯政府开始打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时,1934年2月12日,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和领导的保卫同盟举行起义,进行了一次英勇的绝望之战。

奥地利的保卫同盟被打败了。当时许多人认为奥地利的工人阶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斗争开展得太晚了。实际上在1933年3月,当多尔富斯关闭议会、建立起他的政府专制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就被吓倒了。它相信多尔富斯的诺言,即他愿意在几周后恢复符合宪法的状态。它不相信,仅仅关闭在经济危机时期就已丧失众党的议会就足以促使群众起来革命。它害怕无产阶级的起义会促使执政的教会法西斯主义者和在野的民族法西斯主义者联合(这两者在当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不可调和地互相敌视),会把德国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引入奥地利政府,从而使奥地利屈服于希特勒德国。所以多尔富斯赢得了时间,可以稳定他的政府专制制度,加强他的暴力工具,在11个月的镇压时期内大幅度削弱工人群众的斗争力量。当保卫同盟在1934年2月12日起来反抗时,他们只能在与如果在1933年3月15日起义相比远远不利的条件下展开斗争。这个经验给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得出结论:“不要太晚开展斗争!当必须斗争时,在法西斯主义还能打垮工人阶级前就开始斗争!”

这一教训深深地影响了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西班牙在1931年经历了一场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自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推翻了君主政体;他们没有流血牺牲就能取胜,因为军队的军官听从自由资产阶级支配。但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变得尖锐,两个阶级间的武装决战似乎已经无法避免。西班牙工人阶级受奥地利起义教训的影响,不愿意太晚动手。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矿工起义。然而他们也失败了。工人阶级再次取得经验:如果国家权力的武装力量自身没有在斗争过程中瓦解,没有拒绝服从或不站到起义者这边来的话,他们就无法在反对国家权力的武装斗争中取胜。

在德国,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甚至共产党,尽管他们有一套革命的言语和意识形态,也不敢对民族法西斯主义采取武装抵抗;汹涌澎湃的民族法西斯主义群众的大潮使整个工人阶级丧失了勇气,以致甚至它的最革命的阶层也毫不抵抗地投降了。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工人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英勇反抗。认为社会民主党只会进行改良主义斗争,不会开展革命斗争,唯独共产党有能力领导革命斗争,这种过于简单的公式一方面通过奥地利和西班牙事件,另一方面通过德国的事件被推翻了。这再一次指出,传统、意识形态和言语并不能像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状况那样决定群众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刻的行为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都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当法西斯主义先掌握了国家的暴力工具时,工人阶级就无法抵御法西斯。这个经验给国际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任务:预先防止国家权力为法西斯主义服务。

法国的无产阶级首先面临这个任务。1934年2月6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左翼政府由于法西斯主义者在巴黎街上的骚动而被推翻。2月12日,在奥地利保卫同盟开始起义的同一天,法国工人阶级用一天的总罢工来抗议法西斯主义者的暴力侵袭。法国人民中掀起了激烈的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民主的资产阶级和农民举行示威抗议法西斯主义,联合成立“警戒委员会”,共同对付面临的危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党建立战斗同盟,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两大政党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够回避群众的激烈自发运动。两大法国工人政党建立起“联合行动小组”。它首先组织了大型的对抗法西斯的群众集会,但是它很快就认识到,单靠群众集会不足以阻挡法西斯的道路。它必须完成一个任务,即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扩大为“人民战线”,在选举中组织“人民战线”内的政党和组织的互相支持,使它们以建立一个“人民战线”的政府为目标;这个政府应当解散法西斯主义联盟,解除它们的武装。

在法国事件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修改了它的整个策略。它亲眼见到,德国共产党拒绝给予受到法西斯威胁的民主以任何支持,从而使法西斯更加容易取得胜利,后来自己又毫无抵抗地屈服于胜利的法西斯主义,被它解散和击溃;如果它的支部在其他国家再次重复德国共产党这样后果严重的蠢事,它将无法向群众交待。当问题已只是涉及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时,它还在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斗争;它现在不得不承认,尽管资产阶级民主无疑是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但是无产阶级的生死攸关的利益仍旧要求在法西斯主义这一资产阶级统治最终的、野蛮的、最强劲的形式面前捍卫“民主主义的自由”。它知道,德国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在镇压德国工人阶级之后,已威胁到苏联。苏联在受到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的同时威胁后,开始寻找同盟者一起反对法西斯政权迫在眉睫的进攻;它加入了国际联盟,并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同盟条约;在那些民主国家内,愿意与苏联结盟捍卫和平的民主派是否能维持自己,这些国家是否落入法西斯主义之手,而这种受反社会主义情绪控制的法西斯主义将使希特勒德国可以在东部为所欲为,这些对苏联来说并非无关紧要的。苏联的同盟者是否在西部充分备战,这对受到德国、波兰和日本威胁的苏联来说决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当1935年5月法国总理赖伐尔在莫斯科签署苏法“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向他证明,他“完全理解和赞同法国所推行的,将它的武装力量保持在安全所必需的水平国防政策”。

这样,1935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行了一个彻底的转变。从前共产党人把资产阶级民主制作为敌对的阶级力量的组织来反对,现在代表大会却声明,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后残余”,反对法西斯主义对它的进攻。从前他们把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来反对,现在他们却向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提出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统一战线。从前他们把同资产阶级政党的任何联合行动都作为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背叛”来反对,现在他们却到处要求建立旨



在把民主的资产阶级和农民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人民阵线”，并且声明要支持“人民阵线”的政府。

共产国际就这样同它的整个过去决裂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同时也发生了分裂，以致无法作出决议和采取行动。

法西斯国家内属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各政党中，一种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正在发展起来，这种社会主义要求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阵线，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社会主义民主制道路上的一个必要阶段，它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巨大的社会变革上。在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法国，社会党同共产党结成了联盟，而且双方就“组织上的统一”即两党根据革命纲领的合并进行了谈判。尽管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在法西斯国家和直接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支部中，一种革命的左倾社会主义正在发展起来，但是同时民主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首先是英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却更加右倾了。这些国家几十年来已不再有任何革命动荡；这些国家拥有旧的深入人心的自由主义机构和议会制机构；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在欧洲是最高的，生活水平相对说来也是最高的。因此，不言而喻，这些国家工人群众的思想状况与法国不同，在法国，伟大的革命传统在继续起作用，而法西斯主义已成为远为直接得多的危险，工人的生活水平低得多；这些国家与中欧各国更加不同，在那里，工人阶级经历了战后时期的革命和法西斯的反革命。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 1933 年希特勒得势后也不是没有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式的审慎态度、它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的政策并没有阻止资产阶级政党对共产主义抱极端仇视的态度；不是没有看到，德国资产阶级资助、支持了法西斯反革命取得胜利，镇压和驱散了这样审慎的、这样政治家式的、这样忠实地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民主党。但是 1934 年，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武装起义失败后，各右翼社会党从经验中得出了结论，认为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由于把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搞得过分尖锐，导致用暴力解决，从而使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现在它们认为，它们必须

在民主的法制基础上执行一种明智的审慎的政策,必须指出民主的道路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可行的,并且不必为了防止本国的资产阶级转向法西斯主义而同共产党人联合,从而损害自己的声誉。

这样,社会主义的危机正在公开化:一方面,共产国际不得不同它的整个过去实行决裂,另一方面,联合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的各党正在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的分歧愈来愈尖锐了。

这一社会主义危机不能机械地通过多数决议来解决,因为这些决议会试图迫使有生命力的大党走上它们认为危及生存的道路。这一危机只能通过发展本身来克服。

共产党人在 1917 年到 1923 年的革命时期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同社会民主党的具体政治目标是对立的;他们认为,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动摇通过战争到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政治上的对立。此后在 1923 年到 1933 年这一时期,这种对立的性质起了变化。革命阶段暂时过去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直接的迫切任务了。但是,当社会民主党在这一阶段试图利用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实力地位为工人阶级争取积极成果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的直接任务只是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努力把工人群众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当社会民主党试图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当前的政治事件的时候,共产党人只提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宣传任务:同社会民主党争夺对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1934 年,法国实行统一行动以后,情况就不同了。1935 年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新策略不再把共产党人的任务局限在单纯的宣传上,它向他们提出了各种直接的当前的政治任务;现在他们也想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当前的政治事件直接施加影响,以便阻止法西斯主义在民主制国家中获胜,以便在法西斯主义获胜的地方把它打败,以便防止战争。但是,这些当前的政治任务同样也是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那些任务。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为同样的

当前目标而并肩斗争，那么，两党即使没有就统一行动达成形式上的协议，也会发展成事实上的联盟。

这种实际上联盟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各个国家内部，而且也出现在国际政治方面。在 1933 年以前，苏联一直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系之外。但是，自从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并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同盟条约以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就和西欧的工人政党生活在同一个国际关系的世界之中了。西欧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这两者就在同样的基础上为维护和平这同一的目标而斗争着。即使这两个国际没有通过形式上的统一行动互相结成联盟，但它们对当前的世界政治问题毕竟采取同样的立场；因此，尽管违背它们的愿望，它们终究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了。

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不得不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一再提出同样的当前要求，完成同样的当前任务，为同样的当前目标而斗争，这种情况必定使他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彼此接近，削弱不利于他们联盟的各种障碍。

但是，这种发展由于工人阶级的两大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遇到阻碍和困难。只要这两个政党还为争夺对群众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它们就会一再使它们的原则性思想体系互相对立起来。如果不能在一种更高的统一中扬弃民主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那么，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在这种统一阵线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它的存在始终会受到威胁。

使对立的政治思想体系互相结合起来，那是不够的。问题恐怕也不可能只是在于，从表面上把无产阶级两大政党的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调和一下，使它们达成妥协。时代本身向社会主义提出的任务，不如说是要以新的更高的合题来克服和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命题和共产党的反命题。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为直接的当前任务的斗争中的联盟十分重要，但是，如果不能以一种既把社会民主主义又把共产主义结合在自身中的整体社会主义来克服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片

面性,这种联盟还是保持不住的。如果说历史使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分化,那么今天就是使它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了。必须超脱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僵化观点,发展一种能够克服这两者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而把它们包括在内的整体社会主义。

### 整体社会主义

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破产以来,英国工党、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法国社会党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最强大的政党。英国工党是改良主义的最纯粹的体现。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的首脑。法国社会党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位。

战前法国各工会是在革命工团主义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发展与社会党无关。因此,法国社会党从来没有像英国工党和中欧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成为一个群众组织。同样,它的思想体系和策略从来没有受到那些群众的影响,这些群众加入社会主义运动,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进行争取当前利益的斗争,以便迅速取得成果。它一直是目标明确的社会党人的一个比较狭小的思想一致的团体,它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活动,力图领导工人阶级,但从来未能把工人群众联合在它的各个组织中。正因如此,它从来没有像中欧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同工会联系密切的群众组织那样,或者像以工会为支柱的工党那样彻底地向改良主义屈服。它在第三共和国的民主基础上的战斗传统固然在它内部继续起作用,但是同这些传统相联系的是法兰西民族的伟大革命传统。饶勒斯的改良主义固然在它内部继续起作用,但是盖得和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瓦扬的布朗基主义也在继续起作用。法国的议会民主制的机制一再使改良主义集团离开社会党而向右转,从而加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它的队伍中的优势。一方面,新社会主义者分离出去,另一方面,同共产党人采取联合行动,这就推动了这一发展。在法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中无疑存在着一种观念的强大而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这一观念是超脱于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

对立之上的。

在法西斯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存在着类似性质的发展萌芽。它们的干部来自被战胜和被粉碎了的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但是他们由于这些政党的失败而革命化了，他们在法西斯主义的恐怖下被迫进行革命斗争。在他们那里，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发展阶段上的传统是同新的革命的方法和宗旨联系在一起。

最后，在两个国际之间存在着一些小的集团，其中一部分，如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向左转了，一部分从共产国际中分裂出来向右转了。它们也在为那样一种观念而斗争，这种观念将在自身中克服国际社会主义两大营垒的僵化的教条。

现在的任务是，将这些形形色色的萌芽发展成一种统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这种理论和政策要使由于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而分裂的东西整体化。我把那种要克服世界无产阶级的分裂的统一观念称作整体社会主义的观念。但是，我采用这种说法绝不是想同法西斯时期以前意大利社会主义的那一自称整体派<sup>①</sup>的派别发生什么关系。当代的整体社会主义只能从我们时代的问题中发展起来。

我们一方面看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英国工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利时、荷兰的富有成果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美国工会，澳大利亚各工党——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运动是民主的和改良主义的。我们另一方面看到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进行的目标明确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苏联变成了现实，这种斗争支配着法西斯国家的革命的社会党干部，这种斗争在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中起着作用，这种斗争影响着远东的革命运动。改良主

---

<sup>①</sup> 指 20 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一个派别，其首领是恩利科·费利、奥迪诺·莫尔加利。整体派是当时党内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激烈斗争的产物。这一派主张，观点截然不同的各个派别应当无原则地相互迁就，以保持党的统一。在 1906 年党的代表大会上，这一派取得了胜利。从 1908 年起，其影响开始急剧下降，1912 年以后完全消失。——编者注

义的阶级运动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任何争取发展一种整体的国际社会主义的斗争都必须从这个问题出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他们的认识向工人运动指明，它的目标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他们的学说向社会主义者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是不会因此而一劳永逸地被克服的。不如说必须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反复地重新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也就是使工人阶级运动同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

工人阶级总是并且到处都是首先为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直接的当前利益而斗争。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在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发展阶段上，群众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前者为满足自己直接的当前利益而斗争，对于后者来说，为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当前利益而斗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的一个阶段，是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一种斗争手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职能就是克服这种一再出现的紧张关系，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任务过去和现在都正是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运用民主权利和民主机构，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社会保障、更高的文化。在取得巨大成果的时期，它暂时认为，它能够通过这条道路逐渐“挖空”资本主义，接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它在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中造就了一个领导阶层，这个阶层完全醉心于争取更高的工资、更有效的社会保障的当前任务，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为工人阶级的当前斗争所设置的客观障碍，而且不能想象与它所习惯的、它所熟悉的、它本身已经适应的斗争手段不同的另一种斗争手段。与此相反，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不会通过从一种改良到另一种改良的逐

步改造而被战胜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有通过革命的爆破才能取胜。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表现为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

在法西斯主义得逞，工人阶级的一切合法斗争手段都被剥夺，因而工人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这种对立看来似乎是被克服了，但实际上仍旧以革命宗旨为外表而继续存在。一种人认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只是使工人阶级重新获得为其当前利益而斗争的自由的一种手段，另一种人认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是夺取政权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手段。

的确，甚至在无产阶级已经建立它的专政并且已经对社会制度实行改造的地方，原有的对立仍在发生作用。一些人认为，问题在于要以工人群众尽可能小的牺牲来实现社会改造，从而尽可能快地提高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另一些人认为，问题首先在于尽可能迅速和尽可能彻底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哪怕工人阶级必须为此付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惜；只有当社会变革过程进行得相当深入，足以防止内部的一切反抗和外来的一切侵略的时候，劳动者才应当收获他们的果实。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派别斗争史和苏维埃专政同苏联工人群众的关系变化史，都充满这种在专政之下继续存在紧张关系的事例。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紧张关系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它像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所有的阶级一样不能放弃维护它在这个社会内部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的—一个阶级，它的最终解放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取得。因为工人阶级始终而且必须始终为改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的状况而斗争，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认为，问题不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进行局部的斗争，而在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整个斗争，所以工人运动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就紧张起来。而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能由战斗的工人阶级去战胜，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能由它去夺取和建立，所

以必须不断克服这种紧张关系。

但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工人运动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不可避免的思想体系;在这个阶段上,工人阶级虽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无论如何已足以利用民主机构为提高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的生活水平而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正如整个说来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不断产生并且必然不断得到克服一样,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必然不断产生并且必然不断得到克服。

我们已经看到,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世界危机的后果,使工人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条件发生了差别。有一些国家重新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进行有效的斗争,因而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也保持下来并且加强了,另一些国家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进行有效的斗争,这就迫使工人阶级进行反对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革命。因此,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继续存在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是,联合工人阶级的力量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一必要性、不久以后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将使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世界决战成为直接的历史任务这一可能性,都迫使把工人阶级一切有斗争能力的力量聚集起来并使它们互相联合,而不管它们的斗争条件的这些差别,不管被这种斗争条件所决定的工人运动实践的这些差别,不管由这种实践产生的意识形态的这些差别。

由于世界战争,由于俄国革命和中欧各国的革命背道而驰,工人阶级分裂了,这把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作为对立的两极相互对立起来了。工人阶级经受了分裂的种种致命后果。由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迫切需要消除工人阶级两个阵营的敌对状态。但是,本身应当包括工人运动两大派别的整体社会主义,不能扬弃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工人阶级本身的生存条件所造成的。整体社会主义只能而且必须使革命的社会主义



义同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的关系,使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致成为对立两极的那种关系。今天应当通过改变这两者的关系来完成那一工作,这一工作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理论贡献,并且始终是它的经常的实际任务。

马克思主义在最初时期就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目标明确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同领导工人阶级为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当前利益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应当怎样。《共产党宣言》就这一点写道:“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以这样的方式描述了目标明确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同当时工人政党建立的关系,也就是同英国宪章派、同法国二月革命前夕为民主而斗争的革命集团和革命俱乐部的关系,也就是同那些还没有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首先只是为民主和社会改良而斗争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当然,《共产党宣言》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推荐的策略仅仅在有了虽然还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已能在其内部起作用的工人政党的地方,才是适用的。

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产生的。本世纪初,沙皇俄国还没有工人政党,而且也不可能。布尔什维克党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一个对群众保密的、在反对沙皇政权的斗争中按集中制领导的非法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编者注

政党产生的。今天在各法西斯国家产生的党是与此类似的。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秘密政党。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巨大历史成就诱使人们甚至在各民主国家也建立类似的党,而在那些国家却存在着巨大的合法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因此,共产党人从1918年以来恰恰做了《共产党宣言》反对做的事情:他们成立了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提出了他们想用以塑造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原则。他们以此分裂了工人运动。分裂的致命后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存在着工人阶级合法群众性政党的民主国家中,在也必须同时包括民主国家合法群众性政党的国际中,只有通过回到建党原则即《共产党宣言》上的组织原则,才能够克服这种分裂。这一原则是,革命的社会党人不应当作为特殊政党同工人政党分开,而应当捍卫工人阶级群众性大党内部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应当教育革命的社会党干部坚信:一旦历史的事件使工人阶级群众接受革命思想,推动他们接受革命干部的领导,那么,这些思想就能够掌握工人阶级的群众性大党,这些革命干部就能够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全部群众性大党的领导。

改良主义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不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对工人的奴役”。它是工人阶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策略是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状态;只要这种思想体系由之产生的和这种策略与之相适应的斗争条件本身未被克服,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不能相信自己能够克服群众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破坏群众性政党的改良主义策略。因此,他将认为他在大的工人政党内部的任务,不是成立要夺取这些工人政党的领导或者要分裂这些工人政党的支部,不是反对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为民主制和社会改良而斗争的策略要求,不是诱使工人阶级采取一种导致失败并从而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体操”策略。但是,他“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就是说:他知道,在任何暂时的经济繁荣为工人提供富有成果

的斗争可能性之后,就有一场重新破坏这一斗争成果的危机到来。他知道,正是工人阶级在民主制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驱使资本家阶级跑到法西斯主义一边。他知道,无产阶级在民主制下并通过民主制取得权利之时,正是民主制面临被资本主义反动派炸毁的最大危险之日。他知道,走向一种完善的、不再受资本统治、不再受阶级斗争威胁的民主制的道路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就是说:是通过无产阶级政权的,这种政权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必须是足够强大和持久,足以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转变。他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改良工作,才能够把工人阶级从剥削和失业中,把社会从法西斯的铁蹄下,把民族从异族统治下,把人类从战争中解救出来。因此,他不赞同在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中由于斗争取得成果而产生的种种幻想。尽管如此,他“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就是说:他全力以赴地参与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任何一点微小的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他不要想“提出塑造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原则”。这就是说:他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改良而斗争的策略要求,又不反对这一斗争所要求的策略手段。但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就是说:如果说,他参与改良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斗争,并且使自己适应这一改良主义发展阶段的必要性,那么,他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毕竟已经看到这些政党的局限性,他看到,在一些国家,发展今天已将越出这一阶段,将使斗争条件改变,将不得不同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幻想、斗争方法实行决裂,另一些国家明天也将如此。他克服了空间上的局限性,教导工人运动仍然停留在改良主义发展阶段的那些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去了解法西斯国家的革命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成就。他克服了时间上的局限性,教导其生存条件和斗争条件还使改良主义保持主要地位的那些地方的工人阶级,使它了解明天或者后天的历史事件也将迫使它走上另一条道路即革命斗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用这种方式在改良主义工人政党内部和受改良主义工人政党领导的国际内部捍卫革命思想和教育革命干部,从而克服片面的、狭隘的观点,克服作为不可调和的无法统一的矛盾而非辩证地互相对立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由于工人阶级两个营垒的分裂而发展起来和彼此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把改良主义理解为工人运动同一定的发展阶段的适应,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把改良主义理解为一定发展阶段的结果,所以它认为,改良主义的必要性只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只是一种一时的必要性,一旦这种改良主义与之相适应的发展阶段本身被克服,这种必要性必定要被克服;而且马克思主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甚至在改良主义的发展阶段上就去发展和传播革命思想,就去教育那些将要克服这种必要性的革命干部。在这个观念中,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矛盾,它成为一种整体的、在其本身中克服了对立观点的社会主义,从而成为分裂的工人运动内部的整体化力量。

它必须把为民主而斗争的伟大遗产,把民主社会主义的遗产交给革命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高度评价人权保障、精神自由、集体自决、人性等的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继承文化责任感,来保持、恢复、拯救这些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而受到威胁和破坏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成果。它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遗产交给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认识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修修补补并不能使人类摆脱剥削、失业、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只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做到这点。因此,它必须重视资产阶级民主的伟大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是几十年来工人阶级漫长的胜利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发展的富有成果的基地。然而,它必须同时认识到,尽管如此,资产阶级民主仍旧只是由资本家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哪怕是最高的形式。它必须教导工人群众认识到,只有

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摧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手段，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重建更高阶段上的、更完善形式的民主，从而把人类资产阶级时代的那些伟大文化成果作为不可缺少的财产加以保护。它必须用这种历史观念使民主社会主义的习性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激情结合成更高的统一体。

它在实践上必须首先为克服无产阶级的分裂而努力。当社会主义的大党和共产主义的大党并存时，它首先必须促使它们采取共同行动，结成斗争联盟。当改良主义的工人大党旁边只有一些小的共产党支部存在时，它可以促进共产党人加入工人大党，可以促进工人大党接受他们。但是，对它来说，统一战线不能成为单纯的口号，统一不能成为偶像。它不能陷入一种幻想，以为把分裂的无产阶级力量简单地相加就足以扩大阶级力量；不能陷于危险的妄想，以为一种组织上的联合如果没有带来最低限度的思想上的统一，竟会是持久的；不能自己欺骗自己，看不到这种联合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资产阶级阵营的反抗，这种反抗会使广泛的和强大的资产阶级群众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从而会成为工人阶级的最大危险。它必须一方面反对死抱住工人阶级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不放而拒绝建立任何统一战线的狭隘态度，另一方面反对看不到统一战线中现实矛盾的幼稚幻想，而是应提出这样的认识：统一战线工作首先是一项意识形态上的任务，即发展最低限度的共同理论认识和共同政治战略的任务，只有在具备这样的最低限度时才能克服在十五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对立，从而才有可能建立起持久的和有效的统一战线。

它必须首先把战后历史的最重要事实，即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发展的事实置于它必须向工人阶级传播的那一历史观念的中心。

它必须同还一直存在于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内部的对苏联的那些鄙陋的、庸俗民主主义的偏见作斗争。它必须教导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认识到，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正在苏联发展起来，这种社会制度以最强有力的、最迅速的发展显示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

义的优越性。它必须利用这一发展的一切成就来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它也必须教导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认识到,一旦苏联在现在已经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不知失业为何物以后,又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到甚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就将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必须教导工人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否在世界上取得胜利,取决于社会主义能否在苏联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苏联的实现,正在把社会主义从一种抽象的思想变为有吸引力的具体范例;因此,苏联必然成为正在临近的社会动荡的中心,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然集合在这一中心的周围,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然全力以赴地捍卫它,它的胜利必然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走向胜利。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到最严重的失败和受到最严重危险的威胁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这样来加强群众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对本身力量的信心、对自身解放的希望,即向他们指出:在那里,在从波罗的海和黑海到太平洋的广阔领域,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已成为现实!在那里,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成长,世界上的工人们,你们将同这一国家结成联盟去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用未来的社会主义公团的国际联盟克服民族界限!

但是,正因为苏联的胜利发展必须在当代整体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念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正因为我们深信,除了苏联的内部发展外,没有别的什么将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前景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必须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集合在苏联的周围,而且必须竭力影响苏联本身的内部发展。苏联发生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只有当唯一能够开始和保持这个过程的专政被废除而由社会主义民主来代替的时候,才会完成。这种民主将使人民群众本身在重新恢复的人权保障、充分的精神自由、直接的集体自决的基础上成为自己的劳动过程、生活过程和文化过程的主人。为了我们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了自由(法西斯主义正在威胁这种自

由,社会主义必须在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比在资产阶级民主下更完善地恢复它)的伟大文化成果,为了社会主义,我们有义务促进苏联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苏联的资本主义敌人面前为它辩护和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它的成就。我们不能放弃对苏联当权者的措施进行坦率批评的权利。苏联本身的发展需要一种社会主义舆论在世界上得到发展,这种舆论充分重视苏联的成就的世界历史性伟大意义,它理解苏维埃专政对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的历史作用,它竭力动员世界上工人阶级的力量来支持苏联并使他们集合在苏联的周围,但是同时,不管当时在苏联是谁当权,只要他们的措施同苏维埃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历史任务发生矛盾,这种舆论就会坦率地批评这些措施,友好地鼓励和呼吁采取各种措施去促进苏维埃制度进一步民主化。

整体社会主义用这种方式竭力使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切身事业,从而教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准备进行将成为他们本身的事业的社会革命。国家权力空前增长,尤其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现代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空前加强,这就使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看来都不可能获得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机器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专政的力量。那种会发展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将几乎只能是一场战争的后果。尽管社会主义的确必须全力以赴地使战争推迟到尽可能遥远的时候,但它也的确必须教育工人阶级准备利用由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暴力机构的动荡而夺取国家政权,从而解放无产阶级。

1914年,交战国的工人政党同本国政府实现了国内和平。它们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战争而必然陷入最严重动荡的时刻停止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斗争。这一情景恐怕会在一场新的大战开始时重新出现。

如果大的民族彼此展开流血的搏斗,如果它们为本身的生存而在

战场上搏斗,那时民族的激情就会获得一种连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也不能抵挡的力量。那时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将超过阶级意识和阶级敌视。那时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大党也会受到民族的群情激愤的压力。

只有在战争过程中,只有在战争的苦难和牺牲日益严重的时候,群众才会逐渐产生敌视战争的情绪。只有那时他们才会接受革命社会主义的忠告,利用由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去推翻资本主义。

没有一个人比列宁更加充分地认识群众情绪的发展:在战争开始时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后来对战争的反抗逐渐加强,最后发展到用革命反对进行战争的政权。1922年海牙和平大会以前,他写了《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这比他为公众所写的文章更明确得多地说明了群众情绪的这一发展。他在其中把“我们要用罢工或革命来回答战争”这种论调斥为废话,指出“只有最愚蠢的人或不可救药的骗子”才会以此为满足。他说,“一般工人组织即使自称革命的组织,在真正日益迫近战争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他要大家回想,世界大战开始时情况是什么样和“为什么情况只能是那样”。他指出,在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然是对本国资产阶级有利的”。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战争期间,“反对战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保存和建立秘密组织,以进行长期的反战活动”<sup>①</sup>。

但是,工人政党在战争中重新同本国政府实现国内和平这一危险不仅会由于群众在战争开始时充满民族激情而造成。各种新的政治事件正在增加这种危险。如果国际联盟把一个国家斥为侵略者,并且呼吁或者责成另一些国家起来制裁侵略者,那么,反击侵略国的战争,对于进行这一战争的那些国家的工人政党来说,就会表现为一场实现国际法、反对违法破坏和平的神圣战争。这一点会诱使它们为进行战争服务,并在战争期间停止反对本国资本主义政府的任何斗争。如果民主国家进行反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那么,无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的敌

---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11—312页。——编者注



视就会诱使民主国家的工人政党去同本国政府实现国内和平。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同苏联结成联盟，那么，保卫苏联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这一点就会成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国内和平的理由。这样，工人大党在战争中再一次成为资本主义政府进行战争的工具的危險，今天比 1914 年不是小了，而是大了。

由于这一危險，革命的社会主义必须力求使群众了解，如果他们不利用战争为他们提供的而且恐怕只有战争才能为他们提供的那种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机会，那么，他们在战后就将再一次经历十分可怕而且还会更可怕的危机，十分可怕而且还会更可怕的失业和群众贫困的时代，就将再一次遭到由战争产生的野蛮的法西斯国家的镇压，就将再一次走向新的可怕的战争。

不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战争期间是像列宁所认为的那样只能通过秘密组织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还是能以合法的手段执行这一任务，不管它是能在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内部执行这一任务还是要被排除出这些政党，无论如何，战争开始时工人阶级中只会有少数人听信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是，在战争的进程中听信的群众会越来越广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将用这种方式在战争的进程中逐渐成为由于战争的苦难和牺牲而革命化了的群众的领导者。

在世界大战中，“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即各工人党中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联合起来的少数反对派，同他们那些党的国内和平政策进行了斗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一次新的战争中将必须进行斗争，以反对民主国家中工人大党的又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内和平政策，但是这一斗争与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在上一次战争中必须进行的斗争并不完全相同。因为社会主义在一次新的战争中的地位由于两个历史事实将有所改变：一个事实是法西斯主义在伟大的德国取得胜利；另一个事实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得到胜利发展。

民主国家反对希特勒德国。谁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这不可能是与工人阶级不相干的。因为希特勒德国的胜利会意味着欧洲的法西

斯化。因此,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暂时有一个共同利益,即战胜希特勒德国。然而,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战争目的,必定而且势将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战争目的相对立。资产阶级想打败德国,是为了瓜分第三帝国,奴役和剥削德意志民族。但是,它不想让对它本身有危险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取得胜利。如果它的武装的胜利在德国引起革命,它就会像它在1918年和1919年所做的那样,力求把德国革命保持在资产阶级的限度内,如果革命超越这一限度,它就会使用它在1917年到1919年在俄国和在匈牙利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使用过的军事力量手段和经济力量手段,来对付这场革命。相反,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企图打败希特勒德国,正是为了在德国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为了立刻允许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没有任何公开和隐蔽的割地和赔款的和平,为了使自己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

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同苏联结成了联盟。如果苏联参与战争,那么,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就取决于苏联能否胜利。它失败了,就会使无产阶级的最大希望破灭几十年。它胜利了,社会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将是不可抗拒的。因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必须集合在它的周围。谁在战争中反对苏联,谁就是搞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勾当。他就是我们的死敌。站在苏联一边并同它结成联盟进行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是苏联的利益。这样,同苏联结盟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暂时具有一种共同利益即争取胜利的利益。然而它们的战争目的是对立的。因为毫无疑问,同苏联结盟的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在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就必定转而反对苏联,因为苏联的胜利对全世界的资本统治来说是致命的危险。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必将全力反抗这种转而反对昨天的盟友的行为,必须同苏联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资本家阶级。

这样,在一场新的欧洲大战的情况下,甚至在那些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在那些同苏联结盟进行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战争目的与无产阶级的战争目的也是对立的。这些国

家的工人阶级只有在做到以下几点时才能实现它的战争目的。这就是:在战争本身的进程中取得政权,使战争服从它的目的,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府为了帝国主义目的而进行的战争转变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保卫苏联的革命战争,从而在战场上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苏联,无条件和无保留地支持革命的国家实行自卫!在希特勒德国和在所有同希特勒德国结盟的国家、在所有对苏联作战的国家,以革命反对战争!在对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国家、在同苏联结盟的国家,只要支持进行战争对保卫苏联和打击希特勒德国是必要的,就支持进行战争,但是,这一支持不是追随资产阶级,而是坚定不移地甚至利用战争的起伏变化在战争的进程中剥夺资产阶级的战争领导权,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战争服从无产阶级的目的!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战争期间通过列宁所说的“长期的活动”唤醒、教育、动员工人群众去完成任务。

堑壕两边的工人政党的这样一种革命协作要求克服一切狭隘的民族观点和民族评价。它要求国际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世界历史的决定时刻使一切民族的特殊利益服从争取社会主义世界胜利的人类利益。这样的国际主义思想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国际中才能得到发展,这个国际包括世界上的工人,不顾他们的生存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不同,不顾他们的传统和思想体系的不同,教育他们去进行目标明确的协作。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不包括年轻的苏联无产阶级,即有着最伟大的革命传统和最伟大的革命成就的无产阶级。共产国际不包括巨大的、有力量的、体现一百年来无产阶级斗争传统的西欧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整体社会主义今天只有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得到发展。因为这个国际的松散结构允许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有在它的范围内进行鼓动和采取行动的自由,只有这种结构才使整体社会主义有可能在这个国际内维护自己的观点;共产国际不容许“背离”它的信条,因此力求克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僵化的对立的那种观点没有可能在共产国际中维护自己和得到贯彻。但是尽管整体社会

主义因此今天只能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发挥作用,它仍旧必须力求克服两个国际之间的对立。如果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工人政党在一次新的战争中动员其全部力量去保卫苏联,利用战争去夺取政权,从而在战火本身中同苏联的劳动群众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那么,这一对立就会克服。如果说上一次大战分裂了世界无产阶级,那么,新的世界战争必须把它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整体社会主义。

当然,联合不是在战争开始的日子实现的,那时群众充满最炽热的爱国激情。联合只有在战争期间的逐步使群众革命化的过程中才会实现,它只有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战争期间必须进行的“长期的活动”的结果才会实现。联合只有在战争进程中通过不同思想的斗争才会实现。如果战争使无产阶级群众革命化,那么,个别的工人阶层和个别的领导集团由于已经完全与改良主义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就不能转向战争所提出的革命任务,仍然袖手旁观,这种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这样,正是战争能够而且很可能将会暂时地引起无产阶级力量新的分歧或者甚至是新的分裂。但是,无产阶级内部的分界线那时将与今天完全不同。来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阵营和来自共产国际那个阵营的人、来自西方今天还是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和来自东方革命的劳动群众的人、不会囿于过去成见的人、有能力和有决心去完成任何一次新的战争必定给人类带来的革命任务的人,所有这一切人都会被战火熔铸成一个整体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这种力量将是人类的争取建立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

译自 1936 年布拉的斯拉发德文版第 233—336 页。

其中部分译文选自《鲍威尔言论》第 471—493 页。

殷叙彝、张凤凤、高燕等译